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扩展版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全文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维普网全文收录期刊

东方论坛

EASTERN FORUM

1988年创刊 双月刊
2023年第1期
(总第179期)

编辑委员会

主任：胡金焱

委员：（按姓氏音序排列）

卞建华	蔡颖雯	陈德球	陈洪连	陈瑞华
董志勇	窦秀艳	方雷	何云峰	侯传文
胡金焱	黄速建	姜异新	姜振昌	刘东方
刘京希	刘喜华	刘跃进	吕周聚	马斗成
孟天运	孙百才	孙继国	谭好哲	王立胜
王庆金	王绍波	王兆胜	王子今	尉利工
魏建	吴义勤	肖建红	钟永光	周潇

主编：孙继国

副主编：冯济平 侯德彤

1988 年创刊

2023

东方论坛

1

双月刊

总第 179 期

□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价值

史家亮 徐艺轩 · 1 ·

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体系

冯志峰 · 10 ·

□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中国当代纪实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重写

——以陈廷一的纪实创作为例

章罗生 · 24 ·

“最风行的是《幻洲》”

——论叶灵凤《幻洲》半月刊的美术编辑

杨剑龙 王 童 · 39 ·

□ 东方文化

佛传与史诗

侯传文 · 49 ·

隋唐华严宗般若理想美学探论

赵建军 · 61 ·

□ 政治学研究

战略竞合与强大自身

——英美权力转移的百年博弈及启示

谢剑南 · 79 ·

□ 历史研究

明末同善会流播考

曾桂林 · 97 ·

民国时期北平红十字会慈善事业述论

王 娟 · 111 ·

□ 金融研究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券信用利差的非线性影响

——基于中国债券市场数据的研究

刘茵伟 张群姿 · 123 ·

□ 乡村振兴

新型集体化乡村旅游：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张言庆 马 波 · 135 ·

乡村社会治理与文化生态修复

——以民间手工艺为例

朱利峰 · 146 ·

THE EASTERN FORUM

The Contents of the 1st Issue for 2023

Contemporary Value of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i Jialiang Xu Yixuan(1)
On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of the Economic Work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eng Zhifeng(10)
Contemporary Chinese Documentary Literature and the Rewriting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A Case Study of Chen Tingyi's Documentary Creation	Zhang Luosheng(24)
"The Most Popular is <i>Fantasy Island</i> ": Art Editor Ye Lingfeng of the Semimonthly	Yang Jianlong Wang Tong(39)
Buddha Biographies and Epics	Hou Chuanwen(49)
On the Ideal Aesthetics of Prajñā of Huayan School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Zhao Jianjun(61)
Strategic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and Self-strengthening: A Centennial Game of Power Transfer Between Britain and America and Its Enlightenment.....	Xie Jiannan(79)
A Study of the Spread of Tongshan Association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Zeng Guilin(97)
On the Charity of the Red Cross Society in Peiping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ng Juan(111)
Nonlinear Effects of the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on Bond Credit Spreads: A Study Based on Chinese Bond Market Data	Liu Yinwei Zhang Qunzi (123)
New Collectivized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trinsic Logic, Actual Dilemma and Practical Approach	Zhang Yanqing Ma Bo(135)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and Cultural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 Case Study of Folk Handicrafts	Zhu Lifeng(146)

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价值

史家亮 徐艺轩

山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济南 250358

摘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全面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问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实现新突破。中国式现代化确证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强大生命力,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提供了开创人类美好未来的新范式。科学认识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价值,对于新时代新征程的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 时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3)01-0001-09

早日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无数中国人的追求和梦想,也是党领导和团结人民为之不懈奋斗的重要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本质要求、战略安排、重大原则等一系列问题,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入到一个新的关键时期。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科学认识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价值,不仅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建构,而且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中国式现代化确证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是勇担使命的政党,具有先进性和纯洁性,具有组织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实践表明,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得以开创并不断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党的全面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不断提高党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不改变,实践不改向。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我国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原因,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把握的首要原则。

历史经验表明,现代化不可能自在自发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发端于中华民族危亡的关键节点,诞生于中华民族迫切地想改变自身命运的吁求之中。近代以来,为探寻国家和民族的出路,无数仁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贡献研究”(21&ZD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史家亮,男,山东莒南人,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徐艺轩,女,山东安丘人,山东省高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科研助理,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人志士“你方唱罢我登场”,但均未能解决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根源性问题。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南,在探寻国家和民族出路,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进程中,推动中国走上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先是团结带领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奠定了独立探索现代化道路的政治前提;然后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着力探索一条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现代化道路;进而团结带领人民推进改革开放,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实践首先深刻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在走向现代化的探索过程中,这一最本质特征逻辑地呈现为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多个维度。就道路维度而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新时代作出了“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探索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民族复兴的路径。就理论维度而言,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时代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新飞跃,创立了理论完备、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①的过程中,继续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并成为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理论。就制度维度而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建立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日益完善的制度保障。就文化维度而言,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传承弘扬红色文化,不断发展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增强人民的文化自信,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有机统一,集中体现党的领导这一核心本质。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实践彰显了党的领导独特优势。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历史自信和历史主动精神的政党。党的领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居于统领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着顶层“决定性、全域覆盖性、全局指导性的作用”^②。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传承弘扬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形成了信念坚定、矢志不渝的思想优势。中国共产党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坚持把群众路线贯彻到党治国理政各个方面,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了深植于民、人民至上的群众优势。中国共产党以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民主集中制作为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法宝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贯彻执行,形成了体系完备、组织严密的制度优势。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中国共产党牢牢把握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宝贵经验、优良作风和独特优势,不断增强历史自信。党的历史自信“不仅是当下自信、自立、自强的基础,而且蕴含着接续奋斗的底蕴和启迪”^③。在新征程中,全党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以孜孜不倦的精神状态为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团结奋斗。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就表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一切成就的根本原因。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7页。

② 丁俊萍:《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应深刻把握的若干关系》,《理论探索》2020年第2期。

③ 丁兆梅:《坚定历史自信内在依据的四维审视》,《东岳论丛》2022年第10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比较优势根本在于其不断取得新成就。新时代十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①,经受住了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党史看,这是践行初心使命、坚定历史自信和增强历史主动的十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巩固了核心领导力量。从新中国史看,这是科技进步、经济腾飞、强国战略卓有成效的十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积累了雄厚物质基础。从改革开放史看,这是推进更深层次改革和更高水平开放的十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强劲发展动力。从社会主义发展史看,这是结合时代课题不断推动科学社会主义振兴的十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积累了经验、增强了信心。从中华民族发展史看,这是饱含从“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实践的十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凝聚起磅礴力量。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要求始终注重加强党的建设。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适应这一时代要求的必然选择。党的建设是关乎中国式现代化事业能否持之以恒稳中有进,攻坚克难迎头赶上的关键问题。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反思、自我完善、自我提高中不断锤炼坚强的党性,不断提升从容应对前进道路上风险挑战的娴熟能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②党的建设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深刻影响着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伟大征程上进行的新的伟大斗争。由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时刻牢记“三个务必”,始终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以党的永不变质保证江山永不变色,始终发挥党的坚强领导核心地位和作用。

二、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强大生命力

从现代化语境来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运用和发展,推动中国的现代化理论逐步由被动转为自觉。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③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性和价值性的有机统一,其基本原理和贯彻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指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科学理论指南。中国式现代化也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现新飞跃。

纵观百年党史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过程也是一部探索我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每一次理论的历史性飞跃,都推动我国现代化迈入新的历史阶段。党的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带有中国风格、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理论。这一理论的一个鲜明实践指向,是党以强烈的历史自觉和历史主动精神担当起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重任。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6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64页。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6页。

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为进一步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导,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头追赶世界现代化的步伐,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进行理论探索 and 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重大理论成果在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过程中,系统回答了“为什么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什么样的中国式现代化、怎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等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所形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思想引领,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首先,这一重要思想科学阐明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系统回答了“为什么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各国发展的共同追求和奋斗主题,也是理解新中国发展历程的核心话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借鉴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理论,反思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及不足,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探索和实践的成就和经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不断进行新的突破,确证中国要获得发展的独立性、自主性、安全性,必须抛开西方的现代化思维原则,构建独特的中国式现代化体系。独有的历史底蕴、独有的文化传承、独有的复杂国情,使得当代中国的伟大变革势必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把自信自立作为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符合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探索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逻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逻辑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逻辑。

其次,这一重要思想科学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系统回答了“推进什么样的中国式现代化”问题。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模式,归根到底要看这一模式是否符合自身实际、能否解决现代化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必须符合社会主义的属性和本质要求。由此,中国式现代化具有西方现代化所不具备的特色和优势,这集中表现为党的领导的最大优势、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合作共赢的发展模式、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表现形式等。这既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内涵,又昭示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和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牢牢立足于时代和实践,立足于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立足于历史经验的运用和新的实践的发展,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要求,极大地丰富发展了人类社会现代化理论。

最后,这一重要思想科学阐明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安排和需要把握的重大原则,系统回答了“怎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步走”战略安排,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清晰的目标定位和战略部署。在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确保了推进现代化过程中政治上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道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实践上的道路遵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确定了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深化改革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行稳致远的强大动力;坚持发扬斗争精神,为应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风险与挑战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归结以上内容可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崭新的思想内容丰

富和发展了现代化理论,建构起系统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科学理论体系,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思想理论指导。

中国式现代化以其实践及成就印证了“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南和世界观方法论指导,中国式现代化新的实践不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鲜活的思想来源。这就要积极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为此,要以新的视野不断深化对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科学回答现代化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维度推进丰富和发展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三、中国式现代化深刻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是有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提。”^②中国式现代化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深刻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对于在新征程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完成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和把握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邓小平 1992 年的“南方谈话”明确凝练了社会主义本质要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③这一重大论断在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过程中,江泽民提出:“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④这一重要论述从人的主体性角度发展丰富了社会主义本质论,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胡锦涛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⑤和谐社会理论突出了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意义,将社会建设纳入到现代化建设布局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⑥等重要论断,将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内容,坚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认识的发展,深化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中国式现代化深刻反映了对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本质的把握。中国式现代化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16 页。

② 李海青:《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四个层面》,《重庆社会科学》2022 年第 5 期。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73 页。

④ 《江泽民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294 页。

⑤ 《胡锦涛文选》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522 页。

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年,第 142 页;《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 114 页。

的发展过程,始终贯穿了一心一意谋发展的主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更是强调以高质量发展奠定现代化的坚实物质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①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促进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理论与实践互动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一重要思想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理论指南。

中国式现代化深刻反映了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把握。人的现代化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人的全面现代化与人的全面发展有着相同的蕴含。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依靠人民推进现代化建设。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鼓励人民自觉参与到党和国家的共同事业,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和历史创造性的发挥,为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不竭的力量源泉。强调人民群众的主体意义远不止仅仅把人民的力量聚集起来,更重要地是坚持人民是现代化价值享有的主体,使人民更多更公平地享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与价值实现的有机统一。

中国式现代化深刻反映了对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把握。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层面归纳了社会主义本质中“目的”与“手段”的矛盾运动规律,在实践层面揭示了从“解放生产力”到“共同富裕”的阶段性发展规律,不断丰富发展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理论,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共同富裕有了更为明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有了不断完善的激励机制和日益健全的制度保障,共同富裕的成效不断得到有效提升。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战略任务,必须坚持循序渐进、久久为功,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

中国式现代化深刻反映了对促进社会和谐的本质要求的把握。社会和谐离不开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公平正义是衡量一个国家和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过程,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的过程,也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不断推进的过程,从而为社会公平正义提供日益坚实的保障。另一方面,社会和谐客观上存在人与自然和谐的向度。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一直思考和应对的一个重要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现代化的探索历程日益增强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意义的认识,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内涵和要求,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四、中国式现代化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

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反映了这一现代化模式的重大实践价值和深远历史价值,对于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8页。

完成党在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具有重要意义。在新征程中,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显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高度自信。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①近代以来,以救亡图存、民族复兴为逻辑起点,激烈的思想交锋、不同的道路选择、曲折的模式探索,构成了一幅中华民族气势磅礴的光辉实践的历史图景。拨开这些历史画面的表象,中华民族由危亡走向复兴的实践内在地蕴含着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探寻。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自觉承载起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使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彻底结束了中华民族备受欺凌和压迫的屈辱历史,为探索一条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建设道路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百废俱兴、百端待举的复杂局面,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理论,明确提出了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但无论是1964年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第一次正式而完整地提出现代化任务,还是1975年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四个现代化,这一历史时期的现代化仍然是一种以工业化为导向的现代化,这一时期提出的强国目标更多地带有前瞻性和战略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敏锐把握国际形势的重大改变,科学判断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并基于对时代主题的新把握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和战略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②,并将中国式现代化和小康社会建设联系在一起。由此为中国式现代化这样一个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实践模式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观也开始从单一现代化向全面现代化推进。改革开放开启并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各项建设,建立了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充分发挥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比较优势。“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五大领域统筹兼顾,完备地体现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针。“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又有战略举措,完整地展现出党治国理政总体方略。对内治理方面,五大新发展理念深入人心,新发展格局不断得到完善,高质量发展得到持续推进,“六个精准”“五个一批”助力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区域经济一体化、城乡发展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等进程不断加快。对外合作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新时代十年,党和国家取得的重大历史成就、实现的重大历史变革,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

着眼于未来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锚定“两步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昭示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19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7页。

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未来。只要全党坚持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政治担当淬炼党的坚定信念,以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政治品格外化党的优良作风,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政治智慧提升党的政治本领,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就能扛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推动如期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五、中国式现代化为开创人类美好未来提供了一种新范式

在世界历史意义上,现代化发端于西方资本主义。但是,“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照搬外国模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①中国式现代化是立足于自身民族复兴实践的对现代化模式的重构。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是所有人共富而不是少数人独富,更不是西方两极分化的现代化;实现了“资本逻辑”向“人民立场”的转变,克服了极端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局限,强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同时,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突破了对“工业化”即现代化的局限性认识,把中国现代化发展到以“整体文明”为导向的新阶段。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社会现代化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参考借鉴和力量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经历了曲折探索,有成功也有教训。中国式现代化过程始终蕴含着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历史主动,契合了百年来中国人渴求民族复兴的强烈愿望和更加开放、更加主动地拥抱世界的现实需求。改革开放以后,受西方文化价值观主导,中国的现代化经历常常被拿来与西方国家的经验比较。但实践日益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由内部因素、外部力量、行动实践、观念意识、传统文化、人类共同价值相互作用形成的,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局限,形成了一种从西方中心主义转向多边主义、从西方的串联式发展转向并入式叠加发展路径。另一方面,西方现代化始终伴随着血腥、暴力,奉行零和博弈的外交理念,而中国式现代化则坚持共建共商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秉持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共赢理念。中国式现代化以自身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彰显了为人类谋大同的责任担当,有力回应了西方社会“强国必霸”的线性逻辑。所有这些,都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了全人类共同价值。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切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②中国式现代化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应对全球挑战。当前,世界局势风云诡谲,国际形势变幻莫测。在这一时代局势面前,中国始终立足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价值基点,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塑造全人类共同价值作出无可替代的重大贡献。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西方国家凭借现代化的领先优势,垄断了现代化的话语权,构建了一套有利于西方的现代化话题体系,将现代化与西方化画上等号,将先进、发达与欧美国家挂钩,将民主、人权与西方价值观绑定,落后、贫穷、污染则成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刻板印象。西方国家通过控制意识形态来营造出现代与传统的对立,塑造“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叙事体系,

① 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7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63页。

利用这套语言与逻辑框架来固化西方的权威性与控制全球治理的能力。中国式现代化所取得的成就打破了旧的世界格局,使环太平洋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在经济实力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前提下,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治理体系的重构,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迈进,为世界赢得更为有序的国际营商环境和更为和平的国际发展环境。

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了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在深刻改变中国面貌的同时,也助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呈现出高度的文明自觉。党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中,在重视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同时,坚定不移走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在以经济建设为统领的同时,兼顾社会各领域的治理与完善,坚持以系统观念为方法原则进行前瞻性思考,保证党和国家的重要方针政策全局性谋划、各项事业整体性推进;在坚持造福中国人民的同时,也坚持造福世界人民。中国式现代化建构起一种“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的文明、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相统一的文明、合作共赢与和平发展相结合以及共建共享与交流互鉴相结合的文明,这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做出的原创性贡献。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全球视野上重新定义了现代化,极大地拓展了人类对现代化的想象与实践,推动人类沿着现代化的正确道路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责任编辑:潘文竹

Contemporary Value of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i Jialiang Xu Yixuan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358, China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Party's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comprehensively explains the issu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promote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achieve new breakthrough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has confirmed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the strong core of leadership of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emonstrated the strong vitality of Marxism in adapting to Chinese conditions and the times, reflected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eralded its bright future, and provided a new paradigm for creating a better future for mankind. Understanding and grasping scientifically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far-reaching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practice of the new journey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ntemporary value

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体系

冯志峰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西 南昌 330108

摘要: 新时代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做好经济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加强党对经济工作全面领导的关键,在于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体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和政治高度统一的辩证关系,科学回答新时代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个重大问题,全面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各级党组织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正确把握好党领导经济工作制度体系的本质特征、价值取向、保障战略和实践要求,切实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促进高质量发展、推动高效能治理、维护高水平安全、创造高品质生活,为确保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国家长治久安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凝聚强大的社会力量。

关键词: 党领导经济; 经济和政治; 辩证关系; 系统集成; 经济规律; 人民美好生活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3)01-0010-14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不断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人类永续和平。实现党和人民奋斗目标的基础,就是不断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能力,以创新举措持续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①新时代要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就必须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落实好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分析新时代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根本要素,更为深刻地把握新时代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才能科学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实践之问,更好地坚持和完善领导有力、科学有序、运行有效、发展有为的党全面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激发全社会组织力、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经济长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新奇迹。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对地方党委书记权力的党内监督体系研究”(9ADJ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冯志峰,男,江西东乡人,法学博士,中共江西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院长,主要从事党领导经济工作研究。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3页。

一、制度的本质特征：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所在。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就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切实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①。

（一）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是新时代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

古今中外一切国家发展实践以铁的事实印证了这条金规铁律：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实现“民富国强、重安道泰”，都需要有一个强大的领导组织或领导集团来团结带领其区域内人民共同奋斗才能得以完成。中国春秋时期的管子早在《管子·霸言》中就明确提出：“夫国大而政小者，国从其政；国小而政大者，国益大。”^②这就较早地指出了一个国家大小与其领导集团能力强弱之间存在的正相关关系：如果一个国家很大，但是其领导集团比较弱，这个国家就会慢慢衰败；如果一个国家很小但其领导集团能力强，这个国家就会不断强大，因此一个大的国家必须有一个足够强大的政治集团来领导治理才能实现繁荣进步。正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由此凸显了一个国家或政党领导核心的极端重要性。

近代政党产生以来几百年的历史实践又进一步深刻说明，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成为现代化强国，必须要由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党来实现有效领导，才能有效防范化解发展道路上的各种重大风险挑战，在经济发展的大海中破浪前行，成功到达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彼岸。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早在美国建国初期就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科学思考，明确要求通过维护中央权威来增进全社会的长治久安，更好地维护公众的权利和自由：“我想，凡是能思考的人们，大都已开始认识到：我们的制度在理论上比实践上更完善；尽管把美国的优点吹嘘得天花乱坠，我们将很可能提供最新的但可悲的证明：人类的统治者不使用强制手段是没有本领管理自己的。”^③为此，华盛顿力主坚持要维护中央权威：“我怀疑是否有任何一种制度，不使用政权的强制力量就可以使中央政府的法令得到应有的贯彻。而做不到这一点，其他都无从说起。法律和法令无人遵守，或者不能完全贯彻，反而不如根本没有，因为零不过是等于零，有法令而不能贯彻则会产生忌妒和不满。”^④正是基于对历史进程的深刻洞察，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也睿智地提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区别，并不在于政府统治形式的不同，而在于政府统治程度的高低。”^⑤一个现代化国家成功的关键在于“具有适应性强和凝聚力高的强有力的”政党制度，“一个现代化中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⑥即使与亨廷顿在

①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7页。

② 《管子精华》，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0页。

③ [美]乔治·华盛顿：《关于邦联的缺陷》，《华盛顿选集》，聂崇信、吕德本、熊希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21页。

④ [美]乔治·华盛顿：《强制的力量必不可少》，《华盛顿选集》，聂崇信、吕德本、熊希龄译，第222—223页。

⑤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1页。

⑥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译，第396页。

不同观点上常意见相左的另一位著名学者福山也赞同亨廷顿的观点,明确提出:“穷国之所以穷,不是因为缺少资源,而是因为它们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①,未能产生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党领导核心将社会力量有效地组织起来,导致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一错再错,陷入了“发展陷阱”而不可自拔。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面对一盘散沙、积贫积弱、备受欺凌的旧中国,中国共产党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前所未有的责任担当将全国人民凝聚起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在一百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不断衰落的命运,科学回答了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如何通过和平发展实现经济超越发展的世界级难题,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西方学者们都不得不由衷赞叹:“20世纪中期最突出成就之一,就是1949年中国在经过百年的动乱后首次建立起了一个真正能治理中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②这就以铁的事实有力地证明,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强民富的根本所在。实践证明,我们什么时候坚持党的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就能保持良好势头,民族的向心力就越来越强,人民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好;什么时候偏离党的领导,发展就会停滞,社会就会倒退,国家就会面临动荡不安、分崩离析的重大危险。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的重大理论观点,明确指出:“党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党的领导当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抓住了中心工作这个牛鼻子,其他工作就可以更好展开。”^③中国经济是一艘巨轮,体量越大、风浪越大,越需要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才能更好地领航掌舵,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航船劈波斩浪、一往无前。新时代党的全面领导要在经济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就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把握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切实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全面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治能力、战略眼光、辩证思维和专业水平,推动形成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社会发展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我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

(二)党中央权威是危难时刻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的根本依靠

任何一个国家或组织如果缺乏权威,就不可能会形成一致的行动,实现预期的奋斗目标。由此可知,一个国家或政党组织如果缺乏权威,这个国家或政党组织就不可能具有公信力,就没有足够的

① [美]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页。

② [美] 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0页。

③ 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2年,第15页。

力量将广大人民群众凝聚起来,人民就会沦落为乌合之众,社会就必定会成为一盘散沙,陷入发展停滞的陷阱。这是一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政治发展规律。

英国政治学家甘布尔认为:“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如何建构权威,以统一人们的行动。”^①德国政治学家马克斯·韦伯反复强调:“权威是现代文明的基石,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非凡的作用。它也有利于一切指望这种权威保障自身权力和财产的人。”^②恩格斯深刻地指出过,在任何社会,权威是用来解决问题的,没有权威这个社会就无法有效地组织起来。如果人们“把权威原则描写成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描写成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因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而有所改变的。”^③因为,国内外历史反复地证明,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其后果是不可设想的。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认为其失败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以中国解放战争为例,国民党军队虽然在数量上占据优势,但由于军队系统内部山头林立、各自为政,导致军队行动效果不断呈现出做“减法”的趋势,而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具有高度权威,在内部之间高度团结、行动一致,而且动员能力强,就像杠杆的效应,不断体现出做“加法”的态势。在这一加一减的交互变化中,实际上代表着人心向背,代表了历史发展规律,从历史、现实、理论、实践和制度等各方面都印证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重大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既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历史镜鉴,又是对西方政党文明制度的借鉴吸收,更是我们党一百多年来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经验总结。在遵义会议以前,由于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我们党的事业屡遭挫折,一度陷入面临亡党的危险。遵义会议后,我们党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成熟的、有权威的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新阶段,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进而领导人民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继续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应时代之变迁、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从新的实际出发团结带领人民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大疫情和世界局势复杂动荡的叠加冲击,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深刻地认识到:党中央权威是危难时刻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的根本依靠,在重大历史关头、重大考验面前,党中央的判断力、决策力、行动力具有决定性作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最重要的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最关键的是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每一个党组织、每一名党员、每一位干部,都必须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

① [英] 安德鲁·甘布尔:《政治与命运》,胡晓进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3页。

② [德]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56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2页。

绝,始终保持全党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最高原则,加强新时代党领导经济工作就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强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重视从讲政治的高度做经济工作,把握经济发展规律,理顺中央和地方职责关系,构建从中央到地方运行顺畅、充满活力、令行禁止的工作体系,不断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科学化、法治化、专业化能力和水平,结合实际创造性抓好工作,不断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促进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是新时代党领导经济工作需要把握的根本矛盾

生产方式是指人们为取得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自然界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一般而言,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能动统一。生产力是指生产主体利用劳动工具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的能力,表现为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或者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物质力量,是人类的本质力量在历史中的全部展开。生产关系是指在生产劳动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生产方式的两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反过来制约着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就是建立在生产力即主体与客体关系基础之上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

社会主要矛盾是某一时期主导性、决定性矛盾,从根本上说,其他矛盾的解决都要服从于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也是我们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根本任务。在人民需要和社会发展的这一对矛盾关系中,人民需要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社会发展的目的是满足人民需要,这是我们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理念。生产方式内在矛盾主要体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不同的时期体现出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决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以及反官僚资本主义,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决定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把原来落后、混乱、畸形发展、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引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增加物质产品,更好地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主要任务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一百多年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虽然多次发生转化,但从根本上反映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这条逻辑主线。新时代,这一对矛盾有新的内涵,从生产力看,是发展的不平衡不

充分；从生产关系看，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我国经济工作就要在更高水平上来解决这一对根本矛盾，不断完善以党的组织力为核心、以生产力为导向、以创造力为中心、以执行力为保障、以发展力为基石、以号召力为目标的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提升组织的先进性、战略的前瞻性、决策的科学性、治理的绩效性、发展的科学性，以后发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突出贡献，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二、制度的价值取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鲜明的品格。坚持人民至上，站稳人民立场，增进人民福祉，以中国式现代化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我们党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目的。

（一）人民至上是党作出正确抉择的根本前提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是一个政党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任何一个国家或组织的兴衰存亡，在一定程度上都决定于“人心向背”这个根本规律。古今中外，无论何种执政者代表何种利益，都必须宣示自己是为全体人民利益而奋斗，才能长期有效地维持自身统治。由此可知，人心向背本质上反映出一个执政党是以哪些社会阶级为执政基础，从而最为根本地维护哪些阶级的根本利益。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中国古代也有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朴素的民本思想，但这些民本思想对于广大人民来说都是统治者为更好地麻痹人民、实现专制统治的有效工具。在西方的政治学说中，以卢梭等为代表的思想家曾提出人民主权学说，承认人民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权威，这一学说在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西方话语中的“人民”终究还是“资本逐利”视角下的冠以“人民”名义的资产阶级，并不符合“人民”的本质含义，只是打着“人民”的幌子成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用来更好地统治广大人民群众。无产阶级政党则第一次真正将“人民至上”作为党的根本宗旨，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一切理论和实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人民至上”的概念，强调“人民至上”与黑格尔学说、法国空论派等一切唯心主义的“理性之上”根本对立，明确指出“历史的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①为此，他们科学系统地阐释了以人民至上为核心的唯物史观，指出历史的前提是从事物质生产生活的“现实的人”。而将“现实的人”之人有效地团结动员起来为既定目标不懈奋斗，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使命任务。

中国共产党创立伊始就把“人民”二字铭刻在心，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

^①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04页。

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①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坚持人民至上,成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十大历史经验之一。这主要是因为,人民至上是作出正确抉择的根本前提,只要心里始终装着人民,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就一定能够作出正确决策,确定最优路径,并依靠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人民至上,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永远铭记人民是共产党的衣食父母,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以370多万共产党员的牺牲换来了新中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盛世,无数英雄用鲜血和生命践行了人民至上的理念。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明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立场,鲜明主张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伟大斗争中,我们党不惜一切代价救治患者,这是人民至上的真实写照,与西方漠视个体生命形成了鲜明对照。我们党不仅致力于解决人民的根本利益、整体利益,也注重解决群众的现实利益、个体利益,坚持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持续夯实了党的长期执政基础,巩固了党的长期执政地位。

(二) 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力量

在西方国家的政治架构中,人民被视为一种政治力量,是在竞争选举、争取支持等博弈活动中可以利用的政治力量,是实现资本家财团目标的有效工具。与历史唯心主义的神创论、英雄史观不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决定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历史的思想和活动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无产阶级政党“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②,“自觉地当工具”^③来为人民谋利益。这就充分体现出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本质不同所在。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作为党的领导的力量源泉,作为执政的最大底气,把人民视作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在革命战争中,我们党依靠人民群众的小推车推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在百废待兴的建设年代,我们党依靠广大工人阶级白手起家、肩挑手扛铸就了新中国工业的初步崛起;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依靠农民大包干的智慧开启了农村改革的序幕。进入新时代,我们更需要将人民作为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始终紧紧依靠人民力量书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壮丽华章。

我们党来自于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我们党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始终牢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5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5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73—374页。

记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始终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就一定能够领导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不断把为人民造福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三)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目的

发展经济为了谁,经济发展的成果谁来分享,这是经济学的终极命题,也是各国执政者无法回避的问题。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早就把经济发展归结为财富的积累和资本的增长。当代以来,经济学界逐渐把经济发展的重心放在人的因素上,认为经济发展不仅限于量的积累,更包含着增加就业、提高收入、消除贫困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多重内涵。

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推进各项工作。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经济斗争融入军事斗争、政治斗争,致力于解决农民的最基本生活需要。党执政后,在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努力改善人民生活。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就其表现载体的形式而言,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生动的,是时时刻刻展现在中华大地上人们纷繁复杂的现实利益的动态表达,具有多样性、层次性和递增性的特点。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进程中通过建立健全从中央到地方的强大组织网络体系,塑造崇高社会理想和先进价值观的意识形态体系,发挥先进模范作用的精干干部队伍体系,展现令行禁止的严明纪律规章体系等,不仅使自己成为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而且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的一切力量,结成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通过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等方式,将发展推动力、社区服务力、情感治理力、自我革新力有机地贯穿在创造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全过程,形成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合力。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党中央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我们党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正确处理增长和分配的关系,把“蛋糕”切好分好,让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越来越好,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更充分体现。

三、制度的保障战略: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就必须立足我国制度优势,结合实际情况,增强忧患意识,全面深化改革,大力推进开放,做到居安思危,既通过发展提升国家安全实力,又在发展中更多考虑安全因素,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重大风险挑战,确保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一)制度优势是形成共克时艰磅礴力量的根本保障

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稳定性问题,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根本优势,因为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是制度竞争。衡量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有效、是否优越,最为根本的方面看这个国家的制度在重大风险挑战面前,能不能有效地把全国人民团结带领起来,为了共同的目标众志成城、攻坚克难、坚毅前行。由于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经济学在发展中形成了举足轻重的制度学派和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使我们更关注制度的作用,强调非市场因素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主张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以熨平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20世纪80年代末苏东剧变以来,休克疗法对经济发展带来的重创及其衍生的复杂乱象,更使人关注制度变迁、制度转型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管不管用,有没有效,实践是最好的试金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①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以铁的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正因如此,在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下,我们不迷惑、不动摇、不摇摆、不懈怠,始终坚持根本制度、保持制度定力,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使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发挥出攻坚克难、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能量,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宁、国家统一提供了有力保障。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多种严重自然灾害频发、新冠疫情肆虐、国际环境复杂严峻、外部打压持续的新形势下,我们党从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到日益丰富不同领域具有创新性、支撑性的重要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层次分明、系统完备,各项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守住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底线,实现了经济发展的稳中求进、稳中有进,推动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对比更加鲜明。这些事实充分证明,

^①《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2页。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能够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独特优势,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和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使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发挥出攻坚克难、推动发展的强大能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新时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和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在推动发展上拥有强大的政治优势、理论优势、制度优势、文化优势。善于运用制度力量应对风险挑战冲击,我们就一定能够经受住一次次压力测试,不断化危为机、阔步前行。

(二) 改革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之一,更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创新理论”的鼻祖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的核心不单在于生产要素的积累,创新驱动才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最大驱动力。二战以来,一些新兴经济体出现了高速增长发展,根源就在于源源不断的创新。当前世界经济发展陷入二战以来程度最深的衰退之中,除了外部因素的冲击之外,其根本问题就是增长动力不足、缺乏创新。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开拓创新史。长期以来我们依靠改革创新,走活了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棋局,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新路。改革与创新是相伴相随、相辅相成的,改革是对旧的不合理部分进行改变与革新,创新是对常规内容的打破并进行新的创造,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有学者指出,“无论是迫于环境的压力还是协商后的选择,我们的政治制度正在越来越多地介入迄今尚未受到控制的领域,越来越多的决策范围被集权化,即由权力决定一切。很多这样的扩张,不是要求人们接受,就是被人们认为可以接受。然而,凡是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生冲突的地方,斗争就开始了。”^①“市场的自动作用妨碍我们理性而审慎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因为市场制度是一种受自身反馈作用调节的‘自发秩序’,它由目标构成的‘人为秩序’是冲突的。”“今天的每一个政府都在不断干预经济过程,当然也都在制订计划。”^②实际上,“市场是整个经济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没有人会认为市场系统与经济系统是同一回事。”^③经济系统要比它的市场子系统更为巨大,这是根据系统与子系统各自定义的区别业已包含的结论。因为,公共性产品和外部性效应,已确切地表明经济系统是涵盖并大于市场系统的。市场从根本上来讲只是一个生产部门的子系统,这一点至关重要,它把商品(不是服务)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联系在一起。一百多年来,党领导人民披荆斩棘、锐意进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敢为天下先,走出了前人没有走出的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正从中高速增长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的驱动力也要相应的从要素扩张转向创新驱动,创新日益成为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能否有效实现的决定性因素。我们要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将改革与创新融合起来,不断激发增长动力和市场活

① [美] 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下卷:古典问题)》,冯克利、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00页。

② [美] 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下卷:古典问题)》,冯克利、阎克文译,第603页。

③ [美] 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下卷:古典问题)》,冯克利、阎克文译,第613页。

力,加大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牵住创新这个“牛鼻子”,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经济社会发展打造新引擎。

(三)实现安全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根本要义

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和目的,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和保障。进入新时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①“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②党要领导做好经济工作,就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发展仍然是当前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是维护安全的基石,发展得好本身就是最大的安全,发展不好本身就是最大的隐患。新时代党领导经济工作,必须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实现安全发展,这是经济发展的根本要义。没有了安全,国家发展就无从谈起,再辉煌的发展成果也会毁于一旦,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一质的规定性,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力量。长期以来,我们在经济发展中强调安全发展,一般来说是从狭义上来把握“安全”的涵义,指的是安全生产和安全管理,避免发生安全事故。要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既通过发展提升国家安全实力,又深入推进国家安全思路、体制、手段创新,营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在发展中更多考虑安全因素,努力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影响我国发展的内外因素日趋复杂,我们拓展了安全发展的内涵和外延,从国家安全的视角来统筹发展和安全,将国家安全放在新发展格局思考和谋划,形成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党的十九大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并写入党章。从我国的发展阶段来看,发展的高线是高质量,发展的底线就是要安全,就是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并做到稳中有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③在我国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夯实国家安全和稳定基层基础,完善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④。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52 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11 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 19 页。

④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52 页。

四、制度的实践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必须严格按照正确的战略需要正确的策略来落实的要求，把战略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以稳求进、以进固稳，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情，以更加认真的态度、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科学的方法取得最好的效果。

（一）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经济工作的根本战略

就像人类社会的发展要经过长时间的演化、从较低形态向较高形态进化一样，经济发展也包含着进化论的道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总是要从较低阶段演化为较高阶段。当然，这个过程不是线性的，而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1960年罗斯托夫首次将经济发展划分为传统社会阶段、“起飞”过渡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大众高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总的来说，对于一个经济上处于良性发展的国家，其发展趋势就是由低到高、由量到质、由低质量到高质量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100多个重点收入经济体中，只有十几个成为高收入经济体，那些取得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就是在经历高速增长阶段后实现了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深化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先后提出了“多快好省”“发展是硬道理”“科学发展观”等发展理念，实现了经济发展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再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中国经济发生了显著的质态变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新时代我国发展的基本特征，也应当成为我国经济工作的根本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①新时代经济工作，必须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和战略谋划，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战略，在战略上赢得主动。各地要创造性贯彻落实党中央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激励干部担当作为，鼓励创造性贯彻落实，防止空喊政治口号的形式主义，防止简单粗暴的命令主义，同时要克服慢动作、跟不上现象，创造性地在学习和实践中找思路、想办法、寻对策，努力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手，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二）科学决策和创造性应对是化危为机的根本方法

世界万事万物都处在变化之中，风险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当今世界就是一个“风险型社会”。面对这个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不确定的世界，面对各种各样风险危机的隐患，我们党作出科学决策和创造性应对是化危为机的根本方法。

从世界各国发展进程来看，现代化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其本身就孕育着发展的不确定性，蕴含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危机，让人们在追求物欲的过程中容易迷失自我。特别是在西方国家，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是西方风险社会深刻的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难以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0页。

克服的内在矛盾。全球化的发展,加剧了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科技等领域的风险在全世界生成和扩张,演变为世界性经济风险。近年来频发的“黑天鹅”“灰犀牛”事件,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敲响了警钟。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都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的特征更趋明显,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风险相互叠加。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这就要求我们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着力破解各种矛盾和问题,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安危不贰其志,险易不革其心。”面对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的长期性、复杂性,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坚持系统思维、法治思维、战略思维、底线思维,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科学预判形势、精准推出举措,继续抓住并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坚定信心、把握主动、稳扎稳打、协同推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努力实现最优政策组合和最大整体效果,不断为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三)科技自立自强是促进发展大局的根本支撑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是一个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立身之本。纵观人类历史长河,一部人类社会的进化史就是一部科学技术的发展史。马克思精辟概括了科学技术的伟大历史作用,认为科学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世界经济强国发展史告诉我们:世界经济强国无一不是当时的科技强国,即便是一些小国弱国依靠科技自立自强也能较快地发展成为经济强国。十五、十六世纪,葡萄牙曾凭借先进的航海技术,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而在人类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英国、美国抓住机遇,先后崛起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科技创新是一个关键变量,科学技术的竞争成为国家间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因素。

坚持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自立自强永远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安身立命最坚实的依靠和屏障。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战略性、关键性支撑。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艰辛历程不断地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必须自主研发才能实现突破。我们“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①我们唯有坚持自主创新,增进原始创新能力,才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牢牢把握科技发展主动权,领先科技发展潮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科技支撑。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内在的也需要更高水平的科技人才、更高层次的科研平台、更加优化的科研环境,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我们要坚定不移实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1页。

施科教兴国战略,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形成国家实验室体系。科学统筹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强科技基础能力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全面塑造新时代我国发展新优势,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在解决突出问题中实现战略突破,在把握战略全局中推进各项工作,坚定不移地把国家发展建立在更加安全、更加可靠的基础之上,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强有力的科技保障。

责任编辑:侯德彤

On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of the Economic Work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eng Zhifeng

School of Marxism, Jiangxi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Nanchang 330108, China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it is a major task for the Party to strengthen its overall leadership over economic work so as to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key to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overall leadership over economic work is to continue and improve the system of the Party leadership over economic work, correctly deal with the highly unified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y and politics under socialist conditions, scientifically address the major question of what kind of development to achieve in the new era and how to achieve such development,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Party's ability to lead economic work. Party organizations at all levels must uphold the authority and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correctly grasp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value orientation, strategic guarantee and practical requirements of the system of economic work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effectively translate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of economic work led by the Party into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romote efficient governance, maintain a high level of security, and create a high quality of life. All this is to ensure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Party's long-term ruling position, lay a solid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the country's long-term stability and pool strong social strength.

Key words: the CPC'S leadership over economic work; economy and politics;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system integration; law of economy; a better life for the people

中国当代纪实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重写

——以陈廷一的纪实创作为例

章 罗 生

湖南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摘 要: 陈廷一纪实创作的数量、畅销与影响等位居当代中国作家前列。题材选择的重大与独特,文体形式的多样与创新,人物再现的典型与鲜活,描写方法的生动与通俗,是他传记创作的总体特色与风格内涵。而贯穿其报告创作始终的,是他鲜明的家国大爱、深沉的责任担当与崇高的浩然正气。他之所以没登“大雅之堂”、在文学史上无地位,主要是因我们屈从于西方文化影响下的“纯文学”“话语霸权”等。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立场”“中国价值”和“创新性发展”,正视“纪实时代”的“大文学”现实,重视对陈廷一等纪实大家的研究,从“大国”文化建设的战略高度,更新观念,挑战传统,重构理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重写中,变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雅俗共赏”“双翼齐飞”为纯文学、通俗文学与纪实文学的“虚实互补”“三足鼎立”。

关键词: 陈廷一; 纪实创作; 观念更新; 理论重构; 文学史重写

中图分类号: I206.6;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3)01-0024-15

陈廷一创作的数量、畅销与影响等位居当代中国作家前列,在传记界有“南叶北陈”(即南有叶永烈,北有陈廷一)之说。题材选择的重大与独特,文体形式的多样与创新,人物再现的典型与鲜活,描写方法的生动与通俗,是他传记创作的总体特色与风格内涵。而贯穿其报告创作始终的,是他鲜明的家国大爱、深沉的责任担当与崇高的浩然正气。他之所以没登“大雅之堂”、在文学史上无地位,主要是因我们屈从于西方文化影响下的“纯文学”“话语霸权”等。因此,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今天,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坚持“中国立场”和“中国价值”,正视“纪实时代”的“大文学”现实,重视对陈廷一等纪实大家的研究,从“大国”文化建设的战略高度,更新观念,挑战传统,重构理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重写中,变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雅俗共赏”“双翼齐飞”为纯文学、通俗文学与纪实文学的“虚实互补”“三足鼎立”。

陈廷一于2014年获大上海吉尼斯“个人撰写、出版传记文学著作数量之最”称号,包括其“经典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现当代纪实文学(1898—2021)”(21FZWB01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章罗生,男,湖南韶山人,文学博士,湖南大学纪实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纪实文学研究。

珍藏文集”14卷等在内,已出版传记等创作100部以上^①,其创作总量将近4000万字^②,位居当代中国作家(纪实)之冠,即使是同样出手快、销路广,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的叶永烈、王朝柱与李敖等也远在他之下^③。那么,这些创作量巨大、也拥有读者众多的作家——尤其是陈廷一,又为何不被重视、少为学界所知?其原因,从表面看,是文学史或教科书上无地位;而深入考察,则主要是观念陈旧、保守,尤其是屈服于西方文化影响下的“纯文学”“话语霸权”等。即传统的“文学是虚构”“小说是老大”等观念,既排斥以“纪实”为主的文学,更排斥远离“虚构”的传记等创作。因此,本文试以陈廷一创作为例,对文学观念更新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重写等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

陈廷一的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许世友传奇》《宋美龄传》等为代表,是其成名期。其中《许世友传奇》出版后,有关单位为他在京举办研讨会,刘白羽等名家给予高度评价。接着,他在海峡两岸“冰冻期”推出的《宋美龄传》又先声夺人、几次再版,成为领衔中国传记创作的畅销书,并创造了中国书刊发行业史上的奇迹。20世纪90年代,以“宋氏家族”系列为代表,是其黄金期。在该时期,他以几乎每年一书的速度,先后推出了《宋庆龄全传》《宋霭龄全传》《孙中山大传》《蒋介石传》《孔祥熙传》《宋子文传》《宋查理传》,以及《陈氏兄弟》(陈果夫、陈立夫传)、《张氏父子》(张作霖、张学良传)等。21世纪以来,其创作进一步发展,可视为“钻石期”。在该时期,他不但拓展“宋氏家族”题材,又写了《宋氏三姐妹》《宋氏三兄弟》《陈其美传》,以及“民国四大家族全传系列”(《蒋氏家族全传》《宋氏家族全传》《孔氏家族全传》《陈氏家族全传》),且再开红色题材创作新风,写了《毛氏三兄弟》《贺氏三姐妹》与《天地良心:万里在安徽》等。他再次成为大陆拥有最多读者群的畅销书作家之一,其《布衣总统:孙中山》等入选中学语文课本,他本人获中国当代10大“优秀传记作家”等多项奖励^④。概观陈廷一的传记创作,其成就与特色表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是题材选择的独特性与传奇性。与叶永烈等“史传”大家类似,陈廷一同样注重从“红”“黑”两面反映20世纪中国风云变幻的复杂历史。但叶永烈侧重在现当代,陈廷一侧重在近现代;叶永烈侧重中共党史与国共关系史,陈廷一侧重国民党史与“四大家族”尤其是宋氏家族等。与此相连,所谓“红”“黑”人物与“名人”等:叶永烈所选择和描述的主要是陈独秀、毛泽东、邓小平、陈云等共产党领袖与傅雷、马思聪、钱学森、梁实秋等文化名人,以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与陈伯达等“文革”元

① 见陈琼枝:《陈廷一创作100部传记文学获殊荣》,《中国国土资源报》2004年10月27日。

② 于友先2016年指出:陈廷一已留下3700多万字的纸质出版物;《宋庆龄传》是当年青岛出版社的名牌看家书,最多时一年6次重印;有关“许世友的书一直占据着畅销书的排行榜,可谓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看家书,印数达百万册之多”参见于友先:《陈其美传·序言:百年中国,百年梦想》,北京:东方出版社,2019年。2016年后,他又有《陈廷一报告文学精品展读》(上下卷)等多部作品。同时,他还有“陈廷一经典”系列,即《成名作》《代表作》《传世作》《畅销作》《巅峰作》《获奖作》《封笔作》等22卷即将出版面世,《宋氏三姐妹》30集电视连续剧即将由中央电视台拍摄播出,并有组织机构为他设立“陈廷一文学馆”,他还用自己的稿费设立了“李耳文学基金会”晨光奖等。

③ 据有关资料统计,包括影视、传记与理论著述等在内,叶永烈与李敖的创作总量各在3000多万字,王朝柱在2000多万字。

④ 参见于友先:《序一》,见陈廷一:《民国岳父:宋查理》,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

凶;而陈廷一所选,则主要是孙中山、宋庆龄、陈其美、宋查理(嘉树)、张学良等国民党左派领袖与社会贤达,还有许世友、万里与毛氏兄弟等革命将帅和先烈,以及蒋介石、宋霭龄、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与陈立夫等国民党右派首脑和豪门权贵等。叶陈两人在题材与传主选择方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相对而言,陈廷一所选者,则更富独特性与传奇性。因为,虽说叶永烈写“四人帮”与陈伯达等“黑色”人物也独占鳌头,但在写毛泽东、邓小平等“红色”人物方面则并非空前绝后;而陈廷一所写的“四大家族”与豪门权贵等,就其全面、系统与集中而言,则至今无人可及。而正是由于“四大家族”尤其是作为“天下第一家”^①的宋家情况复杂,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政治关系密切,影响巨大,因而其题材本身就更具传奇色彩。陈廷一正是从家族、家庭与人生命运等角度,以生动文笔与通俗形式,演绎了“蒋氏天下陈家党,宋氏姐妹孔家财”,尤其是宋氏三姐妹“一个爱钱,一个爱权,一个爱国。爱钱者人为财死,爱权者以身相许,爱国者国比天大”^②的传奇故事。

“红色”系列创作也是这样。如写《毛氏三兄弟》,是作者有感于毛泽东的书籍已经“琳琅满目”,而毛泽民、毛泽覃的书目则“很难看到”,因而觉得“历史似乎对毛氏兄弟越来越不公平,在大哥毛泽东的彩色光环下,兄弟们不应该暗(黯)然失色”,故“以时光流年式的革命史为顺序,以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为背景,以毛氏三兄弟的生动感人的故事为主线,突出毛氏三兄弟的婚姻家庭、生活小事、情感历程。以小见大,以小见真,大到国事,小到家事,以家比国,以国论家”^③。《贺氏三姐妹》也是如此:作者有感于贺氏家族为中国革命牺牲了40多位亲人,而贺子珍3姐妹即是其典型代表,尤其是贺子珍这位历经长征的女英雄,从延安“神秘失踪”后即被历史尘封,因而他要主持公道。故作品“以贺子珍与毛泽东的爱情为主线,其他姊妹为辅线,歌颂人性美”,还原她们的传奇故事与非凡人生^④。

尤其是《许世友传奇》(《许世友外传》)中的许世友,其传奇色彩更浓:他出身贫苦,性格倔强,嫉恶如仇;8岁进少林寺习武,练就一身绝世武功;当军师首长后仍挥舞大刀,率敢死队冲锋陷阵;长征中智斗张国焘,后又被误会、关押;曾骂毛泽东,后又衷心佩服、誓死捍卫,等等。而作者作为传主同乡,从小就从外婆口中得知不少有关许将军的传奇故事,并深受其影响。故他长期下苦功调查采访、搜集资料,从而玉成了特色鲜明、影响广泛的首部许世友“传奇”。至于《天地良心:万里在安徽》中的万里,是改革开放中勇闯禁区、杀开血路的传奇人物:“文革”结束后,他先大刀阔斧整顿铁路,变其混乱无序为“安全正点万里行”;后至安徽,又顶住压力、敢闯禁区,重新尝试和推广曾被“批倒批臭”、令人“闻风丧胆”的“包产到户”,不但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赢得了“要吃米,找万里”的美誉,而且为中国改革最难、最大的“三农”问题,闯出了新路。他的这种为民请命、为国分忧而不怕丢官、不怕坐牢的责任担当与崇高精神,令人钦佩。正如田纪云所说:“如果说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话,那么他就是高级工程师之一。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特别是为中国改革开放作出的卓越

① 陈廷一认为:“在蒋介石政权里,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占有显赫的位置。实际上说蒋的政权也是四大家族的政权。人们往往把蒋姓放在首位,宋姓放在其后,其实宋姓才是真正的实权派。宋氏两姊妹由于其卓越的才干,征服了男性世界,控制了蒋、孔两姓。她们能像捏面团一样地使男人围着她们转,使她们的男人在实践上也深感女人的厉害,自愧不如,甘拜下风。”见陈廷一:《乱世枭雄:蒋介石》,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204页。

② 陈廷一:《布衣总统:孙中山·后记》,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306页。

③ 陈廷一:《毛氏三兄弟·前言》,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④ 参见陈廷一:《贺氏三姐妹·前言》,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年,第2页。

贡献,以及他的无私无畏、光明磊落的高尚品格将永载史册。”^①

其次,是文体形式的系统性与多样性。在这方面,陈廷一与叶永烈也有相似之处。叶永烈除“红”“黑”系列、“名人”系列与“自传”系列外,还有“行走”系列等纪实散文;陈廷一则除“红”“黑”“家族”传记系列外,还有“国土三部曲”等报告系列。但与叶永烈不同的是,陈廷一的文学传记更表现出形式的多样与“家族化”等特色。具体来说,既有个人与家族专传(大传、全传),又有兄弟、姐妹、父子与家族等合传,尤其是注重以“家族”为中心,对其重点人物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反复叙述。这集中、典型地表现在对“四大家族”尤其是宋氏家族的描写上。当然,广义的“宋氏家族”,除“家长”(父亲)宋查理(嘉树)及其3个女儿和3个儿子外,也包括其女婿孙中山、蒋介石与孔祥熙等。而这10余位传主,因出版时间与单位不同,尤其是随着作者认识的提升,资料的充实与形式的创新,又大多不但有“传”,而且有“大传”“全传”与“合传”等。如以宋查理为传主的,分别有《宋查理传》与《民国岳父:宋查理》;以孙中山为传主的,分别有《孙中山大传》《布衣总统:孙中山》与《青年孙中山》;以蒋介石为传主的,分别有《蒋介石大传》与《乱世枭雄:蒋介石》;以宋子文为传主的,分别有《宋子文大传》与《民国财长:宋子文》;以孔祥熙为传主的,分别有《孔祥熙大传》与《山西首富:孔祥熙》等。尤其是宋氏三姐妹与三兄弟,不但有《宋氏三姐妹》与《宋氏三兄弟》等合传,而且有独立的“大传”“全传”如《国比天大:宋庆龄》《第一夫人:宋美龄》《无冕之王:宋霭龄》与《民国财长:宋子文》等。此外,如许世友与张学良等,也前有《许世友传奇》与《张氏父子》,后有《许世友外传》与《我本英雄:张作霖张学良》等。

对多个家族尤其是宋、蒋家族进行集中的反复“传”写,其中某些大的事件与背景等肯定有重叠与交叉,但作者还是尽量注意从个人与家族出发,写出其不同个性与特色。如对宋霭龄、宋庆龄与宋美龄“宋氏三姐妹”,着重突出其“爱钱”“爱国”与“爱权”等不同特点;对宋子文、宋子良与宋子安“宋氏三兄弟”,在不同个性的描写中,突出其“经济学博士”的才识与业绩,尤其是宋子文作为“民国金融之父”与财政部长的才干等;在对蒋介石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及孔祥熙与许世友等人的撰写中,则分别突出其“枭雄”“英雄”“首富”与“传奇”等。又如《蒋氏家族全传》与《蒋介石大传》和《乱世枭雄:蒋介石》相比,虽然也重复了蒋介石一生的“枭雄”经历,即从崛起、争雄、与中共抗衡,到失败、偏居台湾与去世等,但更重“家族”,即除蒋介石本人外,更详写了宋美龄、陈洁如与蒋经国等其他蒋氏家庭成员,尤其是蒋、宋体制的形成及其既相互配合又相互斗争等。在这方面,尤以“宁汉合流”“蒋宋联姻”“西安救蒋”“上海打虎”与“宋孔争财”,以及在对待宋庆龄等问题上表现最为突出。如在“宁汉合流”中,宋霭龄、孔祥熙与蒋介石紧密配合,通过俘获宋子文、软化宋庆龄、争取冯玉祥而使汪精卫倒向;因蒋介石深知“得天下必得宋家”,故许诺与宋霭龄“平分天下”,答应宋美龄的所有条件,又威逼陈洁如出国,而终致“蒋宋联姻”与蒋宋体制的形成;在“上海打虎”中,蒋经国态度强硬,触犯宋美龄、宋霭龄(孔令侃)等宋、孔家族利益,蒋介石以宋美龄代他去前线慰劳为交换条件而被迫让步;当蒋介石与杜月笙密谋除掉宋庆龄这一“绊脚石”时,宋美龄与宋子良等姐弟配合,逼使蒋介石不敢下手,等等。

^① 田纪云:《代序:改革开放的大功臣》,见陈廷一:《天地良心:万里在安徽》,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页。

再次,作品以“春秋笔法”,在客观叙事中穿插适量评点,既揭示了历史的必然规律,又不乏对人物的“盖棺论定”。具体而言,一方面,作者通过对“民国四大家族”尤其是“宋氏家族”与“蒋宋体制”的揭秘,有力说明这种“家天下”或“家国一体”的专制、独裁,必然导致腐败,也必然被历史和人民所抛弃。这恰与毛泽东所领导的红色政权及其历史结局形成鲜明对比。作品指出:“蒋宋结缘,蒋家受益,宋家沾光,真正实现了‘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姐妹孔家财’的蓝图”;蒋经国上海“打虎”的失败,“是一场牺牲原则而保全家族利益之争”(《蒋氏家族全传》);“宁、汉”两个政府的“蒋、汪”之争,实际也是宋氏姐妹(霁龄与庆龄)自身之争;“‘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矛盾,说破了就是相互利用、相互斗争”(《宋子文大传》);“要说辛亥革命不能不说孙中山,要说孙中山不能不说陈其美;要说民国建立不能不说袁世凯,要说袁世凯也不能不说陈其美;要说国民党历史不能不说蒋介石,要说蒋介石又不能不说陈其美;要说辛亥英雄不能不说秋瑾、徐锡麟,要说秋瑾、徐锡麟还是不能不说陈其美。陈其美是孙中山的左右手,是袁世凯的死对头,是蒋介石的引路人,是秋瑾、徐锡麟的老战友”(《陈其美传》),等等。另一方面,作者又站在当今的时代高度,对蒋、宋等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等进行了较客观、辩证的分析与评价。如对蒋介石,作者既肯定他领导抗战的功劳,到台湾后能坚持“一个中国”、抵制美国的分裂图谋,在建设方面“也不是像后来台湾民进党所说的一无是处。除了人们所熟知的土地改革、九年义务教育及发展经济外,更重要的是毅然推动地方自治及后来的妇女解放、废除养女制,对台湾民主政治与社会改革有诸多的贡献”^①,又批判了他的专制、独裁与权谋等。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他对张学良的监禁与对蒋经国的扶持、“接位”等方面,因而作者认为他“爱权之心,甚于爱国;爱子之心,甚于爱民”等。对宋美龄,作者既肯定她的外交才华、重视亲情,尤其是抗战期间的争取美援与劳军、亲民等历史贡献,又抨击了她的“爱权”“家天下”与“个人至上”等。对宋子文,则既肯定他讲义气、重友情,是“理财高手”“虽是西装革履,却有民族风骨”“虽是党国要员,却有民族气节”“虽是西学学子,提倡开放,却不媚外”,但又批评他软弱、动摇,对蒋“傲慢”却又屈从,同时也贪财、腐败等。

最后,是风格形式的“文学性”与通俗性。与叶永烈相比,在“文史兼容”方面,叶永烈更注重“史”,即十分重视学术考证与资料翔实等;而陈廷一则更重视“文”,包括其构思谋篇的讲究,故事情节的组织,与通过细节、语言以表现人物个性等。陈廷一较多吸收了虚构叙事尤其是通俗小说的艺术手法,表现出更鲜明的“文学性”与通俗性。故有人称其传记创作为“传记小说”。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在构思谋篇与材料组织等方面,不但注重精选典型事件或提炼典型情节以表现人物,而且注意在对比与冲突中凸显其思想性格之差异。前者如:《许世友传奇》分别以“银手镯”“偃月刀”与“驳壳枪”等为中心进行结构,来具体叙写许世友的传奇故事;《宋查理传》通过选择潜逃海外时船上遇险,回上海传教后开创印刷与面粉事业,倾囊、舍家资助孙中山革命,以及阻挠孙中山与宋庆龄成婚等典型事例,再现了宋查理的传奇一生与鲜明形象;《陈其美传》通过收复上海、招募姊妹花、诛斩陶骏保、智取“地头蛇”、拥孙文做总统、为共和烈士申冤、与“袁独裁”较量、衷肠诉黄兴、除掉郑汝成及被害前后等典型事例,再现了陈其美这一风流大都督、“民国第一豪侠”与资产阶级革命家的鲜明

^① 陈廷一:《乱世枭雄:蒋介石》,第330页。

形象。后者如:《宋氏三姐妹》,既在对比中突出了其“爱钱”“爱权”与“爱国”的不同追求与个性,也写了她们在血脉亲情基础上的合作与互助。这一点,作品通过描写宋家的3次斗争与分裂,即围绕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恋风波,蒋介石与宋美龄的政治婚姻,以及宋霭龄、宋美龄与宋子文在财政部长等问题上的争权夺利等,表现得尤为鲜明、突出。如在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恋风波中,宋霭龄联合父母,将宋庆龄软禁家中,断绝她与孙中山的联系,而宋庆龄则串通女仆,逃离囚笼,与孙中山远赴日本完婚。这些,既表现了宋庆龄的勇敢坚定与对爱情的坚贞,又凸显了“老猫”宋霭龄的世俗与奸诈等。

而蒋介石与宋美龄的政治婚姻则更是如此:既表现了人物的鲜明性格,又揭示了政治与历史的诡秘、幽深。作品揭示了蒋介石在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内出现了分别以蒋介石与汪精卫为首的“宁汉分流”。当时,宋庆龄与宋子文兄妹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而明确支持武汉的汪精卫,形势对南京的蒋介石很不利。此时,蒋介石为了挽救危局,千方百计通过宋霭龄向宋美龄求婚,而宋霭龄因看好蒋介石这颗政治新星,就不但拉拢、争取了实力雄厚的冯玉祥,而且迫使宋子文转向自己阵营。而梦想当“第一夫人”的宋美龄,在蒋介石答应其全部条件后,毅然抛弃热恋男友而投入蒋介石怀抱。如此,蒋介石胜局已定,宋庆龄虽被孤立却坚持反蒋。而正是这场激烈的“家”“国”矛盾冲突,不但使宋氏三姐妹的“爱钱”“爱权”“爱国”等不同追求与个性得以进一步表现,而且使蒋介石的政治野心与投机、奸诈,以及宋子文的见风使舵与软弱、动摇等,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鲜明表现。

二是在叙事方法与具体描写方面,不但注重从婚姻家庭与矛盾冲突中表现人情人性,而且注意选取典型细节,结合其趣闻轶事,追求生动可感的“文学性”等。正如有人所指出的“他大胆尝试传记小说式的人物刻画,不溢美不弃恶,让人物跃然纸上,使传记更好读、更好看”^①;也如作者所说的,他的创作区别于他人之处是“多了些生活琐碎,摒弃时代留给作者的‘高、大、全’的精神桎梏,多了时代性和世间人情人性的描写,多了家庭、婚姻和爱情的描写,多了些故事的好看,多了些个性的刻画。比如说孙中山谈女人,语惊四座。应该说这是还原中山先生的真实。孙中山是人,其次才是伟大的革命家,他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作为男子汉,他有异性追求,同时也追求异性。再如宋氏三姐妹,一个爱钱,一个爱权,一个爱国。爱钱者人为财死,爱权者以身相许,爱国者国比天大。等等,这都是我采访、写作的价值观,抑或是我认为是的铁的写作原则”^②。如《乱世枭雄:蒋介石》不但具体描述了蒋介石的婚姻、家庭等情况,而且真切状写了蒋介石、宋美龄在上海举办的“最隆重婚礼”,西安事变中的“患难与共”,战场惨败时的争吵与哭泣,在蒋经国上海“打虎”问题上的冲突,以及面对陈布雷哭谏、自杀时的内心震撼等。《蒋氏家族大传》则不仅细写了蒋介石与陈洁如的情感纠葛,而且描述了宋美龄在得知蒋介石对她“不忠”后的痛哭与“焚鞋”等举动。但相对而言,尤以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恋故事写得最为集中、细腻,也最为生动、感人。如《孙中山大传》与《宋庆龄大传》等一样,除具体描述了宋霭龄因妒忌、“面子”等原因而挑拨父亲设法阻止宋庆龄与孙中山之恋,以及宋庆龄的震惊与斗争等外,尤为细致地剖析了宋庆龄、孙中山两人的心理活动,包括对爱情的认识与坚守,以及对

① 万伯翱:《序二》,见陈廷一:《民国岳父:宋查理》,第5页。

② 陈廷一:《乱世枭雄:蒋介石·后记》,第377页。

社会、世俗与舆论的坦然面对等。当然,在这方面,《毛氏三兄弟》与《贺氏三姐妹》等“红色”系列也是如此,都着重从婚姻、家庭与情感等角度,通过“革命”与“爱情”、“大家”与“小家”的冲突,揭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与崇高品质等。在这方面,尤以毛泽东、毛泽覃兄弟与贺子珍、贺怡姐妹的婚姻悲剧和人生命运最为突出。

大量运用趣闻轶事与细节描写,也是陈廷一传记创作的重要特色之一。如《孙中山大传》开头写孙中山的出生时,不但引用了香山的一些民谣、山歌与诗词等,而且还写了洪秀全三访萧朝贵的传说。在写孙中山初见张之洞时,张不见,且在孙的名片上写“持三字帖,见一品官,儒生妄敢称兄弟”退回。孙则在此名片上回敬“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亦可做王侯”后再递送张。张见后大惊,即以礼相待。又如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时,由于人数太多,以致将会场木板压塌。众人大惊,孙中山却笑着说:“这乃是颠覆满清革命成功的预兆”,众人报以热烈掌声。《孔祥熙大传》写到,杜月笙因听信宋霭龄之言,在上海公债买卖上吃了大亏,为弥补损失,就绑架、威逼孔祥熙以50万美元买他一只海龟。见孔不从,又送棺材至家门相逼。最后,孔为保全官位与名声,在中央银行董事会上宣布:给最近在公债事业上做出贡献的杜月笙以奖励。如此,杜月笙不但挽回了损失,而且与孔祥熙成了最好的朋友。《宋子文大传》则不但细写了宋子文在“宁汉合流”中面对大姐宋霭龄与二姐宋庆龄争夺时的痛苦与尴尬,他的“初恋风波”尤其是与张乐怡具传奇色彩的“庐山之恋”等,而且也揭秘了他的“遇刺之谜”,他与蒋介石的“耳光风波”后宋霭龄与宋美龄的反应,等等。

当然,在这方面,《宋霭龄全传》中有关孔令俊(孔二小姐)的描写更为集中、突出。作品描述,由于母亲宋霭龄的娇惯,孔令俊从小就性格乖张、霸道,以致惹事生非、“事故”不断。如她开车与交警冲突后枪杀一人,被带进警察局后反诬交警调戏,并打电话向父亲求救。局长道歉并护送回家,交警罢岗抗议,调查结论是手枪走火误伤。孔令俊之姐孔令仪已自找对象并订婚期,但“爱钱”的宋霭龄夫妇认为不门当户对,急忙拦阻并另找高级军官卫立煌。孔令俊为帮其姐,代为见卫并戏弄:见面后即要卫娶她,并主动亲吻、拥抱,吓得卫丢花而逃。宋霭龄以为孔令仪未看上卫,又为其觅航空英雄孙桐岗。孔令俊则设毒计惩罚出此主意的父亲部下李毓万,她假冒李毓万夫妇名义散发3000张请柬至李、孙两家亲友等,说李之爱女某日、某地与孙桐岗举行婚礼、请其赴宴等,致使孙、李两家闹得天昏地暗。二小姐开怀大笑之余,趁机把姐姐、“姐夫”送飞美国。上海富商之女陆某来重庆会如意郎君,被孔令俊看中后带入别墅寻欢。上床后陆小姐触到“二先生”乳房如梦初醒,方知遇上了性欲倒错的女魔头。随宋美龄赴美时,二小姐大笑罗斯福总统之残疾,急得宋美龄慌忙掏手帕擦翻译之肩以掩饰才未酿成风波。类似丑闻恶行与趣闻轶事,还有如在香港飞机上逼“南天王”陈济棠等为狗让座,在重庆与龙云之子在公园枪斗,将蒋介石侍从室的机密文件丢失导致战事失败,以及与兄长孔令侃在云南边境斗法使林世良成冤鬼,与胡宗南“相亲”时使胡尴尬、狼狈不堪,等等。

总之,题材选择的重大与独特,文体形式的多样与创新,人物再现的典型与鲜活,描写方法的生动与通俗,构成了陈廷一传记创作的总体特色与风格内涵。而这既是其创作影响广泛、成就非凡的原因所在,也是其最具价值与意义之处。正如有人所指出:作者“采用最新史料和观点,多元呈现,解密释惑,融史料、故事、轶闻于一体,增加可读性、启迪性和真实性。剖析家族隐私,解读民国命运,史料全面权威,观点精辟深刻”,“文风动人,笔功扎实,行文自然流畅”等^①。

^① 于友先:《序言》,见陈廷一:《蒋氏家族全传》,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第3页。

一
一

陈廷一 21 世纪以来的创作发展,还表现在审美追求与文体形式的转型等方面。在题材内容与审美追求上,由对历史的执著探讨转为对现实的深切关注——尤其是对国土、生态与改革等问题的思考,以及对民族英雄与时代精神的歌颂等;在文体形式上,则由长篇传记转为文学报告等。这方面的作品,主要有长篇生态系列“国土三部曲”(《皇天后土:中国,拯救我们的土地》《地球遗书》《国土九章》)与《陈廷一报告文学精品展读》(上下卷)等。

除文学传记外,陈廷一的报告创作也内容厚重、特色鲜明。他的“国土三部曲”、《天地良心:万里在安徽》与《陈廷一报告文学精品展读》等,不只标志着作家从“历史”“传记”转向了“现实”“报告”,更重要的是,说明了其主体精神与审美选择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即使命感、忧患意识与责任担当的加强。正如作家所说,他调入国家土地管理局后,因工作关系而有机会、有可能了解、认识“国土”,尤其是其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与深沉危机。正是如此,他意识到“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明哲保身无疑意味着对子孙、对民族的不负责任”^①,因而他“不再关心自己鼻尖下自我价值和创作的追求,也不再关心传记文学中的个体命运”,而是“开始由关注个体命运向群体、民族乃至地球命运过渡”^②。也正是如此,他的《皇天后土:中国,拯救我们的土地》以“中国,拯救我们的地球”为副题,放眼世界,纵览古今,从“天”“地”“人”三个不同角度,以大量数据与具体资料,痛诉我国在国土资源与生态环保等方面所存在的严重问题。同时,也记叙我国政府和人民对该问题的认识及其所采取的措施,包括对国土卫士的赞颂与对问题、措施的思考、探讨等。《国土九章》与《地球遗书》实际上是对《皇天后土:中国,拯救我们的土地》的补充、扩展与深化。即它们在《皇天后土:中国,拯救我们的土地》的基础上,补充了更多事例与资料,也更全方位、多角度与“宏观综合”。不同的是,在结构与体例上,《国土九章》是较完整的“九章”,《地球遗书》则是作品合集,其中上篇包括《地球遗书》《世纪警钟》《大地沉疴》《警告人类》等;下篇包括《春风已度玉门关》《倾斜的中国》《退耕还林交响曲》等。总之,它们既是特色鲜明的“生态”“问题”文学,也是发展、创新了的“现实”“社会”文学;或者说,它们既是生态报告的有机部分,为生态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又与问题报告的发展同步,为问题报告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了新鲜经验。

《天地良心:万里在安徽》虽被视为“传记文学”^③,但因其以人带史、以人议政等特色,即主要通过叙写“万里在安徽”而反映中国改革的历史并探讨“三农”等问题,且未从家庭、婚恋等日常生活方面全方位再现人物,因而实际上更近“报告”而远“传记”;又因作品所写的人事与“土地”紧密相连,即“万里在安徽”所进行的实际是“土地改革”,因而该作也可视为“国土”系列之一。它和《皇天后土:中国,拯救我们的土地》等“三部曲”一样,不但体现了作家的“主体虔敬”等特色,而且进一步说明了他创作的转折与发展,即从“历史”到“现实”,从“以人为主”到“人、史、理结合”等。具体而言,不同于以往的“宋氏家族”等传记,该作不再借鉴通俗小说等手法与技巧,也不再将“文学性”放在首位,

① 陈廷一:《皇天后土:中国,拯救我们的土地·后记》(第2版),济南:济南出版社,2006年,第352页。

② 陈廷一:《地球遗书·后记》,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205页。

③ 参见陈廷一的《天地良心:万里在安徽》版权页标注:传记文学。

而是在以“人”为中心的同时注重“史”的再现与“问题”的探讨,即通过万里的改革事迹与个性表现,既反映中国农村改革的艰难历程,尤其是在有关“包产到户”问题上的复杂斗争,又探讨有关“三农”问题的解决与发展等。这一点,我们从作品第五至十一章的标题,如“改革序曲”“首次交锋”“借地度荒”与“最后较量”,以及后记“改革没圈句号”中有关农民土地权问题的思考与议论(如“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土地最大的问题是财产权的归属问题”)等,均可清晰看到。正如有人所指出,作者的“激情描写”表现在:“一是借用新颖的艺术形式和生动的文学语言,努力张扬传记作品应有的文学意识”,“二是特别注意选取典型场景和历史细节,让人看到那段历史的另一风景——万里的政治追求和‘为生民立命’的‘真性情’”,“三是在叙事中注意融进点化之美,从而加深了作品反思历史的思想蕴藏”等。总之,“如果说张广友《改革风云中的万里》、丁龙嘉《万里早期革命生涯》多注意‘生活真实’的话,那么陈廷一的《天地良心——万里在安徽》更为突出的是‘艺术真实’”(尽管在某些史料方面也存在一点“硬伤”)等^①。

《陈廷一报告文学精品展读》(上下卷)^②收集了作者近年来的中短篇新作16篇。与以往相比,这些作品的题材内容更为广泛,其现实担当与时代精神等也更为强烈。其中既有继续探讨生态环保与国土问题的《2013:雾霾挑战中国》《生死系于国土——100万“国土人”的答卷》《永远的月牙泉》,也有为科学家、艺术家与政治家立传的《中国之蒿——屠呦呦获诺贝尔奖之谜》《医魂——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人》《大师正疯狂——东方舞神陈爱莲》《温家宝的地质情结》;既有以当代意识观照历史的《国殇——中日甲午海战120周年祭》《大国之怒——一场针对日本旷日持久的跨国大诉讼》《村东,那一十八尊雕像》《烽火玫瑰——抗战中的宋氏三姐妹》,更有反映现实“问题—改革”的《并蒂红莲——中原(焦作)“邗新社亲”500春的最新报告》《魂殇——河南周口市“平坟风暴”调查与冷思考》《孟晚舟背后的中国》《西固圆梦曲——兰州采风记》《黄金之光》等。然而,无论是反思历史还是批判现实,也无论是反映改革还是歌颂英雄,贯穿作品始终的,是作者鲜明的家国大爱、深沉的责任担当与崇高的浩然正气!

正是如此,作者认为,面对“长期雾霾”这样一个现实,我们不能等也等不起,不能再停留在应急性的治理上,而应制定长期性、战略性的防治方案。并疾呼:“治理空气污染,人人均有责任,此事刻不容缓! / 治理空气污染,各方联合作战,此事迫在眉睫! / 信弹已经升空,总攻已经打响,此役务必拿下! / 让蓝天更蓝,让空气更鲜,让中国梦早日实现!”(《2013:雾霾挑战中国》)认为“十个腐败官员八个贪,八个贪官皆与土地有关”;对“土地蛀虫”的曝光,不仅能引导人们认清土地违法的错误和危害性,帮助人们识别土地违法的表现和手法,形成对土地违法的批判舆论,而且能唤起人们对土地违法的斗志,形成强大的社会监督力量等(《生死系于国土——100万:国土人”的答卷》)。而通过对周口市“平坟风暴”的调查,作者又对“三农”等改革问题作了深刻思考,认为在我国现行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中,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是虚置的,“现在土地的犯罪百分之九十在政府。个人腐败百分之九十是政府官员”——如把耕地比作“鱼”的话,作为监管者的政府则是“猫”“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

^① 详见全展、魏雪:《万里传记的三种叙事》,《现代传记研究》2016年第1期。

^② 陈廷一:《陈廷一报告文学精品展读》(上下卷),北京:华文出版社,2019年。

裁判,这样的体制能保护好 18 亿亩耕地吗?”总之,要“让农民真正拥有自己的土地,做大地的主人,当家作主。不要再折腾他们了,不要再让他们伤心流泪”,这“才是当前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最大目的!”(《魂殇——河南周口市“平坟风暴”调查与冷思考》)

同时,作者通过屠呦呦获诺奖所引起的风波,也反思了中国的科研体制与国情,批判了有关人性弱点与民族劣根性等。如认为某些人对屠呦呦获诺奖“犯酸”乃至“犯难”,是因为她的行政职位、教育背景、学术地位与自己不相匹配,是“因为屠呦呦的实话实说、口无遮拦的个性与这个正统的圈子文化不般配”——他们看重的不是一个人的发现,不是其研究成果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而是“在这个环境中能够兜得转的被各方认可的‘八面玲珑’”;屠呦呦“有能力改变人类生存的机体抗争力量,但她无法改变圈子化了的傲慢与偏见”——她未评上院士“是中国科学领域人为的冷落,是中国人才制度的沦落”。因此,“如何将焦点放在学术成就之上,将之作为压倒性的评选标准,应是两院今后的努力方向”,等等(《中国之蒿——屠呦呦获诺贝尔奖之谜》)。

而在《大国之怒——一场对日本旷日持久的跨国大诉讼》《国殇——中日甲午海战 120 周年祭》《孟晚舟背后的中国》与《村东,那一十八尊雕像》等作品中,作者在歌颂民族英雄与大国脊梁的同时,高扬的不但是爱国、自强等民族精神,而更透露和闪射出的是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与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如《大国之怒——一场对日本旷日持久的跨国大诉讼》痛切呼吁:中国人民强硬起来,海峡两岸联合起来,共同保卫我们的祖产——钓鱼岛!全世界爱好和平者联合起来,维护“二战”战后秩序,清算日本的倒行逆施,再次将日本国推向被告席!《国殇——中日甲午海战 120 周年祭》认为: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是我们“与狼谋皮”的历史,是列强侵略中国、掠夺中国资源的历史;中国不想和美国搞对抗,但美国却费尽心机折腾中国,“中国人一直梦想的是复兴和崛起,但在美国和日本的眼里,它们思考的是一只肥羊已经长大,何时开刀宰杀”。因此,“为了祖国的领土和蓝天,为了国家的尊严,为了祖孙后代的生存,为了民族复兴梦的实现,当敌人来犯时,我愿意披甲前往一线,像邓世昌那样义无反顾地向来敌迎头痛击,以雪当年甲午国耻,再告甲午殉难将士的忠魂!”而《孟晚舟背后的中国》,则一方面赞扬任正非是“邓世昌式的民族英雄”,华为是中国民族企业的标杆,作者最欣赏和感动的是任正非的“一件事做到底,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另一方面又尖锐揭露“抓捕孟晚舟,显然是美国打压华为系列行动的一部分……美国就是在以法律之名行阻止中国高科技公司崛起之实”。而作者从任正非与孟晚舟等人身上,又“仿佛看到了世界上没有任何高山能阻挡华为人的脚步;没有任何江湖能拦截华为人的道路”,等等。

总之,正如有人所说:陈廷一作为一个平民出身的作家,他担当起了“为天地立心”的责任;作为一个国土资源作家,他担当起了“为生民立命”的责任;作为一个军旅作家,他担当起了呼唤正义和平的责任——从他“那一百多部文学作品中,从那些触目惊心生动感人的故事情节和壮烈场景中,从他那些颇有见地饱含哲理振聋发聩的弘论中,难道我们还感受不到作家那颗赤诚和高尚的灵魂吗?难道我们还感受不到一个中国作家勇敢自觉的担当吗?”^①

^① 修成国:《序二:一个中国作家的自觉担当》,见陈廷一:《陈廷一报告文学精品展读》(上卷),第 9 页。

三

我们再回到前面所提的问题,既然陈廷一的创作不但数量雄冠文坛之首,而且题材重大、特色鲜明、影响广泛,那么,又为何没登“大雅之堂”?既未引起学界重视,又在文学史等教科书中无地位?这一点,实际上关系到文学观念的更新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因而我们需联系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重写的实际,从宏观、学术的高度来进行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自诞生以来,其文学史一直处于不断重写之中。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提出“重写文学史”后,出现了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教程》和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等各有特色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在此基础上,近期又有10余种史著问世,从而形成了新的“史纂”热潮。其中“通史”有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严家炎本”)^①、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以下简称“丁帆本”)^②和刘勇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第2版)(以下简称“刘勇本”)^③等;“断代史”有於可训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论》(第3版)(以下简称“於可训本”)^④、吴秀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全本)》(以下简称“吴秀明本”)^⑤和孟繁华、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修订版)(以下简称“孟繁华本”)^⑥等。与以往相比,这些史著的进展与开拓表现在:

一是时空视野与学科领域的进一步拓展。如“严家炎本”在“空间上,将文学史的叙述面作了较大充实”,“时间上,将中国现代文学的源头,上溯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方法上,它首次突破了作品语言必须以汉语为限的界限,将中国作家用外文、用少数民族语言写的有成就、有特点的作品同样写进了中国文学史”,“文学类别上,它不但在清末民初的部分写进了古体诗词、文言散文和文言小说,而且在白话诗文占据主导地位的‘五四’以后,依然尝试着写进了少量古体诗”^⑦。“丁帆本”认为,“新文学”包括“民国文学”和“共和国文学”,其起点是1912年的民国元年”等^⑧。

二是学术质量的进一步提升与个性特色的进一步彰显。如“严家炎本”“几乎每一章都有某些原创性的内容,或有新资料的发现,以及那些读来能让人眼睛一亮的观点”,因而它既是“别具一格的教材”,又是“学术含量丰厚的专著,是最近十多年来现当代文学研究最重要的标志性成果”^⑨。“丁帆本”不但重新起用“新文学”之名,而且赋予其全新概念,如认为1912—1949年为“新文学”的第一阶段(含大陆与台港地区及海外华文文学);1949年后为第二阶段,包括大陆的“共和国文学”与台湾的“民国文学”等。

三是编写体例与价值功能的进一步探索。即在编写体例上,它们一方面发展了“作家论型”“文

① 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中下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② 丁帆主编:《中国新文学史》(上下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

③ 刘勇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第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④ 於可训:《中国当代文学概论》(第3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⑤ 吴秀明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全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⑥ 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⑦ 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后记》(下册),第344页。

⑧ 丁帆主编:《中国新文学史·绪论》(上册),第1—4页。

⑨ 温儒敏:《再谈现代文学史写作的“边界”与“价值尺度”》,《学术月刊》2011年第12期。

体史型”与“专题史型”，另一方面又改进、提升了“混合型”。在价值功能上，则表现出科研与教学的进一步结合，或者说致力于学术，定位于教材。具体来说，其一是资料性。即尽可能使史料全面、准确、翔实。因而都努力在发掘史料、拾遗补阙或拓展学科视野上下功夫。其二是“经典性”。即在作家作品的选择及篇幅与文字上，尽量使其“少”而“精”“准”。其三是实用性。即在内容安排、标题设置与书写形式等方面，尽量使其适合教学或阅读（自学）。因而或设置“思考题”“作家小传”“延伸阅读”，或追求条理清晰、语言简洁、图文并茂等。

然而，它们也存在某些需要探讨的问题与不足，比如，如何避免头重脚轻，解决整体平衡与风格统一；如何确定入史对象、统一评价标准与进行经典选择；如何树立严谨学风，增强精品意识等。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如何认识与评价纪实文学创作的问题。笔者认为，至今为止，我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是一部基本上由“纯文学”观主宰，或由“纯文学”创作占统治地位的文学史，它严重遮蔽、抑制或忽略了纪实文学。如在20世纪90年代，在“重写文学史”思潮后的第一次“造史”高潮中，即使此时纪实文学创作已波涛汹涌、蔚为大观，但其轻视纪实文学的现象不但未得以改观，反而更严重了。在这方面，笔者曾以6种代表性史著为例进行统计，发现“纪实文学”所占比例只有1.2%^①。而检视10余年后“重写”的以上史著，笔者发现其问题仍较突出。如“严家炎本”仅有600字左右论及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与《本报内部消息》；“丁帆本”除刘宾雁的这两篇作品外，只论及了郁达夫、沈从文和杨绛等的纪实散文；“刘勇本”虽有“杂文与报告文学的复兴”一节，但也只谈了徐迟、黄宗英与鲁光等。如果说，因“通史”的时间较长、内容较多，因要考虑平衡而不能给“纪实”以更多篇幅的话，那么，在专写“当代”的“断代史”中，因“新时期以来”的分量较重，尤其是其“纪实”创作的成就已不在“虚构”之下，就应给纪实文学以足够重视与高度关注了。然而，遗憾的是，“孟繁华本”仍沿袭前例，基本上未提纪实文学；“吴秀明本”与“於可训本”虽没有忽视“刘宾雁的特写”和“徐迟的报告文学”等，但或限于报告文学，或限于“80年代”，同时也篇幅有限、内容不全。

那么，纪实创作的情况究竟如何？是它缺乏经典名家与精品力作，还是我们在观念、视野等方面存在问题？这一点，我们仅从上面的分析中即可见端倪，而如果联系巴金、林语堂、刘白羽、徐迟、徐刚、王朝柱、石楠、赵瑜、胡平、何建明、王宏甲、李鸣生、王树增等众多大家的创作，则更可切实看到中国现当代，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纪实文学发展迅猛、成就辉煌，名家辈出、群星灿烂，至今则更在其“崛起的高原”上持续“隆升”，进入了“纪实”的“大文学”时代。那么，它为什么在文学史中被轻视、无地位？为什么我们对小说等可大写“70后”“80后”等作家，而对报告、传记等却极少写“40后”“50后”？难道是后者的成就、贡献与影响等不如前者？这一点，我们只要将陈廷一等与某些“虚构”作家进行比较即可得出否定性结论。实际上，我们之所以“轻”纪实，其一是为传统知识与学术视野所限，其二是阅读与研究跟不上创作发展，其三是屈从于西方文化影响下“纯文学”的“话语霸权”。这三点互相关联、互为因果，其中关键是最后一点，即“纯文学”观的传统保守。正如有人所指出：“中国现代文学观的形成，是现代‘纯文学’观念产生和艺术自律观念确立的过程”，至新时期后，这种趋势被

^① 见章罗生：《中国报告文学新论》，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2—63页。

人描述为文学“回复到自身”,从而逐渐形成了“纯文学”的强大体制^①。

实际上,在中国文学史“重写”中,也一直存在着“纯文学”与“大文学”观的内在冲突。如刘经庵宣称:“除诗歌,词,曲,小说外,其余概付阙如”^②,胡适认为:“达意达得好,表情表得妙,便是文学”^③;而陈伯海则认为:用“情”“采”二字概括“文学性”有最大的普遍效应,传统的“缘情绮靡”说当可获得新的时代内涵^④;“为了切合民族文学的历史事实,似可考虑参照传统‘文章流别’论的模式,采取一种‘大文学史’的眼光”^⑤。正是如此,方铭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试图“还原一个时代文学的全貌和一个作家的全貌,而不是依赖于西洋文学的三分法、四分法选择研究对象”,同时认为“今日虚构文学的衰落,而纪实文学及传记文学的广阔市场和前景,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文学抛弃虚构的历史,重新回到过去存在过的写作和阅读的历史中去,未必不是可能的”^⑥。

这种“纯文学”与“大文学”的观念冲突,在新时期以来表现得更为尖锐、突出。一方面,“纯文学”“成为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主潮,并且固定为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常识和话语霸权”^⑦;另一方面,其“大文学”观又在暗滋潜长,且从创作与理论两翼向“纯文学”体制发出了有力挑战。就创作而言,主要是纪实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迅猛发展;就理论而言,先是以范伯群为首的学者对通俗文学理论的执著研究,后有杨义、陈伯海与旷新年等人对“纯文学”的批判与对“大文学”的倡导。而笔者则认为,不仅纯文学与通俗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两翼,而且虚构文学与纪实文学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学的两翼;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重写”不只须“雅俗共赏”“双翼齐飞”,而且应“虚实互补”“三足鼎立”,即纯文学、通俗文学与纪实文学三分天下。或者说,在通俗文学已基本上跻身“大文学”之列后,纪实文学的“入史”问题就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重写”中的当务之急。为达此目的,在思想理论上,尤其是在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上,我们就必须坚持“中国立场”与“中国价值”,而不能唯“洋”是举,更不能“崇洋媚外”,而要如方铭的《中国文学史》那样,坚持“中国立场”“中国视角”“中国价值”和“中国方法”,凸显“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发掘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独特的历史命运”等^⑧。

在解决“大文学”观与纪实文学的“入史”问题时,我们还必须立足当代、直面现实,充分认识纪实文学的巨大存在及其价值与意义等。出版的中长篇小说每年约3000部以上,而纪实作品则在5000部以上;“阅读写实体作品比阅读虚构小说类作品的读者,大约多出三成”,“在当下,即使是一本获得过茅盾文学奖的优秀长篇小说,年销售量也难有二三十万册,然而像《苦难辉煌》等写实体作品则可以轻松地达到上百万册”^⑨;“1990年以来,我国传记文学作品以年产300部的速度发展,近年更

① 参见旷新年:《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概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5—17页。

② 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编者例言》,北平:北平著者书店,1935年,第1页。

③ 胡适:《什么是文学——答钱玄同》,见《胡适文存》第1集第1卷,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

④ 陈伯海:《文学史与文学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1—72页。

⑤ 陈伯海:《文学史与文学史学》,第364页。

⑥ 方铭:《中国文学史·前言》,长春:长春出版社,2013年,第4—6页。

⑦ 旷新年:《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概念》,第59页。

⑧ 参见方铭:《中国文学史·前言》,第1—7页。

⑨ 何建明:《写实体作品的问题与前景》,《文艺报》2012年2月3日,第3版。

是以年产千部的速度增长”^①。其中,2012年达5744种,此后每年保持在6000到10000种之间^②。而陈廷一、叶永烈等大家的崛起,正是这种“纪实”大潮汹涌澎湃的必然结果,也是其时代“大文学”中的突出代表。因此,对陈廷一及其创作的认识,我们必须联系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实际,从观念更新与理论创新的时代高度,才能登堂入室并窥其奥秘。也许,这正是陈廷一创作及其研究的首要意义所在。

还须进一步探讨的是纪实文学与文学史“重写”中的价值标准问题。即:纪实文学是否存在与“纯文学”等相通的“文学性”呢?在这方面,学术界也有不少可资借鉴之论。如果说,古人的“缘情绮靡”说与胡适的“表情”“达意”说还只提供了区别“文学”与“非文学”的参考标准,那么,朱德发的“真善美”说却有更适合于“大文学”的普泛性与实用性。他认为,真、善、美的依次递进是衡量所有文学的“价值判断标准”——“对于文学来说,所谓‘真’乃是其‘生命’之所在。这个生命之真,乃是在人道之光烛照下的物象之真、事理之真、科学之真、情感之真、伦理之真、道德之真、思绪之真……这诸多的认识、教育、审美功能,都源于文学的客观之真、艺术之真、想象之真,故而‘真’是各种形态文学的生命,也是文学的价值根基所在”^③。

依此标准“审视”,纪实文学不但不应被轻视,而且应在文学史中占据重要位置。因为纪实文学是最富启蒙理性与最具精神承担的“严肃文学”,它不但具有“情感之真、伦理之真、道德之真、思绪之真”,而且具有“物象之真、事理之真、科学之真”。甚至可以说,与虚构文学相比,它更体现了“真”这一文学的“生命”与“价值根基”。以往人们之所以轻视纪实文学,主要是认为其“文学性”不强,尤其是看不惯史传报告与某些纪实散文中过多、过强的信息资料、学理分析与文化批判等。实际上,这是从“纯文学”观出发,将“美”置于“真”之上的表现。殊不知“文学如无‘真’,所谓的‘善’和‘美’是不存在的;而没有‘真’与‘善’的文学,‘美’同样也是不可能的”^④。纪实文学从整体上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理性精神、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正是其“情感之真、伦理之真、道德之真”与“物象之真、事理之真、科学之真”等的集中表现。这一点,我们从梁启超、林语堂、朱东润、叶永烈与石楠等的文学传记,徐迟、徐刚、赵瑜、胡平、陈桂棣、张正隆等的文学报告,以及巴金、杨绛、王树增、李辉、章诒和等的纪实散文中均可见到。尤其应指出的是,它们在保证“真”的前提下,也并不缺少“纯文学”所具备的“美”的质素,其中不少作品在典型描写、哲理抒情等方面,甚至为许多“纯文学”所不及。而陈廷一的创作,则更是这方面的典型范例。其“红”“黑”系列尤其是蒋、宋“家族”传记系列,为我们认识中国近现代历史之“真”提供了新鲜的独特角度;其以“国土”为重点的报告系列,为我们认识改革时代的现实之“真”做出了积极的重要贡献,尤其是它不但充满“善”,而且在“美”的追求方面也取得了卓越成就并积累了宝贵经验。即它一方面有效吸收了“纯文学”在构思谋篇、典型描写与人物塑造等方面的优良,另一方面,又成功借鉴了“通俗文学”情节生动、故事性强与语言晓畅等“特技”,因而其既有担当又具正气,既好读、畅销又接“地气”,从而创造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一点,更是陈廷

① 参见全展:《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概观》,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10页、第271页。

② 李一鸣:《为天地立心 为人民立传——漫谈中国传记文学的前世今生》,《文艺报》2022年12月21日,第6版。

③ 朱德发:《现代中国文学史重构的价值评估体系》,《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④ 朱德发:《现代中国文学史重构的价值评估体系》,《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创作的价值与意义之所在。

总之,与西方“以纪虚(虚构)为始源”不同,中国“以纪实(实录)为嚆矢”^①,其纪实创作历史悠久、积累深厚,以《史记》等为代表的经典名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光荣传统。这一点,不但在其“现代转型”中有突出表现,尤其在它新时期后的“繁荣兴盛”中得到了有力佐证。然而,“西方叙事学有着一条由虚构正宗到虚构、纪实并重的发展轨迹,而中国则出现了令人沮丧的扬虚构贬实录的演变态势”,“富有纪虚叙事传统的西方,已开始扭转只重视纪虚叙事的隐形偏爱,而我们中国时至今日却仍在高扬虚构叙事之大旗,这是一种屈服于西方文化霸权并且反传统文化的内在学理缺陷”,现在是“该到我们清理这一不重视纪实叙事的理论与实践的现象,并构建中国自己民族传统的中西纪实叙事学的时候了”^②。而在这一开拓创新的“大国”文化攻坚战中,陈廷一的史传等纪实创作,无疑是极重要、有力的武器弹药之一。

责任编辑:冯济平

Contemporary Chinese Documentary Literature and the Rewriting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A Case Study of Chen Tingyi's Documentary Creation

Zhang Luoshe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Chen Tingyi ranks in the forefro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writers in the the number, popularity and influence of creations. The great and unique choice of subject matter, the variety and innovation of stylistic forms, the typical and vivid representation of characters, and the vivid and popular description methods are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and stylistic connotation of his biography creations. A clear love for the country, heavy responsibility and noble righteousness run through his report creations. The reason why he has no place in literary history is that we succumb to the "pure literature" and "discourse hegemon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culture. We must adhere to the "Chinese position", "Chinese value"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face up to the reality of "big literature" in the "documentary era",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study of Chen Tingyi and other documentary masters. From the strategic height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by a "great power", we should update ideas, challenge traditions, "reconstruct" theories in "rewriting"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so as to turn the "common appreciation of the elegance and vulgarity" of pure literature and popular literature to equal focus on the complimentary pure literature, popular literature and documentary literature.

Key words: Chen Tingyi; documentary creation; concept renewal; theoretical reconstruction; rewriting of literary history

① 王成军:《纪实与纪虚——中西叙事文学研究·导论》,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页。

② 王成军:《纪实与纪虚——中西叙事文学研究·导论》,第1—2页。

“最风行的是《幻洲》”

——论叶灵凤《幻洲》半月刊的美术编辑

杨剑龙 王 童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 200234

摘 要:《幻洲》半月刊由叶灵凤独自经营美编,其封面设计在抽象的板块式设计中,蕴含着深邃的意蕴,其插图在流畅的线条、奇幻的构图、黑白的对比中,呈现出抑郁神秘诡谲的境界,营构出刊物的唯美主义追求。叶灵凤精心设计刊物的题画与尾饰,幻美而蕴蓄,暧昧而迷离,在简约的构图、幽婉的线条、含蓄的象征中,呈现出独特的审美风格。女性、玫瑰、蜡烛、孔雀羽成为叶灵凤偏爱的绘画语言,他在模仿与借鉴比亚兹莱、露谷虹儿中,使《幻洲》半月刊成为具有唯美主义色彩“风行”“横行”的文学刊物。

关键词:叶灵凤;《幻洲》半月刊;美术编辑;唯美主义

中图分类号: I206.6; G2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3)01-0039-10

在中国现代文学期刊中,《幻洲》半月刊是独特的存在。该刊46开袖珍毛边本,创刊于1926年10月,停刊于1928年1月第2卷第8期,前后仅出版了20期。“然而在当时,短小精悍的《幻洲半月刊》,上部象牙之塔里的浪漫的文字,下部十字街头的泼辣的骂人文章,不仅风行一时,而且引起了当时青年极大的同情。”^①“该刊‘内容侧重文艺’,实际上分成上下两个部分:上部‘象牙之塔’由叶灵凤主编,主要刊登文学作品;下部‘十字街头’由潘汉年主编,主要刊登讨论社会现实问题的杂文与政论文章。”^②1927年1月26日,鲁迅给友人的信中说当时“最风行的是《幻洲》”^③。

1926年,定大在《评两种杂志〈幻洲〉和〈一般〉》中评说《幻洲》说:“第一部分是所谓象牙之塔,象牙之塔是只有没事的阔人们进去坐坐的,但这塔却也不尽然,虽然一大半的文章是出世想的靡靡的,在其中间却也可以看出反抗旧势力的精神,因为他们能叫出苦闷……至于第二部分,则是所谓十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图像文献整理与研究”(16ZDA188)的阶段性成果;上海高水平大学建设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创新团队成果。

作者简介:杨剑龙,男,上海人,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驻院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文化转型与现代中国创新团队成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王童,男,江苏徐州人,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上海中学数学》编辑部编辑,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① 叶灵凤:《回忆〈幻洲〉及其他》,许道明、冯金牛选编:《叶灵凤集:白日的梦》,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年,第169页。

② 陶柏康:《从〈幻洲〉半月刊到〈战线〉周刊》,陶柏康:《从驰骋疆场到失踪——蒙冤二十七载的潘汉年》,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第20页。

③ 鲁迅:《致韦素园》(1927年1月26日),见《鲁迅书信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26页。

字街头,是提倡新流氓主义而向一切旧的恶的东西拼命进攻的阵地。”^①谢其章在《创刊号风景》中以“横行一时的微型杂志——《幻洲》”为标题介绍《幻洲》^②。《幻洲》半月刊是一本具有唯美主义色彩“风行”“横行”的刊物,该刊由“叶灵凤装帧设计,从封面到插图、题画、尾饰、广告等,都由他一人经营”^③。《幻洲》半月刊的风行与横行,既与刊物的内容相关,也与刊物的美术编辑相连。

—

在后期创造社作家中,叶灵凤属于才华横溢的小说家、编辑家、翻译家、美术家和藏书家,“他能写小说、小品、杂谈,能翻译,还会装帧插图。作画多用英国画家比亚兹莱和日本画家落谷虹儿富有世纪末情调的笔意,屡受鲁迅的讽刺。创作颇饶,十年间梓行了《女娲氏之遗孽》《菊子夫人》《鸠绿媚》《处女的梦》等短篇集及《爱的滋味》《穷愁的自传》《红色天使》《时代姑娘》《未完的忏悔录》等长篇。情节扑朔迷离,结构变化多姿,颇带新浪漫主义风味”^④。叶灵凤另有散文集《天竹》《白叶什记》《忘忧草》《读书随笔》《文艺随笔》《晚晴什记》《北窗读书录》《花木虫鱼丛谈》《世界性俗什谈》等,翻译作品有《新俄罗斯小说集》、罗曼·罗兰的《白利与露西》、显克·微支的《蒙地加罗》以及《故事的花束》《九月的玫瑰》和纪伯伦的散文等。

叶灵凤原名叶韞璞,1905年4月9日出生于南京书香世家,祖父曾点过翰林,父亲做过地方官,母亲王氏是名门之后。叶灵凤幼年丧母,家道中落,因父亲工作之故,十岁左右就离开了南京,赴江西九江读书,而后又随家人迁往昆山、镇江,在九江时阅读了《新青年》和周瘦鹃编辑的《香艳丛话》。在镇江教会中学读书时,看杂书、读笔记小说,“开始学刻图章,开始学画中国画,甚至还开始学做旧诗”^⑤,临摹《芥子园画谱》《古今名人画谱》。1924年,叶灵凤随三叔来到上海,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他开始学习西洋画。1925年,叶灵凤在《学生杂志》发表游记《故乡行》,他向《创造周报》投稿,结识了创造社的成仿吾、郁达夫、郭沫若、周全平、倪貽德、敬隐渔等人,开始在《洪水》发表作品,并发表插图。当时,“郁达夫介绍了《黄面志》,田汉又翻译了王尔德的《莎乐美》,使我知道了英国的薄命画家比亚兹莱,对于他的画起了深深的爱好”^⑥。比亚兹莱担任过《黄面志》的美术编辑,田汉翻译的《莎乐美》1923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插入了比亚兹莱16幅插图。叶灵凤的画得到了郭沫若、成仿吾、周全平等的推崇。1925年,叶灵凤协助周全平编辑《洪水》杂志,为杂志设计封面和插图,并发表小说、散文等。1926年,叶灵凤通过郑伯奇,得到了日本画家落谷虹儿的画集。他回忆说:“这全是童话插画似的装饰画,使我当时见了如获至宝,朝夕把玩,模仿他的风格也画了几幅装饰画。”^⑦1926年

① 定大:《评两种杂志〈幻洲〉和〈一般〉》,《中国青年(上海1923)》第6卷第15期,1926年11月1日。

② 谢其章:《创刊号风景》,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207页。

③ 姜德明:《幻洲》,《书衣百影:中国现代书籍装帧选(1906—1949)》,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2页。

④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633页。

⑤ 叶灵凤:《小楼里的生活》,见陈子善编:《叶灵凤随笔合集之三·北窗读书录》,上海:文汇出版社,1998年,第257页。

⑥ 叶灵凤:《献给鲁迅先生》,《论语》第96期,1936年9月16日。

⑦ 叶灵凤:《读郑伯奇先生的〈忆创造社〉》,《读书随笔三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34页。

叶灵凤与潘汉年合作,先后创办小报《A11》周刊、《幻洲》周刊,《A11》周刊第5期后被查禁,《幻洲》周刊第2期后停刊。1926年10月1日《幻洲》半月刊创刊。1927年叶灵凤参与泰东书局出版物的美术设计。1928年1月《幻洲》半月刊停刊,5月叶灵凤创办《戈壁》半月刊,1928年底叶灵凤主编《现代小说》月刊。1929年与周全平、潘汉年合编《小物件》杂志。1930年3月《现代小说》第3卷第5、6期合刊后被查禁。1931年4月叶灵凤主编《现代文艺》。1932年5月叶灵凤为《现代》创刊号设计封面。1934年叶灵凤与穆时英合作主编《文艺画报》。1935年叶灵凤进入时代图书公司任编辑。1937年叶灵凤任《救亡日报》编辑。1938年5月叶灵凤迁居香港,曾任大同印务书局编辑,主编《星岛日报》副刊“星座”、《立报》“言林”、《华侨日报》副刊“文艺周刊”、《国民日报》副刊等。1975年11月23日,叶灵凤病逝于香港养和医院,享年70岁。

二

在《幻洲》半月刊创刊号上,刊载《本刊重要启事》:“本刊系独立性质,内容侧重文艺,兼及批评讨论。每半月出版一次,由同人私自集资发行,托上海创造社出版部为总代售处,与以前曾出二期即止出版部周报‘幻洲’性质完全异样,并无连带关系,恐有误会,特此声明。”^①1936年,叶灵凤在回忆十年前郁达夫对于其绘画的推崇时说:“周全平和倪貽德更是大加赞赏。这一来,我成了‘东方比亚兹莱’了,日夜的画,当时有许多封面、扉画,都出自我的手笔,好几年兴致不衰,竟也有许多人倒来模仿我的画风,甚至冒用L·F·的签名,一时成了风气。”^②叶灵凤被誉为“东方比亚兹莱”,为诸多杂志书籍作插图和封面设计,叶灵凤包揽了《幻洲》半月刊美术编辑,使《幻洲》半月刊成为具有唯美主义色彩风行的文学刊物。

在谈及《幻洲》周刊时,编者曾解释说:“‘幻洲’是世界语‘OAZO’的译音兼译意。其实就是绿洲(Oases)。”^③虽然《幻洲》半月刊与《幻洲》周刊不同,但是刊名的寓意近似。周全平以骆驼的笔名发表《我们的幻洲》一文说:“虽然是繁华的都会,但环绕在周遭的却像是一片荒凉干枯的沙漠。没有水,没有花,没有香,也没有绿。火一般的炎日下负着重担的骆驼在灰黄色的流沙上蹒跚着,流着汗,吐着白沫。——找一个休息一下的地方吧!只要能休息一下就好。而且也得要有一株青棕,一眼清泉便足够了。”^④寻找沙漠中的绿洲,要有一株青棕一眼清泉,这便是叶灵凤为《幻洲》半月刊设计封面的寓意。叶灵凤在设计《幻洲》半月刊创刊号封面时,以抽象版画式块状构图,以褐色、绿色、本白三色分割画面,占画幅绝大多数的褐色,寓意“荒凉干枯的沙漠”,图左顶天立地立锥般的绿色,以及图中心一小片绿色,寓意沙漠中的“一株青棕”和绿洲,褐色沙漠中的一圈圈的线条,寓意“一眼清泉”的涟漪,画幅上方本白色背景中两个绿色的美术字“幻洲”,充满着绿色的生机,封面上的弧线、直线、曲线构成了参差映衬的艺术美,留给观者丰富的想象与意蕴(见插图1)。《幻洲》半月刊第1卷以创

① 《本刊重要启事》,《幻洲》半月刊第1卷第1期(创刊号),1926年10月1日。

② 叶灵凤:《献给鲁迅先生》,《论语》第96期,1936年9月16日。

③ 编者:《又要谈自己的事情了》,《洪水》半月刊第2卷第19期,1926年6月16日。

④ 骆驼:《我们的幻洲》,《幻洲》周刊第1期,1926年6月12日。



插图 1

刊号封面为本,每期变换色彩。有学者评价《幻洲》半月刊第1卷第3期封面说:“画幅被绿、白、紫三色分割,分别表示植被、沙漠和水,设色明快、爽朗悦目。笔触略显粗拙但大部分线条极其流畅,连水中的涟漪也清晰可见,画风直追比亚兹莱。”^①《幻洲》半月刊第2卷的封面,与第1卷完全不同:以黑色、黄色、本白三色分割画面,画幅前端三条黑色的波线,意味着清澈的河流,右首八条粗细不等的竖线,可以联想到船桅或树林,黑线后大大的黄色图案,像一条游动的大鱼,画幅左侧黑色图案像连绵的山脉,黄黑交织的图案像鸟、像泉、像风,画幅右上角在黄色如金字塔的背景上,是两个黑色粗体字“幻洲”。整幅画面充满着动态感、轻灵味,洋溢着奇幻色彩、空灵韵味。

第2卷其他几期均变换色彩。叶灵凤曾在《幻洲》半月刊第1卷第7期《璅缀》中说:“最近曾有许多朋友们写信来,说幻洲的封面画看不懂,要求我作一个解释。我很惭愧,这一个要求使我极难于答复。因为他实在没有什么奥秘的意思可解。这是一幅画,他所要求的只在欣赏,并不在解释。蝴蝶翼上的花纹,西方天际的晚霞,是被人喻为最美丽的东西的,但是他并没有什么含义。一切的装饰图案也都如是。”^②《幻洲》半月刊的封面设计,在抽象的板块式设计中,蕴含着深邃的意蕴。

在美术编辑中,叶灵凤精心安排《幻洲》半月刊的插图,几乎没有专为作品作的插图,插图都安排在叶灵凤主编的上部“象牙之塔”中,刊载了亚丝·勃歇夫3幅、虹儿3幅、Dold 8幅、Alb.Hahn 6幅、Larsson 1幅、罗丹雕塑1幅、叶灵凤绘图7幅。亚丝·勃歇夫的3幅:《The Death of the Last Centaur》(第1卷第3期,《最后一个人头马之死》)描绘鳞次栉比的建筑黑影前,画幅中间是一匹健壮的人头马,他后肢半蹲前肢伸展,昂首向天双臂挥动,执拗战栗。《The Madman's Funeral》(第1卷第3期,《疯子的葬礼》)描绘黑夜里,一群骷髅们一前一后抬着疯子的尸体去埋葬,画幅浓郁黑色的底色中,骷髅们白骨森森,在白色裹尸布飘逸的线条后,是一盘大大的圆月,离奇阴森。《失败后》(第1卷第6期)绘一赤身裸体瘦骨嶙峋的武士,有着一对黑色展开的双翼,一手携盾牌,一手捏长剑,落魄凄冷。《幻洲》半月刊第1卷8期刊载虹儿3幅:《幻影船》绘沉沉黑夜中,在滔天巨浪中行驶的一艘帆船,画幅中大半篇幅是腾起的巨浪,右上角绘的帆船努力驶上浪峰,惊险迷离。《绒织物之习作》绘一身穿花袍秀丽端庄的女子,坐在沙发里织毛线,她身前的茶几上,放着一只玩偶,一只长颈小花瓶里,插着一朵盛开的玫瑰,温馨恬静(见插图2)。《小憩》绘一面容俊俏的青年贵族男子,身穿高领华服,纤纤左手持一支烟,腾起一圈圈烟雾,他身前的酒杯还有半杯酒,他身旁是一位盯着他看的秀发女子,暧昧淫靡。插入画幅最多的是Dold 8幅:《夜的顶礼》(第1卷第9期)绘一纤长裸体女性的背影,她伫立在漫天繁星背景的门框台阶前,两只纤长的手臂伸展扶着门框,如瀑的长长黑发拖曳下来,至底部绘成孔雀尾一般的图案,香艳奇



插图 2

① 群山:《《幻洲》第一卷第三期》,《采葑小集》,北京:海豚出版社,2016年,第29页。

② 叶灵凤:《璅缀》,《幻洲》半月刊第2卷第7期,1928年1月2日。

诡。《蛾》(第1卷第9期)绘夜空中五位赤裸着的采星女,她们细长的裸体在夜空里,呈现出曼妙的飞舞状,手里采摘着一颗颗晶莹剔透的星星,白色美艳的胴体与黑色幽深的夜空,构成一种映衬和反差,神奇幽幻。《神秘的对象》(第1卷第10期)绘一大眼、高鼻、樱唇女子头像,戴着黑色的包头布,两耳悬挂长长的耳饰,神秘幽深。《挣扎》(第1卷第10期)绘星空下套在网里的裸女,长长的美腿脚踝上戴着脚环,躺卧在网里两手挣扎,大片黑色夜空背景中繁星点点,无奈执拗。《逃避》(第1卷第11期)绘一扇华丽大门前,一修长妖娆女子赤裸着腿迈步,细长的双臂戴着环,两手做着怪异的动作,身前有一条张开大口凶狠的狗,其身后黑色背景中,竖着一根雕花柱子,怪异沉郁(见插图3)。《恳求》(第1卷第11期)绘一在波浪里挣扎恳求的裸女,画幅黑色的底色里前端是裸女修长白皙的胴体,她仰首举手向前祈求,画幅右上角虚线勾勒一个幽灵,诡谲骇人。《舞》(第1卷第12期)画幅绘黑色背景中,画幅下方一头戴冠冕的半裸女子在起舞,她双手合并前伸,一腿朝后弯曲,其身前有一巨蟒样的怪物,含笑注视着她,画幅右侧是一伫立的巨大石柱,怪诞神奇。《呈现》(第1卷第12期)画幅中黑色底色上绘一只升起的手臂,手臂上缭绕着众多弧线,摊开的手掌中托起一颗桃状的心,执拗温馨。《幻洲》半月刊第1卷第5期刊载了 Larsson 的《人体》素描1幅,绘一肥硕坐女的裸体,平和的笑容、肥硕的双腿,左手托着右手在脊背搔痒。



插图3

《幻洲》半月刊第1卷第7期刊载 Alb.Hahn 的6幅:《光荣的胜利者》绘一戴橄榄枝头圈的骷髅,意味着一将功成万骨枯。《野蛮的土人,任小孩与鳄鱼相嬉的土人,听见了大战的消息,也觉得可怕》绘两个鼻子、耳朵上都戴环的肥硕土人,在看报后吃惊的表情。《进行曲》绘一个穿袍子的骷髅在用小提琴疯狂地拉着进行曲,画幅右侧绘一队队士兵,向炮火连天的前方冲去。《一个武装的士兵同个猩猩的比较》右侧绘一个戴着防毒面具的士兵,左侧绘一个猩猩。《二十世纪的新建筑》绘一座大教堂,教堂正中居然是一个骷髅。《马槽中,血污了手的瞻圣者》绘圣母玛利亚在马槽中降生基督,那些杀人如麻的人们两手沾满了鲜血,居然还来朝圣基督。Alb.Hahn 的绘画充满了反战精神。

《幻洲》半月刊共插入叶灵凤有标题插图7幅:《皈依》(创刊号)画幅中间是一个低眉垂脸虔诚跪拜的长发女,两挂如瀑的黑色长发挂在胸前,画幅左下角是圆盘形的香炉,一缕黑色的香烟袅袅升腾,蔓延开来形成美妙的图案,女子身后是悬挂着的披肩,披肩上有着玫瑰与孔雀羽翼图案,虔诚神秘。《幻象》(第1卷第4期)画幅上右侧绘伫立着戴黑色眼罩长发披肩的女性,左侧投下浓郁黑色的影子,诡谲离奇。《冥想》(第2卷第1期)画幅右半部是黑色背影中,披裙袍伫立抑郁的女性,画幅左侧是花丛中烛台上点燃的一长支蜡烛,压抑奇幻。《残夜》(第2卷第2期)画幅前一支即将燃尽的蜡烛,蜡烛的一缕青烟在画幅上,构成两条婉转优美的线条,画幅左上角是一戴着黑色眼罩的黑色长发面容,画幅左侧是一条黑色卵石路尽头,一个踟蹰独行者的背影,惊恐神秘(见插图4)。《苦杯》(第2卷第3期)画幅中绘圆盘中基督受难的图像,一条笔直开阔的大道两旁,分别是盛开的向日葵田和硕果累累的葡萄园,画幅中间是全身赤裸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身影,绚烂惨烈。《囚》(第2卷第4期)画幅上绘戴着粗大手铐脚镣黑色的身影,他弓背屈膝老态龙钟,一盘圆月正升起,一只猫头鹰站立右上角枝桠上,沉重压抑。《昨夜的梦》(第2卷第4期)画幅绘一个正在垂泪秀发的女子,一

滴滴厚重的泪滴,滴在画幅左下角一朵巨大的玫瑰花上,画幅右上角是黑夜中的一盘圆月,凄凉清冷。《无名的病》(第2卷第6期)画幅中间绘一黑发低眉垂眼的女性面容,画幅右上角是戴黑色眼罩长发女子的脸庞,画幅左下方是一丛盛开的玫瑰,神秘迷离。叶灵凤还有一些未冠名的插图。

《幻洲》半月刊的插图,除了 Alb.Hahn 的 6 幅反战讽刺画以外,大多数插图以女性为主体,在流畅的线条、奇幻的构图、黑白的对比中,呈现出抑郁神秘诡谲的境界,营构出刊物的唯美主义追求。



插图 4

三

叶灵凤在《幻洲》半月刊创刊号的《编后随笔》中说:“这一次我对于插画的卖力,这一点心血确是不可埋没的。除开封面画和一幅半面的插画外,仅是那许多零星的饰画,已值得自己珍赏的了,我画了许多杂志上的饰画,从来没有这一次这样的用力。”^①在《幻洲》半月刊中,叶灵凤精心设计刊物的题画与尾饰,让刊物增加一些唯美色彩。

《幻洲》半月刊的题画设计,从创刊号起大约按照栏目设图:第1卷上部“象牙之塔”目录页的题画为半圆形图饰,图案似孔雀开屏羽毛图饰;下部“十字街头”目录页的题画亦为半圆形图饰,图案似缀着果子的橄榄枝。从第2卷第2期开始,上部“象牙之塔”目录页的题画更换为半圆形图饰中长发女子背影;下部“十字街头”目录页的题画为半圆形图饰中古装女子的行走,背景为烟囱和行人。上部首篇的题画为长方形图饰,画幅中心是一披长袍女性,她似乎伫立在长桥上,有几分抑郁、几分梦幻,长桥两旁是缤纷多彩的风光。第1卷散文栏为长方形题画,画幅上是多个长发披肩裸女形象,或弯腰俯首,或挺胸仰天,或手舞足蹈(见插图5)。小说、小品栏题画为长方形画幅中绽开的八朵玫瑰,缀在诸多带刺的花枝上。小说散文栏为篇题左侧竖立黑框长方形题画,画幅左侧为伫立穿袍的女性,右上角为窗棂,左下角为桌子。诗歌、散文栏题画为女子玫瑰圆形图,画幅左侧为伫立的长发女子,上半幅为黑色背景中绽开的朵朵玫瑰,画幅中间是烛台上的一支蜡烛。序言栏的题画为方形图案,画幅主角是披着宽松衣袍黑发女子回眸的身影,飘逸的长发像浓墨一撇,右方是孔雀尾翼图案,左方是孔雀回首。编后随笔题画为长方形剪影,画幅上是欧式庭院中的女子形象,左为树丛,右为廊柱,中间是伫立穿古袍的女子。下部首篇的题画为



插图 5

长方形图饰,在黑色背景中,是两只徘徊十字街头的狗,画幅右边是一戴礼帽女性身影。街谈巷议栏题图为长方形,黑色背景中一盏台灯下,绽开着一朵朵玫瑰花。日记连载栏题画为长方形画幅中诸多短发女子的面容和后背,并有一些白皙的手臂。书评栏题画为篇题左侧竖立长方形画幅,黑白对比的三角和圆弧图案中,是波浪般、轻风般的线条。闲谈栏题图为黑色长方形框中,右侧山坡上的一间黑色小屋,左侧山坡上的两朵小花。第1卷第4期叶灵凤的小说《菊子夫人》的题图为圆形图案,

① 叶灵凤:《编后随笔》,《幻洲》半月刊第1卷第1期(创刊号),1926年10月1日。

中心绘一明眸樱桃小口女子的面容,额点红、黑短发、长耳环,图案周边绘数朵菊花。第1卷第4期《人生与性爱》题图为长方形图案,画幅是横七竖八的京剧面具,有花旦、青衣、老生。第2卷中的题画,常常出现圆形画幅中双翅女子的画像,并绘一群鸟儿排列椭圆形围着。

《幻洲》半月刊的尾饰设计,创刊号《编后随笔》的尾饰是圆形图案,一穿宽松衣袍女子的背影,其左手按在黑色的桌上,桌上香炉里的香烟袅袅升腾,右侧是屋舍的黑色剪影(见插图6)。第1卷第2期随笔《幔》的尾饰,长方形画幅中,是四位长发披肩女子的背影,好像站在黑色的拱门前,她们中间有一缕香烟冉冉升起。小品的尾饰,长方形图案中,是披衣袍黑发女子站立的身影,惊诧的面容前,是弯曲着垂地的长发,身后是屋舍的剪影。散文的尾饰是半圆形图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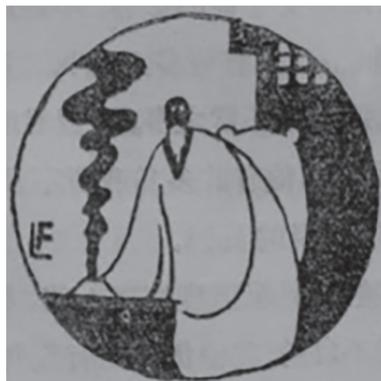


插图6

左面黑色背景中是短发女子的剪影,右面是玫瑰花的线条勾勒。旅居随笔的尾饰为半圆形图案,图中是仰面躺在床榻上的女子,其黑色的秀发如瀑布一般从床头披拖到地上,画面上方是窗棂、右侧是布幔的花饰。第1卷第4期小说《口红》的尾饰为长方形图案,黑底中间用白线勾勒一站立劳作者的身影,右下角是一跪拜者,右上角描画了太阳的面容。亚灵《新流氓主义》尾饰为长方形图案,画幅为一女性面容,小眼睛、厚嘴唇,几缕发丝如柳条垂下。《骆驼与泼皮男士》《北行道上》的尾饰为一长方形图案,画幅上是栅栏外一株老树弯曲

的身影,几枝光秃秃枝桠上飘落的树叶,昭示着深秋的来临。《街谈巷议》的尾饰为一圆形图案,画幅为岸边的一株弯曲的衰柳,无叶的丝丝柳枝垂下,看得见河水与对岸。第2卷第2期开始出现了些新的尾饰:梅绍农诗歌《进酒曲》、第2卷第3期沈松泉《致一个少女》的尾饰为圆形图案黑夜中,戴耳环女性骷髅,伸出纤细的十指。第2卷第2期叶灵凤《禁地》、第2卷第4期亚灵的《求爱》的尾饰为长方形图案黑白对比中的冰川。

叶灵凤精心设计刊物的题画与尾饰,幻美而蕴蓄,暧昧而迷离,在简约的构图、幽婉的线条、含蓄的象征中,呈现出《幻洲》半月刊独特的审美风格。

四

美国学者拉尔夫·迈耶在《美术术语与技法词典》中认为:“‘插画’指诸如书、杂志和广告等印刷品中,为了配合文字意义加强效果而特意插入的图画。一幅本来为了其它目的而画的画,如果与文字内容相符也可用来做插画。与文字并置在一起但不是特意描述文字的艺术是装饰而不是插图。”^①叶灵凤为《幻洲》半月刊所设计的封面、插图、题画、尾饰,大多并非是为了配合文字而作的,叶灵凤为《幻洲》半月刊所作的图画,并非简单地从属于文字,而具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

叶灵凤的美术设计在《幻洲》半月刊中,形成了其独特的绘画语言,其中女性胴体成为其特别钟情的对象,在其遴选插入的亚丝·勃歇夫的《The Madman's Funeral》、虹儿的《绒织物之习作》、Dold的《夜的顶礼》《蛾》《挣扎》《逃避》《恳求》《舞》,都以女性美艳妖娆的胴体为描绘主体,在流畅的

^① 转引自邓雅楠编著:《插图设计》,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3页。

线条、妖艳的形体中,呈现出神奇迷离的美感。叶灵凤创作的插图《皈依》《幻象》《冥想》《昨夜之梦》《无名的病》《幻洲》半月刊创刊号插图描绘伫立女性的背影、第1卷第2期插图描画时髦女郎低眉敛首之态,都以女性为主体,虽然叶灵凤并不恣意描画女性裸体,却在阴郁凄迷的画幅中呈现出伤感沉郁的风格。“女性是美的象征。优美的曲线,丰盈的肌体,俏丽的面庞,明净的眼睛,是大自然赋予女性的天然美质。女性以她的存在显示鲜活的生命力。女性的美令人赏心悦目,唤起人们美的情思、美的追求。”^①在《幻洲》半月刊题画与尾饰的创作中,叶灵凤大多也选取了以女性为主体,《幻洲》半月刊上部首篇文章的题画,全平《迷梦》、金牛《漂泊的话》的题图,为众多长发裸女;《编后随笔》的题图与尾饰,滕刚诗歌《怨女》题画,为一长发卧女,绍宗散文《夜哭》题画,为玫瑰前伫立女性。在美术设计中,叶灵凤努力以婉转流畅的线条勾画女性美艳的胴体,凸显女性内心的抑郁与感伤,呈现其绘画语言独特的追求与审美。

叶灵凤在《幻洲》半月刊的美术设计中,常常描画玫瑰的图案,成为其画幅中重要的绘画语言。“在古代,对一些有名的星占学家,如阿格列帕·封·纳特斯赫姆说来,他们认为玫瑰本身就是伟大女神维纳斯的本命花。以此类推,玫瑰盛开在一年之中最美好的季节里,它象征着爱情,象征着美好。”^②火红的玫瑰常常是热恋中男女表达恋情的信物,象征着忠贞不渝的爱情。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的小说《献给艾米莉的玫瑰》中,玫瑰花象征着艾米莉一生从未得到过的爱情。叶灵凤的《昨夜之梦》(第2卷第5期)描画月夜中女性的泪滴,滴落在一朵大大的玫瑰上,表达女性爱情的失落与悲伤(见插图7)。叶灵凤的《无名的病》描画敛首低眉女性的抑郁伤感,画幅左下角是一丛绽开的玫瑰,蕴蓄着女性对于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叶灵凤为《幻洲》半月刊设计的题画中,玫瑰常常成为画幅中重要绘画语言:创刊号绍宗《夜哭》的题画,圆形图案中伫立的女性身后,是半幅玫瑰图案。“街谈巷议”的题画,长方形图案中是灯下绽开的玫瑰图案。滕刚《怨女》的半圆形尾饰,绘一女性头像,右下角是黑色背景中玫瑰花的白线勾勒。第1卷第2期《红灯小撷》的题图,长方形图案中是长满刺的枝干上八朵绽开的玫瑰。第1卷第9期潘汉年《信手写来》的题画,是长方形画幅中绽开的数朵玫瑰。



插图7

叶灵凤在《幻洲》半月刊的美术设计中,常常描画蜡烛的图案,成为其画幅中重要的绘画语言。“一般说来,蜡烛象征作为‘世界之光’的基督。”^③据统计,唐代诗歌中有七百首写到蜡烛的诗篇,“诗中的蜡烛意象往往产生了富贵化、女性化、温情化、悲情化倾向”^④。自李商隐的名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流行后,又将男女间至死不渝的爱情增添了悲情色彩。叶灵凤的插图《冥想》画幅中,披袍伫立女性旁,是一柱长长点燃的蜡烛。叶灵凤的插图《残夜》画幅中,诡谲的长发女性头像前,是半截熄灭蜡烛袅袅的烛烟。创刊号《编后随笔》的尾饰,是圆形画幅长袍女子的背影,画幅左边绘一熄灭烛烟的袅袅升腾。第1卷第2期滕刚诗歌《散后的歌场》的题画,是穿黑袍伫立女子,其身旁是烛台上点燃的蜡烛。《幻洲》第2卷第2期上部“象牙之塔”目录页的题画,半圆形画幅中是

① 方彰林、姜世正主编:《人体美学》,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26页。

② 曹乃云编译:《外国象征典故辞典》,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0页。

③ [美]詹姆斯·霍尔:《东西方图形艺术象征词典》,韩巍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第108页。

④ 詹衡宇主编:《唐诗鉴赏常识》,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0年,第299页。

长发女子背影,其左首是一刚刚熄灭的蜡烛,烛烟袅袅升腾。第2卷第2期插图圆形画幅中,在半裸女子的双手前,是一支伸出画幅长长点燃的蜡烛。

叶灵凤在《幻洲》半月刊的美术设计中,常常描画孔雀羽的图案,成为其画幅中重要的绘画语言。叶灵凤美术设计受到英国比亚兹莱绘画的影响,田汉翻译的《莎乐美》1923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插入了比亚兹莱16幅插图,叶灵凤因此对于比亚兹莱绘画极度爱好,“我喜欢比亚兹莱为这个剧本(《莎乐美》)所作的画,甚于剧本本身”^①。比亚兹莱的《莎乐美》插图中的《孔雀裙》,就描画了一位女性长长的裙摆下方孔雀羽的图案(见插图8)。郭沫若曾写诗赞颂该画“我独披件白孔雀的羽衣,遥遥地,遥遥地,在一只象牙舟上翘首”^②。叶灵凤插图《冥想》中伫立女子裙摆的右下方,也绘描了孔雀羽的图案。叶灵凤插图《皈依》(第1卷第1期)画幅上跪拜女子身后悬挂衣裙的图案,也绘描了孔雀羽的图案(见插图9)。《幻洲》半月刊上部的题画,是孔雀开屏的羽翼图案。叶灵凤在《幻洲》半月刊插图中,方形画幅中绘一伫立女子回眸场景,以孔雀图案为画幅的背景。

有学者评说《幻洲》半月刊的美术编辑:“在编辑《幻洲》期间,叶灵凤的插画糅合着英国画家比亚兹莱的热烈的梦幻感,和日本画家落谷虹儿的幽婉的抒情性,于明快的黑白设色和小蛇似的敏捷线条之间,升华出迷离恍惚的梦。”^③奥博利·比亚兹莱(1872—1898年)是英国19世纪末最伟大的插画艺术家之一,他曾为《亚瑟王之死》《莎乐美》《莉希翠塔》《劫发记》《沃尔普尼》等作品绘插图,他担任著名杂志《黄面志》的美



插图8



插图9

编。精细的线条、细碎的花纹、装饰的意味、颓废的色彩,让比亚兹莱成为具有无限影响的插图艺术家(见插图10)。鲁迅评价说:“……视为一个纯然的装饰艺术家,比亚兹莱是无匹的。他把世上一切不一致的事物聚在一堆,以他自己的模型来使他们织成一致。”^④1920年,比亚兹莱被介绍进中国,让叶灵凤一见钟情,“动手模仿起来,画过许多比亚兹莱风格的装饰画和插画”^⑤。叶灵凤在《幻洲》半月刊插入其创作的《皈依》《残夜》等,在画幅构图、人物造型、婉转线条、颓废色彩,都直接受到比亚兹莱的影响(第1卷第4期)(见插图11)。落谷虹儿(1898—1979年)是日本浪漫主义绘画的代表性画家,有《虹儿画集》《我的画集》《我的诗画集》《梦迹》《悲凉的微笑》《抒情的旅人》《睡莲的梦》《花嫁人形》《爱的抒情画集》《银的吹雪》等。鲁迅在《〈落谷虹儿画选〉小引》中引落谷虹儿自序:“我的艺术,以纤细为生命,同时以解剖刀一般的锐利的锋芒为力量。我所引的描线,必需小蛇似的敏捷和白鱼似的锐敏。”^⑥鲁迅评点说:“用幽婉之笔,来调和了 Beardsley 的锋芒,这尤合中国现代青年的

① 叶灵凤:《读书随笔(修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48页。

② 郭沫若:《“蜜桑索罗普”之夜歌》,见朱自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1917—1927)》,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106页。

③ 杨义、张中良、中井正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上卷,台北:台湾业强出版社,1995年,第240页。

④ 鲁迅:《〈比亚兹莱画选〉小引》,见张望辑:《鲁迅论美术》,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56年,第48页。

⑤ 叶灵凤:《比亚斯莱的画》,《读书随笔》二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294页。

⑥ 鲁迅:《〈落谷虹儿画选〉小引》,见张望辑:《鲁迅论美术》,第61页。



插图 10

心,所以他的模仿者就至今不绝。”^①叶灵凤选入《幻洲》半月刊第1卷第8期落谷虹儿3幅插图,均选自大正十三年(1924年)日本交兰社出版的落谷虹儿诗画集《睡莲的梦》。落谷虹儿的画:“在乍看上去颇富装饰性的构图下,他以那些用铜版画的刻针所描绘的精致的、纤毫毕现的曲线,呈现自身的想象,赋予作品以一种东洋艺术家所特有的细腻的感受性。”^②叶灵凤在《幻洲》半月刊插入其创作的《冥想》《无名的病》(第2卷第6期)(见插图12)等,在画幅的设计、人物的造型、曲线的婉转、蕴含的温馨等方面,可以见出所受到落谷虹儿的影响。虽然,由于鲁迅与叶灵凤的交



插图 11

恶,他评说叶灵凤的画“生吞琵琶词侣,活剥落谷虹儿”^③,却道出了叶灵凤的绘画受到了比亚兹莱、落谷虹儿的影响。叶灵凤在绘画过程中,学习了比亚兹莱的精细与颓废,借鉴了落谷虹儿的柔美与神奇。叶灵凤的绘画还受到了英国画家丹特·加布里埃尔·罗赛蒂、威廉·布莱克和美国画家鲍里斯·阿茨巴舍、洛克威尔·肯特等画家的影响。

叶灵凤在《幻洲》半月刊的美术设计中,女性、玫瑰、蜡烛、孔雀羽成为其偏爱的绘画语言,在其追求的凄美抑郁的境界中,将爱情的追逐、失落的情感、忠贞的向往、美艳的图案融汇,呈现出《幻洲》半月刊独特的唯美色彩。在模仿与借鉴比亚兹莱、落谷虹儿过程中,虽然叶灵凤还缺乏比亚兹莱的精细与华美,还缺少落谷虹儿的锐利与细腻,但是叶灵凤在美术设计中,使《幻洲》半月刊成为一份具有唯美主义色彩“风行”“横行”的文学刊物。



插图 12

责任编辑:冯济平

"The Most Popular is *Fantasy Island*": Art Editor Ye Lingfeng of the Semimonthly

Yang Jianlong Wang Tong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Fantasy Island* is a semi-monthly run by Ye Lingfeng, whose cover design with an abstract block conveys profound meaning. The smooth lines, fantastic layout and contrast between black and white in his illustrations present a mysterious atmosphere of depression, which attributes to the aesthetic pursuit of the publication. Ye carefully designed the magazine's title paintings and ornaments, which were beautiful and vague, ambiguous and blurred, showing a unique aesthetic style with a simple composition, gentle lines and implicit symbols. Women, roses, candles and peacock feathers became Ye Lingfeng's preference of the painting language, and by imitating and learning from Beardsley and Koji Fukiya, he made *Fantasy Island* a popular literary publication with its aesthetic colors.

Key Words: Ye Lingfeng; semi-monthly *Fantasy Island*; art editor; aestheticis

① 鲁迅:《落谷虹儿画选》小引,见张望辑:《鲁迅论美术》,第60页。

② 刘柠:《落谷虹儿与竹久梦二》,《东方早报》2014年4月16日。

③ 鲁迅:《奔流》第一卷二期编校后记,见杨里昂、彭国梁主编:《鲁迅出版文选》,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251页。

佛传与史诗

侯传文

青岛大学 文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71

摘要: 佛传与史诗是印度文学史上两种不同的文学体裁,属于不同的文类范畴,但二者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佛传文学的形成时期,印度两大史诗已经广泛流传,对正在形成过程中的佛传产生了较大影响,形成比较明显的互文性。公元2—3世纪产生的《佛所行赞》和《佛本行经》等史诗型佛陀传记,是佛传与史诗结合的产物,从内容看是佛传,从文体看是史诗,具有独特的文体学意义。史诗型佛传不仅体现了史诗从口头文学到书面文学、从民间文学到文人创作的发展历程和诗学特性,而且艺术风格从素朴到铺张,开了印度文学史上文人“大诗”创作之先河。

关键词: 佛传文学; 史诗; 史诗型佛传; 大诗

中图分类号: B949.9; I207.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3)01-0049-12

印度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前后,公元5世纪被印度教确立为经典,在这千余年的产生、流传、加工、增益的过程中,产生了印度文学史上另一种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类型佛陀传记。公元前5世纪佛陀释迦牟尼灭度以后,他的生平事迹成为佛教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佛教文学艺术的重要素材。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后的部派佛教时期,佛徒出于对已经远去的佛祖的怀念,或出于弘法护教的需要,有意广泛收集资料,编撰佛陀传记。现存梵文和汉译佛陀传记有十余种,大多产生于公元前后,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加工变异。佛传文学产生、流传、加工、增益的过程,与两大史诗交叉重合。后发的佛陀传记中可以看出两大史诗的影响,其间的互文性关系和文体学意义值得专题探讨。

一、互文性

佛陀传记与两大史诗的互文性表现在许多方面,或者说二者有多种互文方式。首先是情节方面的模仿借鉴。比如释迦牟尼出身为刹帝利王族,作为王子青少年时期应该接受相应的教育。在原始佛典中,基本没有或者很少这方面的内容。但在许多佛陀传记中都有悉达多太子作为王子接受教育的记述,其中有些作品辟有专章,如《神通游戏》有专门的《学堂示现品》,《佛本行集经》有《习学技艺品》,都是讲述菩萨到达学龄进学校学习,或者国王聘请名师对王子们进行教育。作品关于太子教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印度佛传文学资料整理与研究”(2018VJX03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侯传文,男,山东泰安人,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印度文学、佛教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育的内容和方式,除了依据当时或作品问世时代印度的教育体制,其主要参考借鉴的对象应该是印度两大史诗,特别是《摩诃婆罗多》。《摩诃婆罗多》比较关注王子的教育问题,既有理论的表述,也有实际的描写。其理论表述如《和平篇》中有关于各个种姓的正法的论述,其中关于刹帝利的正法有这样的表述:“他应该学习,而不应该教学;应该保护臣民,永远努力消灭盗匪,在战场上逞威。举行各种祭祀,富有学问,在战场上获胜,这样的国王是征服世界的豪杰。”^①《摩诃婆罗多》关于王子教育的具体描写主要在史诗初篇,其中系统地讲述了王子们的教育过程。他们先跟慈悯学习了弓箭术,然后作品写道:“为了孙子们能出类拔萃,希望他们训练有素,毗湿摩请名师,全都是精通弓箭术、武功娴熟、勇武超群的人物。不是足智多谋,不是威望崇高,不是精通各种武艺,不是极具天资的人,已经教导不了这些力大无穷的俱卢子孙学习武艺。”^②由此引出名师德罗纳。作品比较细致具体地讲述了毗湿摩聘请德罗纳教授王子们武艺的过程。德罗纳对阿周那格外看重,不仅将他培养成为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射手,而且教会他车战、象战、马战以及地面战斗的武艺,“还教会这位般度之子杵战的武艺、刀剑之术、长矛、钩连枪和标枪的武艺,以及几种兵器并用的武艺”^③。

关于王子教育,作为佛传集大成的《佛本行集经》也有比较充分的展示。作品记述释迦族的王子们在具备了初步的学习基础之后,净饭王问群臣:“何处有师,最便武技、善巧、军戎、兵仗、智略,堪教于我悉达太子?”大臣推荐忍提婆,说他掌握29种善巧善妙功夫,堪教太子兵戎、法式。于是净饭王聘请忍提婆来教太子。不久王子们皆得29种成就,从中可以看出,作为刹帝利王子,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包括兵戎、法式、书算、音律、图画、骑射、相扑等技艺。不仅如此,作为将来要继承王位的太子,还要学习王法,作品写道:

复欲教习诸王要法,所谓天文、祭祀、占察、悬射前事、谵语巧诵、知诸兽音、达于声论、造作诸技、因伎报答、咒术杂事,十余种名,治化古先,一切书典,教于太子。及自他释,亦如是教。^④

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中都有主人公少年时期学习和养成教育的内容,在这方面,后出的佛传文学明显受到史诗的影响。

佛陀传记对两大史诗借鉴最明显的首先是比武招亲。两大史诗中都有比武招亲的情节或场面的故事情节。《罗摩衍那·童年篇》中罗摩拉开神弓赢得公主悉多为妻,《摩诃婆罗多》中阿周那在比武招亲中力挫群雄,赢得黑公主。后期佛传中有许多作品安排了比武招亲的情节。如《佛本行集经》第十三品《掬术争婚品》,主要讲述太子通过比试技艺赢得耶输陀罗为妃的故事:净饭王通过让太子给适龄少女分发礼品的方式,发现太子对大臣摩诃那摩之女耶输陀罗有意,于是择日派人前往提亲。但摩诃那摩表示自己有祖传家规,女儿要嫁给精通技艺之人,太子生长深宫,未曾学习,无有技能,因此不能将女儿许配。净饭王为此忧愁烦恼,太子问明缘由,同意与释种青年比试技艺。有五百位释迦族青年参加比赛,菩萨精通各种技艺,在书写、数学、角力和射箭等方面都远胜对手,赢得耶输陀罗。《神通游戏》之《技艺示现品》也是记述太子通过比试技艺赢娶耶输陀罗的故事,其在射箭比赛中有

① [印]毗耶娑:《摩诃婆罗多》(五),黄宝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11—112页。

② [印]毗耶娑:《摩诃婆罗多》(一),金克木、赵国华、席必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01页。

③ [印]毗耶娑:《摩诃婆罗多》(一),金克木、赵国华、席必庄译,第306页。

④ 《佛本行集经》,闍那崛多译,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册,东京:日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79年,第705页。

一个特别的细节值得关注：轮到太子射箭的时候，他拉弯一张又一张弓，每张弓都断裂；国王命人取来放在神庙中供养的祖传神弓，所有释迦族王子以及耶输陀罗的父亲执杖都不能弯弓搭弦；太子左手握弓，用右手一个指尖搭上弓弦，一箭射出；那支箭穿透远处许多铁鼓和障碍之后，钻入地下，形成“箭井”；太子由此战胜所有竞争者，赢得耶输陀罗。这个细节很容易使读者联想到《罗摩衍那·童年篇》中罗摩拉开神弓赢得公主悉多为妻的情节，其中的一致性不仅在于神弓，而且在于以赢取美女作为王子养成教育成功的标志。

其次是对主人公的神化方式。早期佛典中的释迦牟尼是人而不是神，基于原始佛典的早期佛传也将其作为人来描写，着力表现他追求真理的执著精神，表现他得道和传教的大智大慧。部派佛教时期产生的各种佛陀传记神话成分明显增多，对佛陀的崇拜和神化有所增强。在后期的大乘佛传文学中，佛陀被塑造成全知全能、尽善尽美、法力无边、超越时空的至高无上的神，从而最终完成了佛陀由现实的教派领袖导师向救世主的转化。这样的佛陀形象发展演变有许多因素，对两大史诗的借鉴是其中之一。两大史诗最初都是歌颂刹帝利王族的英雄颂歌，主人公原本是人间的国王或者武士，后来经过婆罗门的加工改造，将《罗摩衍那》的主人公罗摩和《摩诃婆罗多》中的重要人物黑天作为大神毗湿奴的化身，并且极力宣传对作为大神化身的罗摩和黑天的崇拜，由此，原本世俗的歌颂民族英雄的史诗逐渐演变成为印度教的经典。佛教与印度教互相斗争又互相影响，由于印度教的两大诗史塑造的大神形象吸引了大量群众信教，刺激了佛教徒，他们感到必须神化佛陀，塑造佛陀的完整的和超人格的形象，才能与印度教的大神相抗衡，这个任务只能通过编制佛陀传记来完成，由此促进了佛传文学的发展。大部分佛陀传记都把佛陀描写为天界神灵化身，特别是大乘佛传《神通游戏》，在《序品》之后用了6品，讲述菩萨由天宫降生人间的故事，突出化身下凡的主题^①。此外，觉音的《顶珠》前两章描写净饭王拜神求子，众天神让兜率天的国王降生人间，化身净饭王的儿子悉达多，征服爱神，救护三界，明显模仿《罗摩衍那》“童年篇”十车王求子，众天神请求毗湿奴大神下凡人间，化身十车王的儿子罗摩，铲除十首魔王罗波那，救护三界。也就是说，佛陀传记中不仅人间智者释迦牟尼成为至高无上的神灵是两大史诗影响的结果，其化身下凡的方式也有对两大史诗的借鉴。

再次是两大史诗中的人物和故事经常作为典故出现在佛传作品中，属于典型的文本互文，是佛传与史诗互文的基本方式。这样典型的互文又有几种情况：

其一是人物类比，即史诗中的角色人物进入佛传，与佛传中的人物形成类比。如《佛所行赞》第六章《阐释迦返城》讲太子半夜逾城出家之后，吩咐车夫阐释迦回去向父王和家人转达自己的问候之意和出家求道决心，车夫不愿舍太子而去，说“我心中烦恼焦躁，不能将你抛弃林中，而自己回城，如同苏曼多罗抛弃罗摩”^②。苏曼多罗是《罗摩衍那》中十车王的车夫，罗摩自愿流放森林，苏曼多罗奉十车王之命，将罗摩送往森林，然后独自返回。因此这里阐释迦自比苏曼多罗。作品继续讲述车夫和马回到迦毗罗卫城，市民们没有看到悉达多太子返回，都非常悲痛，作品写道：

看到他俩身躯和步履沉重，

^① 参见侯传文：《〈神通游戏〉与后期佛教神话》，《东方论坛》2018年第6期。

^② [印]马鸣：《佛所行赞》，黄宝生译，见黄宝生译注：《梵汉对勘佛所行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57—158页。

释迦族雄牛没有一同返回，
市民们的泪水洒落在路上，
犹如从前罗摩的车辆返回。

这一颂直接提到了罗摩，是直接的明显的互文性。接下来作品描写净饭王得知爱子出家，进入森林修道，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欣赏阿迦王聪慧的儿子
十车王，这位因陀罗的朋友，
儿子流亡森林后，升入天国，
而不凄凉地活着，空流眼泪。”

……………

国王与儿子分离而悲痛，
失去原本如同大地的坚定，
就像十车王为罗摩忧伤，
神志不清，接连不断哀诉。^①

这里将净饭王与十车王类比，将悉达多太子与罗摩类比，显示出《佛所行赞》与史诗《罗摩衍那》的互文性。接下来作品讲述大臣和祭司为了安慰国王，出城寻找太子，试图劝说他回家，在劝说太子的过程中，也多次提到包括罗摩在内的两大史诗中的人物，如：

你已听说恒河之子毗湿摩，
罗摩和婆利古族后裔罗摩，
他们都做了让父亲高兴的事，
你也应该做让父亲高兴的事。^②

其二是引述或借用史诗中的人物或故事情节。如马鸣《佛所行赞》第十一章《谴责贪欲》中太子回答瓶沙王，讲述贪欲的危害，有些典故便出自两大史诗，比如“即使优揭罗瑜达持有锐利武器，仍然因为贪欲，死于毗湿摩之手”^③。“俱卢、苾湿尼安陀迦和弥佉罗弹宅迦人走向毁灭，把握自我者怎么会喜欢如同屠场刀火的贪欲？”^④其中提到的人物和家族，都出自《摩诃婆罗多》。再如《神通游戏》讲述释迦牟尼从降生到初转法轮的生平传说，其《家族纯洁品第三》讲述菩萨在兜率天宫准备12年后降生人间，他在天宫观察下凡的时间、地域、国家和家族，在天子们的协助下先后考察了南瞻部洲的十六个高贵的刹帝利王族，发现他们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这些王族有许多见于两大史诗，如其中提到象城的般度族：

另一些天子说：“在象城这座大城中，这位出身般度族的国王威武，勇敢，肢体完美，摧毁敌军。这个家族适合菩萨投胎。”而另一些天子说：“那里也不适合。为什么？这个家族世系由于般度族的诞生而混乱，据说坚战是正法之子，怖军是风神之子，阿周那是因陀罗之子，无种和偕

① [印] 马鸣：《佛所行赞》，黄宝生译，见黄宝生译注：《梵汉对勘佛所行赞》，第223—224页。

② [印] 马鸣：《佛所行赞》，黄宝生译，见黄宝生译注：《梵汉对勘佛所行赞》，第238页。

③ [印] 马鸣：《佛所行赞》，黄宝生译，见黄宝生译注：《梵汉对勘佛所行赞》，第285页。

④ [印] 马鸣：《佛所行赞》，黄宝生译，见黄宝生译注：《梵汉对勘佛所行赞》，第290页。

天是双马童之子,因此,这个家族不适合菩萨投胎。”^①

再如马鸣《佛所行赞》中祭司和大臣劝太子回家,太子表示已经出家的人不可能再回家,就像吐出的食物不能再吃进去。祭司和大臣举了一些离家之后又回家的先例加以劝导,其中包括罗摩:

安波舍利王即使住在苦行林,
也在臣民围绕下返回城市;
同样,罗摩也从苦行林返回,
为保护遭受恶人蹂躏的大地。

太子则针锋相对,提出反驳:

你向我举出罗摩等等,
作为返回家中的例证,
但他们不是正法典范,
破坏誓言者不足为训。^②

其三是思想观念方面的互文性,其中又有两种情况:一是正面的讲述。如马鸣《佛所行赞》中讲述太子出家后拜访大仙人阿罗蓝,仙人依据数论哲学为其讲述世界的构成和演变。数论哲学有以奥义书为代表的原始数论,以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为代表的史诗数论和以自在黑《数论颂》为代表的古典数论。原始数论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自在黑生活在马鸣之后,所以马鸣作品中比较系统的数论哲学的表述只能是来自《摩诃婆罗多》的史诗数论。二是作为批判否定的对象。由于佛教与婆罗门教印度教总体上处于对立地位,因此,在佛传作品中,代表婆罗门教印度教观念的两大史诗也经常作为对立面出现。如《佛所行赞》中讲述摩揭陀国的瓶沙王面见出家求道的悉达多太子,以婆罗门教的人生三要劝说太子放弃出家,“你必须合理遵循法、利和欲!如果出于贪欲,颠覆这三者,就会在今生和来世遭到毁灭。如果想要实现完整的人生目的,那就应该摒弃那种排挤利益和正法的爱欲,轻视正法和爱欲的利益,断绝爱欲和利益的正法”^③。这样的人生三要及其关系是两大史诗特别是《摩诃婆罗多》所着力宣扬的价值观^④。太子则以离欲思想和无常论彻底否定婆罗门教的人生价值观,指出:“国王啊,你对我说,完整实施法、利和欲,这是人生最高目的,然而我的看法是它们毫无意义,因为这三者无常,不能令人满意。”^⑤

二、史诗型佛传

史诗是西方文学文类学的一个概念,东方史诗是相对于西方史诗而言的,是运用西方文学文类概念研究东方文学的成果,或者说是在东方文学中发现了与西方文学的史诗相类似的作品,于是也

① 黄宝生译注:《梵汉对勘神通游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42页。

② [印]马鸣:《佛所行赞》,黄宝生译,见黄宝生译注:《梵汉对勘佛所行赞》,第255、259页。

③ [印]马鸣:《佛所行赞》,黄宝生译,见黄宝生译注:《梵汉对勘佛所行赞》,第272页。

④ 参见侯传文:《从〈摩诃婆罗多〉看印度以“正法”为核心的价值观——兼与中国天道观比较》,《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⑤ [印]马鸣:《佛所行赞》,黄宝生译,见黄宝生译注:《梵汉对勘佛所行赞》,第300页。

将其称为“史诗”,印度两大史诗是如此,史诗型佛传也是如此。但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人创作的长篇叙事诗能否纳入史诗范畴,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虽然存在争议,但此类作品在文学史上大多还是以史诗相称,如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中古波斯诗人菲尔多希的《列王纪》等。基于此,马鸣《佛所行赞》为代表的一类诗体佛陀传记也可以看作史诗。史诗型佛陀传记有一个发展过程,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南传上座部巴利文佛典《小部》之《经集》中关于佛陀生平事迹的叙事诗,如《出家经》《精进经》《那罗伽经》等。其中《出家经》讲述佛陀出家后与瓶沙王首次会见的故事。作品虽然简短,只有20颂,但有情节,有人物,有对话,有正面描写,有侧面描写,塑造出了一个坚定的出家求道者形象。此类作品虽然还不是完整的佛陀传记,而且篇幅过于简短,没有展开叙事,也不能塑造一个完整的佛陀形象,但却具有重要的文体学意义。这些作品采用了叙事诗的文学形式,选取佛陀生平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素材如出生、出家、降魔等,可以发挥想象力,构造情节,由一般佛典的重教理转向重生活,重人格,重在写人,而非传统佛典的言行录,为佛传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郭良鋆先生指出:“在巴利文三藏中没有一部完整的佛陀传记,只有这些片段的描写。它们成为后来佛典中史诗型佛陀传记的滥觞。”^①

史诗型佛陀传记的代表作是著名佛教诗人马鸣的《佛所行赞》,大约产生于公元2世纪。作品共5卷28品,有9000多行诗,可以分为5部分。依据北凉昙无讫的汉译,《佛所行赞》开篇《生品第一》和《处宫品第二》为第一部分,主要写释迦牟尼出生之祥瑞和少年生活之优越;第二部分从《厌患品第三》到《答瓶沙王品第十一》,主要写太子出家过程,表现出家与反出家的矛盾;第三部分从《阿罗兰郁陀仙品第十二》到《阿惟三菩提品第十四》,写释迦牟尼修道过程,表现修道之艰难和成道之喜悦;第四部分从《转法轮品第十五》到《菴摩罗女见佛品第二十二》,主要写佛陀收徒传法之盛况;第五部分从《神力住寿品第二十三》到《分舍利品第二十八》,主要写佛陀的涅槃,真实再现了佛陀临终对弟子的谆谆教诲和佛弟子对导师的依依不舍之情。这部史诗型佛陀传记以历史叙事为基础,系统讲述了释迦牟尼佛的一生事迹,塑造了完整的作为人间导师的释迦牟尼佛形象,成为佛传文学中的典范之作,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这样评述《佛所行赞》:“意述如来始自王宫,终乎双树,一代佛法,并辑为诗。五天南海,无不讽诵。意明字少,而摄义能多,复令诵者心悅忘倦,又复纂持圣教,能生福利。”^②

刘宋宝云译《佛本行经》,大藏经收录该经在各卷经题后标注“一名《佛本行赞传》”,标题、基本内容和文体形式都与马鸣《佛所行赞》一致,二者曾经被认为是同本异译,有学者对两部作品进行比较,发现二者实际上是两部独立的作品,其题目在流传过程中也有所混淆^③。尽管在文献学和版本学方面还存在某些问题,但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取材佛陀生平事迹创作的长篇叙事诗,即从题材内容的角度说,它系统讲述了释迦牟尼佛的一生事迹,属于典型的佛传文学作品;从文体形式的角度说,它属于典型的史诗型佛传。《佛本行经》与《佛所行赞》虽然内容基本一致,但亦有许多差异。其一,二者章节设置有很大的差异,《佛本行经》前三品和《现大神变品第二十》《忆先品第二十二》《叹定光

① 郭良鋆:《〈经集〉浅析》,见《经集》,郭良鋆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07页。

② 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84页。

③ 本文依据藏经题名,遵循约定俗成,不做更多考证。

佛品第二十四》《调达入地狱品第二十七》《现乳哺力品第二十八》等不见于《佛所行赞》，而昙无讖译《佛所行赞》的《合宫忧悲品》《推求太子品》和《父子相见品》不见于《佛本行经》。其二，叙述方式也明显不同，《佛所行赞》是标准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开篇直接这样切入释迦牟尼出生的家族：“甘蔗之苗裔，释迦无胜王，净财德纯备，故名曰净饭，群生乐瞻仰，犹如初生月。”^①简单交待家族情况之后，讲述菩萨降胎和诞生；而《佛本行经》则是通过忆念的方式讲述佛陀事迹，开篇《因缘品第一》说明作品的创作因缘：佛灭 200 年后，阿育王建八万四千佛塔，天龙鬼神都非常欢喜，唯有金刚力士因思念佛而现忧愁。后生诸天没有见过佛，便向金刚神询问，金刚神于是展开佛陀事迹的叙述。其三，两部作品的情节、细节和对佛陀事迹叙述的详略也有较大差异，人物形象塑造和艺术表现也有明显的差距，说明《佛本行经》与《佛所行赞》是两个作者依据同样的题材分别进行的创作。虽然《佛本行经》的艺术成就不及《佛所行赞》，但仍不失为一部优秀的史诗型佛传。由于《佛本行经》作者佚名，梵本失传，难以确定年代。其汉译时间一北凉一刘宋，都是公元 5 世纪初，相差不大。但从内容细节看，《佛本行经》多于《佛所行赞》；从佛陀形象塑造看，《佛本行经》对佛陀有更多的神化，表现出一定的大乘佛教精神，作品中也有“愿志大乘意，写情心专固”的表述^②，由此可以初步断定，《佛本行经》问世时间晚于公元 2 世纪的《佛所行赞》，应该在公元 3 世纪前后。

类似的史诗型佛传还有觉音的《顶珠》。全书十章，第一章描写净饭王拜神求子；第二章写众天神让兜率天的国王降生人间，征服爱神，救护三界；第三章写他出生在迦毗罗维城净饭王家中，长成英俊的青年悉达多；第四章写王子悉达多与戈利耶国王的女儿结婚；第五章写净饭王为太子建造适合三种季节居住的宫殿，悉达多学习武艺，尤其精通弓箭术；第六章描写春天来临，爱神开始施展威力，于是众天神认为现在是王子觉悟的时机，在王子前往花园时，众天神向他显示老人、病人、死人和出家人；第七章描写王子再次前往花园，看见林中的妇女以及她们在水池中嬉水；第八章描写日落和月亮升起；第九章描写晚上宫中妇女唱歌跳舞，王子对此毫无兴趣，而心中充满焦虑，于是，他在众天神的护送下离城出家，爱神听到众天神赞扬这位王子，焦虑不安；第十章描写爱神向王子发动进攻，发射花箭，但毫无作用，于是爱神便派遣妇女上阵，但无论这些妇女如何施展魅力，都不能破坏王子沉思入定，羞愧地败下阵去，最终，王子觉悟成佛。这部作品的情节内容和结构与传统佛传差异较大，也不像其他佛陀传记那样有过多的说教文字，艺术表现比较符合古典梵语叙事诗的规范，但文字比较简朴，不像一般古典梵语叙事诗讲究文字技巧，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和文体学意义。作品产生年代争议很大，早至公元 3 世纪，晚至 10 世纪^③。值得注意的是，作品开头两章写净饭王拜神求子，明显模仿《罗摩衍那》“童年篇”十车王求子。作品中菩萨征服爱神，爱神对王子射花箭不起作用的情节，与《佛所行赞》和《佛本行经》基本一致。据其内容和文字表现，作品问世时间应在公元 5 世纪前后。

三、文体特性

史诗型佛传和史诗一样，有一个从口头文学到书面文学、从民间文学到文人创作的发展历程，体

① [印] 马鸣：《佛所行赞》，昙无讖译，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4 册，东京：日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79 年，第 1 页。

② 《佛本行经》，释宝云译，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4 册，第 115 页。

③ 参见黄宝生：《印度古代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年，第 235—236 页。

现了史诗文类的诗学特性。

首先,史诗一般是在民间长期口头流传的基础上由文人加工编订,作为一种文学文体,上承口头文学时代的神话传说,下启文学自觉时代的各种文学文体,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和文化史意义。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的形成过程非常有代表性。一般认为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的形成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名为“胜利之歌”,只有8800颂;第二阶段称为“婆罗多”,有24000颂;第三阶段才成为具有100000颂的《摩诃婆罗多》。其作者主要有三部分人,一是“苏多”,即歌手。他们一般是刹帝利之男与婆罗门之女结合所生,地位比二者都低。他们的职业就是给国王或刹帝利贵族当歌手,有时担任史官或秘书。这一阶层的人既熟悉国王贵族内部的政治斗争,又与下层人民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条件成为史诗的创作者和民间传说故事的搜集、编纂和加工者。许多历史传说由他们编成诗歌进行传唱。二是修道士仙人。两大史诗具有明显宗教性倾向,而且还被确定为宗教经典,这就是修道士仙人参与创作的结果。三是人民群众。史诗中穿插了大量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的作者应该是人民群众。即使以文人创作为主的史诗,如瓦尔米基的《罗摩衍那》,也是在民间长期流传的基础上,由瓦尔米基做了加工、整理和统一、协调的工作,另外瓦尔米基的《罗摩衍那》创作完成后,也有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被加工的现象。因此,从产生的角度看,口头性、长期性、民间性以及全民创作与文人创作相结合,是史诗文体的一个重要特点。史诗型佛传也体现了同样的发展历程和文体特性。佛陀生平事迹最初都是口头创作并口头流传的。传说佛灭第二年,上座弟子大迦叶召集并主持了第一次佛典结集。这次佛典结集有五百上座高僧参与,具体办法是先由一人将他所听到的释迦牟尼的教说叙述出来,主要由号称“多闻第一”的阿难诵出“经”,由号称“持律第一”的优波离诵出“律”,然后由参加集会的其他佛弟子共同审定认可。《摩诃僧祇律》卷32有关于结集情景的记述:主持人迦叶问众比丘“先集何藏?”众人说“先集法藏”。迦叶问“谁应集者?”比丘言“长老阿难”。阿难谦让,众人坚持,说“世尊记汝多闻第一,汝应结集”。于是阿难对众人说:

诸长老!若使我集者,如法者随喜,不如法者应遮。若不相应应遮,勿见尊重而不遮。是义非义愿见告示。

众皆言:“长老阿难!汝但集法藏,如法者随喜,非法者临时当知。”^①

然后将诵出并得到认可的经律进行編集,最终的结果是集经为“四阿含”,集律为“二部毗尼”“犍度”等^②。由此结集出的经藏和律藏中都有许多记述佛陀生平事迹的作品。这样的佛教经律的“诵出”,可以看作佛传文学的口头创作阶段。其后数百年佛典虽然经过数次结集,但很少有文字书写。即使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时期,佛典第三次结集后有了文字抄录,但没有编入正藏的佛传文学,无论是诗体还是散文体或韵散结合体,都仍然处于民间口头流传形态。佛教诗人马鸣,受到印度教史诗《罗摩衍那》的启发,将零散的广泛流传的佛陀生平事迹进行整理,以叙事诗的形式进行加工创作,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使史诗型佛传由口头文学走向书面文学,由民间文学走向文人创作,成为民间创作与文人创作相结合的典型代表。

^①《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2册,东京:日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79年,第491页。

^②参见释印顺:《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4页。

其次,史诗是神话与历史结合的产物,具有特定时代的文化印记。史诗大多产生在人类的童年时期,这一时期,人们既有了理性的萌芽和历史的记忆,又富有幻想,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他们刚从幼年的神话时代走来,习惯于用幻想和想象解释世界的神话思维,于是在有限的历史记忆基础上,他们通过想象,创作出史诗这种神话与历史相结合的文学类型。印度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都有一定的历史基础,前者被视为印度雅利安人由北向南扩张的历史反映,是民族融合的历史写照,后者更是被视为“历史传说”。由此可见,史诗中有一定的历史成分,但仍然伴随着大量的神话传说,这是史诗文类的普遍特点。史诗型佛陀传记也具有神话与历史结合的特点。佛传的基础是历史,其传主是历史人物,内容是这个人物的经历,其资料来源主要是早期佛典。早期佛典主要关注佛的教导,对于佛陀生平并不重视,因而也不在其生平事迹上做文章,不去虚构臆造,其中的佛陀生平资料反而非常可靠,历史性比较强。然而早期佛典中除了实录写真的历史性内容之外,还有许多关于佛陀生平的传奇性和神奇性故事。这些神奇事迹在佛经分类中称为“未曾有法”,包括生兜率天,由兜率天下降入母胎,天地震动;从母亲右肋出母胎,出生不久即行七步观察诸方;坐阎浮树下得初禅成就,阎浮树影为荫世尊而不移,世尊修行期间,魔王曾经跟随,伺机破坏,但始终没有找到机会,如此等等神异现象。这些神异的“未曾有法”也都进入了《佛所行赞》《佛本行经》等佛传文学作品。早期佛典中还有佛陀及其弟子通过禅定获得各种神通的记述,以及佛陀生平的重要阶段都有天神出现并发挥作用。这些具有神话性质的故事情节,都是人类童年时期神话思维的产物,在佛传作品中也得以延续。此外,佛陀传记作为文学创作,不追求客观真实,而是融入了比较多的神话思维和魔幻叙事。比如《佛本行经》开篇《因缘品》从阿育王建八万四千佛塔说起,天龙鬼神都非常欢喜,唯有金刚力士因思念佛而现忧愁,后生诸天没有见过佛,便向金刚神询问。金刚神表示“愿承佛威神,令意不谬误;能少少颂宣,叹佛之德善”^①。这里的询问者和故事讲述者都是天神,奠定了作品总体叙述方式的魔幻叙事基础。

再次,史诗一般都是英雄史诗,主人公一般都是英勇善战的英雄,作品中都闪耀着刀光剑影,都响彻着战斗的呐喊。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伊利昂纪》和《奥德修纪》是英雄史诗的代表,塑造了阿喀琉斯、奥德修斯等英雄人物。印度的《摩诃婆罗多》像希腊的《伊利昂纪》一样,写的是一次毁灭性的大战,宏伟壮观气势磅礴,战车隆隆刀光剑影,始终响彻着战斗的呐喊。围绕这场战争,史诗描写了一批英勇善战的英雄,其中的阿周那、怖军、德罗那、迦尔那、马勇等都是勇敢的战士。《罗摩衍那》的核心故事是一场争夺美女的大战,与《伊利昂纪》类似。敌对双方都表现出英勇精神,主人公罗摩、神猴哈奴曼、罗刹王罗波那及其儿子因陀罗耆都膂力过人,非常英勇善战。从原始野蛮时代进入文明社会的各民族,早期都有一定的尚武精神,这是英雄史诗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佛陀传记的主人公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英雄,而是一位求道者,一生并未领导或参与战争。在这方面,史诗型佛传为了遵循史诗文类规范,一方面安排了比武招亲的情节,显示太子精通各种武艺;另一方面安排了佛魔斗争的情节,其中也有一些激烈战斗的场面,如《佛本行经》之《降魔品》讲述菩萨坐上金刚座,三千世界震动,惊动魔王。魔王问明缘由,惧怕菩萨悟道成佛对魔界构成威胁,于是开始设法破坏释迦牟尼的

^① 《佛本行经》,释宝云译,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册,第55页。

修行。他先派三个女儿前去扰乱菩萨。三个魔女在菩萨面前施展媚态,惑乱其心志。菩萨则“审谛视魔女,形体衰老悴,如花被重霜”^①。魔王见状大怒,亲率大军出战。魔王以言辞威胁不能动摇菩萨意志,即便弯弓射箭,菩萨仍然端坐不动,坚固如山。魔王于是驱动大军,向菩萨发起进攻,菩萨则针锋相对,予以还击。最终菩萨通过比拼功德战胜魔王。作品力图通过菩萨与魔军的斗争,表现其英雄气概,从而能够体现史诗的诗学特性。实际上,佛传的主人公不是一般意义的英雄,但可以看作另一种意义的英雄,他在群雄并起的沙门时代,用智慧力挫群雄,建立起后来居上的佛教僧团,进而发扬光大,征服世界,所以佛陀的一个称号就是“大雄”,即伟大的英雄。以这样的伟大英雄为主人公的长篇叙事诗,称为史诗当无不可。

最后,史诗型佛传不仅具有史诗从口头文学到书面文学、从民间文学到文人创作的发展历程,而且在艺术风格方面具有从素朴到铺张的诗学特性。史诗的原始形态都是朴素的,西亚和北欧发现的早期史诗都具有这样的特点,不仅情节简单,而且叙事朴素。后来出现的经过文人加工的史诗大多情节复杂,叙事铺张。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虽然卷帙浩繁,号称十万颂,但如果除掉各种各样的插话,其主干部分叙事还比较简单,不太讲究藻饰,没有太繁复的描写和渲染;《罗摩衍那》则比较讲究藻饰,铺排场面,渲染情感,因此在印度文学史上被称为“最初的诗”。史诗型佛传的发展过程更能体现史诗叙事由素朴到铺张的特点。早期诗体佛传都非常简单朴素,如《出家经》讲述佛陀出家后与瓶沙王首次会见的故事,只有短短20颂,就塑造出了一个坚定的出家求道者形象。《精进经》主要讲述佛陀成道之前降伏魔王的故事,只有25偈,情节也比较简单,魔王摩罗劝世尊放弃精进努力的修行,世尊以坚定的信念挫败了摩罗的企图。《那罗伽经》由两部分组成,序诗部分讲述释迦太子诞生,阿私陀仙人预言太子将来会成佛,正文部分是阿私陀仙人的外甥那罗迦和佛陀的对话,讲述出家人应有的品行。这些作品篇幅短小,叙述简略,没有铺排渲染。《佛所行赞》已经有铺张渲染的倾向,如作品写太子出游,人们都争相观瞻,特别是年轻妇女们,为了观看太子,争先恐后,拥上楼顶和窗前。作品将这些妇女的姿态神情都作了细致的描写。其后写太子离城出家,对父王的悲伤痛苦之情作了充分的渲染。后出的《佛本行经》文风更加铺张,比如《佛本行经》之《降魔品》关于菩萨与魔王对战,有这样一段描写:

于是魔王益恚盛,即放战具爱欲火,地虚空然不可知。

菩萨即放甘露观,化云雨润灭欲火。爱即畏惧菩萨德,安祥天至邪鬼退。

魔王即放恚毒发,如召祸害化成虺。地上普满毒蛇虺,缠绕道树悉周遍。

菩萨即放大慈发,化成吉来蛇退灭。魔王复放愚痴发,菩萨计缘逆得胜。

魔王复放嫉嫌箭,名曰恶口化为龙。菩萨复放大悲箭,化为金乌龙逃退。

魔王复放傲慢发,发名梵手化成象。菩萨复放十力发,化成师子象退去。

魔王复放妄言发,名曰调戏化成风。菩萨即放至诚发,挫折魔箭化成山。

魔王复放慳贪发,发名吝恶化成雾。菩萨即放惠施发,化云细雨除土雾。

魔王复放阴盖发,名曰睡眠化成云。菩萨即放五净发,化成暴风坏裂云。

^①《佛本行经》,释宝云译,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册,第76页。

魔王复放邪见发,化成邪冥覆世间。菩萨复放正见发,化成为日除魔冥。
 菩萨被大忍辱铠,戒成充备跣立地,著七觉意之花鬘,进定瓔珞微妙好,
 手执慈弓梵寂箭,从意筒中而拔之,适放一发都得胜,如阿须伦胜古烈。^①

这里都是一些互相对立的观念,被诗人象征性地表现为战斗用的箭矢,魔王和菩萨你来我往,互相对射,战斗场面看起来非常激烈,其铺排繁复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作品的铺排风格由此可见一斑。

以《佛所行赞》为代表的史诗型佛传在印度文学体式特别是诗歌文体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开了印度文学史上文人“大诗”创作之先河。印度诗歌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传统,公元前15世纪前后便出现了《梨俱吠陀》等诗歌总集,其内容以颂神诗为主,其表现形式以抒情诗、祷辞为主,间有叙事诗、对话诗等形式,为印度各类诗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这些早期诗歌,包括其中少量的叙事诗,都没有复杂情节和宏大篇幅。经过公元前8—5世纪印度社会和思想大变革,文学风格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取材神话传说和早期民族历史事件的诗体长篇叙事文学兴起,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后世诗人尊两大史诗为典范,创作出一系列被称为“大诗”的长篇叙事诗。然而从公元前几世纪两大史诗成型到公元5世纪大诗人迦梨陀婆的“大诗”创作之间,有一个长期的空档,填补这一空档的便是《佛所行赞》《佛本行经》等史诗型佛传。“大诗”注重叙述和描写的铺排渲染,在人物、情节、情味、叙述、诗律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规范要求,如印度古代文论家毗首那特在《文镜》中指出:“大诗分章。有一个主角,天神或刹帝利,出身高贵,性格坚定而高尚。也可以有出身同一家族的许多高贵的国王。主味应该是艳情味、英勇味和平静味,其他的味作为辅助。有所有的戏剧情节关节。情节取自传说或其他,人物高尚。追求的成果是人生四要或其中之一。”^②《佛所行赞》《佛本行经》等史诗型佛传具备所有大诗要素,符合大诗规范。比如大诗要求主人公出身高贵,佛陀正是这样的一位主人公。大诗必须有情味,应该以艳情、英勇或寂静为主味,还要有其他的味作为辅助。史诗型佛传大多以寂静味为主,太子出家寻求解脱是追求寂静,苦行林和园林精舍环境寂静,佛所悟道说法及最终涅槃体现的都是寂灭之道。《佛所行赞》等作品中也有其他辅助的情味,如艳情味在一般作品中表现为爱情婚姻,在《佛所行赞》中主要表现为太子出家前与耶输陀罗的夫妻生活和众彩女对太子的诱惑;英勇味一般表现为战斗情节,大部分佛传作品都有菩萨降魔情节,表现了菩萨与魔王魔军斗争的英勇。佛传情节展现释迦牟尼一生的曲折经历,也基本符合大诗情节复杂多变的要求。佛陀追求的成果是解脱,属于人生四要“法、利、欲、解脱”之一。作为史诗型佛传,《佛所行赞》上承史诗《罗摩衍那》,下启古典时代的大诗,在印度文学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由于这部作品,诗人马鸣不仅是佛教文学的开拓者,也成为印度古典文学的奠基人。英国学者渥德尔认为“他是印度六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而且对于了解他的人们来说,也是世界最早十大诗人之一”^③。

大诗即文人创作的长篇叙事诗,虽然以史诗为典范,并且大多取材于史诗,但已经不具有史诗的属性。取材于佛陀事迹的长篇叙事诗也是如此。比如约9世纪希沃斯瓦明的《罽宾宁王成功记》是

①《佛本行经》,释宝云译,《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册,第77页。

②《梵语诗学论著汇编》(增订本),黄宝生编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451页。

③[英]渥德尔:《印度佛教史》,王世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12页。

一部取材于佛陀事迹的长篇叙事诗,讲述佛陀度化罽宾宁王的故事。罽宾宁王接到探报,拘萨罗国波斯匿王企图征服世界,成为转轮王。大臣群情激愤,要求讨伐波斯匿王。有一位大臣建议先派遣使者与波斯匿王交涉,于是罽宾宁王派遣达舍迦作为使者前往舍卫城。达舍迦来到舍卫城,要求波斯匿王归顺罽宾宁王,遭到拒绝。于是罽宾宁王率军向波斯匿王发起进攻,双方激烈交战。波斯匿王败退,向佛陀求助。佛陀前往战场,施展神通,用火焰遏制罽宾宁王的军队。罽宾宁王由此敬仰佛陀,希望成为比丘。佛陀建议他不要出家,而是成为皈依佛法僧三宝的居士,继续统治国家。于是,罽宾宁王返回自己的都城,遵行佛法。汉译佛典《撰集百缘经》中有《罽宾宁王缘》,讲述佛陀以神通调伏罽宾宁王的故事。佛经故事中没有发生战争,诗人希沃斯瓦明按照大诗模式,增添了战争情节和风光、游戏、欢爱等场景^①。此类作品虽然取材于佛陀生平事迹,类似史诗型佛传,但已经不是标准的史诗型佛传,而属于一般的佛教叙事诗,或者可以归入大诗之列,与印度教传统的大诗一样,虽然取材于两大史诗,主人公大多是史诗中的人物,但已不属于史诗文类范畴了。

责任编辑:冯济平

Buddha Biographies and Epics

Hou Chuanwe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Buddha biographies and epics are two different literary genres in the 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 belonging to different literary categories, but they have a very close relationship. In the formative period of Buddha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the two Indian epics had been widely circulated and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Buddha biographies which were then in the process of formation, resulting in a fairly obvious intertextuality. Buddha biographies such as *Buddhacarita* produced in the 2nd and 3rd centuries are the product of combining Buddha biographies with epics. They are Buddha biographies in content and epics in style, with unique stylistic significance. The epic-style Buddha biographies not only reflect the development and poetic characteristics of epics from oral literature to written literature, from folk literature to literati creation, but also the artistic style from simplicity to extravagance, which brought about first "Mahākāvya" creation by the literati in the 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

Key words: Buddhism biography; epic; epic-style Buddha biography; Mahākāvya

^① 参见黄宝生:《印度古代文学》,第234页。

隋唐华严宗般若理想美学探论

赵建军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无锡 214122

摘要:中国化佛教宗派华严宗,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独特而深远的,体现到美学方面,主要以体系化的理论,建立了一种理想的美学形态。就华严宗的实际存在而言,它列于隋唐中国化佛教各宗理论之中,属于思想体系最为精密庞大之一种,美学蕴涵异常丰富,其理论特色主要聚焦于般若化理想美学,提出“法界缘起”“六相圆融”“十玄门”“五教义”等美学命题,这些对推进中古美学的理论水平和思想意蕴,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

关键词:华严宗;般若;理想美学;中国化佛教

中图分类号: B946.4; B83-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3)01-0061-18

隋至初、盛唐,佛教在中国经六朝判教的知识化操作,转向汲取佛教思想精华,建设中国式的佛教宗派。三论宗、天台宗、唯识宗相继崛起,华严宗稍后,但发展势头雄浑。本来,建宗立法,是中国人的师门传承套路,往往囿于家门宗脉、法规而有传播范围的限制,但佛教各宗突破了一般师门传承的局限,各个佛教宗派均依“宗”弘“教”,据理践行,奉行普度众生的般若波罗蜜菩萨道,得以借助隋唐一统的政治、经济发展之势,逐渐成为可与传统儒道思想比肩抗衡的思想理论系统。在佛教各宗中,华严宗由于兴盛期在三论、天台、唯识之后,又先于禅宗南宗的心性实践,从而能够广涉博取,精心营构,发展出十分恢弘精密的理论体系。在华严宗的佛教理论体系中,美学思想是一个“内渗”的系统,言其内渗而不是“内嵌”,是因为大乘佛教理论的源与流,均依托于般若思想而得成立,而般若思想又是佛教理论中最富有美学特质、依于般若“幻”义和化于名相和识境诸缘的感性化存在的。因此,华严宗的理论系统就必然彰显出般若美学的思想气质和理论特色,并以其般若美学的理论特色内容构成“体系中的体系”,其思想流泻的精蕴,如玉之质,金之色,令中国人广受泽润,精神智慧获得突变性升华。那么,华严宗的般若美学有何特色,其理论内涵和思想特征是什么,形成哪些对中国美学颇具理论建设价值的命题?就很值得给予系统的理论发掘和探讨。

一、华严宗主体论美学理想

华严宗早在隋代就已经提出基本观念,但在三论宗、天台宗和唯识宗活跃的时期,华严宗并没有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古后期佛教般若范畴与美学流变研究”(13BZW01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赵建军,男,内蒙古巴彦淖尔人,文学博士,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美学史、佛教美学和文化研究。

找到拓展自身理论根蕴的契机。“法界”概念由法顺提出时,关于空的认识还停留在因缘和合无自性体,唯以空性为本含摄真俗二谛的境界。般若识性以空性为体,具有摄受无与有,将之纳入玄学化空性本体之趣,当此际诸法因缘都在“悟”中存活,并无法界对象可论,此可谓华严宗初现端倪,尚不具备生长的土壤和气候。天台宗与空性的般若对接,开启了中国美学的“性空”(直觉智慧)个性化存在方式。由于佛经传输的方便,三论宗和天台宗共同的资源源源译入,从而三论宗得以从外围为天台宗廓清迷雾,使三乘归于一乘,妙法生于二谛弥合之间;天台宗则做足内家功夫,不仅让性空成为本体,而且作为生命智慧,为中国其他宗系佛教提供了生力源泉,这中间自然包括华严宗。但华严宗在隋代,包括在唐初,依然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一个根本的限制是法界作为佛法对象化概念,其立法的深意很难通过现象学的玄想观照和对象化的心性自证得到表达——法界既不是一个“断法”的静态概念,也不是一个“常法”的先在概念,它是代表大乘佛教“行自在”的生命概念。这与天台宗的“直觉”思维方式及其依然带有浓重的“悟”式痕迹,在生命理想无由寄托,找不到合适表达自身的概念时,就还不能很好融合,因此华严宗在隋、唐初并没有找到让生命主体依托于法界、自在而行促成思想系统的动机和途径。但文化和理论的场域拓展使不同群体、阶层的身心意识发生裂变,借助唐代对儒道释并不明显的厚此薄彼政策和六朝以来重拾信仰的世道人心,人们对理想的期待渐为炽热,不仅寄托在生活和社会实践中,而且渴望以理论方式投射出去。这就给华严宗美学理想的产生提供了契机。当时的时代背景和趋势,对精神昂扬、向外拓举形成有利的氛围,探险精神和美好情怀并行不悖,从而不独华严宗,也有别的佛教宗派创举理想,如净土宗便以佛国净土,以阿弥陀佛自证“法界”“不死”表达修道理想。对净土宗,有学者认为:阿弥陀佛的语义所表达的就是“不死”“甘露”的思想,“就‘不死、甘露’的语原看,巴利语的 Amata amadam 梵语是 Amrita。消除 Amrita 的动词 r,剩下动词 i,便变成了另外 Amita 的语句,这是一个俗语的语句。这样的转讹,原是合理的变化。况巴利语的 Amita 又极似;由此两者的混同,而俗化成 Amata 一语,这当是首肯的。因此,‘不死’、‘甘露’的意义,乃是意味着佛陀自内证的无量寿,所谓‘体现了不死、甘露为之佛陀’,这原是表征自内证底内容的,于是,便以 Amrita-buddha=Amita-buddha(阿弥陀佛)的名义,而附予尊称之”^①。“不死”之西方净土世界,用“南无阿弥陀经”声念修持自证,把神圣的信仰关系——由此岸到彼岸——拉到几乎零距离状态,这样极简而纯粹的理想化设置,阿弥陀佛的象征式寄托,与声念修持便捷的自证自悟,都在理念和操演方式上,把生命理想还原到类似巫术祭祀的发愿、许诺和祈拜模式上,它对佛教的改造甚至比天台宗的直觉还要直观和简化,其中净土信仰的内证虽然很庄重,也很严格,充满慈悲、庄严、华美、寂静、喜乐色彩,但所采用的异化“神性”对象化投射基本上取消了主体的主动努力,以便“按照一个无穷无尽的不重复的范式,在魔幻—宗教性‘力量’的范围之内再次找到了誓言的力量与效力”^②。这是净土宗生命理想的感召力量和实现方式,它显然存在严重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主体思想建构性的不足,因为它的理想表达适合数量广大的俗界众生,却很难表达佛教的深度理想,尤其很难把中国知识阶层的生命情怀和复杂意识寄寓在里面,华严宗则在思想理论建构意义上,满足了这

① 澹思:《阿弥陀佛的起源》,见张曼涛主编:《净土思想论集》,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年,第122页。

② [意]吉奥乔·阿甘本:《语言的圣礼誓言考古学》,蓝江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8页。

方面的时代需要。

汲取异域思想资源完成美学思想的系统化改造,并非简单的由主体主动精神、主动意志的选择就能完成的。华严宗发展初期未能实现理论建构的对象化主体选择,上面所述世俗层面的需求过于强烈,导致士人的追求暂时不能抢占主导位置是一层原因,还有一层是士的历史文化积淀,也让他们不愿简单地采取对象化的或以客体对象为精神载体的思想表达方式,这在传统美学轨迹里并没有深厚的记忆。因此,或许净土宗被俗界众生所择,并非是净土宗本身的缘故,主要还是文化氛围、趋势尚不具备充分条件,主体意愿尚未能充分自觉的缘故。而事实也表明,净土宗虽然在中国未能被广大的士人知识分子所采信,可它还是以自己的对象化法界理想建构方式在中国建立,并在五百多年以后被日本僧人法然从唐代僧人善导那里学得真法,从《观经疏》受到启发,带回日本建立起净土宗。并且,法然依据《观经疏》“二河黑白道”^①,将“西方乐土”譬喻衍生为图解方式,形成日本式的净土宗理论范式与美学实践体系。法然对净土宗的开悟和图解性转换,证明了净土宗也并非只能为俗界大众所用,它也一样可以形成深度的理论系统。不过,这种图像性的、显明客体化的净土宗思想系统,终究为中国人所不取。因此,从初盛唐至中唐,中国的净土宗执守的一直是比较原始的信仰方式,般若美学理想在这种智慧方式中只能以“神圣誓言”的方式释放,无从积极主动地建构起净土理想的美学理论体系和话语。

唐中叶时期,华严宗具备了建构主体论美学理想的各种条件,般若意识将潜在的主体性调动为积极的在场的主体性,得以从华严法相着手建立系统的华严宗美学体系。华严宗美学主体意识所体现的般若圆满性,主要包括:其一,般若识性足以强大到能够控御主体对象化的“施設”形态。般若识性拥有般若本体,即佛性、法性、心性等构成美学价值的根底;般若识性同时是能在它更多情况下不是从本心出发,而是借助已有的思想因缘(增上缘)发挥效能时,般若识性或能接近般若本体,却不能将般若本体转化为能发射出去。华严宗法藏则具备了强大的般若识性,能有效地将基于心性本体的法性转化为法相(可显性地存在的能),从主体位置向对象化的客体位置投射。其二,般若幻相具备了因体合缘的法性特质。“幻相”是因缘,是空、假、中,这是三论宗认识到的;幻相是心相的衍变,犹如莲花绽放,唯有旋转陀罗尼的总持才能体现其法性真义,这是天台宗强调的“心性”直觉幻化的生意;幻相为识缘,依他识而起,其种子在阿赖耶识里属于藏识,还是不能摆脱自身为“飘浮的流云”,并不具备法雨的真境真性。而到法藏那里,“幻相”被赋予了“法性”的“相体”涵义,是为真正可以自生其相,自变其状、自足其成的性体和能体。东方美在《华严宗哲学》一书中谈到法藏对华严宗的贡献,用“同体相入”概括“体性”作为“法相”的自摄能体之“一多”现象,而这恰是幻相被赋予了法相的体与能的情况。方东美说:“法藏大师此地所谓的‘同体相入’的这个‘同体’,并不是广泛意义的‘同体’,譬如像‘色体’也是‘体’,也可以由异化为同;又如‘心体’也是‘体’,也可以由异化为同。此地所谓‘体’,是指佛性的‘体’。……就是要把那个从作用上看起来的‘无穷佛性’当做 supreme energy(究极的能力),产生的 infinite function(无限的作用)。那么对其他的一切 material function(身

^① 按:比喻阿弥陀佛的接引和释迦佛的发遣,由水火二河和白道的交织,演示人生在善恶面前的生命抉择,通过西方净土的灿烂景观,宣示了自导净土愿力的修证与实现。

体的作用) mental function (心理的作用),一直到对其他 kinds of function (有情众生的作用),都是从这个 infinite function 的里面产生出来的。然后再就体质这一方面看起来,以这种佛性为无穷的体质,然后就说 material phenomenon (身体的现象)是这个佛性的 partial manifestation (局部表明)。”^①其三,般若的解脱意旨展示为心魂精神的博大气度,根本超越了以往般若信仰意识的大小乘比较与自他度权衡。方立天《华严金狮子章校释》指出,法藏“力图缩短佛境与现世、佛与众生的距离”,其“论述理事无碍,本体与现象圆融,事事无碍,任何一个东西都包括一切东西”,揭示了“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尘世污垢和涅槃境界、此岸和彼岸不是截然脱节,而是互融无碍的,从而使人们对进入涅槃境界有一种渴望似乎又可及的安慰”^②。把两个世界一体化,这是华严宗理论的殊胜方面,但方立天以华严佛境理论为进入涅槃而得到安慰则未免消极,因为从法藏始即转入心体能量的主动喷射,使主体性的在“我”一极的“有”,通过这种华严法界的佛土想象性建构,异常华丽庄严地建立起来,它树立的是主体心性的对象化世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理想化投射。在华严宗建构的佛土世界中,自在蕴藏着主体心性的精神与气度,客体对象化世界是主体性的彰显,它是那个时期中国人文主体精神对象化投射所实现的一种自在自由表达。

二、般若理想的“客体化”集合

华严宗的美学理论建构,是般若对涅槃、中观、唯识佛学和中国易、儒、道诸说给予综合处理的产物,具有很强的智慧集合性。本来中国美学发展至魏晋,已经就宇宙论、情志论、感应论等形成美学的系统整合,并以玄学化为其表征,经过又四百年左右的佛教智慧的浸渗,本土的理论综合方式更得到般若识性的浇灌,能自主从事美学理论的思想、体系、结构和观念的精密化设计。这对中国美学无疑是一个质的飞跃性进步,它意味着中国人不仅在社会、文化意识的总体觉醒过程中,更自觉地以哲学、宗教的审美意识催醒过去局囿于伦理审美的状态,而且在把人性纳入般若识性进行智性反思的同时,对自身的存在及未来的命运也能够运用细密精致的策划,通过推进理论范式来确定人生的整体发展质量。在这个过程中,佛法理蕴通过“法界”范畴实现心性蕴涵的客观化转向,人们对理想的期冀尽可能以现实化的人性、世情、俗务诸因缘“合以成德”的果报面目出现,实现客观上人文意涵的主体性提升和现实情感与境遇的对象化释放。这样一种“华丽转身”的美学效应在整个中国古典时期是不可多得的典范和极致,华严宗的理想化、客观化的般若“法界”设计,对中国美学的理论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法界”,梵语 Dharmadhātu,由“法”(dharma)与界(dhātu)合成。法界与般若的因缘,本来在中印美学都是一个短板。中国美学重感受、感应,强调主体视点的流动和对对象轮廓的线性勾描,这种观察认知方式是比较主观的,因而很缺乏一种客观认知对象体的专注和精雕细镂的精神;印度美学重幻想、想象,重视在颠倒的宇宙、自然,亦包括社会与人的关系中人的“色受想行识”的位置和作用,

① 方东美:《华严宗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第495页。

② 法藏著,方立天校释:《华严金狮子章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前言》,第31页。

因而很缺乏一种现实地把握人、自然、宇宙和社会的严谨务实的实践态度,因是缘故,印度美学的智慧、智性、识性、意念等的主体观念构想,对对象性概念每每缺乏“面”“网络”的客观化编织,即使有时涉及经验性的存在也常常基于主体的“智力间歇”而获得“次生的”客观性空间,终究不能在整体系统占据决定性位置和角色。这个美学“短板”通过六朝判教的知识论整合,特别是隋以来佛教各宗的理论系统化建设,逐渐地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一方面,般若与“法性”“涅槃”的因缘越来越紧密,另一方面,中国美学自身也在知识论整合大潮中,有力地将宗法、伦理和审美的因袭传承用客观化的佛法理念或其他玄学观念呈现出来。于是,导致华严宗体系内部的“法界”概念的集合性越来越强,终于将这一范畴演化为华严宗美学的核心范畴。

首先,华严宗确立了自身宗脉谱系的中国化统绪。华严宗宗脉谱系有“十祖”“七祖”“五祖”等不同说法,反映了华严思想对印度宗谱的“回认”存在差异,但在涉及中国方面时则无一例外要提到“杜顺、智俨、法藏、澄观、宗密”等,将他们奉为中国的五祖。而“十祖说”中印度的普贤、文殊、马鸣、龙树、世亲,还有“七祖说”中马鸣、龙树差别甚大,说明在印度法理的追寻上不仅很难统一,也缺少稍微清晰的认识。但思想创始人和宗主的确立对一门宗系的思想理论至关重要,它意味着该宗系的理论格局是由这些重要人物奠定的。然而华严系印度方面的重要思想家,有的还被中国人视为不可信的、不真实的人物。例如“十祖说”中马鸣的出身一直是难解之谜,将这样真伪难辨的人物和二世纪以后的论主龙树、世亲和普贤、文殊菩萨拼在一起,本身就是不严肃的,愈发反衬了中国思想家的权威性与作为“立范者”的客观地位。这样,华严宗脉谱系就从杜顺、智俨、法藏、澄观、宗密等依次排定,构成庄重的中国华严宗思想家、理论家统绪。

其次,华严宗的《华严经》的“法界”概念,具有跨越时空的高度集合性。一方面,中印思想透过这个概念得到充分的聚焦和释放;另一方面,自佛教传入中国,思想家们不断开拓的修道智慧通过它得到了表达。《六十华严》中般若智慧的主体性向客体一极移位,构成《华严经》(《八十华严》)的基础。《六十华严》译出时间在晋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三月十日至元熙二年(公元421年)六月十日,译者为佛驮跋陀罗,助译法业等^①,这是鸠摩罗什翻译的般若经大量推出后最重要的佛经之一,最初没有引起注意,就像在印度曾作为秘籍不外传——思想殊深一时不能广被理解——在中国也少有人能理解,鸠摩罗什注重推广般若经,注重方等般若空性而强调“法性”“智性”,但他理解的“法性”是“大而空”的,偏向于宇宙客体的,这种客体性当然与《华严经》不同,并不能够理解。《六十华严》翻译时,助译法业对华严主体性向客体迁移的倾向有所意识,著有《止归》二卷,惜不传。日本学者木村清孝就此说:“他所亲近承仕的《六十华严》翻译者——佛驮跋陀罗,相当清楚的《华严经》思想的主体化,可被承认之事,也是不可忘记的。据《高僧传》,他承袭无自性空,提倡了‘一微’和‘众微’的

^① 按:其事见于《出三藏记集》(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第九,苏晋仁、萧炼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20页)和《搜玄记》(智俨:《大方广佛华严经搜玄分齐通智方轨》卷第一,《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第13页)。

缘起关系。此思想可说是,包含了与之后华严教学的法界缘起说,在本质上是相连续的内涵。”^① 围绕着“法界”概念,《六十华严》的名相随各品的敷演而扩大,并逐渐形成“客体化”堆积态势。第一品“世间净眼品”首开“入法门而得自在”,以般若智慧眼观一切佛境界,体悟无所依妙法界得诸法实相。这是“法界”概念最初的产生,原义从主体愿行和志力的“无所依而如来身相悉满”立意,导向“法”的客体轨持性存在。继而延递道、行、果位的修道而将他范畴、概念纳入,令其皆聚合于“法界”相位之中。如“行”衍化出菩萨“承佛神力”的慈悲现行,令“众生转胜清净功德法门而得自救”。“法界”提摄诸般若主体范畴,在菩萨自在行中将之客观化,如“清净”“慈悲”“幻”“化”“苦”“乐”“智”“无性”“无垢”“无量”“精气”“生气”“趣”“遍照”“境界”等,它们彼此相互交迭,错综复合,曲折关联,构成逐一相对的意义域进而又更新生成下一级概念。譬如“卢舍那佛”以“海”喻“法”,形容有“佛地”“佛境界”“佛持”“佛行”“佛力”“佛无畏”“佛三昧”“佛自在”“佛六根”“佛智海”“世界海”“众生海”“方便海”“波罗蜜海”“法门海”“化身海”“佛名号海”“佛寿量海”“菩萨所修行海”等广大无边的“法界”概念,它们使“佛海”的无性自在消解静寂意义,时时“震动”和“涌起”:

莲华藏庄严世界海,六种十八相震动。所谓:动、遍动、等遍动;起、遍起、等遍起;觉、遍觉、等遍觉;震、遍震、等遍震;吼、遍吼、等遍吼;涌、遍涌、等遍涌。^②

描述“震动”的细微概念烘托出佛法性海的华丽庄严。“菩萨十住品”还用建构性的美学话语将菩萨主体的行愿化为众性的“发心”,称菩萨“于一切众生发十种心”,包括:大慈心、大悲心、乐心、安住心、欢喜心、度众生心、守护众生心、我所心、师心、如来心,心性入住法界,菩萨化为众生,菩萨心、众生心凝合为法界道心,遂产生修道的巨大力量。《六十华严》的“法界”蕴涵的集合并非预先设计的结果,而是在生成中逐渐获得加持的。“明法品”便在“清净心行,一切如来力无所畏”基点上加持“十行品”“十地品”“十明品”“十忍品”等智慧妙法,以提升法界的道力境界。实际陈述时,每一品的境界都呈明“法界”的特殊方面,不同的界品承载不同的意蕴,实际上是集合吸收了各部派佛经的意蕴。而有的范畴无论是否新出,都依法界从解别赋新意。如“十地品”本来南北朝时就译出来了,但在《华严经》里“十地”,即“欢喜地”“离垢地”“明地”“焰地”“难胜地”“现前地”“远行地”“不

① [日]木村清孝:《中国华严思想史》,李惠英译,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第36页。按:“一微”和“众微”的关系,是《高僧传》“佛驮跋陀罗”传记鸠摩罗什与群师就“玄微”问题所对答,焦点是:众微成色,色无自性故空,以析微破色空,则一微、众微何所置焉? 争议大意:“什问曰:‘法云何空?’答曰:‘众微成色,色无自性,故虽色常空。’又问:‘既以极微破色空,复云何破微?’答曰:‘群师或破析一微,我意谓不尔?’又问:‘微是常耶?’答曰:‘以一微故众微空,以众微故一微空。’时宝云译出此语,不解其意,道俗咸谓贤之所计,微尘是常。余日长安学僧复请更释,贤曰:‘夫法不自生,缘会故生。缘一微故有众微,微无自性,则为空矣。宁可言不破一微,常而不空乎?’此是问答之大意也。”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第335页。从《高僧传》,对一微与众微关系继承者是佛驮跋陀罗(Buddhabhadra),但据木村清孝说,法业才是华严教学的重要人物,也是华严的最早的研究者,那么,法界缘起的理解应从法业开始。法业之后有求那跋陀罗(Gunabhadra)、玄奘、刘谦之等人。

② 佛驮跋陀罗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二,《大正新修大藏经》第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第405页。

动地”“善慧地”“法云地”等呈现的是“华严世界”，“十地”的渐、顿要义要从华严法界得到解释。通过融摄般若、涅槃、中观、唯识的佛法概念和范畴，《六十华严》体现出繁复而精妙的美学设计，集信力、智慧、情感、意志和不可思议于法界妙境，显示了主体性的客体化生成，具有潜能转化为理想，理想可转化为现实的无限可能性。

在《六十华严》中得到表述的思想，在《八十华严》《四十华严》获得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并且在“法界”理想面向世俗的实践涵义方面更加集中和明确起来。《六十华严》共“七处八会”，《八十华严》为“七处九会”，最后“入法界品”，由释迦牟尼示现顿法，让普贤、文殊菩萨和百城善知识“为善财童子说明渐证法界”。其中“有关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中摩耶夫人至弥勒菩萨十一位善知识（四十一至五十一）的相关文字”是梵本中原没有的。《四十华严》更是完全补充了新的内容，故《四十华严》又名《普贤行愿品》，最初作为南天竺乌荼国国王王子王遣使向唐王朝的献书，题名《大方广佛华严经、百千偈中所说、善财童子亲近承事佛刹极微尘数善知识行中、五十五圣者善知识、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此经译出后与《六十华严》《八十华严》相合形成完整系列。这样《八十华严》《四十华严》在善财童子参访普贤与众多善知识，以及普贤行愿的内容方面，就充分体现了以普贤统摄华严、以“法界”摄受诸蕴涵的总旨，况且两经均在唐代译出，因而深受华严宗后继者重视。法藏对华严经及其主体性移位客观化的般若“幻归”特质，也通过《华严经》从六十到八十、四十的集中融摄有了更自觉的认识，促使华严宗在法藏的推动下再度得到更大的改观。

法藏的贡献在于把般若的主体性理想和美学价值观念，以客体化的理论网络建立起来。中国美学在隋唐以前缺少严密的客体化理论系统。《周易》是以“卦象”为织点的展开，主观性和推导性成分居主；诸子理性以主体感悟类比事理，客体性不能形成完整系统；汉代经学有主体意志的客观化倾向，惜对象化的客体形态为宇宙论式的思维和结构；玄学的本体“集义”使理论高度辐辏，观念价值的逻辑函值不取决于客体事理和世运，而且理论构成的网络化程度也不够高……。所以，就美学的理论化、系统化程度衡量，还是要轮到佛学形态的美学了。在这方面华严宗之前的各宗尽管各成其理论系统，但三论宗、天台宗具有鲜明的玄学主观化特征，唯识宗聚焦主体性的分析，一方面在客体化方面不突出、不典型或者不具备，另一方面就系统性程度而言，三论宗着重于与其他佛乘的比较，依空性展开的逻辑还不够充实；天台宗的直觉系统比较大，形成了独特的思想场域，但“十如是”“十法界”呈明的是心体及心体能量的绽出，并没有实现客体化，其“法界”“六即”和“止观”等范畴还带有浓重的“易思维”以象为织的痕迹。所以，要论客体化及系统性而言，只有华严宗最具代表性了。但华严宗的系统性也是在法藏手上才获得空前的综合的，此前杜顺提出“法界观门”，设定“真空观”“理事无碍观”“周遍含容观”的三重观门，用“一乘十玄门”统理教行，著有《法界观门》《五教心观》两部著作，体现出理论融摄“理事”的客体化和系统性倾向，到智俨具体化为“四分”“毗昙”“成实”“地持”“十地”“般若”“涅槃”等理论分支，深化了华严宗的理论系统，但显得还是有点分散。而法藏综合了之前的华严宗诸师，还有唯识宗、天台宗、禅宗的般若智慧成果，撰写了大量关于华严的佛学著述，包括：《华严旨归》一卷、《华严纲目》一卷、《华严五教章》（又名《华严教分记》《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三卷（四卷）、《华严探玄记》二十卷、《玄义章等杂义》一卷、《起信论义记》二卷（五卷）、《华严三昧观》一卷、《华藏世界观》一篇、《妄尽还源观》一篇、《华严传》五卷、《楞伽疏》未详卷数、《密严经疏》

四卷、《金狮子章》一篇、《新经料简》十二卷、《般若心经疏》(宋传五)、《普贤观》一卷、《色空观》一卷、《法界义海》二卷、《寄海东华严大德书》一卷(义天录)、《华严问答》二卷、《华严三教对辨悬谈》一卷、《华严唯识章》一卷、《华严游心法界记》一卷、《华严发菩提心章》一卷、《华严关脉义》一卷(东城录)^①约四十余种。在这些著述中,法藏对华严宗的理论体系进行了全面的阐述^②,以般若美学的智慧视角组织起严密的华严宗理论网络。法藏之后澄观和宗密继承法藏的教学和诠释路线,注重梳理法源,标立正宗,兼采诸宗,探蠹决疑,发掘幽趣;更有李通玄在智俨、法藏之外,“取象表法”,别创一帜,让华严宗与易学、儒学形成紧密的法理呼应,意味着在客体化这一极向的理论创构上,华严宗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美学的客体化体系建构,已达到相当成熟、不可替代的理论高度。

三、华严理想美学的重要命题

华严宗的主体心性客体化,建立般若理想美学的对象形态,在唐代中叶是真正地实现了。这个所谓般若的理想,即心体及其能量的对象化投射所形成的形态,它与纯然客观的外在形态不同,因缘于主体的识性、情志和想象等而产生;它不是为了响应或附和佛教流行的盛况而将佛教关于信仰的誓言、修道体验和种种神奇想象以饱满生动的方式再现出来——显然不是,因为宗教信仰可以夸张,可以超越世俗成为奇迹,奇迹则是“超出人们所能运用于自然力量的手段之外的一种作用”^③,是在陈述其理想性时,缘于主体的现实动机、感受和想象而为,并不热衷于“纯粹的”思想状态。唐君毅对菩萨“上天入地”的精神观照与作为有很好的概括,认为:一方面,菩萨是“观照凌虚”与“感觉互摄”的统一,因为要“拔苦与乐”“悲悯有情”,所以要有主观→客观的观念,作为“自觉其感觉所对之万物散殊之世界,乃为此能自觉其感觉之心之所统摄,而更视一切客观的万物,亦各为一感觉主体,能互相感觉以相摄,而相互呈现者,在观照凌虚境中,则于一切类事物之性相、关系等意义,皆将视为此观照的心灵所统摄”^④;另一方面,“理想美学”的对象形态本来就是情志逆射的产物,而在综合前期佛法空性与中国美学主体论基础上完成的体系建构,它必然在吸收不同文化性、相方面显示出空前的融摄力与创造力,而唐代佛教各宗的美学以华严宗的体系构成最为复杂,它不仅将印度佛学的小乘、部派

① 按:日本学者木村清孝指出:可以确指为法藏所著约三十余部,但从法藏参与六十、八十《华严经》的翻译、曾参与玄奘的译事,对般若经、禅经等均有颇深造诣的情况来看,出自他本人的著述必不会少,因此我们综合法藏所作为四十余部。参见木村清孝:《中国华严思想史》,李惠英译,第113页。

② 按:魏道儒认为:智俨“在吸收慧光以来华严学发展成果基础上,融会当时各派学说,基本完成了华严宗学说体系的整体框架”,而法藏“是从注解晋译《华严》到注解唐译《华严》的过渡人物”,著作虽多,却重复严重,“形成脉络和主要特色的著作有《探玄记》《五教章》《华严问答》《华严旨归》《妄尽还源观》等”。参见魏道儒:《中国华严宗通史》,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108、128、124页。魏道儒看智俨高于法藏,主要基于智俨构建华严体系的骨架而言,对此笔者不能苟同,因为华严构架早在法顺(杜顺)便已提出,智俨则是从判五教而归一乘实践教义,展开了“法界缘起”的涵义,他属于法顺到法藏的过渡人物。现在对一些成果是法藏和智俨谁写不能判明,致使不同说法产生,但这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法藏的“法界”理论系统标志着客体化理论系统的形成,它不单单是“一乘教化”的核心,更是中古后期美学主体性对象化建构的理论高峰。

③ [法]帕斯卡尔:《思想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00页。

④ 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72页。

和大乘佛教的种种妙说都攒入其中,而且对中国文化的巫术、易学、儒学和其他杂学,也有不同程度的糅合。方东美在研究《华严宗》亦宗教亦哲学的内涵时,对其展现的精神领域的价值有一很好的阐释,对心性主体的能动建构与严密的客体化网络的形成,从人的精神及其实践统一性上,概括说:

《华严经》的这—种宗教,它就是要提出 Kataka Tapical Buddha(毗卢遮那佛)当做世界主——物质世界主、生命世界主、正觉世间(就是精神世界)主……所谓“正觉世间”就是一个精神领域的总体,而在这个精神领域的总体里面,要把世界上面一切人的愿望、一些人的理想,都提升成为最高的价值。而这个价值的完成实现,首先要实现于精神主体——即各时代的佛。再由各时代的佛各自引导他们的信徒、菩萨、大菩萨等,大不了等,面对这世界,先提升器世界里面物质存在的价值,使它变成为生命,再提升各种生命里面的价值变作为精神理想。^①

方东美的这段话强调了由物质世界主到有情生命世界主,再到正觉世间主的提升过程,意味着华严宗在“精神领域”展开的“精神理想”,涉及不同的层级、形态,都有相应的范畴、概念,相对于天台宗和唯识宗,这些范畴和概念是精神理想的“对象化投射”,是以“法界”作为范畴和概念的载体来伸张其理想的,因而从范畴及与范畴相关的命题来把握其存在,就尤其显得必要。

(一)法界缘起。“法界”是华严宗般若美学的核心范畴,围绕这一概念建立的华严宗理想美学形态,是中国美学吸收印度佛教和文化达到成熟阶段的反映,也是中国美学自性觉醒之后所获得的最大的综合性成果。那么,“法界”概念的意涵为何?法界作为般若美学范畴又有何特殊蕴意?《杂阿含》云:“眼界、色界、眼识界,耳界、声界、耳识界,鼻界、香界、鼻识界,舌界、味界、舌识界,身界、触界、身识界,意界、法界、意识界”^②,十八界中的“法界”概念标明由身体感觉到意识诸功能乃至无意识所形成的对象界,在这个排序里“法界”的层位是很高的,但这里并无明显的迷悟之分别,至于“眼界”与“法界”和“意识界”的区别也不是很清晰,而在中国的佛教则突出般若的慧悟,天台依《法华经》有十界说,分别为“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声闻、缘觉、菩萨、佛”,前六后四,六凡四圣,应对于俗界六迷和道界四悟。《华严经》讲“法界缘起”,设定“四法界”,为“事法界、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事”与“理”皆为法所摄,法是心性能体的对象化投射,则“理”可约为“体”,“事”可约为“能”,理事即有能量的本体,亦即华严宗理想化、客体化的法界。华严“法界”与小乘、天台相比有大的不同,更具意识主动性,理智化程度也比较高,牵涉的因缘也比较浓,然这一切因均出自主体化的能动建构,终究是般若智慧客体化的结晶。“法界”的成立及其显现就是“法相”。本来般若实相讲的是法性,这在三论宗、天台宗都如此,故“空性”也好,“性空”也好,都是在说“法性”,不过是一个以空为归依,一个性本为空无归有出。唯识宗的般若识性亦是法性,此性为“识有”,唯识是本,但这个“识性”因为是般若识性,它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抽象的物性,而是依从于人的存在的,因而修道践行演绎着识性的存在。识性本身的转化、觉悟过程,都呈现了法的圆满与自足性,因而称

^① 方东美:《华严宗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第32—33页。

^② 求那跋陀罗译:《杂阿含经》卷第十六,《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第116页。

唯识为法相也是可以的,叫做依识缘起,依法变相,即所谓“心如工画师,画种种五蕴。一切世间中,无法而不造”^①。而华严的“法界”作为“法相”,就比前几宗在逻辑上更高一筹,原因是华严宗以法界为缘起,“法界”比一般因缘更具深广的构因意义。一般因缘无自性而杂合净染,因无自性而不能自成,故对有待合和以成。而“界”因缘为心体法相,本身已然是一种合和,作为缘对象化而待之则以缘为缘,成为显示高度法理的境象,因之称为“法界缘起”。华严宗的“法界”既是因缘,也是合和;既是法性,也是法相。因为法界缘起内在于主体驱动的“自动性”,其源源不绝的更新力量就非其他本体构因所能比,而令我们从美学上更愿意肯定的是华严宗的“法界”范畴,不仅超越了般若意识单纯的“无”或“有”,超越了玄学化构想的“有无相合”之“独化”,而且作为更高基点上展开的理论建构,能充分呈现般若意蕴的完满支撑。法界缘起是中国美学建构意识在中古获得的一次重要的理论突破。

法界缘起的美学形式,体现出客体境象的事理结合,表面上事理与法性、法相似不关联,事缘于俗务,理从乎事体逻辑,但法界之事理为心相能体所投射,从起始端便与俗界不直接挂钩,因此与法性、法相未尝须臾分离,缘缘法界而合和为法相变幻,则更显美学无限旨趣——心性蕴涵更趋幽深、博大、优美、无限——法相自由呈现,便是法相万状,般若识性的感觉、认知、想象与幻相一直迸射的相状。法藏《华严经探玄记》根据法相事理的无限相状,就法界缘起展开了充分的论说,每一种论说的背后都隐含着一种美学的形式。如《入法界品》第三十四云:“第二法界类别亦有五门,谓所入能入存亡无碍。初所入中亦五重:一、法法界;二、人法界;三、人法俱融法界;四、人法俱泯法界;五、无障碍法界。初中有十:一、事法界,谓十重居宅等;二、理法界,谓一味湛然等;三、境法界,谓所知分齐等;四、行法界,谓悲智广深等;五、体法界,谓寂灭无生等;六、用法界,谓胜通自在等;七、顺法界,谓六度正行等;八、违法界,谓五热众鞞等;九、教法界,谓所闻言说等;十、义法界,谓所诠旨趣等。此十法界同一缘起无碍镕融,一具一切,思之可见。”^②这段话是说第二法界这个类别中有五种法门,其中最初的法门有五重法界,分别是“法”“人”“人法俱融”“人法俱泯”“无障碍”五种法界,而在“法法界”又包含十种法界,分别是“事”“理”“境”“行”“体”“用”“顺”“违”“教”“义”十种法界,对它们一一解释后,概括为“此十法界同一缘起,无碍镕融,一具一切,思之可见”。所有的名相都是“法”的“名相”,“法”的法界又含纳十种,这十种皆具事理功能,它们“同一缘起”,指和合镕融,一为从心而合,亦为待缘而合,待缘则法中事理镕融“镜象”,使客体化之法界成就一具一切的伸展机制,华严法界缘起的境界由此愈益崇高伟大,不可限制。法界缘起让美学的内涵变得既空灵,又充实;既稳定而有方向感,又变化而愈来愈不确定。总之,像“法界”这样涵括客体化事理的美学范畴以及“法界缘起”这样的“美学命题”,大概在根究学理意味、精细构筑思想“世厦”的意义上,达到某种登峰造极的程度了。

(二)六相圆融。六相圆融是无障碍法界的一种描述,这一概念最早出自智俨。“六相”分别指总、别、同、异、成、坏。智俨说:“六相有二义:一顺理;二顺事。此二义中。顺理义显,顺事义微。”^③“知

① 佛驮跋陀罗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9册,第465页。

② 法藏:《华严经探玄记》卷第十八,《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5册,第441页。

③ 智俨:《大方广佛华严经搜玄分齐通智方轨》卷第三,《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5册,第66页。

总别顺理义增者,为辨六相令见心入理。”^①理、事皆有法界,“从相入实”。“性者体,起者现在心地耳,此即会其起相入实也。”^②“相”非物相,也不是纯然真空玄义,“相”归于法,起于现在心地,说明还是心性所发,只是相要显现法,是法的住所,令法皆因缘于相而被显现,故相的真实义为非相,谓这可入于相而实为非相。《金刚经》阐明般若之相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③。相,是非实体性,故虚妄;离相,意味着得实,指相的虚妄一面被抛舍,相显真实的一面却未必抛舍,何故?住于法则相入实。如此这“总别同异成坏”六相,就把真俗相融相即世界的多侧面尽括无遗。“见心入理”,呈明“相”是主体志意的投射之象,其因理而自成、自足,各具法界,彼此交互,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均显示成住败坏的生命性相,也是人生真实底蕴的客观化写照。

“六相圆融”的交互性融摄,隐含着主体顺事顺理的实践,揭示了宇宙、微尘界生生幻化的奥秘,表达了中国美学智慧吸摄佛法巧妙转捩意旨的不尽妙用。唐人采纳佛教关于宇宙的观念,认为莲花藏世界海,一微尘见一切法界,一即非一,一即一切。“微尘非小,能容十刹;刹海非大,潜入一尘”^④,无碍法界以理摄事,以事融理,两相迭合,互证法印。同时,法界之六相圆融,非见无以起相,非相无以显法。般若意识的细微化,反映美学理趣的精微和细腻化。澄观说:“一莲华叶或一微尘,则具教等十对,同时相应具足圆满。”^⑤“有十莲华藏微尘数相。相体广矣,一一用遍;相用广矣,一一难思。互相融入,体用深矣。若此之相,唯属圆教。”^⑥宗密说:四位行有“相行、体行、业行、方便行。方便中,以六相圆融令一行具一切行。”^⑦宗密将“六相圆融”与儒道意涵相合,更显生命主体的能动扩张意志,意味着人所入法界随般若意识的细化而返归为“会通本末”^⑧的真性元心。关于华严宗后期与禅合流的趋势,这里暂且不讨论。我们注意到,六相圆融在建构性的精神层面展开了细微精致的侧面,又将这些侧面作为法界蕴含“六相圆融”之理,则微尘圆满,微尘也是碎尘,法界诸相是智慧的灵魂与闪现,因而有为、无为、亦有为亦无为、非有为非无为、无障碍等深义,均能自在绽现。所谓圆融的极致,无非相即理实,微尘无碍,宇宙无碍,内观无碍,外瞻也无碍,达到如此智慧灵魂融通妙致时,则彻底消泯了人为分设的道俗二界,把主观与客观世界彻底打通,有为不再专属俗谛,无为及亦有亦无、非有为非无为,也不貌似道意冥想,似乎解脱是神仙往生来世事,一即一切,刹那是碎尘,虚空是微尘,罪人是碎尘,圣贤也微尘,一尘一世界,一法一法界,六相圆融皆可以数用,用智无以测其广,用心难以取其明,无碍解脱是朗然明亮的精神境界,也是华严理想最庄严美丽的体现。

六相圆融这个命题,把华严般若美学的内在结构充分理想化了,从而在精神境界的精致程度和方法论意义上灵通变化程度方面,都超越了天台宗和唯识宗。天台宗的内在结构无疑不及华严细微,

① 智俨:《大方广佛华严经搜玄分齐通智方轨》卷第三,《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5册,第66页。

② 智俨:《大方广佛华严经搜玄分齐通智方轨》卷第四,《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5册,第79页。

③ 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一,《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第749页。

④ 法藏:《华严经探玄记》卷第十八,《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5册,第441页。

⑤ 澄观:《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卷第二,《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5册,第515页。

⑥ 澄观:《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卷第四十七,《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5册,第865页。

⑦ 澄观撰疏,宗密随疏钞:《华严经行愿品疏钞》卷第六,《新编卍续藏经》第7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第975页。

⑧ 宗密:《原人论》卷第一,《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第710页。

唯识学的相分和见分蕴含的逆向流动,在华严宗成为六相交互的一种可能。在原来的宗教意趣设定中,般若意识愈是远离众生,则愈离虚妄,愈切近真实际本元,现在所谓趣、性相乖即相和,虚妄即真实际,道俗并无刻意的分别,因而也没有什么纯粹湛然的实法真空。一与多的关系,在华严宗真正表达出中国美学独特的韵味,它不是柏拉图式以“多”分有“一”的美学逻辑范式,也不是赫拉克利特“寓杂多于统一”的运动对象的辩证阐释,更不是亚里士多德的将潜能与现实区分,将质料与实体性视为本原,将形式与目的视为可能,实际上隐含着对现实对象的理性分割的形式逻辑判断。华严宗对法界的理解,辟开“六相”的微观结构,仿佛用智慧的显微镜观照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微妙的千百种变化,在设定这样的微观结构时,吸纳了佛教华严经理蕴的中国华严宗美学采取的是发言主体仿佛不在场一般的效用,让一切成为自在之理,而西方美学对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依然纠葛不清,这种纠葛不清并不是说西方美学自古而今关于美学本体的逻辑设定都是荒谬而无意义的,而是说他们关于逻辑上可确定的内容每一新论的提出,都仿佛在中国美学的智慧阐发中,成为被包含的相对性内容,就如同在华严宗“六相圆融”美学命题中不过是“法界”之一微尘、碎尘而已。这便是中国美学的特色和优势,这个创造性的美学结构和涵溶无尽缘起的美学场域,内在地传达了中国美学的“生生”主题。当一切妙合到极致,令虚空不可测其广,微观不可度共幻时,我们依然能够静持主体性的优雅与从容,巧妙摄取各种有益的元素,让其在中国美学的理想机制中伫立、扎根和开花,这是西方美学难以设想出的绝妙景观。

(三)十玄门。“十玄门”是华严宗理想美学的创生理据。“四法界”“六相圆融”的“缘起相由”,即“十玄门”范畴,最早是智俨在《华严一乘十玄门》中提出,法藏改造和提升为“法界”和“六相”凸显真义妙境的理据。如果说,“法界”是能体(本体)的对象化建构,“六相”是法界建构(显现)的精神现象结构,那么,“十玄门”就是“法界”“六相”连接的中介,它类似于康德三大批判的审美判断。不过,“四法界”的理法界、事法界、理事法界、事事法界因缘圆满,也是具足“六相”并呈现的根因,同时“六相”的“总、别、同、异、成、坏”顺理、顺事而显,也表明自身并非纯粹的精神表象(理式),而是具摄取、绽出“法界”的,具有自身充分“个别性”的微量“能体”,就是说,也是圆融具足的“法界”,因而与康德的本体界、现象界性质迥然有别。“十玄门”的提出揭示了“法界”和“六相”生成的缘由,意味着一方面法界的圆满与能体扩张性,是作为倒悬之果而存在的,否则法界的法性、义旨何以能够涵摄饱满,并不能单从因缘圆满和通体生成得到呈明;同理,“六相”作为法界的侧面和显现的微观结构,亦如同天台宗莲花的绽放,“生成”的过程便隐含着法界之果的品形,但莲花的绽放何以能摄“果”,以及类象与个象之个别性何以显现,则不能由观而止究其本真。“十玄门”范畴的设置就揭示了作为“相由”生成的法理,因而具有了极特殊的美学寓意。

智俨生于隋文帝仁寿二年(公元602年),卒于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正处中唐开新的前奏时期,其所撰《华严经搜玄记》确立“明六相,开十玄,立五教”^①的基旨,又在《华严一乘十玄门》提出“十玄门”的核心意旨:

^① 续法辑:《法界宗五祖略记》卷第一,《新编卍续藏经》第13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第544页。

一者,同时具足相应门(此约相应无先后说);二者,因陀罗网境界门(此约譬说);三者,秘密隐显俱成门(此约缘说);四者,微细相容安立门(此约相说);五者,十世隔法异成门(此约世说);六者,诸藏纯杂具德门(此约行行);七者,一多相容不同门(此约理说);八者,诸法相即自在门(此约用说);九者,唯心回转善成门(此约心说);十者,托事显法生解门(此约智说)。^①

后法藏《华严探玄记》继承了智俨“十玄门”的思想,改“诸藏纯杂具德门”为“广狭自在无碍门”,“唯心回转善成门”为“主伴圆明具德门”,将排列次序也予改变,依照总、空、用、体、缘、相、喻、智、时、境的序次排列。后人称法藏的为“新十玄”,以与智俨的“古十玄”相区别。“十玄门”主要解决现象界与本体界的隔障,这无疑也是华严宗般若美学通体建构的关键。所有的执著、偏见、邪见,均来自人对本体界、现象界的生存机械化切割,让本来活生生的生命、生存、生活的有机性变成单面化、狭隘化的所谓“合理的”“规矩的”现实。那种执经验(常见)、执理性(区别性)、执幻念(夸张与想象)的精神、观念、思维、习惯,对过去、现在、未来的把握,都因为偏执而变形,令感受变得模糊,思考变成武断,幻象虚浮而不切踪影,动意变成紊乱的臆想,结果导致所有精神的外化,包括人的生存及存在之行为、状况,都虚浮而飘散,貌似确定实则经不起推敲,更缺乏充实细致的内容。华严宗的“十玄门”范畴,发挥的恰恰是圆融、柔韧、细腻的美学内涵,调动起鲜活、灵动、周致、包容的美学意蕴,注入了美学创生的逻辑结构,为华严法界理想美学的诞生提供了独特的阐释依据。

“十玄门”统一了本体界与现象界,“统一”的方法就是法界生成的法门,“随有一门即具一切”,各法门相通又相别,因而“十玄门”既是精密的理论建构,又是美学化的方法论思维,它标志着华严宗美学的复合生成理论,在综合与超越其他各宗方面所具备的优势,也体现中国古代美学智慧的复合观念所达到的水平,这种智慧被现代哲学、美学用复杂性概念来指称类似或相应内容,但对于华严宗“十玄门”而言,不仅是促成微观生成向无限延伸、转换的重要概念,而且也是本身就确立了美学的运动皱褶,以及具有曲折幽深之美学品格与采掘不尽之阐释性的重要范畴。

法藏对“十玄门”的阐释,立意十分精密,在“初门”中就设定“十玄”之意了,考虑到视角、意涵、结构、体式、功用、流程、境界等等都很具足:“就初门中有十义具足:一、教义具足;二、理事;三、境智;四、行位;五、因果;六、依正;七、体用;八、人法;九、逆顺;十、应感具足。”^②那么,“初门”就应当是“同时具足相应门”,我们便按照这十个方向进行分析,将“依正”“人法”视为涉及美学思维的意向,“教义”“理事”“境智”视为美学意旨的深度探掘,“体用”“行位”视为美学结构、模态的形式化概括,“感应”“逆顺”视为美学流程的描述,“因果”视为美学格局的表里互化与时空总体呈现状况,这些方面综合起来可以说十分全面了。

法藏揭示了法界与六相相融相即的丰富美学意旨,它至少在如下几方面超越了一般的审美旨趣:一是并非单纯对“审美”的义释,而是涉及到精微的复杂义理的美学涵义;二是也非静态性质的描述,而是包含了视点和思维重点、活跃点的不断切换;三是揭示了法的纯粹理趣,并用它映射现实,因现实而实然化。这其中涉及任何一面都难度很大,很难辨清辩透,“十玄门”却将它讲得透彻圆满。同时,“缘起相由”的“十玄门”定位,亦明确阐明十法门并非为玄思所设,是为“相”而立,美学化的

^① 智俨:《华严一乘十玄门》卷第一,《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5册,第515页。

^② 法藏:《华严经探玄记》卷第一,《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5册,第123页。

用意十分显豁。因而,从佛法的本义讲,“缘起相由”所析十义,即诸缘各异、互遍相资、俱存无碍、异门相入、异体相即、体用双融、同体相入、同体相即、俱融无碍、同异圆备,包含了佛法方方面面的义理;从美学意蕴讲,“缘起相由”所析十义,即多极差异、以化遍融、观止并存、意境互转、即事触真、幻象迭构、中道体同、圆融无碍、同异圆明这十种美学的妙境。

(四)五教义。“五教义”是般若美学分析的成熟形态,也是华严宗判教理论的成熟形态。南北朝以来佛教判教理论提法众多,着眼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宗义”的实相分析,另一方面是“教理”的践行性质分析,这两个方面的分析均涉及般若美学的智慧应用。“宗义”分析以美学本体论的检思为主,“教理”践行则触及美学的身心实践和美感经验方面的问题。因涅槃理论开始流行,般若理论遭遇改头换面的知识修正。体现到宗义、教行判定方面,则多推崇涅槃圣道说,而于般若智慧观照则不再直接置论臧否。譬如,慧观依“五味喻”提出“二教五时”说。“五味喻”出自《大般涅槃经》,云:“譬如从牛出乳,从乳出酪,从酪出生酥,从生酥出熟酥,从熟酥出醍醐。醍醐最上,若有服者众病皆除。所有诸药悉入其中。善男子!佛亦如是,从佛出生十二部经,从十二部经出修多罗,从修多罗出方等经,从方等经出般若波罗蜜,从般若波罗蜜出大涅槃,犹如醍醐。言醍醐者,喻于佛性,佛性者即是如来。”^①慧观根据佛陀说法的时机,分别出五种不同的“教时”,将它们总体上分为顿、渐两教,其中“渐教”为佛陀针对根器不同的众生,演说浅深不同的教理:初时为声闻人、辟支佛、大乘菩萨这三种人分别演说,称为三乘别教;第二时演说荡滞明空的般若之教,这是为犯了“我执”“法执”的这两种而说的,因为般若指导人获得人空、法空,对声闻、辟支佛和菩萨乘也是必要的,因此称二时亦三乘通教^②。……在最后一时,慧观主张涅槃教为最高阶段,提法与《大般涅槃经》的“醍醐最上”设定一致,譬喻佛性涅槃是最高一级。在这个划分里,般若教作为“三乘通教”别具眼光,它主要依时设教,并无明显的高下轩轻之分,对于般若唯识和中观般若性空,以及般若否定之旨,般若幻有之义,等等,均无明显倾斜。慧观的“二教五时说”可以说非常具体了,表明在佛教义理的本体认识上,南北朝已经达到了十分清醒并能准确识别不同佛法本体论的认知程度。正是这样一种基础促成隋时吉藏就慧观的渐顿五时教,展开了进一步的认真判析,吉藏说:

“次云《大品》是三乘通教,是亦不然,释论云:‘般若不属二乘,但属菩萨。’若《大品》是三乘通教,则应通属,何故不属二乘?”问:“若依释论明般若但属菩萨,在经何故劝三乘同学般若?”答:“般若有二种:一者摩诃般若,此云大慧,盖是菩萨所得,故不属二乘。若以实相之境名为般若,则三乘同观。故劝三乘令并学之,经师不体二种之说,便谓般若是三乘通教。”^③

吉藏一方面指出慧观判教说的矛盾,“三乘别教”含声闻、辟支和明六度之菩萨乘,是以般若为三乘共有,但实际上般若只属大乘,大品般若也纯粹是大乘经,并不属于声闻和辟支佛。这是慧观判教对般若的错误理解;另一个方面也指出般若分两种,一是摩诃般若,即大智慧,只有菩萨才具的智慧;二是实相般若,指佛教修道的智慧境界,这是三乘,包括小乘都要抵达的一个目标,故声闻、辟支

① 昙无讖译:《大般涅槃经》卷第十四,《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第449页。

② 蓝日昌:《六朝判教论的发展与演变》,台北:文津出版社,2003年,第97页。

③ 吉藏著,韩廷杰校释:《三论玄义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14—115页。

佛和菩萨都可以学习般若智慧,以洞见般若实相。吉藏的解释强调了般若在经教判说中的地位,充分肯定了实相般若作为三乘通教的本质,这对于揭示般若的真实意涵是很有意义的。但吉藏也只是就实相来讨论般若的深蕴,并未就缘起般若展开深入探讨,其所指摩诃般若,讲的似乎是大乘般若缘起,然而究竟如何缘起,却并不详明。天台宗将般若空性缘起转换为性空缘起,有效糅合中国心性学说般若理论系统,通过“圆融”“六即”等概念呈显以空御有的妙谛。照理说,天台宗般若理论中国化、美学化的一个伟大创举,其理论系统化之高,阐发般若直觉之妙也是少有能企及者的,但天台宗的般若判教不全面,也没有细腻触及主体思维本身的智慧运程,从而纵然有性空妙法,用莲花喻说开权显实之效,终归是不成熟的、体系上有缺憾的理论主张。到了唯识宗依“三性”而论般若唯识缘起,令般若智、性与名言等幻合,为识转似外境,化空为有,别开洞天,使般若缘起上升到新的主体论美学的新高度。但唯识论般若美学也存在偏颇,主要体现在识性的把握,囿于对常识的依赖或悖逆而以此为识性的种因,阿赖耶识确定的“识转”的能量、体性的转化,在美学的逻辑本体上都存在二元玄合之嫌,况且由遍计所执到依他起性,再到圆成实性的教行判别,虽然暗含人生的顺逆走向,以识性的对流及刹那流变的识性递转标明了唯识的智慧品性。但此有为内有,描述得再客观也是一种内省的心理美学化之有,它与真实的现实人生还是有区别的,因而有关人的修道境界的理论设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厢情愿,在大的格局上有玄学化遗风,因而唯识缘起也不是成熟的般若缘起理论,并不能完整、正确地解释大乘般若缘起有关幻空妙有等美学理蕴,也就是说仍属于未了之论。那么,教理和教行的问题,就自然留给了华严宗,而华严宗的般若实相与般若缘起的理论,在解决内外、表里、总分、同异等关系方面是最为成熟的了。因而,华严宗的“五教说”就自然而然成为中古时期最成熟,对般若智慧诠释得最充分的理论学说。

华严“五教义”,以杜顺《五教止观》为最初立义,分“法有我无门”“生即无生门”“事理圆融门”“语观双绝门”“华严三昧门”五教。智俨《华严经搜玄记》分“渐、顿、圆”三大教,又《华严经孔目章》《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中从渐教出“小、初、熟”三种,与“顿”“圆”合为“五教”。法藏《华严经五教章》《华严经探玄记》继承杜顺、智俨五教划法,明确为“小乘教、始教、终教、顿教、圆教”五种,又称“贤首五教义”。

五教义的名目与天台宗“化法四教”大体相同,另加顿教。澄观说“大同天台,但加顿教”,慧苑评曰:“此五大都影响天台,唯加顿教令别尔。”^①天台置顿教于“化仪四教”,即顿、渐、秘密、不定四种。天台“化法”对应根机,“化仪”四教对应般若实相,宣示类型、分法所据不一,使顿教不能具备与藏、通、别、圆并列的位置,体现了对般若实相“宗义”的认识透彻,但对其教行之义不够彻观。华严五教将顿

① 慧苑:《续华严经略疏判定记》卷第一,《卍日本续藏经》第1辑第5套第1册,第9页。见《新编卍续藏经》第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第18页。按:慧苑师首国师法藏,法藏与人合译《八十华严》后,作《华严经略疏》约四分之一去世,慧苑和同门宗一分别续写,其中慧苑撰写部分《续华严经略疏判定记》颇受后学诟病,针对集中在慧苑认为法藏所判“五教”受天台影响,另加“顿教”而成,而慧苑认为顿教乃离言之教,不属于能诠范畴,因而主张排除。慧苑之论说发现了顿教的直觉、妙悟究竟与渐教的修道次第的差别,揭中了“五教”所含的“四教”与“顿教”存在实质性不同,显示出思维和分析的细致性,也揭示了其中内在的矛盾,但他废除“顿教”的主张,则意味着取消了修道的直觉、妙悟之路,这等于堵塞了后学的“教外”实修之路,因而被视为异说。其实,“顿教”结合了中国人的审美直觉特点,汇聚了关于“应会”“灵感”“悟解”的知识,将之纳入般若智慧的觉悟,对普通人的教行是十分有益的理论,此在后来的禅宗实践和大众审美回归趋向中也予以了验证,如此,慧苑之判就显得用力过度,不过,他对“五教”的批判也有合理的方面。

教列入,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华严五教义的般若美学蕴涵如何贯通和体现,般若美学的思维体现出怎样的别致通达呢?《华严经探玄记》说“以义分教,教类有五,此就义分,非约时事”^①，“以义分教”就是从义学、义理构成的角度进行分类,既包含“宗义”“教行”,也涵摄“实相”与“缘起”的般若美学智慧分析,是比其他各宗更全面、系统的佛教判教理论。唐君毅就华严与天台判教说进行过比较,从般若“圆义”的发掘、完善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

华严宗人,则依此华严经既为佛后来所说之一切教义之原始而为乳教,更由华严一经所启示之义理,以建立华严之圆顿教。天台宗人,既以佛在第五时所说之法华涅槃为究竟。然华严宗人,于佛之五时说法,更喻之如日之照世界。其在华严时之说法,如日初出之照高山,为日出先照时。此时乃为圆顿大根众生,转无上根本法轮,名为直显教。并以佛阿含时、方等时、般若时所说者,喻如日升转照时,乃为上中下三类众生转“依本起末法轮”,而成种种方便教。再以佛法华涅槃时所说之会三乘归一乘,摄末归本之教,乃日没还照时所转之“摄末归本法轮”,以令彼偏教之五乘人等,转偏成圆。然此日没之还照,也即还与日初出之先照在高山,自相照映,终始相生,如一圆周。故既有天台宗人弘此佛第五时所说之法华,亦理当更有华严宗人之弘此佛在第一时所说华严。然后可见佛之说法之终始皆圆之胜义所存也。^②

唐君毅发现华严宗达到“圆之胜义”的极致,讲的是理圆,体系之圆。这个看法是对的,我赞同这个看法,认为所谓的“理圆”“体系之圆”其实也就是中国“易学”“宇宙本体论”“玄学”的美学之“圆观”与佛学融合所标举的境界。经过佛教义学的滋润和灌溉,美学的“圆”义不仅是应化于不同对象、由浅入深的方便教理,也成了深度文化的意涵内化与践行外化的阶位和境界,是与感通圆融的理论体系相符相契的最合适的符号、范畴。而般若作为呈显心性、灵机、感应、思维、直觉的特殊美学智慧,在五教义的理论构成中,以其特有的教相表达了特殊的美学蕴涵和价值:

一是“小乘教”本非菩萨乘所行之道,但般若为六度的领导,令小乘声闻教由“苦集灭道”悟入因缘,其般若理蕴也以如实知的理性觉悟为主,道断苦阴,建立八正道为菩提心的正向之果,更以“十二因缘”联结人生的苦厄相状,建立切己的感知因缘,获得独觉智慧。这些对修道众生而言,无论根器高低都有基础意义。故立小乘教为第一,开显由世俗跋出的美学用意,表达《阿含经》《俱舍论》平实的精神解脱旨趣,具有特出的美学价值。

二是“始教”所体现的“权教”之意,是大乘进阶之始。所谓立意要高,体现在用何种智慧来夯筑精神觉悟的基础,自然只能是般若。不同于既往的判教,这里的“始教”所用宣法佛典包括《般若经》《智度论》《解深密经》《中论》《唯识论》诸种,它们对般若“空”“有”二宗能够兼收并取,让空性、性空之类实相与心性、识性之类缘起法相并举,因之而被称为“空始教”或“相始教”。般若智慧的开显仿佛清澈之流的浇灌,为菩萨道的心性注入汨汨甘泉,也为真正运用智慧来实现精神解脱,奠定下坚

① 法藏:《华严经探玄记》卷第一,《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5册,第115页。

② 唐君毅:《华严宗之判教论》,张曼涛主编:《华严宗之判教及其发展》,深圳:大成文化出版社,1978年,第42—43页。

实的思想理论根基。

三是“终教”与“始教”相对,体现“实教”本义,宣示了佛典《涅槃经》《楞伽经》《大乘起信论》《法界无差别论》《胜量经》《密严经》《宝性论》等的殊胜义。法藏《华严经探玄记》说:“定性二乘,无性阐提悉当成佛,方尽大乘至极之说,立为终教。”^①实教即实修之教,是般若对象化果位的体现,讲究依次而修,亦称为渐教。开花结果,果味可寻,乃般若智慧达到菩萨乘的至极境界。终教与始教义理上同样有侧重,不过仍为不完全之教,即偏教,故判教宜相对中有绝对,主次中有主导。

四是“顿教”指“不依地位渐次”而修。“顿”在中国语言中具有当下直截、刹那成就之意。此指排除小乘法真谛之悟、亦排除大乘空始教的空性和唯识法相之教,排斥一切人为设计的修道次第,凡属思量性质的、依于法理逻辑的,均为顿教所排斥。顿教所追求的,一念不生即名为佛,明心见性,中无隔碍,既不指涉目的、对象、境界,也不借助语言文字得到意涵诠释,也不熔裁十方佛以方便法门的融合为其旨要,因其本身就是一种空而即的存在,顿教可摄禅法,是一种特别价值的般若觉悟之道。

五是“圆教”依《华严经》而成本教。澄观《华严经疏》云:“圆教者,明一位即一切位,一切位即一位,是故十信满心,即摄五位,成正觉等,依普贤法界帝网重重主伴具足,故名圆教。”^②灌顶《贤首五教仪》说:“圆教者,统该前四,圆满具足,一位即一切位,一切位即一位,是故十信满心即摄五位,成正觉等依普贤法界,性相圆融,主伴无尽身刹尘毛,交遍互入,故名圆教。”^③赖永海《中国佛教通史》说:圆教“包括《华严》‘别教一乘’和《法华》‘同教一乘’。‘别教一乘’是指《华严》经义超越其他经教,为诸教之本(‘本教’)。‘同教一乘’是指《法华》经义混同于诸教。”^④此议有所偏失,当仅就《华严经》而言。将《法华》视为“圆教”是作者自己的体认,与华严宗般若分析并不是一回事情。一者,天台宗认为“通教三乘因果俱偏,别教菩萨因偏果圆,圆教菩萨因果俱圆”^⑤,而将《法华经》《涅槃经》作为能适应各种根机开悟的圆教经典。虽然《华严》和《法华》都是一乘教法,华严以三乘(菩萨乘)别教归一乘,《法华》以诸经教同归一乘,却并不意味着华严宗将《法华经》与《华严经》等同奉为圆教之宗。二者,华严宗的“圆教”概念与天台宗不同。天台宗是“开权”之圆,般若“性相圆融”之“圆”;华严宗是“性海圆融”和“无尽缘起”之“圆”。天台偏重于体用相合,妙转通变;华严偏重于内外融洽,体构恢弘,两者均达到美学趣味的某种极致:在般若实相层面上,天台宗创立了主体性空妙有的美学系统,通过“一念而具三千法界”,使般若主体的生命气息通过意念投射呈积极释放状态;而“十法界”将凡圣界相勾连,法界为主体心念投射于世间与出世间,让世间与出世间亦为主体心念之法界。美学构体的高度主体化和以此为基所筑成的系统大厦,使天台宗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具有难以超越的地

① 法藏:《华严经探玄记》卷第一,《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5册,第115页。

② 澄观述、净源疏注经:《华严经疏注》卷第一,《新编卍续藏经》第88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第61页。

③ 灌顶、续法集录:《贤首五教仪》卷二,《新编卍续藏经》第10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第37页。

④ 赖永海主编:《中国佛教通史》第7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9页。另,牟宗三《佛性与般若》也持此见,其列图例两幅,明示华严为“六道”“小乘”“始教”“顿教”体外之教,以大乘真心为真性,成就唯一“宝塔形”之圆教;而天台为体内含六道及藏、通、别教之圆教,故亦为实教。参见牟宗三:《佛性与般若》,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438页。

⑤ 湛然:《法华文句记》卷第九上,《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第316页。

位。而华严宗则创立了客体化美学对象的恢宏模态,“法界”在华严宗这里,是理、事交集的圆融存在体,它的缘起相由并不直接基于主体意念的慧悟,而是透过法界“十玄义”的精密结构和累累无尽的创生功能达成圆融无碍,华严宗的主体生命力的投射貌似不及天台宗直接和强烈,甚至心性、识性的分析似乎也没有天台宗集中和深入。但华严宗美学和华严宗美学思想的集合性及其体系结构的完善分析、对思想义理客观性价值的定位把握与阐释却绝对在天台宗、唯识宗之上,甚至可以说,华严宗代表了中国古代客体论美学臻于完善的一个高峰,以后也只有宋代理学达到了可堪媲美的成就。然而理学美学的观念形态和思想体系与华严宗相比,并不及华严宗更富有生命信仰的情怀和丰富完善的智慧机制。那么,单就美学贡献而言,可以说华严宗达到了中国古代客体论美学的某种极致。

责任编辑:冯济平

On the Ideal Aesthetics of Prajñā of Huayan School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Zhao Jianjun

School of Humanities,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The Huayan School as a sinicized Buddhism sect has generated unique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Chinese culture. As for aesthetics, this influence mainly refer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deal aesthetic form with a systematic theory. As far as the actual existence of Huayan School is concerned, it is listed among the theories of sinicized Buddhism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nd belongs to one of the most sophisticated major ideological systems, with extremely rich aesthetic implications. Its theory is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the ideal prajñā-like aesthetics, putting forward such aesthetic propositions as "origin of Dhamma-dhatu", "six-phase harmony", "ten mysterious gates" and "five doctrines". These have very important theoretical research value in promoting the theoretical level and ideological implication of medieval aesthetics.

Key words: Huayan School; Prajñā; ideal aesthetics; sinicized Buddhism

战略竞合与强大自身

——英美权力转移的百年博弈及启示

谢剑南

青岛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摘要: 英美权力和平转移中,国际体系由英国治下的和平向美国治下的和平的权力转移,前后历经百余年战略博弈,其间两国既竞争又合作,既冲突又相惜,既对冲又借重,始终充满了相互打压对手与竞相强大自身的战略竞合。美国快速崛起进程中保持战略克制是英美权力转移的关键原因。英美权力转移的战略竞争和互利合作的过程与结果表明,打压对手并非战略竞争上策,在互利合作中不断强大自身,发展自身以经济科技实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更有益于实现长远国家利益战略目标与世界和平发展。

关键词: 英美权力转移; 战略竞合; 打压对手; 强大自身

中图分类号: D8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3)01-0079-18

英美先后成为国际体系的霸权国家,国际体系相应地由英国治下的和平(Pax-Britannica)向美国治下的和平(Pax-Americana)权力转移。期间,两国没有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而发生战争,而是实现了权力和平转移。从历史维度来看,尽管二战是英美权力转移的关键转折点,英国霸权在1945年甚至在1939年就没有霸权可言了,但英美权力转移是一个长期的持续过程,以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并开始全面崛起为起点标志,一直到1967年英军完全撤出苏伊士运河以东防务为结束标志,这场持续了百余年的权力转移才得以最后完成。

一、文献论要

对于英美霸权历经百年博弈后和平转移,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总体上看大致有五类观点。

(一) 英美权力和平转移的五类主要观点

1. 实力逆转论。持此观点的学者,主要基于实力决定论。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是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世纪美国发动代理人战争的特点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研究”(21BGJ01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国际秩序变革对我国国际秩序战略的影响及对策研究”(20XGJ004)及四川省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研究”(SC21ZDYZ006)子课题“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内涵释义”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 谢剑南,男,湖南娄底人,法学博士,青岛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青岛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全球治理和国际关系研究。

欧洲的“离岸平衡手”，也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霸主。然而，在十九世纪中后期，英国实力达到顶峰之后，逐步显示出相对衰落之势。马克思指出，“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这一论断，契合了英美权力转移过程中实力因素的关键性作用。一些中外学者从英美硬实力层面进行了比较研究。英国在1860年占世界工业生产总产值份额的19.9%，是名符其实的世界第一工业强国。^①然而，美国内战后，统一了国内市场，大力发展工业和国际经济贸易，很快就超过了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在1870年至1900年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三倍多。^②“到19世纪末已占世界工业生产总产值近1/4，超过英国而居世界首位。”^③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明智地认可了由英强美弱转向英弱美强的客观现实，逐步接受了美国崛起，最终在没有发生两相争霸战争的情况下，实现了英美权力和平转移。

2. 战略克制论。有许多学者相信，英美权力和平转移的主因在于美国在崛起进程中，始终注意战略克制，尤其是军事克制。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认为，“作为后起大国的美国，以经济开放和公平贸易为突破口，寻求一条在当时国际权力格局下符合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成长路径。”^④美国在漫长的崛起过程中，实行了非直接挑战英国霸权的渐进性战略，采取“搭便车”与推卸责任的策略，在各领域辅以“蚕食性”途径，逐步获得重要权力和相应地位，最终实现英美之间世界霸权的和平转移：一是美国在建国后，主要专注于周边领域扩张，并且通过提出“门罗主义”拒止英国和欧洲列强染指美洲大陆；二是美国不仅有优越的地缘条件，而且凭借强大经济实力，通过“门户开放”作为楔子，挤入英国及欧洲列强在全球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以战略上“搭便车”和策略上“强自身”的复合方式，在与霸权国英国的竞合中稳步实现了强大自身的发展目标。

在英美权力转移过程中，美国采取低调迂回的“缓称王”战略，在不同战线和领域中，以“零敲牛皮糖”的方式，通过外围进入核心的“外围—核心—核心”方式，以地域性扩展和领域性扩张的方式，逐步发展并巩固自己的实力范围，与英国展开战略竞逐。美国以这种非激进的机会主义方式，在英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注重发挥经济与商贸等软性优势，明智地成为追求有限目标而非无限目标的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保持了战略克制，更容易被英国所容忍和接受，最终通过二战的绝佳机会，一举登上霸主宝座。

3. 德国掣肘论。有部分学者认为，英美权力转移过程中，德国作为重要的第三方因素，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英国霸权受到了德、美、法、俄、日等国的挑战。英国霸权有三大支柱，分别是近代工业、海军和殖民地，其中霸权受冲击最深的是殖民地的非殖民化，同时工业和海军优势逐步被德、法、日、美等其他国家赶上，英国霸权摇摇欲坠。当然，“任何既有霸权的国家都不会自愿向其他国家转让霸权或世界领导权。”^⑤除非两大因素同时出现，一是霸权国与兴

① [美]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陈景彪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第186页。

② 杨生茂、陆镜生：《美国史新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29页。

③ 宋效峰、黄家亮：《国际金融视角下的英美权力转移及其启示》，《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④ [美] 克里斯托弗·莱恩：《和平的幻想：1940年以来的美国大战略》，孙建中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8页。

⑤ 梁军、章博：《试论大国霸权的和平转移——以英美互动为个案》，《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4期。

起国的实力非对称对比发生明显变化,二是出现了第三方重大共同威胁。十九世纪后半期,尽管美国实力发展迅速并很快在经济上超越了英国,但面对近在咫尺且咄咄逼人的德国巨大威胁,阿隆·弗雷德伯格 (Aaron Friedberg) 指出,“在英国人眼中,德国的崛起对英国构成了更为紧迫的威胁。”^① 肯贝尔·查尔斯·苏特 (Campbell Charles Sontter) 认为,“德国作为灰色恐怖的突然出现……使惊恐不已的英国投入了美国的怀抱。”^② 由此,英国调整了对美政策的对抗力度,转而采取借助和联合美国对抗德国的策略,由此美国坐收渔翁之利。

两次世界大战几乎耗尽了英国家底,极大地削弱了英国霸权。二战后,英国实力一落千丈,同时苏联又成为英国与欧洲的巨大威胁,美国成为苏联阵营之外的霸主,英国面临生存困境,不得不争取与美国的友谊,与美国发展“特殊关系”,成为美国忠实的“小伙伴”,美国也因此最终顺利地接过了英国的霸权之鞭。这表明,英美权力和平转移,既有来自双方谋求合作共赢的内在需求,也有来自国际体系的结构压力。

4. 同根同源论。英美两国有共同的民主和自由的政治文化,在语言、文明、制度、价值观、信仰等方面具有高度同质性,本质上有天然的亲近感。社会学认为,类群同质性行为体之间发生冲突的等级与烈度,一般要少于类群异质性的行为体。这也契合了西方推崇的“民主和平论”观点,即英美同文同制,更容易产生集体认同,相互之间不会或者难以发生战争,从而更有可能顺利实现权力和平转移。如在 1895 年爆发的委内瑞拉边界危机中,英美相互给予了支持和配合。在 1898 年美西战争爆发后,“欧洲各国舆论,除了英国之外,都指责美国而同情西班牙。”^③ 此时的英国,“在英西友谊和英美友谊中,更看重后者。”^④ 当美国舰队封锁马尼拉湾时,“比美国舰队更为强大”^⑤ 的德国舰队就停泊在此,德美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德国舰队鉴于英国态度而始终不敢轻举妄动。

在 1899 年 10 月至 1902 年 5 月的英布战争中,美国投桃报李,美国也向英国展现出了一个盟国才有的战略合作态度,暗中偏袒英国,进行了密切合作,向英国出口了 20 万头骡子、驴子和成千上万的战靴,“缓解了英国的后勤问题”^⑥,获得了英国朝野好感。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英国国内这种广泛存在的观念,主观上为英美权力和平转移提供了厚实的思想基础。

两次世界大战,美国都站在了英国一边,美英两国都把利益分歧限制在最小范围,本能性地紧密联合在一起,彼此都把对方当成独特合作对象,进行了广泛深入合作。在英美权力转移过程中,尽管存在不情愿之处,但英国更倾向于把英美权力转移视为权力延伸而非霸权更迭。“丘吉尔深信,美利坚帝国是其前身大英帝国的自然进化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其延续。”^⑦ 尽管这种观念有点差强人

① Aaron Friedberg, *The Weary Titan: Britain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lative Decline, 1895-190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68.

② Campbell Charles Sontter, *Anglo-American Understanding, 1898-1903*.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7, p. 21.

③ 王绳祖:《国际关系史》第三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

④ Lester B. Shippee, "Germany and the Spanish-American War".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24-1925, Vol. 30, pp. 754-777.

⑤ [苏] 斯辽兹金:《1898年的美西战争》,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第92页。

⑥ Bradford Perkins, *The Great Rapprochement: English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95-1914*. Atheneum, 1968, p. 94.

⑦ [美] 爱德华多·坎帕内拉:《英国百年来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角色》,参考消息网,2019年11月3日。http://www.cankaoxiaoxi.com/world/20191103/2394482_2.shtml。

意,但对英国来说,面对霸权衰微和“权落谁家”现实窘况,由美国而不是德国或苏联来接过霸权则是最好的结果了。

5. 国际机制论。有学者从国际规范视角出发,认为国际机制在英美权力转移中产生了重要作用。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认为,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有利于降低战争风险和加强合作。^① 英美权力转移过程中,正值世界格局和国际体系深刻嬗变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先后出现了以国际联盟和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组织,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逐步完善,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组织和集体安全机制的全球治理新模式。英美双方在新的国际格局和集体安全机制中,在共同应对风险挑战时加强了互信合作,降低了两国作为友好国家的战争风险,而且双方利益关系也得到了较好的机制性安排。

无论是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还是雅尔塔体系的策划及实行中,英美双方都没有尽全力打压对方,而是有合作也有防备,既让对方较大空间地享受公共产品,也在面对共同威胁和挑战时进行合作应对。查尔斯·杜兰(Charles Doran)考察权力转移导致冲突的原因时,注意到了新霸主为了避免与旧霸主之间的冲突而加以厚待,他认为,“新霸主为了维持新的国际秩序,(对待旧霸主的)合理的做法就是使其拥有合乎其实力与历史相当的角色。”^② 美国作为二战后的新霸主,通过国际组织和集体安全机制,在大国利益分配中较为体面地顾及了英国利益,这种“合理做法”大大缓解英国作为守成国在失去霸权时的恐惧与担心,这就使英国在权力转移过程中,相对顺其自然地把霸权过继给了美国,并且继续享受着一定的传统大国地位。

(二) 文献评析

上述观点各有侧重,但仍有不足之处,并没有全篇幅地展示英美权力转移全过程。在体系变革过程中,作为和平的关键条件与重要法则,体系本身应当保持实力变化与体系结构的动态平衡,包括实力与意图、扮演角色和自身利益的平衡。实际上,英美在权力转移的漫长博弈中,既竞争又合作,既冲突又相惜,既对冲又借重。也许正是由于美国长期采取战略克制,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和商贸,使英国放松了对美国的戒备,并且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互利合作的重要对象,从而使英国集中精力对付挑衅性更强、威胁性更大的德国,而间接默认了美国崛起,并且英美最终也顺利实现了权力和平转移。

历史并没有掩盖另一个真相,即在体系变革与格局转型中,战争是最常见的变革方式,权力转移往往面临严峻的“和平变革的困境”,英美权力转移中,这一方面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和充分。在国际政治发展中,“和平变革的困境”通常归因于守成国。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精辟指出,“如果前景要么是衰落,要么是与一个崛起国家对抗,政治家大多选择打仗。”^③ 在崛起国试图谋求与其实力相对应的利益与地位时,守成国对崛起国的意图及方式十分敏感甚至是恐惧,守成国根植于对霸

① [美] 罗伯特·基欧汉:《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页。

② Charles F. Doran, *The politics of Assimilation, Hegemony and It's Aftermath*, Baltimore, John Hopkins Press, 1971; Charles Doran, “The Power Cycle and Peaceful Change: Assimilation, Equilibrium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in John A. Vasquez et al. Eds., *Beyond Confron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5, pp. 190-199.

③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91.

权的留恋而产生的强力反应和采取的激进措施,往往会由此滑入“修昔底德陷阱”。

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认为,“现实中国际政治从来就是一项残酷而危险的教义,而且可能永远如此……大国的最终目标是成为霸权,即体系中的唯一大国。”^①事实上,“英美之间的权力和平转移,并不意味着美国实现了和平崛起,相反,美国在成为国际秩序主导国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战争。”^②英美权力转移过程中,由于德国等国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引开了英美权力转移时的可能冲突,并且促进了英美战略协同和密切合作,因而间接超越了“和平变革的困境”。^③对于美国来说,经历了多次局部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才接过霸权之鞭。换言之,美国是在战争洗礼中,最终登上霸权宝座的。

然而,历史格局从来都不是单一要素促成的,而是多方面因素同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共同促进了格局的转换。恩格斯曾深刻指出,“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④“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⑤从客观原因来看,美国崛起后所拥有的超强实力是其中的根本因素,“在国际体系中,国家实力的变化引起国际权力结构改变,最终导致权力发生转移。”^⑥斯蒂芬·史本德(Stephen Spender)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形象比喻,“英美虽分享着共同的语言、传统、和文学作品……但两者之间的距离就好像从月亮到地球那么远。”^⑦因此,学界普遍认为,实力变化主要是英美权力转移的原因而非结果。显然,无论权力转移的方式与过程如何,对于有强大实力又有谋取霸权意图的美国,英美之间的权力转移终将成为必然结果。

二、美国迅速崛起与英国实力下降

美国独立后,领土和人口迅速扩展,尤其在內战之后,经济迅速发展并全方位崛起,而英国霸权相对衰落,客观上形成了英美相互战略竞争。

(一)美国快速发展实现和平崛起

美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基本没有历史包袱,在立国之后,通过扩疆拓土、吸引移民、整饬内政、发展农业、工业革命等一系列举措迅速发展强大。美国的领土面积,从立国时的80万平方公里,到十九世纪中叶,增长了12倍之多,成为超大型领土大国。美国人口在十九世纪初只有700万人左右,到十九世纪后半叶,来到美国的移民就多达2700万人。伴随着史诗般的“西进运动”,美国迅速发展

①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序言第11页。

② 韩召颖、袁伟华:《权力转移进程中的国家意志制衡——以1895年英美解决委内瑞拉危机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

③ Jacek Kugler and A.F.Organski, "The Power Transition, A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Evaluation", in Handbook of War Studies I. Unwin Hyman, 1989, p.173.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0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2页。

⑥ 韩召颖、袁伟华:《权力转移进程中的国家意志制衡——以1895年英美解决委内瑞拉危机为例》,《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

⑦ Stephen Spender, *Love-Hate Relations, A Study of Anglo-American Sensibilities*. Hamish Hamilton Ltd, 1974, p.x.

成农业大国,并通过工业革命迅速成为全世界经济实力最强大国家。

不过,一直到19世纪后期,美国军事实力仍比较弱小。在1890年,美国现役部队人数排名世界第14位,只有25000人,排在保加利亚之后,美国海军更是十分弱小,甚至欧洲最弱的意大利海军的人数都是美国海军的8倍,但美国工业实力却是意大利的13倍。^①

表1 19世纪后期英美军事实力比较

	英美两国军人及海军人员数量		英美两国战舰吨位	
	1880年	1900年	1880年	1900年
英国	367000	624000	650000	1065000
美国	34000	96000	169000	333000

资料来源: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Random House, 1988), p.203.

美国在美西战争前后,依托经济实力迅速发展强大军事实力。后来经过一战和二战的良机,通过战时成为“民主国家兵工厂”,打造了世界一流军队,发展了众多盟友,在全球建立了数百个军事基地,彻底补齐了原来欠缺的军事力量及投放的短板,成为美国崛起后赢得霸权的重要支柱。

美国作为一个以欧洲(英国)殖民地基础建立起来的国家,其崛起不是偶然的。总体来看,美国崛起并取代英国成为新霸权国有五大步:第一步是完成领土扩张与大量引入劳动力,第二步是强化科技并大力发展经济,第三步是以经济优势融入英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第四步是逐步建构自己主导的国际机制,第五步是参与世界大战并借机称雄。期间,美国以地域优势采取“拒止战略(门罗主义)”,以高额关税扶持“幼稚产业”,以商业优势构建“太平洋商业帝国(门户开放)”,以军事优势树立“霸权支柱”,以西方国家“领头羊”优势最终确立为国际体系“霸主”。

(二) 英国总体实力持续相对衰落

英国是个老牌帝国主义大国。在1860年前后,英国权力达到相对鼎盛时期,英国人口占欧洲的10%、占世界2%,但其工业生产能力相当于欧洲工业生产潜力的55%—60%,相当于世界工业生产潜力的40%—50%,其中,英国的生铁产量占全球53%,消费的原棉占全球产量50%,煤和褐煤的产量占全球50%。^②同时,英国作为国际体系的霸权国,拥有全球最多、最广、最大的殖民地,成为“日不落帝国”,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遍及全球各地。

但在十九世纪后期起,英国逐渐落后于美、德、日等新兴强国。19世纪80年代,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4.1%,而同期英国只有2.2%;19世纪90年代,英国提高到3.4%,但仍不如美国3.8%。^③在1873—1913年的40年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5.0%,而英国同期仅为1.6%。1885年和1886年,美国先后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份额和世界钢铁生产最大的国家。^④1894年,美国

①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Random House, 1988, p.202-203.

②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Random House, 1988, p.151.

③ 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270页。

④ Pau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Random House, 1988, p.201.

GDP超过了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而作为英国霸权重要支柱的殖民地,由于民族运动蓬勃开展,英帝国内部发生了三次非殖民化运动,最终使殖民体系渐次土崩瓦解,使英国丧失了重要财富来源和强大战略依托,严重削弱了英帝国整体实力,从根本上动摇了英国霸权的根基。维系英国霸权的海军,经过一战和二战后,其优势几乎丧失殆尽,沦为为二流军事强国,衰落之势已无力护持霸权。

三、一战之前的英美战略竞合

美国在内战后迅速发展并进一步成为英国的区域竞争对手和全球竞争对手,双方都最大程度地争取、维护、巩固、拓展自身权益、地缘权益和国际权益,在各个方面都存在战略竞争与彼此打压对手的情况。

(一) 英国对美国的战略打压及调整

英国的国际政治战略战术,历来具有两大显著特点:一是各个击破的分而治之战略,二是见风使舵的离岸均势战略。英国应对美国崛起和国际格局之变,便是这一战略战术的具体写照。

美国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实现独立,刺痛了英国的神经,也动摇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基础。英国利用优势不断打压新独立的美国,英美矛盾不断升级,在1812—1815年,两国发生了第二次战争,英国在战争中受挫后,于1814年12月24日与美国签订《根特和约》,英国再次确认美国的独立地位。因此,英美二次战争也称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

第二次英美战争后,英美之间的敌对状态仍很明显。双方在美加边界大修堡垒,相互持续对峙,英国先后在魁北克、哈利法克斯、安大略等与美国北方接壤地带修建了代价不菲的军事据点,美国为了防止英国入侵,也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和财力予以应对。在1861—1865年美国内战期间,英国积极支持美国南方政权对抗美国北方联邦政府打内战,不仅“出售”军舰“阿拉巴马号”等给南方政权,还俘获和击毁150多艘北方商船等船舶,给美国造成损失约21.25亿美元。在1872年9月的仲裁中,英国给美国1550万美元的赔偿金^①,才结束了两国在这一事情上长达七年的吵闹和争执。

1871年5月,英美通过《友好解决两国分歧的条约》,把有争议的圣胡安岛划归美国,解决了历史遗留的所有领土争议问题,两国各自从边界撤军,加强了战略信任度和军事透明度,有效消除了安全困境和合作障碍,“产生了一种互不使用武力的军事预期”^②,为之后两国解决利益分歧和相互密切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两国关系发展过程中,英国逐渐默认了美国在美洲的支配权,美国也逐渐承认了英国在美洲之外的势力范围。标志性事件是发生于1895—1899年的委内瑞拉“尚伯克线”的边界纠纷,面对美国总统克里夫兰威胁要“动用一切手段”和自身陷入布尔战争之中的英国,不得不把战略重心放在欧洲而对美国作出一定让步。1899年10月,在美国国会作出了有利于英国的边界仲裁的同时,英国也报以大礼,决定撤出在西半球的英国海军力量。^③英国的这一举动,在事实上等于承认了美国的美洲

^① *Milestones in the History of U.S. Foreign Relations*, office of the history, Milestones 1866-1898. <https://history.state.gov/milestones/1866-1898>.

^②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Security Community*. New University York, Cambridge Press, 1998, p. 208.

^③ U.S. Department of State, "Venezuela Boundary Dispute, 1895-1899", <http://history.state.gov/milestones/1866-1898>.

势力范围,英国希望以此换取美国在英国外交和欧洲事务上的善意中立,并且默认英国在美洲之外的霸权地位。不过,英国在这一事件的妥协与合作,并没有使美国止步于美洲霸权,美国不再遮遮掩掩觊觎世界霸权宝座,这一事件与1898年4月发生的美西战争,一同构成了美国摆脱孤立主义、拉开海外扩张与争夺世界霸权大幕的重要标志。

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期,由于德国统一并迅速崛起引起欧洲局势剧变。与德国崛起后直接挑战英国霸权所不同的是,远在美洲大陆的美国,在政治上采取“孤立主义”政策而没有直接挑战英国霸权。面对愈发咄咄逼人的德国及美国的相对“示弱”,英国不得不集中精力对付德国,最终选择了与美国部分和解。^①英国逐步调整了对美战略,转而采取“平衡浆”的传统均势战略。一方面,英国积极团结并安抚盟友,先后分别与法、日、俄签署了英法条约(1898年)、英日条约(1902年)、英俄条约(1905年),以形成联盟优势,强化英国的战略地位。另一方面,英国由十九世纪前期的对美敌对、打压与遏制战略,在十九世纪后期以后,逐步转向战略防范与竞争合作的战略,以既打又拉的方式,试图把美国拉入自己阵营,以此维持英国的国家利益和霸权地位。

二十世纪初,英国越来越深陷欧洲局势泥潭,不得不全力应对以德国等国引起的欧洲秩序之变。远在欧洲之外的美国,作为新崛起的世界经济第一大国,成为影响欧洲局势的关键国家。由此,英国调整了对美政策,由原来的战略防范逐渐转变为战略借重,一方面,英国不断委曲求全地呼应美国日益增多的国际利益诉求,另一方面,英国仍利用自身优势,在某些领域仍对美国保持一定的打压态势,从而竭力维护英国摇摇欲坠的霸权地位。历史证明,英国对美国的认知转变与政策调整,符合英国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当然,这显然不是英国自愿地主动地与美国和解,而是一种需要仰仗美国“输血”和“保护”的被动的“痛苦选择”^②,但这在客观上为英美相互合作与权力和平转移作了厚实铺垫。

(二)美国对英国的战略应对

纵观美国立国后的对外战略,主要有三大特征:一是间接利用他国“打头阵”来分食利益,二是直接与他国“掰手腕”来争抢利益,三是强硬出手“打出头鸟”来控制利益。这三大特征,始终贯穿于英美权力转移的整个过程中,并且一直延伸到了美国成为霸权国之后的系列对外战略与外交行动中。

1. 以“门罗主义”逐步把英国排挤出美洲。为了拒止和打压英国在美洲的势力范围,把英国和欧洲列强势力挤出美洲,强化美国在美洲的政治经济根基及势力范围,1823年12月,美国提出了“门罗主义”,这是美国在局部范围与英国战略竞争及打压英国海外扩张的一个初始尝试。1836年3月,得克萨斯经过战争后从墨西哥独立出来,成立共和国,随后不久举行公民投票,同意并入美国。为了阻止得克萨斯并入美国,牵制美国领土的急剧扩展,英国迅速接近得克萨斯,希望与之结盟。美国为了反制英国与得克萨斯结盟,于1836年首次实际行使了“门罗主义”政策,并最终把德克萨斯并入美国版图。此后,1852年,美国以“门罗主义”为借口,将西班牙人强行逐出古巴;1895年,美国又以“门

^① Fareed Zakariah,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78.

^② Aaron Friedberg, *The Weary Titan: Britain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lative Decline, 1895-1905*,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88.

罗主义”为由,迫使英国让步以解决委内瑞拉边界危机;1898年,美国又在“门罗主义”的幌子下,通过美西战争,夺取了古巴、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以及夏威夷群岛,拉开了地理上的全球扩张大幕,使得美国势力从美洲扩大到了亚洲及其他地区。自此,最初的“门罗主义”演变成美国扩张与霸权的工具,其涵义经历了“不要来做什么”→“不要干涉我做什么”→“承认我做了什么”→“认可我是什么”的升级演变。

2. 以商业优势提出“太平洋商业帝国”构想。十九世纪中期,美国基本完成了北美大陆的扩张,英国在美洲还控制着加拿大,但对美国已难以构成威胁。美国根据自身实力及与欧洲列强关系,开始把自己当成一个大国参与国际事务,有了更多的独立性政策和主张。然而,此时英国经济仍高度繁荣,是不折不扣的商业强国和海上霸主,因此,美国在战略上采取了半追随英国的策略,借助英国的霸权与影响力,以相对克制的方式,与英国展开全球合作与竞争。在19世纪50年代末,美国国会参议员、辉格党领袖威廉·亨利·西沃德(后来任职林肯政府国务卿)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太平洋商业帝国”构想。西沃德认识到,美国与欧洲尤其是英国的竞争不可避免,但他同时认为,“美国并不惧怕英国,它将依靠工业发展和技术创新与英国决一雌雄,获取未来世界商业霸权。”^①西沃德主张以商业贸易而非征服战争来进行扩张,他认为,“政治优势的获得是在商业优势确立之后。”^②在此基础上,针对远东对华问题,美国于1861年提出了“合作政策”,主张“贸易自由”和“保全中国”,以合作性态度谋求全球范围利益。这表明英国霸权影响力甚大,而美国还羽翼未丰,但美国已在战略上表现出了一定的独立性。这些都为后来美国推出“门户开放”政策奠定了基础。

3. 以“门户开放”方式蚕食英国霸权利益。1899年,针对自己在中国和远东地区的利益发展,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这是继“门罗主义”之后,美国提出的又一影响深远的重要政策。英国为了获得其他列强在中国势力范围的利益,除了把九龙排除在“门户开放”之外,原则上同意了美国的“门户开放”要求。此后,美国很快将“门户开放”原则拓展到拉美市场、欧洲和英帝国实力范围,并通过欧洲列强紧张的军事对峙进行军火贸易而使贸易盈余大增。“到一战前夕,美国的黄金储备就已经超过了英格兰银行,控制了世界官方黄金储备的三分之一。”^③在一战后,美国进一步推进“门户开放”原则国际化,对英、法、比等国软硬兼施,在近东和非洲的委任统治区域贯彻“门户开放”原则,在1922-1923年的洛桑会议上,美国又取得与欧洲列强同等进入黑海并获得土耳其资源的权利,通过《九国公约》拓展在远东门户开放的利益,还以战债谈判问题相要挟的方式,逼迫英国等国在东欧同意实行门户开放。^④作为后起大国的美国,以“机会均等”为旗帜,“以经济开放和公平贸易为突破口,寻求一条在当时国际权力格局下符合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成长路径。”^⑤从后续发展看,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处于崛起过程中对外战略的“总方针”,既有利于美国谋取全球商业利益,又避免了与英国霸权及欧洲列强直接对冲,是美国崛起与谋取霸权过程中的预备性全球性“大战略”。

① 王静:《威廉·亨利·西沃德“太平洋商业帝国”思想评析》,《历史教学》2013年第22期。

② Ernest N. Paolino, *The foundations of the American Empire: William Henry Seward and U.S. Foreign Policy*, Cornell University, 1973, pp. 26-39.

③ Marcello De Cecco, *The International Gold Standard: Money and Empire*, St. Martin's Press, 1984, p. 121.

④ 王立新:《超越凡尔赛:美国共和党政府的国际秩序思想及其对欧洲稳定与安全的追求(1921—1929)》,《世界历史》2015年第1期。

⑤ [美] 克里斯托弗·莱恩:《和平的幻想:1940年以来的美国大战略》,孙建中译,第48页。

四、一战二战之间：英美战略竞合与相互打压

一战与二战,是英美霸权转换的关键时期。两次世界大战,英国元气大伤,美国顺势崛起,两国在国际体系中权力角色迅速完成了关键性转换。

(一)一战期间英美战略竞合

1914年7月,一战爆发。美国最初并没参战,但英美两国围绕海上政策展开了一番较量。在一战前的1909年2月,各有关国家制定了海战规则的《伦敦宣言》,但英国认为过于维护中立国利益并有利于同盟国,却不利于英国发挥海上强国优势,因此早在1911年英国议会就拒绝批准。一战爆发后,美国的友谊和后勤供应都具有很大军事价值,英国不得不根据美国意见三次修改《伦敦宣言》,表面上接受美国提出的“海洋自由”提议,但实际上并没有作出让步,仍然利用自己的优势进行了海上封锁,两国争论最后“以美国的妥协告终”。^①但美国始终对英国的海上封锁耿耿于怀,此后两年间,英美关系围绕海上封锁问题不时呈现紧张状态,1916年10月21日,美国在给英国的一份照会中,抨击封锁是“无效的、非法的和无防御力的”^②,不过两国关系始终没有破裂,两国贸易也基本没有受到影响。

随着战局发展,1917年4月,美国加入英国一边参战,在欧洲先后投入了200万军队和大量战备物资。然而,美国不是以“协约国”身份参战,而是以“共同作战国”参战,因而很大程度保留了独立的政治立场和行动自由。美国参战的理由,一方面是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不断多次击沉美国商船,另一方面主要是得知了德国外交大臣齐默尔曼发给驻墨西哥大使的密电,柏林提议:如果美国宣战,墨西哥就加入德国一方,其回报是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这一密电危及到美国重大核心利益,重重地刺激了美国的神经,不久后美国宣布参战,英美两国克服了众多分歧,进行了较好的战时合作,最后于1918年11月击败了德国及同盟国。一战中,美国给英国的支持力度相对最大,战时英国所欠美国债务高达200多亿美元,这一情况,一方面反映了英国霸权衰微与实力不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美国已拥有强大实力。

(二)一战后的英美战略竞合

一战后,美国从昔日无足轻重的国家,一举成为影响欧洲命运的重要因素。随着德国被击败,对全球利益和世界霸权的争夺,使英美矛盾又显露出来,美国为了争夺权力并确立霸权合法性,尝试利用自己经济优势和地缘优势,以非军事非领土的方式出手削弱英国霸权,并以规范化、一体化和组织化来确立自己的霸权。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美国提出公开外交、航海自由、裁减军备、民族自决、贸易平等和建立国联等“十四点计划”,对英国尤为不利,英国利用自身尚存优势并联合法国等国,对美国提出的主张进行打压,使美国在巴黎和会上几乎一无所获。

然而,美国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仍然与英国展开相互打压的周旋。除了对于战后秩序安排和利益分割的争斗外,美国还把目光瞄准了英日同盟。1902年形成的英日同盟,最初以共同反俄为目标,在后来的发展中,英日相互为依托,转变为制俄、反德和部分反美,从而引起了美国的不快和不安。1921年12月,在美国的积极运作下,美、英、法、日签署《四国条约》,美国以体面的方式埋葬了英国倚重的

① 郑雪飞:《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的英美伦敦宣言之争》,《史学月刊》2001年第4期。

② Stephen Gwynn, ed., *The Letters and Friendships of Sir Cecil Spring Rice: a record*. Constable, 1929, 2V, Vol. 2, p. 308.

英日同盟。

美国还积极瞄准海军这一英国霸权关键。在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美国通过《五国海军军备条约》,确定五国海军主力舰吨位比例为5:5:3:1.75:1.75^①,美国终于成功终结英国海上霸权,取得了与英国同等的海上地位。与此同时,英美也在某些问题上进行战略合作。1923年1月,在法国出兵十万占领德国鲁尔区后,为了掌握德国赔款问题的主动权,英美两国联手推出“道威斯计划”进行干预。为了平衡法国在欧洲独大,美国支持了英国让德国加入国联的提议;在1930年的五国海军会议上,英美又联手打压日本海军扩军意图,确定英美日的重型巡洋舰比例为18:15:12艘,对日本海军发展形成了一定牵制。

后来,随着英国经济实力的恢复,英国又欲谋求对美国海军的辅助舰只优势,使恼火的美国军方一度将英国视为“危险的敌人”和“我们最可能的敌手”,甚至拟定了“赤-橙色”战争计划。^②此举引发了英国的危机感,招致英国激烈反应,当时的外交大臣奥斯丁·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表示,“如果英国还想强行保有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海上)权利,那么英美敌对不仅是可以想象的,而且也是很有可能的。”^③后来经过反复协商,1930年1月在伦敦召开的裁减海军军备会议上,美国达到了与英国海军总体实力大体平等的目标,基本实现了美英海上共治的局面。

总体上来看,此时美国国内仍然有很强的孤立主义思想,加上美国在经济上有强大的自给自足能力,对世界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美国尚未做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新霸主的准备。美国在构想世界秩序的同时,主要是着力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并没有对英国霸权进行取而代之的对抗行动。在一战与二战之间,实力削弱的英国无力再主导全球事务,而全球实力最强的美国却不愿意承担全球领导责任,导致出现“金德尔伯格陷阱”,引发席卷全球的经济“大萧条”,“最终导致了三十年代后期和平的终结”^④,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

五、二战及二战后:美国弹压英国并持续巩固霸权

二战是英美权力转移的转折点,也是美国站上世界霸权之巅的转折点,英美两国战略竞合的方式也彻底发生了逆转,美国主导英美关系发展格局从此形成。

(一) 二战期间美国对英国的战略挤压与英国的反弹

二战爆发后,英国除了联合法、苏等国奋起对抗德意日法西斯之外,再次把求助的目光转向了大洋彼岸的强大美国。此前一直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面对德国可能称霸欧洲的形势,也不得不加强与英国合作。1941年3月,美国实施了《租借法案》,开始大量援助英国战备物资以抗击德国侵略,初步确立“大西洋第一”的战略,随着局势发展,美英加强了合作并形成战时同盟共同抗击德国。1941年8月,英美两国发表《大西洋宪章》,“终结了战前英美互相承认各自势力范围的机制”^⑤,明确了合

①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17世纪中叶—1945年)》,北京:法律出版社,1986年,第340页。

② [美]马克·施托勒:《盟友和对手——解读美国大战略》,王振西主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0页。

③ Alan P. Dobson,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f Friendship, Conflict and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Superpowers*, Routledge, 1995, p. 61.

④ Armin Rappaport, *A History of American Diplomacy*, Macmillan Publishing House, 1975, p. 298.

⑤ 潘兴明:《英美霸权转移的历史考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作击败法西斯的决心,美国从此摆脱了孤立主义,全方位参与世界事务,由此也成为英美权力和平交接的标志。1942年1月,美英苏中等26国在华盛顿共同发表《联合国宣言》,正式形成世界反法西斯的正义大联盟。总体来说,英美两国尽管有意见分歧,但在整个二战中配合密切,不仅形成了强有力联合力量,两国特殊关系也得到提升。

然而,面对强大的美国,衰落的英国常常处于战略竞争的下风。美国利用英国迫切需要美国参战心态,在目标上不只是要击垮德意日法西斯,而且不择手段地逐步刨去英国霸权根基,加速从孱弱的英国手中接过霸主地位。1941年8月英美签署的《大西洋宪章》,其中有一条重要条款,“尊重所有人民选择在其管辖下生活的政府形式的权利”^①,实际上就是威尔逊总统曾在凡尔赛会议上提出的“十四点计划”之一的“民族自决”原则,这既使美国站在了国际道义的高度,又从根本上动摇了大英帝国的根基。

不仅如此,战时的美国已经开始做出称霸世界的战略安排了,在酝酿建立联合国之外,美国国务院和外交关系委员会还秘密制定了“宏大地区”(The Grand Area)战略,囊括了西欧、西半球、远东、中东,这其中把英国及英帝国包括在内,甚至提出,“在可能的情况下,包括整个世界”,在功能划分上,第三世界将成为“原料产地和市场”,工业化国家则作为“伟大的工场”。^②显然,“宏大地区”就是美国决心成为新霸主的战略蓝图。

为了尽力保持英帝国及殖民地利益的丘吉尔首相,在1943年德黑兰会议间隙发牢骚声称,“英国虽不想要到任何新的领土或基地,但打算保持他们原来所有的一切,不通过战争,就不能从英国夺取任何东西。”^③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在迂回作战还是正面作战的问题上,由于英国在非洲有巨大的殖民利益,因而在战争初期力主开辟了北非战场,而美国因为源源不断地投入巨大的军力、物力和财力,很快牢牢掌握了盟军指挥权和决策权,因而在战争的中后期力主直接在西欧登陆展开正面决战,并且借机派遣军事使团直接插手中东的伊朗和埃及等英国传统势力范围的防务和管理,在远东和中国,美国也对英国进行了大力排挤。

尤其是关于战后国际秩序的安排问题,美国已经把自己置于主导地位来创建并主导战后的国际秩序,而英国试图力保原有的帝国利益。英国不愿霸权落入骄横蛮争的德国,也不愿落入意识形态不同的强大苏联,宁愿霸权落入友好得多的盟友美国,并且英国仍力争保留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美国则希望在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新秩序中,英国成为跟班和铁杆盟友,确保西方阵营团结对抗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此同时,英国则希望在战后建立西半球、亚太地区和欧洲不同区域的国际组织,一度还幻想以西欧盟主身份整合西欧成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第三极力量,以此对冲美苏和新的联合国,最大化地维护英联邦和殖民地利益,继续尽可能多地发挥自己的传统影响力。

二战英美权力转移的关键转折点。二战的爆发,实际上主要是大国争霸的产物,在战争期间,美苏英中等国发起反法西斯的正义大联盟,对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美国参战的动机却是多方面的,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曾指出,“美国并非为了世界和平而参战,它是为了阻止一个危险的敌人获得地区霸权而战,和平只是这些努力受欢

① "The Atlantic Charter", August 14, 1941,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live/official_texts_16912.ntm.

② 潘兴明:《英美霸权的历史考察》,《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③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六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289、290页。

迎的副产品。”^①在二战期间,英美两国成为战时盟国,两国除在共同反法西斯的战略目标一致之外,在其他领域仍存在利益分歧,仍然为了各自国家利益而展开战略竞逐。在两国的联盟战略决策中,美国大多数政府和军中精英人士对英国的战略心存疑虑,认为英国背后的目标是想保存大英帝国,而英国人则认为美国的方案不值一提,坚持竭力固守自己的战略目标。^②

(二)二战后英国维护自身利益与美国巩固霸权的多维较量

二战硝烟刚散去,英国首相艾德礼就致信美国总统杜鲁门,表示两国合作应该坚持下去,并且显示出了欲与美国共同合作主导世界的意图,“世界和平最终取决于英美广泛合作”。^③此时英国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借助美国实力、地位与影响力,共同维护西方世界的主导地位,防止自身实力与影响力的持续下滑,并且通过分担遏制苏联等国际义务,继续“证明其作为世界大国的标志。”^④在英国的配合下,美国成为新霸主,成为对抗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羊;而在美国的默许甚至支持下,英帝国转换为英联邦,避免了彻底覆灭的命运,并且打出了“三环外交”的旗帜。英国剑桥大学著名史学教授戴维·雷诺兹(David Reynolds)认为,“在维护两国作为公认大国的合作框架内,英美都在设法夺取优势和有利地位,这的确是一种竞争性的合作关系。”^⑤英美在二战时发展起来的特殊关系,使英国在战后继续成为重要盟友,但也是长期被美国全球战略绑架的盟友。

二战后,英国社会千疮百孔,经济严重削弱。随着美国停止了租借法案,英国失去了“输血”来源,旋即处于财政危机之中,“英镑收支差额是英国黄金加美元总储备的七倍。”^⑥美国利用自己在经贸和金融方面的巨大优势,使美元完全地代替了英镑的国际结算主导地位,“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央银行”。^⑦世界金融中心从伦敦无可逆转地转向了纽约。

由于英美实力的巨大差异,即使在个别领域的利益问题上,英国也无能与美国争锋。面对英国无可挽回的颓势,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明确认为,“我们不能以自己的财力管理半个世界。”^⑧“美国在世界事务及其生活的各个方面开始了一项帝国主义事业……英国充其量只是一个地位较低的合作伙伴,而美国的经济资源和陆海军力量则位于中心。”^⑨斯蒂文·斯宾达(Stephen Spender)认为,“英美虽分享着共同的语言、传统和文学作品……但两者之间的距离就好像从月亮到地球那么远。”^⑩随着美苏两极对抗的明朗化,英国只能依赖美国来有限分享国际权力,丘吉尔本人也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美国人身上”^⑪,美国利用对英国带有政治附加条件的援助,不断地从英国霸权身上“撸羊毛”,大

①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第368页。

② Steve Weiss, *Allies in Conflict Anglo-American Strategic Negotiations, 1938-1944*, Macmillan Press Ltd, 1996, p.49.

③ Ritchie Owendale, *British defence policy since 1945*,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9.

④ Ronald Hyam, *The labor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 1945-1951* (Vol.I), HMSO, 1992, p.xxiii.

⑤ David Reynolds, *The Creation of the Anglo-American Alliance, 1937-1941*, Europa Publications, 1981, p.294.

⑥ P J Cain, A G Hopkins. *British imperialism: crisis and deconstruction 1914-1990*. London and Longman, 1993, p.270.

⑦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七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29页。

⑧ W R Louis, *The dissolu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 J M Brown, W R Louis,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 IV),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331.

⑨ 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300页。

⑩ Stephen Spender, *Love-Hate Relations, A Study of Anglo-American Sensibilities* (Hamish Hmlton Ltd, 1974) p.x.

⑪ [美]威廉·哈代·麦克尼尔:《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与冲突,1941—1946年》上卷,叶佐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501页。

力挤压英国的国际权力和利益,以致丘吉尔的私人秘书卡尔维利也认为英国是在“有条件的投降”。^①

(三)英国主动“撂担子”并提出“三环外交”

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认为,原有的霸权国在面对崛起强挑战时,通常有三种基本策略:第一,发动预防性战争,“消灭或削弱新兴的挑战者”;第二,通过进一步扩张来寻求减少保持其地位的成本;第三,减少或放弃所承担的国际义务,“与威胁性较小的国家结盟或寻求和睦关系”,或者让新兴大国“分担维持现状的好处,换取其分担维持现状的成本”。^②在二战后,英国薄弱的经济、羸弱的军力、孱弱的政治,无力维持占领德国所需的经济 and 军力支援,以及维持在地中海、中东势力范围,为了阻止希腊共产党获胜而在欧洲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并且为了“从美国那里获得比其他各国更多的援助”^③,英国不得不把希腊和土耳其的“担子”移交给美国,“这也是英国接近美国的最好途径”^④。英国在应对德国的两次挑战后,再也无力通过第二种方式来维持霸权,只有通过第三种方式来最大限度地维护英国的国家利益了。

英国作为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尽管其国际威望和国际地位已经风光不再,但仍然多方面极力挽救和维护英国利益。1948年10月,丘吉尔提出著名的“三环外交”:第一环是英联邦和英帝国及其所包括的一切,第二环是英、美、加等英语世界,第三环是联合起来的欧洲,英国在这环环相扣的三环中都居于核心角色。与此同时,英国不仅极力想保留遍布全球的殖民地,还想法设法尽可能地留存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一方面最大限度地挽留英国作为大国的地位和荣耀,另一方面也臆想,“在任何英美协商中可用来进行讨价还价的重要筹码”^⑤。“三环外交”作为战后英国秉持的全球战略,为英国促进本国利益、发挥大国作用、维护西方价值体系,提供了一种现实途径。

(四)美国对英国霸权的最后一击

二战后,英国在中东仍有大量驻军并竭力维护这个英国全球霸权的最后一块堡垒。早在1882年,英国炮轰亚历山大港口之后,英国势力就进入埃及和伊朗,一战后,英国势力遍布埃及、伊期、苏丹、约旦、伊拉克、利比亚、塞浦路斯,二战期间英国又把势力范围拓展到叙利亚和黎巴嫩,战后初期,英国在中东经常性地派驻了二十多万军队。二战后,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反殖民主义运动,不仅使英国在中东一再败退,同时,美国一方面利用英国进入中东,另一方面不断利用当地反英运动对英国落井下石,极力排挤、削弱、打压英国在中东的势力。

英国为了继续保持在中东的主导地位,维护英国大国地位,把埃及和苏伊士运河作为中东防务的核心,认为苏伊士运河“对英帝国而言生死攸关”^⑥,不仅有利于继续控制中东,还具有在战时遏制苏联的军事价值,“以中东为基地直接攻击苏联乌克兰工业带与高加索石油。”^⑦

美国在二战后初期没有很重视中东,而是把战略重点放在复兴欧洲和遏制苏联上,所以支持以

^① B.J.C.Mckercher, *Transition of Power: Britain's Loss of Global Pre-eminence to the United States, 1930-194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301.

^②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191-193.

^③ John Baylis,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1939: the Enduring Alliance*,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7, p.47.

^④ Robert Frazier,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with Greece, the Coming of the Cold War, 1942-1947*, Macmillan Press, 1991, p.120.

^⑤ John Baylis,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1939: the Enduring Alliance*,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7, p.47.

^⑥ John Kent, *Egypt and the defence of the Middle East (Vol.I)*, The Stationery Office, 1998, p.7.

^⑦ John Darwin, *Britain and the decolonization: the retreat from empire in the post-war world*, St.Martin's Press, 1988, p.112.

英国为主继续控制中东。在英国撮合下,伊拉克、土耳其在巴格达签订了防务条约。然而,随着全世界和中东的民族运动高涨,加上英国在中东的排他性政策引起美国的不满,美国逐渐改变了把西方抽象性利益摆在首位的态度,调整了中东防务战略,建立了以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土耳其为核心的防务体系,却把英国高度重视的埃及撂在一边。^①英国继续在中东推行冒险政策,当埃及宣布对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时,1956年7月,英国决定孤注一掷,绕过美国迅速控制了苏伊士运河。美国反应十分激烈,艾森豪威尔迅速给艾登打电话,“安东尼,你是不是疯了?你欺骗我。”^②显然,美国不会为了英国而失去整个阿拉伯世界。^③当军事行动导致石油供应问题重重,英镑地位也摇摇欲坠时,美国没有及时接济英国,“拒绝为英国提供石油,也不肯解救英镑危机。”^④失去美国支持的英国,不得不无条件打退堂鼓。

1957年1月,美国提出了针对中东的“艾森豪威尔主义”,通过“经济援助和军事合作计划”,“每年向该地区提供两亿美元援助,并在必要时使用美国军队”^⑤,标志着美国明确剑指中东,正式谋求挤走英国并取代英国在中东的霸主地位。此后,英国这头“衰老的狮子”不得不调整外交战略与政策,承认美国战略优先的地位,放弃在美苏之外以英联邦为核心建立第三极势力的目标,成为美国霸权身后的小伙伴。1967年,英国最终完全从苏伊士运河东岸撤军,退出了主导中东的历史舞台,而美国全盘接管了中东主导权,完成了对英国霸权的最后一击,英美权力转移至此最终得以完成。

六、英美权力和平转移的启示

从历史维度来看,英美两国总体上经历了英强美弱、实力相持、英弱美强的三个阶段。在每一阶段,英美在寻求互利合作的同时,两国始终都存在战略竞争与相互打压对手。英美权力转移的百年博弈过程表明,权力转移既有各自国内经济发展与政策调整的原因,也有时代发展和国际格局变革的原因,从历史经验来看,至少有四方面启示。

(一) 启示之一: 权力转移有曲折性也有必然性

实力是权力格局变化的核心要素,由于实力累积和身份改变是渐进性的,崛起国通常需要数十年甚至更长时期,才能实现实力累积并强大自身,身份认同与身份改变则需要更长时间,除非突然爆发决定性战争。因此,守成国通常有较多时间来打压崛起国,无论对手来自什么阵营,只要实力和条件允许,守成国会设法强大自身的同时寻求打压对手。查尔斯·杜兰(Charles Doran)认为,“那些实力处于上升阶段的国家没有理由去发动战争,相反,那些实力已经达到最高峰的国家,会担心未来不

^①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54,Vol.IX,Part.I),Washington 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6,p.384.

^② Elizabeth Monroe,*Britain's moment in the Middle East,1914-1971*,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1, p.209.

^③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Vol.XVI),Washington 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90,p.910.

^④ 刘明周:《霸权转移中的大国心态调整——以二战后英美在中东的权力交接为例》,《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⑤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urrent documents* 1957,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1,pp.784-790.

属于自己而发动预防性战争。”^① 守成国对崛起国的打压是权力转移曲折性的主要原因。

然而,由于崛起国比守成国通常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国力”和“国势”上都比守成国有更明显的发展潜力,因而权力转移具有历史必然性。只不过,由于守成国的自我调节与自我发展仍具有相当大的空间,权力转移的过程可能会拉得更长。此外,国际格局变化影响权力转移,国际格局失序会分散守成国对崛起国的警惕性关注与打压,崛起国的战略克制与隐忍发展,有助于“降低两者间的竞争烈度”^②,反之,来自守成国的反作用力愈大甚至打压成功。

(二) 启示之二: 打压对手的相对性与强大自身的绝对性

对于打压对手与强大自身两个方面,可分为三个方面来认知:一是刻意打压对手而疏于强大自身,二是刻意打压对手并兼顾强大自身,三是不刻意打压对手而注重强大自身。打压对手需要同时具有三个条件:其一,能明确确定对手身份;其二,具有打压对手意愿;其三,拥有打压对手实力。英美在权力转移过程中,守成国英国对崛起国美国的态度,首先是难以明确确定美国为对手,相反,更容易确定崛起国德国为对手;其次,随着时局发展,英国越来越失去打压美国的强烈意愿;再次,英国也愈发不具有打压美国的绝对实力。

与此同时,强大自身也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其一,具有良好的地缘资源、人口等基础条件;二是国内条件和制度能支持经济持续较快发展;三是地缘环境和国际秩序友好且能互联互通。从英美对比来看,英国的地缘、领土、人口、资源方面都无法和美国相比,尽管都注重强大自身,但显然不是一个量级上的强大自身,英国变成了中等强国,而美国则成为巨型大国。在大国竞争中,打压对手与强大自身通常是相辅相成的,其中强大自身是谋求权力与利益的最根本途径。打压对手的目的是保持自身强大或保持优势,但通常只能在某些领域或某个时候暂时性削弱对手,绝对性地强大自身才是保持持久优势之道。

(三) 启示之三: 大国间战略竞争与互利合作同时存在

从国际政治常态来看,竞争是本质,合作是需要,竞争中兼有合作,合作中含有竞争,有共同利益不意味着合作,有合作也并不意味着和平。罗伯特·吉尔平认为,合作本质上是“相互的,但又不平等的依赖关系。”^③ 相互合作是需求互补,能弥合短板,聚集能量,节约成本,扩大优势,应对挑战,达到共赢。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合作是对潜在冲突的管理。”^④ 因此,打压对手并不意味着不会相互合作,相互合作并不意味着消弭了战略竞争,目标都是为了促进或保持自身强大。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认为,“合作不应该被视为没有冲突的状态,而应该被视为对冲突或潜在冲突的反应。”^⑤ 由于国家发展的不平衡,使国家间围绕权力与利益进行合作与竞争,甚至可能不惜损害他国核心利益来谋求特定目标,以建构并维护对自身有利的国际秩序。

英美权力转移的百年博弈历史表明,无论是否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守成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始终存在,对权益的追求是建构或解构彼此战略意图的关键要素。守成国与崛起国的关系特

① Charles F.Doran, *System in Cri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80.

② A.F.K.Organski, *World Politics*, Alfred A.Knopf Inc, 1968, p.123.

③ [英] 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第24页。

④ 孙杰:《不对称合作:理解国际关系的一个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9期。

⑤ [美]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信强、何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3页。

征,所体现的主要是建构效应而非因果效应,两者相互依赖有助于权力和平转移,并有助于机制性权益安排。“全球性权力的和平转移,霸权国与新兴大国之间不仅是权力竞争,也是认同竞争;不仅是权力的转换,更是认同的转换。”^① 英美权力转移过程中,双边关系的反转十分明显,即从最初的敌对到后来的对抗、竞争、合作,再到发展成“特殊关系”的亲密盟友,两国关系发展经历了过山车一样的变化。国际合作的收益并不均衡,为了谋求和平与共赢,必然促使非合作博弈向合作博弈转向,从“零和博弈”向“正和博弈”转向,并在进程中改变双方的身份和关系结构,达到合作共赢的状态与目的。

(四) 启示之四: 不断强大自身和勇于斗争是反制打压的双重法宝

美国在崛起过程中,尽管保持了相对战略克制,但在面对英国的“花式打压”时,美国坚持了两手策略,一方面是采取措施强化综合实力以强大自身,以经贸优势的全球主义对抗英国殖民优势的大陆主义,另一方面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稳步推进升级自己以实现降级对方的策略。应该说,美国的“双面策略”都收到了良好效果,迫使英国不得不逐渐调整对美遏制与打压的政策,转而实行以合作和竞争为主的政策。

马克思曾指出,“在搏斗中,问题不在于敌人是否高尚,是否旗鼓相当,是否有趣,问题在于给敌人以打击。”^② 当守成国越来越难以用军事手段来推行霸权主义外交政策时,一方面会更加警惕性地强化军事力量作为杀手锏手段来打压对手,另一方面也会更加反思性地加强经济实力来强大自身。然而,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从现实状况来看,这两者都有着明确边界,前者的边界在于毁灭对手也会毁灭自身,后者的边界在于自身经济实力是否被对手超越。英美权力转移过程经验表明,在前者上,英国不具有吊打美国的能力而美国则具有吊打英国的能力,在后者上,英国经济实力和潜力从十九世纪末起就已无法比肩美国。马克思曾指出,“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的是世界历史性的错误,而不是个人的错误。因而旧制度的灭亡也是悲剧性的。”^③ 历史经验一再表明,大国间在进行战略竞争的同时,甚至在激烈对抗之后,也通常呈现出良性的互利合作关系。

(五) 启示之五: 互利合作可促进长远权益持续共享

权益共享是互利合作的客观特性,有利于保持和促进国家间的非对称平衡,同时也约束了国家间的对抗与冲突,这也成为英美权力和平转换的一个重要原因。英美之间的权益共享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各自产品权益共享。英国是老牌帝国主义,有发达的近现代工业和科教文化产业,也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第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霸权国;美国是后起之秀,在经济、金融、科技、军事、政治与教育等领域都雄冠全球,位置又远在欧洲之外。此外,英美两国同宗、同源、同文、同种、同制,双方都有可供对方共享的自身权益产品,彼此容易形成优势互补关系。二是集体产品权益共享。这种集体产品主要是“朋友”互助式相互建构的。美国内战后,两国相互关系的身份认知由“敌人”逐步向“对手”“朋友”“盟友”转变,直至二战后建立起了“美英一致”的“特殊伙伴”关系,双方不仅在战略上相互配合,在经济上相互融合,在对外政策与行动上也相互战略借重,以达到单凭自身难以达到的目标。三是公共产品权益共享。英美同属盎格鲁-撒格逊体系,先后成为全球霸权国,两国利

① 封永平:《认同变迁:英美权力的和平转移》,《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3期。

②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2页。

③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3页。

用数百年来的全球影响力,成功将自身的优势集体产品英语推动为全球通用语言,形成对自身极为有利的国际公共产品,同时还与其他西方国家一道,按照西方价值观,建构起了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从而支配性地共享这种公共产品带来的诸多权益。

英美历经百余年战略博弈,最后美国以渐进性战略成功崛起并取代英国成为国际秩序的新主导国。英美权力和平转移的背后原因,主要有实力决定论、战略克制论、德国掣肘论、同根同源论和国际机制论,其中,英美实力逆转是其根本原因,美国战略克制是重要原因。英美两国间权力和平转移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既在互利合作中谋求强大自身,也在战略竞争中伺机打压对手,尽管两国并没有直接爆发争霸战争,然而美国成为新霸权国却没有绕过战争,先后通过几次局部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在战争的洗礼中,才成功从英国手中接过了世界霸权之鞭。因此,从英美权力转移的过程和结果来看,国际权力转移要克服“和平变革困境”,至少要具备三方面要素:其一是崛起国的实力和潜力要比守成国的实力与潜力更强大;其二是崛起国与守成国彼此理性认知对方实力和意图都同样重要;其三是互利合作预期与国际体系机制要能够相辅相成。概而言之,国家实力构成的基本要素,如领土面积、人口数量和质量、地缘条件、资源环境、制度体制、教育科技等,在国家兴衰中具有决定性意义,个别中等强国可能在某个特定历史条件下能够阶段性地成为区域性霸权国,但注定无法长期成为国际体系的霸权国。

责任编辑:侯德彤

Strategic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and Self-strengthening: A Centennial Game of Power Transfer Between Britain and America and Its Enlightenment

Xie Jianna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The peaceful transfer of power from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under the British rule to the peaceful transfer of power under the American rule went through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of strategic games, during which the two countries competed and cooperated, conflicting with and cherishing each other, restricting and taking advantage of each other. The process had been full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to suppress each other and strengthen itself. The major reason for the power transfer between Britain and America was to maintain strategic restraint in the process of the rapid rise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process and results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in the transfer of power shows that suppressing opponents is not the best strategy for strategic competition. Constantly strengthening oneself in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is more conducive to achieving the strategic goal of long-term national interests and world peace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power transfer between Britain and America; strategic competition; suppress the opponent; self-strengthening

明末同善会流播考

曾桂林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暨慈善公益研究院,湖南长沙 410081

摘要:明末同善会在中国慈善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极其深远的意义。由于高攀龙、陈龙正的倡行,同善会首先在江南地区流布开来,万历、崇祯年间苏州府吴县、昆山及太仓州先后由地方官绅创设此会,并频施善举。尔后,夏允彝出任长乐县知县,亦将同善会由江南地区传衍、移植至福建,拟订《同善会议》,“与保甲相翼而行”。与此同时,南北诸省有些世家大族,如无锡华氏、吴江叶氏、太仓王氏及山东曹县武氏、乐安孙氏等,皆曾倡行同善会,赡贫族,赈饥民,以化民成俗,维系地方社会安宁。明末同善会的流播,可谓“千古善事只是一道同风”,从中也映照出明清鼎革之际士人经世济民取向的一个侧影。

关键词:明末;同善会;慈善;夏允彝;世家大族

中图分类号: K248; D6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3)01-0097-14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慈善史研究领域,有一个虽未形成热点却令许多学人无法回避、且对理解明清慈善事业发展趋向颇为重要的问题:明末清初之际,同善会究竟是如何兴起、传衍与流播,它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地理分布格局?

日本学者夫马进在1982年发表《同善会小史》一文,率先对明末清初的同善会进行了开创性研究^①。他明确指出,同善会起源于中州,万历十八年(1590)由杨东明创设于河南虞城,至万历后期高攀龙等人正推行于江南地区,它是创立最早、影响后世最大的民间善会,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极其深远的意义。此后,国内外学界始对同善会问题给予关注,陆续有论著问世,对晚明时期武进、无锡、昆山、嘉善、太仓等州县同善会的创设及其运作进行了论析。^②概而观之,夫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明清时期的同善会研究”(12CZS04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曾桂林,男,湖南蓝山人,历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暨慈善公益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社会史研究。

- ① [日]夫马进:「同善会小史——中国社会福祉史上における明末清初の位置づけのために」,『史林』第65卷第4号,1982年,第37—76页,后收入氏著中略有改动,可参见[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伍跃、杨文信、张学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78—115页。
- ② 主要成果有梁其姿:《明末清初民间慈善活动的兴起——以江浙地区为例》,《食货月刊》第15卷第7—8期,1986年;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0—54页;陈宝良:《明代的社与会》,《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民间慈善事业》,《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1期;王卫平:《实念与实事:晚明高攀龙的救世理念与实践》,《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3期;王卫平:《做好人与行善事:陈龙正与嘉善同善会的慈善活动》,《历史教学》2016年第4期(后两文略有修改,收入氏著:《清代江南地区慈善事业系谱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75—89、131—146页);Smith, Joanna Handlin. *The Art of Doing Good: Charity in Late Ming China*,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马进的观点在学界影响广泛,但不时也受到挑战,或认为同善会的兴起不能偏重于客观社会背景分析,还应该从社会需求等主观方面考虑;^①或认为向河南寻找同善会的源流的推断是存在缺环的,“江南地区的同善会有着自己的发生发展逻辑”^②。对于后一问题,涉及同善会的传衍与流播,笔者不揣冒昧,也加入这一讨论中,通过勾稽原始史料,进一步明晰了江南地区同善会由张师绎“传自中州”的传播路径。^③至此,同善会从河南虞城传到江南地区武进、无锡、嘉善等县的途径与方式基本廓清。而前述各县同善会的发展运作情形,经夫马进、王卫平、韩德琳(J. Handlin Smith)等学人探究,已得到较完整的揭示。不过,笔者在仔细梳理既有成果时也发现,即便夫马氏对同善会研究较为深入、全面,然其论域主要囿于江南地区,尤以无锡、嘉善为中心,而其他地区仅稍有涉及,或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时段则集中在万历后期至崇祯前期(约1614—1635)。^④缘此,明末同善会研究尚存薄弱之处,值得进一步探讨。在前贤的基础上,本文拟将关注的时段下移、空间拓展,由此前学人关注的万历、天启、崇祯之际下移到崇祯后期,从江南地区放眼于南北诸省,通过广泛爬梳明清之际的地方志、文集、日记、年谱等文献,钩沉抉摘,详其所略,补其所遗,尝试再对明末同善会的传衍与流播情形作一考述,以期加深对这一问题及明清慈善史的认识。所幸的是,在研究中发掘到一些新史料,虽为吉光片裘,或可补苴罅隙之用。

一、苏州府同善会诸面相

万历十八年(1590),杨东明在河南虞城县首创同善会,后在其著述《山居功课》中叙及虞城同善会创设缘起与会约,引起了时人的关注。至万历后期,经张师绎的引介、倡议,同善会开始在江南地区传布,先是钱一本设立武进县同善会,继而陈幼学、高攀龙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创立无锡县同善会,并进一步完善了会则。同善会移植到无锡后,获得了飞跃的发展与充实,一年四次集会,宣讲施善,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崇祯四年(1631),陈龙正创设嘉善县同善会即受乃师高攀龙影响。无锡县同善会、嘉善县同善会作为晚明时期同善会江南地区兴起与发展的蓝本,学界已有较多论述,本节略其所详,不再赘述,而拟着重考述江南核心区域的苏州府同善会的发展脉络。

明末,苏州府领一州七县,附郭吴县同善会创设最早,由乡宦严一鹏所倡建。严一鹏(1549—1639),字化卿,原为常州府无锡县人,幼孤随母舅姓赵,遂落籍吴县,后复姓归宗。万历丁丑(1577)成进士,曾任浙江、福建道御史,后因劾东厂及税监得罪阉党,乞养归里。崇祯《吴县志》称:严一鹏“居林,绝不通长安书问。久之,起大理寺丞,晋应天府丞,甫三月,辄谢政归,与诸耆硕倡同善会,济孤贫,瘞遗骨。再启光禄寺卿。”^⑤方志并未载明同善会设立时间,而据《明实录》载,万历四十二年(1614)初起升原任福建道御史严一鹏为大理寺右寺丞,万历四十五年(1617)二月他曾以应天府丞职衔上疏,而升南京光禄寺卿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正月。^⑥由此推测,严一鹏倡行同善会应在万历

① 王卫平:《从需求的角度看明末慈善事业的兴起》,《光明日报》2014年12月10日,第14版。

② 王卫平:《实念与实事:晚明高攀龙的救世理念与实践》,《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3期。

③ 曾桂林:《杨东明与虞城同善会——兼论同善会在江南地区的流播》,《安徽史学》2022年第6期。

④ [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82—89、93—102页。

⑤ 崇祯《吴县志》卷44《人物五·才识》,崇祯十五年刻本,上海图书馆藏,第48页下。

⑥ 《明神宗实录》卷516、卷554、卷578,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所1962年影印本,第9725、10468、10944页。

四十五、四十六年间,其时他已年近古稀,归居林下,亦为吴中耆宿。这可看出严一鹏所倡吴县同善会犹有虞城同善会的印痕,略带些怡老会的色彩,但从其善举内容来看,亦明显受到武进、无锡两地同善会影响。

昆山县同善会,依现存史料来看,始见载于康熙《昆山县志》,尔后乾隆《昆山新阳合志》、道光《昆新两县志》、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皆因袭之。然与前朝旧事仅隔四五十年,康熙志中有关同善会的发起人及创设时间即语焉不详,略云:“邑有同善会,其法始于梁溪高忠宪公,明季邑诸绅老仿而行之”。^①而据陈瑚于庚辰、辛巳年间所作日记《穷理录》:“高忠宪公始创同善会,近岁鹿城踵而行之”^②,应不晚于崇祯十三年(1640)。由于昆山县同善会是受高攀龙所创无锡同善会影响而成立,其举办方法也与之相仿,“每岁一季一举,人出其赢余,以九为数。盖计日积一,则三月当余九。出银者多至九两,少止九分,出钱者称是。至会日,悉储之主会,散给邑中之贫不能为生者,而以其余制扁〔匾〕褒奖已故及现在忠孝节烈之家。即于会日,公请一老成有望者敷讲六谕。”^③由此而见,昆山县同善会同样是一年集会四次,并以会员自愿捐助会资的形式来赈济县内无以为生的贫民,或旌表忠孝节烈之家,同时亦延请德高望重者在集会之日宣讲六谕。不过,稍有异的是,昆山县同善会举办的慈善活动中没有施棺,而代之以表彰忠孝、旌奖节烈。崇祯十六年(1643)夏,昆山县同善会由知县万曰吉主会,并请乡贤顾天叙担任主讲。至此,明季昆山县同善会发展臻于鼎盛。^④后来县志在“名宦传”中述万曰吉政绩引《四朝成仁录》亦谓:“邑旧有同善会,曰吉延顾天叙主讲,敷陈六义,民俗一变”^⑤。从这两则史料来看,昆山县同善会后来在一定程度上由官府主导。夫马进甚至认为它“已经成为知县和乡绅共同运营的组织”^⑥,尽管这种观察还有待进一步证实,但亦不无道理。

同善会的影响还在进一步扩大,很快波及到襟江带海的太仓州,一些乡宦士绅也在积极酝酿组织同善会。如明季江南党社运动的重要盟主张采(1596—1648),字受先,在天启年间即与张溥同倡应社,时有“娄东二张”之谓。崇祯元年(1628)登进士后,授临川知县,张采在任上恤民扶弱,多有善政,又立合社,更是名声大张,数年后以疾乞归。其时,养病居家的张采在获悉嘉善、昆山相继创有同善会之后,也生发慈心善念,并不顾体弱气虚,着手筹划起来。如他在《娄东同善会引》所说:

人性皆善,可无立说。自性学不明,于是分先天后天。先天者于诚,后天者于明。诚者因心见事,明者即事生心。要之善惟一原,何容先后?故四海之远,圣人或出,心同理同,断断如也。前贤约立兹会,所谓即事生心者。今夫不为善者,陷溺使然,固可哀悯。……即今约略规条,正如掘地引水,先儒谓成得一分己,方成得一方物。此际工夫难到,且同举斯会,孳孳不已,则成得一分物,庶几成得一分己。但随时随力,使心无不尽。盖心统性情,乃心既尽,则人无贫富,数无

① 康熙《昆山县志》卷6《风俗》,康熙十四年纂修,苏州图书馆藏钞本,不著页码。

② 陈瑚:《确庵日记》卷3《庚辰至辛巳·同善会》,太仓图书馆丙寅(1926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第48页下。按:该卷原题为《穷理录》,分类记述庚辰(1640)、辛巳(1641)两年间所见所得。

③ 康熙《昆山县志》卷6《风俗》,苏州图书馆藏钞本。

④ 康熙《昆山县志》卷6《风俗》,苏州图书馆藏钞本。

⑤ 道光《昆新两县志》卷18《名宦》,《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15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61页。

⑥ [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85页。

多寡。……抑知即我不经,便成两益,即或移我必需,当无大损。苟肯推心,即全善事。采见友人举于魏塘则心动,继举鹿城,心益动。虽两年濒死,而此念不退。病中分款立例,登板布告,兹得幸生,拟克日连会,乃诸君子先自汇集,反以相召,则知善本各足,不谋自应。心同理同,即斯其兆,推诸乡邑,当有翕感者矣。^①

在这篇创会的序文中,张采除阐发为善乐善的道理外,还叙述了太仓州兴设的缘起、经过,尽管他还在病中就已参与其事,“分款立例”,然最终仍为“诸君子”捷足先登,“反以相召”。张采所言“诸君子”,即陆世仪、顾士琏等人,他们后来成为了太仓州同善会的实际运作者。

从外部因素来看,太仓州同善会的筹设,还与江南地区“庚辛大灾”有关。陆允正为其父陆世仪所撰《府君行实》就说:“辛巳大饥,人相食,道路僵仆者相望,府君见之恻然,乃约同志数人为同善会,日聚银米拯饥民。”^②而从陆世仪本人所写日记《志学录》中可知,此事开始筹措于崇祯十四年(1641)春。当时,因上年大旱,春荒已成,^③陆世仪和顾士琏遂为筹设同善会四处奔走联络。

陆世仪(1611—1672),字道威,号刚斋,又号桴亭,精研程朱理学,主张“居敬穷理”“躬身践履”,被后世誉为“江南大儒”,与陆陇其并称“二陆”。然而,他在明季还只是一介诸生。尽管从崇祯九年(1636)冬起,陆世仪与陈瑚、江士韶、盛敬拜盟为“太仓四君子”,作“西轩之约”,“乃相商读书为善之法”^④,力行迁善改过,然此时名声尚未闻达于地方社会。顾士琏(1608—1691),字殷重,此时亦是诸生身份,而他以精于水利之名蜚声江南已是清初顺治年间。陆世仪、顾士琏二人既不是世宦名门之裔,也非豪族富室之嗣。或许缘于这样的身份与地位,他们筹设同善会并不顺利,其间多有波折与嫌隙。据陆世仪日记所载,崇祯十四年(1641)三月十二日,顾士琏“以同善会事约见州尊,州尊欲以同善会属受先,其意犹未能尽信诸兄也”。可见,时任太仓州知州钱肃乐并不是很信任顾士琏、陆世仪等生员,而属意于更有声望的乡宦张采来主持同善会事务。陆世仪觉得顾士琏此举有些莽撞,主张稍加变更,即“以名归州尊,以银归受先”^⑤。在他看来,同善会不应是士绅们的“私会”,主会亦应如昆山县一样,由地方长官出任,方有号召、影响,而善款收支事务则不妨委办于张采。

三月十七日,陆世仪先捐出会资,将分金送到顾士琏家,询问同善会事。顾士琏出示所拟条例,并告知“始会之日,具连名呈请州尊,又请受老登座讲道”,由此,创会之事遂成。陆世仪听后,也极表赞同:“一道同风之治,宜归州尊,必不当有私会;受老临讲,亦宜州尊具柬以请。”^⑥他坚持认为同善会不应成为没有官府支持的团体,且应由知州以公事名义邀请张采主讲。最初,这一主张并不为诸友所理解,但最后还是都同意了,并推他为同善会事代笔写信给钱知州。他慨然应允,颇有义不容辞的

① 张采:《知畏堂文存》卷10《娄东同善会引》,《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8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666—667页。

② 凌锡祺编:《尊道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69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651页。

③ 详见陆世仪:《志学录》,崇祯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四月初一、初六日条,《丛书集成三编》第1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第182页。

④ 凌锡祺编:《尊道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69册,第637页。

⑤ 陆世仪:《志学录》,《丛书集成三编》第15册,第178页。

⑥ 陆世仪:《志学录》,《丛书集成三编》第15册,第179页。

自豪感。^①而接下来的几天,陆世仪却又与顾士琏在同善会的运营管理方面发生严重分歧,甚至有退会的念头。他在日记中抱怨地写道:“今闻顾殷重颇不从谏,不宜身入其中与之谋议,欲凡事一听之彼。若初不与者,此念亦甚痛快。”但虑及同善会尚属初创,且已列名会簿名册,即“以名与会中,不欲其决裂”,于是与陈瑚进行商量。^②

在同善会条例的议定过程中,鉴于近岁时有灾荒、动乱之虞,陈瑚也提出自己的一些设想,如仿行义仓、适当变通救济对象等。他曾在日记中直抒胸臆:“高忠宪公始创同善会,近岁鹿城踵而行之,吾娄贤者亦欲行此。此义举也,凶岁务施劝分,亦得古人社仓之遗意,然愚谓不如竟仿社仓行之尤善。盖给银不如给米,给米之法于春夏荒月则散之,于秋成米贱则少取其值。如秋成不偿者,明年即不复与。如此则惠可以不竭,而小民又已受利无穷矣。”^③同时,他还认为“同善会止给节孝之家,意取劝善。然而,此太平礼乐之事也,行之于近日则当变而通之。即有强力之人而遇歉无所恃赖,亦不妨与之。盖此等之人最易倡乱,给之以米,使无匮食之忧,亦是戢乱一法。况彼既受城中大姓之惠,则有急亦可驱而用之,以御外寇,亦甚便矣。”^④这些内容似乎并没被采纳、吸收到后来的条款中。不过,从前面所述中,仍不难发现有着同善会的基本特征,如采取会员制、由会员捐资充作会费等。同时,他们还对在神前盟誓均表赞同。^⑤

太仓州同善会的集会之期,在每年四月十五日和十月十五日,即一年只有春、秋季两次,这在江南地区的同善会中是较为特殊的,完全不同于武进、无锡、嘉善和昆山等县的同善会每季一举,一年四次活动。这应根据各地情形尤其地方财力及会众多寡而做的变更。据陆世仪日记所载,崇祯十四年(1641)四月十五日是太仓州同善会成立后的第一会,集会议程也是先宣讲,再散放救济款。当日,陆世仪与陈瑚一同赴城隍庙参加同善会的首次活动。“至城隍庙,见设讲坛在殿内,不便众听,乃与诸兄言移之于外。听受先先生讲同善会,语甚警策。听者皆赞叹,州尊色喜,予亦深喜。”^⑥张采在同善会宣讲取得了较好效果,颇受众人称许。随后,发放同善会救助金。陆世仪原打算按登录在册的男、女于两处分别给发,且已分好左、右两列,但顾士琏不听,执意先发男册银两,而让老妇等候多时,以致饥疲不堪。由此,一种不和谐的氛围也弥漫在同善会发起人当中,渐渐削弱了同善会的凝聚力。集会后两天,陆世仪再次萌生退会之念,“予与曰夏欲辞去己名而势有不可,恐反隳厥事。乃语以名不必去,但劳不能任,幸以格外待我两人可也”^⑦。

由上来看,太仓州同善会在酝酿筹设中所呈图景,正如美国学者韩德琳所揭示的那样,是一个充满紧张不安也不够稳定的慈善团体,它不同于高攀龙、陈龙正创设的同善会景象——“一个和谐、有效且能让会员有愉悦、满足感的组织”,这是两幅大相迥异的画面。“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所用文献史料的显著差异,一种是杨东明、高攀龙、陈龙正等人正式的、‘公开’的文集,另一则是陆世仪个人日记。

① 陆世仪在三月十七日、十八日的日记写道:“因欲予作书致州尊,予直任不辩”;“为同善会代作致州尊书。可作而作,义也;不可与而不与,亦义也。此际胸中颇无留滞”。参见陆世仪:《志学录》,《丛书集成三编》第15册,第179页。

② 陆世仪:《志学录》,《丛书集成三编》第15册,第180页。

③ 陈瑚:《确庵日记》卷3《庚辰至辛巳·同善会》,太仓图书馆丙寅(1926年)刻本,第48页下—第49页上。

④ 陈瑚:《确庵日记》卷3《庚辰至辛巳·同善会》,太仓图书馆丙寅(1926年)刻本,第49页上。

⑤ 陆世仪:《志学录》,《丛书集成三编》第15册,第181页。

⑥ 陆世仪:《志学录》,《丛书集成三编》第15册,第184页。

⑦ 陆世仪:《志学录》,《丛书集成三编》第15册,第184页。

由此呈现出的善会也有两种不同的视角:一是理想化的,一是现实性的,从中也折射出他们的社会地位。杨、高和陈的自信与富有,使其很自然地担当起道德领袖的角色,且很乐观地相信他们的善会最终会实现。而由绅权与财富构建起来的声望,让他们得以进行公共演讲,鼓动听众行动起来。”^①而陆世仪的社会背景就逊色得多。也许正因如此,尽管他最初也关注地方公益,参与筹设同善会,但较之陈龙正,他似乎并没有那种慨然视为己任的“热肠”,也缺少些责任担当;而对于同善会的未来,他更寄望于官府,以保一方安谧,“州尊好贤乐善,将来必更有可观,地方安宁,吾辈可安坐读书也”^②。

在太仓州同善会的筹设与发展过程中,从地方文献来看,知州钱肃乐显然发挥了主导作用,如宣统《太仓州志》载:“钱肃乐,字希声,鄞县人。崇祯十年进士,授太仓知州。……举同善会,周恤善类,全活甚众。在任五年,善政毕举。”^③钱肃乐对太仓州同善会的垂注,犹如同期万曰吉之于昆山县同善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或说决定了它的发展趋向。其时,江南大饥,陈瑚屡向知州钱肃乐上呈条议,论及民食、劝义等,还对同善会条规提出增补建议,但后者未被采纳。在其年谱也载有此事,称是年夏“又有补同善会规二条,一崇耆老以风仁寿,二劝习射以豫武备,先后上之当事,不果行”^④。这也可略见太仓州同善会的举办者中知州与诸生员的关系,即官绅之间既有密切合作又有矛盾冲突,凸显出官僚体系下民间慈善团体发展的内在困境。

太仓州同善会的主导者为地方社会的中层官绅,如知州钱肃乐、前临川知县张采,他们都有进士身份,不过在具体运作中也多依靠陆世仪、顾士琏、陈瑚等下层乡绅。或缘于江南地区绅权素来发达,同善会各项善举之施与,也有赖于地方中下层官绅乡民的通力合作。至于明末太仓州同善会管理运作的具体情形,夫马进已述及^⑤,兹不赘述。

二、长乐县同善会之推行

在太仓州同善会蓬勃开展之际,一些地方开始出现了由官府倡办而非由民间自发结成的同善会,这是明末同善会运动兴起过程中呈现出的一个新现象。夫马进较早注意到,它不同于以往由乡绅自发倡议的同善会,而是由地方官自上而下推动成立的。^⑥这其中,最具典型的是夏允彝在福建福州府长乐县推行的同善会。

夏允彝(1596—1645),字彝仲,号缓公,松江府华亭县人^⑦。崇祯初年,与同邑陈子龙等六人结成“几社”,在明末文坛颇负盛名。崇祯十年(1637),夏允彝进士及第,翌年任长乐知县,这也是他一生

① Smith, Joanna Handlin. *The Art of Doing Good: Charity in Late Ming China*,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p130.

② 陆世仪:《志学录》,《丛书集成三编》第15册,第184页。

③ 宣统《太仓州志》卷12《名宦》,《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18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27页。

④ 陈溥:《安道公年谱》卷上,《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71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302页。

⑤ [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96—99页。

⑥ [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100页。

⑦ 夏允彝以浙江嘉兴府嘉善县籍应试中举及登进士,曾纂修《长乐县志》,在纂修人员一栏,姓氏前冠以“禾郡”“嘉善”,而在该志卷3《官师志》载为“嘉善籍,华亭人”。参见崇祯《长乐县志》,崇祯十四年刻本,方宝川、陈旭东主编:《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6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317页。

中唯一出任实授的官职。他在长乐居官五年，“善决疑狱”，“邑大治”，吏部“举天下廉能知县七人，以允彝为首”^①。时福建按察使许世荫也称许说：“云间夏缓公以经世之才烹鲜长邑，凡邑之风俗利病，如握径寸之珠，坐炤千里，教化翔洽，而治以无事”^②。由此，夏允彝被崇祯皇帝召见，特拟擢用，但不久因丁忧归里。虽然夏允彝没有显赫的宦游经历，但他在这段短暂的宦游生涯中，却能体恤民情，兴利除弊，政绩卓著。他在长乐县的各项施政举措中，倡行同善会就是一项引人注目的善政。

长乐县同善会的情形，在夏允彝自编的遗集文录中并不见载，而他在创议过程中曾致信好友祁彪佳，寄去《同善会议》。祁彪佳在日记《感慕录》崇祯十三年五月十六日即记：“得夏彝仲书，示以治邑之谱，如征粮法、同善会，极为美政。”^③其时，祁彪佳正应绍兴府及附郭山阴县当事之请，为荒政忙碌奔波。在救荒赈饥之余，他“又念饥荒遍海内，救之者或有心无术，反扰民，因辑古今救荒全书”^④，广泛收录历代、当朝救荒文献、名臣奏议及邸报函札。由此，“极为美政”的长乐同善会议亦被祁彪佳辑入《救荒全书》这部鸿篇巨制中，编次为卷九《当机章·劝富》。据该书所载，《长乐令夏允彝同善会议》共16条，包括“广劝募”“定都会”“核名数”“募与会”“广愿力”“酌施予”“严督课”“助婚产”“商葬埋”“诱自新”“处恶少”“议供应”“稽出入”“均劳逸”“隆优异”“劝平糶”等^⑤，内容颇为丰富。

夏允彝认为，现有保甲法“大抵防不肖之意居多”，而不能“禁民为非”，更不能“为至贫至困者求一生计”。而人心思变以至民众骚乱，其根源在于“多困”，因而为民父母应“化之于前而禁之于后”。有鉴于此，夏允彝设想将同善会与保甲结合起来，“故特倡为同善会，与保甲相翼而行”^⑥。或许，他已虑及长乐为荒陬海澨之地，毕竟不如江南地区富庶繁华，倘若自发结会募资将无法组织和维系下去，惟有依靠乡村社会已有的基层行政体系，即以都、甲为基础来设立。由此，他将保甲法“微有损益”，通过都甲体系向全县绅民广为劝募，“凡缙绅先生与我良士民，必欣然愿与。如其不与者，是明自揆于善人之外也”。^⑦这也显出其并非以个人自愿参与为基础。

长乐县同善会是以都、甲为基础设立的，因而它不同于晚明江南地区同善会设于城厢，而弥散到广大的乡村社会中。具体言之，由县内八个都设立一个同善会，由都甲长推荐都内的缙绅孝廉为会长；“或会中无缙绅孝廉，各都甲会长集甲长，不拘太学子衿、素封长者，但有慷慨好义、正大详谨者，公推一人会为[长]，专主其事”；如有保长、约正能胜任会长，则以都甲长八人佐之。“每二人共司一季，周而复始”。如剩有一、二都甲，也可附入其他都甲的同善会。同时，如以八都成立一会，“恐地界太辽阔，都甲长奔走不皇”，有疏漏之虞，还可“约略道里适均，定为都会”。^⑧这种组织机构表明，夏允彝在长乐县推行的同善会无疑是一种自上而下式的官办同善会，它与保甲、乡约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甚至有的都甲长、保长或约正“一身而二任”，共同发挥了乡村控制的作用。

①《明史》卷277《列传第一百六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098页。

②崇祯《长乐县志》卷首《徐世荫序》，方宝川、陈旭东主编：《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6册，第6—7页。

③祁彪佳：《感慕录》，《祁彪佳文稿》第2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192页。

④祁彪佳：《祁彪佳集》卷10《行实》，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37页。

⑤《长乐令夏允彝同善会议》，祁彪佳：《救荒全书》卷9《当机章二·第十七劝富》，不著页码，国家图书馆藏远山堂稿本，缩微胶卷。该稿本中，祁彪佳对夏允彝《同善会议》各条有多处删改，所引系据胶片图版辨识复原的夏氏拟稿文本。

⑥《长乐令夏允彝同善会议》，祁彪佳：《救荒全书》卷9《当机章二·第十七劝富》。

⑦《长乐令夏允彝同善会议》，祁彪佳：《救荒全书》卷9《当机章二·第十七劝富》。

⑧《长乐令夏允彝同善会议》，祁彪佳：《救荒全书》卷9《当机章二·第十七劝富》。

尽管如此,正如夫马进先生所指出的,长乐县同善会“既然使用了同善会的名称,就不得不继承同善会的共同特征,采取结社的组织形式,开展富人向贫民施舍的救济事业”^①。在救济事项方面,长乐县同善会在“核名数”“募与会”“广愿力”“酌施予”“商葬埋”“助婚产”等多个条款都有规定。如“核名数”,长乐县同善会首先明确了“本县邑内所最急欲周者有四”,即“饥无食、寒无衣、病无药、死无棺”。这与杨东明、高攀龙所倡同善会的济贫对象是契合的。其具体程序与要求是:“都甲长先各查本都某甲极贫无食者若干户、户若干人,次贫无衣者若干人,或久病不能生理者若干人,各填的名年貌,汇造一式二簿,一送本县存案,一送会长稽查,以凭按簿分别赈给。”^②

“募与会”和“广愿力”,主要是涉及同善会善款的募集。夏允彝指出,“自莅任来,每遇有贫而求济者,或死无以殓者,或棺暴露不能瘞者”,常常“捐薄俸以助之”,“但恐薄俸有限,而四境之失所者无穷,故特倡兹会,计缙绅长者必有同心而起者。”^③这也是他倡行同善会的缘由,进而希冀善与人同,众善共举。但缘于官倡官办,长乐县同善会在资金募集的制度设计上,也就迥异于江南地区,而更多借重于充任会长的都甲长、保长或约正的力量。“各会长各置簿二扇,送县用印,付都甲长随方劝募。自缙绅以及士庶,人不论贵贱,银不论多寡,或一年总题,或按季分题。先募一人捐题若干倡首,其余随所乐助,各书名簿上,一送本县存案,一送会长收执。其银即送都甲长转送会长,设立公篋收贮,以听公用。或有题助米谷者更妙。其米谷暂赁无碍民房一间贮之,俟日后积有赢〔赢〕余,即公买修为同善仓,以垂永久。倘会中既鲜缙绅又乏富室,所入不足供所出,本县身任其责,捐俸佐之,不虞不给也”。“倘缙绅先生及素封长者慨然发博施弘愿,不拘一二会,或三四会,或五六会,俱喜捐助者,即于劝募日随给告白,明开愿助若干会,付都甲长实粘邻会地界,听邻会都甲长登门募题”。^④在劝募、查核贫户等环节,也多由甲长担当分劳。“一会之中,择都甲长八人,共襄善事”,“初行劝募,每人先置小簿一本,各募本都。或甲长同心好善者,听自募甲内以分其劳。又各查本都极贫、次贫人户。此件须同各甲长逐户挨查,不得听甲长混报。募查既毕,约期集会长处,共同登人印簿。其同善簿一以银米多寡为先后,户口簿一以极贫、次贫为先后,量入为出。大略已得过半,编定二人共司一季。此一季中,收募散给等项俱二人均任其劳。至季终,与接管者同集会长家,交盘受事,方可卸担,不得互相推诿。”^⑤由都甲长编定册簿后,同善会即按之发放救济。这种救济方式与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保甲、乡约并无二致。

“酌施予”则详细规定了济贫对象及其救助标准。具体为:“极贫无食者:壮丁壮口,每名月给米二斗;幼丁口,十五岁以下者,月给米一斗五升;十岁以下者,月给米一斗。会长先算明每月应给米若干,为价若干,每月二次,按簿分给,率以为尝〔常〕。次贫无衣者:至冬孟时同极贫丁口,年壮者每名给银二钱五分,置买衣絮;十五岁以下者给银二钱,十岁以下者给银一钱五分。岁只一给。有死丧贫不能殓者,甲长登时报都甲长,都甲长登时报会长,给银五钱,付丧主棺殓。或时值银数不敷,即报本县,捐俸补足。或有病不能赎药者,约每剂定价一分,十剂一给。药完而病未愈,又给银一钱,务

① [日] 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100页。

② 《长乐令夏允彝同善会议》,祁彪佳:《救荒全书》卷9《当机章二·第十七劝富》。

③ 《长乐令夏允彝同善会议》,祁彪佳:《救荒全书》卷9《当机章二·第十七劝富》。

④ 《长乐令夏允彝同善会议》,祁彪佳:《救荒全书》卷9《当机章二·第十七劝富》。

⑤ 《长乐令夏允彝同善会议》,祁彪佳:《救荒全书》卷9《当机章二·第十七劝富》。

病愈而后已。”^①

施棺助葬为江南地区同善会一项主要善举,长乐县同善会亦类此。鉴于当地多有停棺不葬,掩骼之典久废,“欲为永久计,惟有广义冢之一法”。即由都甲长在本会内寻找官山数亩,或公买附近一区,设立义冢。“遇有贫不能葬者,给银二钱,雇工埋瘞。或棺主力能自理,特苦无力买山者,准听葬入山内,量出银一钱,付会长以充公用”。^②可见,其救助之旨与江南地区同善会基本相通。

值得注意的是,长乐同善会还将“助婚产”列为善举之一。鉴于婚娶费用繁杂且昂,贫民苦借贷无门。“倘贫民从此拮据,力能议亲,告明都甲长,转报会长,于纳币时先给助银五钱,至婚期再给五钱助之”;同时,对贫民生子或不能举者也给予资助,“以后贫民每遇生产,不论男女,登时报都甲长领之,同报会长,注名簿内,每月给米一斗,永以为常”。^③此举完全超出无锡、嘉善等地同善会所办的济贫活动,而将施善内容扩而充之,颇类似于宋元以降江南地区盛行的义庄、举子庄。

除赈济贫民外,长乐县同善会还劝平粜,以便“四民之自食其力者”。该会希望地方缙绅、素封之家“慷慨好善,肯略通融减价,以为之倡”,谷价渐趋平抑。具体做法是:“其自百亩以上,或数百亩,或千亩,倘每百亩肯粜谷三十石,即所粜之谷不费矣。仍乞明书簿内,或大张告白,相助若干外,愿粜本会内谷若干石,每石减价若干,自五斗以至三石,俱不拘时日,听其陆续买余。……各会长仍于季终将会内平粜芳名、谷数,汇造簿内送查,另行旌奖。”平粜所减之价,每石数分,多粜至数百石,所差银数于富室巨绅而言亦只如太仓一粟,然对平抑一县谷价则很有用。在夏允彝看来,长乐同善会倡劝平粜,亦可称善量广大。此外,对于一些力行不倦、查有实绩的乐善者,长乐县同善会给予旌表,或送匾,或免差,“使慕善者知所向风”。^④

与江南地区的同善会相比,长乐县同善会也还存在一些差异,甚至颇为明显。这主要缘于它创设初衷乃冀望“与保甲相翼而行”,故而十分重视社会治安的维持。首先,体现在“诱自新”“处恶少”等条款。夏允彝认为,偷窃之举皆因良民饥寒交迫所致,及至事情败露或受捕快恫吓勒索,渐为惯盗。为地方治安长久计,应给予自新之路。由此,长乐县同善会规定都甲长各查本都内自愿改过的惯盗案犯,编造姓名册簿。“会长集众约之,谕以改图,按月计口,照例给米,任地方巡逻之责。岁终无事,量加给赏,以坚其自新。”如果该都甲内有一家被盗,同善会则将其送官究责,着落身上追赃。如会内原无盗案,而附近邻会有之,也可协助并予赈恤,“以资侦伺之役”。^⑤另外,对于地方恶少,也先予规劝化导。都甲长将本都内素性无赖、为害地方最著者编造名簿,一式二份,分别送知县和会长。集众约之,既往不咎,“从今嘉与维新,谕其改弦易辙,按月给米,为地方独任守望之助”。如果怙恶不悛,“集众送官究治,重加枷责”;“若能翻然改图,为地方出膂力,捍外患”,则更乐视为之豪侠,亦不辜与人为善之意。^⑥

其次,“严督课”也是长乐县同善会有别于江南同类机构之处。自魏晋以来,救济机构通常是有

①《长乐令夏允彝同善会议》,祁彪佳:《救荒全书》卷9《当机章二·第十七劝富》。

②《长乐令夏允彝同善会议》,祁彪佳:《救荒全书》卷9《当机章二·第十七劝富》。

③《长乐令夏允彝同善会议》,祁彪佳:《救荒全书》卷9《当机章二·第十七劝富》。

④《长乐令夏允彝同善会议》,祁彪佳:《救荒全书》卷9《当机章二·第十七劝富》。

⑤《长乐令夏允彝同善会议》,祁彪佳:《救荒全书》卷9《当机章二·第十七劝富》。

⑥《长乐令夏允彝同善会议》,祁彪佳:《救荒全书》卷9《当机章二·第十七劝富》。

养无教,至明末养济院此类问题尤为突出。^①夏允彝认为这并不可持久,“有食有衣,不事生理,此待尽之术也,谁能引长江之水以给之?”缘此,他在长乐县同善会议中提出“严督课”,即主张对少壮者要严加督饬,教养兼施。“凡我贫民,惟年七十以外、十岁以内及手足不全者,竟行贍给。此外,年力尚可营生者,自领米以后,俱要随资质所近,或肩挑,或杂技,各习一艺生活。即于领米之日报明会长,某人愿习某事,各与登记本名下。至月终通计生活所得,足供几日之费,仍报会长,量为扣减,稽其勤惰,分别奖戒之。”如此类受助贫民一月内无所事事,养之无益,可由都甲长送县责惩,姑且准再给米一月,听其改正。如下月仍不事事,送县责治外,尽革其米。“其十五岁以下者,课督如之。”^②

再次,长乐县同善会的财务收支状况直接向知县呈报,而不向会员报告,这也是其迥异之处。如:“各会长置循环二簿,送县用印,登记出入,虽分厘斗升,俱对值季都甲长,备细登簿,每季终送县倒换稽查。其本季用剩银米,仍注明存贮若干,以备下季支用。”^③如有不足,则先算清短缺之数。显然,这与它是以都、甲为基础建立起来而非会员结社而成有关;所募款项也源于都甲的征收,而非会员募资捐献。

透过上述分析,不难窥见长乐县同善会的运作情形,而这是其诸多施政举措的一部分。诚如天启进士、邑人马思理《开河记》中所言:“公为人推诚与人,通于世务,以经术润饰吏事,事事类古人。其立常平仓,常岁平敛,荒年蠲救,又时其缓急而先后之,人不病饥而官府蓄积,似刘晏;视税定役,弛微户,使无所与,定户完粮,里无役侵而闾閻乐输,其详定役法,似沈括、苏轼;立同善会,而乡之鰥寡孤独者有养,则古之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贍贫穷也,似次公;诱进儒生,亲自饬励,使人人争自濯磨以有成立,似文翁。”^④此处将夏允彝与汉代黄霸、文翁,唐代刘晏及宋代沈括、苏轼等循吏名宦相类比,且以他所倡行同善会视若颍川太守黄霸贍恤鰥寡贫穷之举,足见其口碑载道。不单乡评如此,官声亦佳。如福建布政使胡维霖称:“至立同善会以恤穷困,有保甲之利,无保甲之扰。此则移风易俗又非才吏之所能为且也。”^⑤这两句话虽主要评鹭夏允彝的施政举措,然言及同善会也属肯綮之语,可见其确有实绩实效。由此,祁彪佳一见夏允彝所示“治邑之谱”即赞同善会为“美政”也就不足为奇了。后来,他又将《同善会议》收录荒政书中,并附注批语:“以会行劝,此真善于劝者也,且不待其荒而赈救于平日,尤得先事之妙。”^⑥

三、世家大族与明末各地同善会之倡行

明清之际,世家大族向来视为民间社会教化之基地。太仓州人陆世仪就说:“夫风俗之淳厚,非必

① 夫马进对自两汉魏晋以来国家的鰥寡孤独政策及救济设施进行了简要回顾与评述,指出明代养济院已出现了种种弊端,吕坤曾尝试对养济院政策进行改革。参见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34—65页。

② 《长乐令夏允彝同善会议》,祁彪佳:《救荒全书》卷9《当机章二·第十七劝富》。

③ 《长乐令夏允彝同善会议》,祁彪佳:《救荒全书》卷9《当机章二·第十七劝富》。

④ 崇禎《长乐县志》卷2《经略志·城池》,方宝川、陈旭东主编:《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6册,第201—202页。

⑤ 胡维霖:《崇禎辛巳修县志序》,民国《长乐县志》卷20《艺文录上》,《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第21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345页。按:前引崇禎《长乐县志》影印本不见此序,卷首仅有按察使徐世荫及邑人曹学佺、刘沂春所撰的三篇序文,或胡序原在徐序之前,因藏本久远,书页已脱落。

⑥ 祁彪佳:《救荒全书》卷9《当机章二·第十七劝富》。

尽由在上之人有以风厉之也；一邑之中有一二世家大族，以礼义廉耻治其家，则相观而善磨励而兴起者多矣。”^①确实，风教兴衰也映照世运升降。当此明清易代之际，缙绅士大夫以“礼”为“教”，移风易俗，其所承担的传统之责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情势之下，也别具一番“制度实践”的意义。^②陈龙正的看法也甚相似，在同善会最初的制度设计中，即以施善、教化内容为内容，以安定秩序消弭动乱为目标的，有如乡约、保甲一样，是一种“安乡之举”“固圉之策”。崇祿十一年（1638），陈龙正给浙江巡按使乔可聘的复函即言：“盖自设是会以来，几无饿殍、无道瑾；又时时讲解劝诱，以提醒良心，消弭邪孽，可莫为乡约、保甲之助。”^③或许，正缘于同善会具有安定人心、维系社会稳定之功效，不单官绅在地方社会积极创设同善会，一些世家大族也将同善会作为缓和贵贱冲突、纾解社会矛盾的润滑剂。

崇祿十一年（1638），无锡人华允诚在家族中举行同善会。据华衷黄所述年谱，称其父华允诚于是年“举同善会”，并言：“吾宗子姓繁衍，贫富不齐，府君分资厚者三等，贫困者四等，以有余济不足，每季聚资，合族于祠而分给之，岁饥则月举焉。于贫困中，鰥寡孤独者加厚，善良者尤加厚。扶济之中默寓奖励，所以联通族血脉于一会中，而潜消其怨贫嫉富之心、诋讼角蚌之端也。”^④华氏此举流泽匪浅，影响颇远，以致入清数十年后，无锡县耆民、儒学为他呈请入祠崇祀所具实事亦有载，赞其“孝友齐家”，“惠泽尤沾闾里”，常“推赢余用周乏”，“济孤寡则广同善之盟”，^⑤又言“于居乡日……倡行甲兑以救贫里，举同善会以贍贫族”，并于庚辛大灾之际“首倡捐米，减价平粜，赈饥弭乱，全活一方”^⑥。类似情形，亦见于江南地区其他仕宦之家，如吴中叶氏、太仓王氏。

吴中叶氏自宋初开派以来，其后裔在吴地繁衍生息，支脉昌盛，书香不绝，代有闻人，至明中后期已成江南望族。吴江分湖叶氏（属吴中叶氏同里派分支）在明清之际还出现了一门七世九进士，而第九世叶绍颀、叶绍袁堂兄弟于天启五年（1625）乙丑科同榜进士及第，一时传为佳话。叶绍袁初任南京武学教授，后入京任工部主事，因见朝纲废弛、吏治腐败，遂乞身归休，隐居分湖，誓不出仕。崇祿十三、十四年（1640—1641），江南迭遭水旱之灾。自崇祿十三年五月起，淫雨不止，米珠薪桂，民情骚动。归隐乡居的叶绍袁见此灾情，寄家书给时任南京光祿寺卿的兄长叶绍颀，云：“家乡几为戊申之续，幸而犹得插青，但米贵甚，米价益贵而巨家益闭，不肯粜，小民岂能枵腹待秋成乎？倘传教家督，或开粜，或广贷，使民有食以用于耜之资，嗷嗷众口诵德不浅矣！”^⑦继而商筹社仓平粜事宜。及至翌年春，他又在分湖仿行同善会，赈恤了一些孤苦无依的贫民灾黎。据其自撰年谱所载，“十四年辛巳……二月十五日，举同善会，昉于锡山高忠宪公（名攀龙），友人陈发交（名龙正）继行于武塘，今余亦仿故例为之。首贍节孝，次赈孤茆，又次施棺，刻有《同善会录》。”^⑧叶绍袁自幼生活和求学于袁黄

① 陆世仪：《榕亭先生文集》卷4《龙城郝氏宗谱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398册，集部·别集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77页。

② 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7页。

③ 陈龙正：《几亭全书》卷45《文录·书牒五》，《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459页。

④ 华衷黄：《奉直大夫吏部员外郎豫如府君年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60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316页。

⑤ 华衷黄：《奉直大夫吏部员外郎豫如府君年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60册，第359、360页。

⑥ 华衷黄：《奉直大夫吏部员外郎豫如府君年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60册，第375页。

⑦ 叶绍袁：《天寥道人自撰年谱·续谱》，吴兴嘉业堂民国二年刻本，第6页下。

⑧ 叶绍袁：《天寥道人自撰年谱·续谱》，吴兴嘉业堂民国二年刻本，第8页上。按：括号内系原刻本双行小字夹注。

家中,受其影响颇深,又与陈龙正为旧交,情谊深厚,^①其为人仁厚,虽家产不丰而犹能扶危助困,急难好义,因而灾变之际遂设同善会赈济乡邻之善举。至五月,米价更昂,人心汹汹,叶绍袁原拟倡议义仓,赈济贫族,后见城中未行平糶,乃决然先行于乡,“每升以钱四十文为率,人心胥悦”。在他的倡率下,吴江县城也设仓平糶,最终“乡城俱帖然矣”。^②由此,同善会与社仓、义仓等一起,在灾年发挥了救荒济贫的作用。

太仓王氏自明中叶以后亦是簪缨累世,王锡爵、王衡父子皆中榜眼,王锡爵官至内阁首辅。王衡早卒,其子王时敏以荫官入朝,未久辞官归里,后于崇祯十五年(1642)春设同善会,主要向阖族募集善款。如年谱载:“春,作一家同善会引,倡率合家眷属及家人辈,至在宅各男女,或银钱,或米麦糠粃,随力输助,广施粥饼,亲自给散。”^③在明季奴变、民变多发之时,刚经历庚辛大灾之后,此举无疑有助于地方社会的安宁。由此可见,同善会在“化民成俗”方面,世家大族仍有其重要的示范意义。

在北方,也有世家大族倡行同善会。崇祯十四年(1641),鲁西南旱荒,兖州府曹县人武岷源、武张联父子发起成立同善会。如康熙《曹县志》之人物传“武岷源”条载:“庚辰,子张联制同善会以济众,欣然赞成之”^④。可见,创设同善会之议由武张联(1612—1681)首先提出,并得到其父的赞允。武氏为曹县大族,洪武初年自山西迁入,至七世武图功万历甲辰科(1604)进士及第,家声日隆,至明末清初已属世宦之家。武岷源为图功三子,“敦伦好礼,乐善安仁”,“忘人我,处朱门若蓬户,视天下为一家。……每与亲故之落魄不偶者,问疾苦,道寒暄,终日不倦”^⑤。武张联也深受其父影响,性尚简朴,“处贵介而无骄矜之色,席素封而有韦布之风”^⑥。关于其设同善会济贫一事,光绪年间纂修的方志载述稍详:“庚辰,岁大饥,立粥厂,养残疾,育婴儿,施药饵,遐迩颂德,莫不曰武善人也。”^⑦而此善举,还可能得到了他两位伯父的支持,如方志载,武崑源,“崇祯十三年,大祲,捐粟赈邻,全活甚众。畴皆逋负,一切焚券,而德色不形于面”;武崑源,“庚辰大祲,输粟济荒,捐金建梵宇,为煮粥之所”^⑧。在举办同善会过程时,武张联还撰述有《同善会书》,李澹园、李悦心为之作序,于崇祯辛巳年刊刻流通。然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湖北巡抚姚成烈以“内载钱谦益鉴定”为由而奏准禁毁。^⑨

武张联创设同善会,其实也受陈龙正的影响。方志载称,武张联喜谈名理,“不屑屑为举子业,桐月李先生,理学名家也,与之订忘年交,竟日讲论,无非濂洛关闽”。^⑩李桐月即李悦心,与陈龙正交

① 叶绍袁晚年在《年谱别记》中追忆道:“乙巳(1605),与袁若思、陈贵闻、发交兄弟共事笔砚,自是往往相同,日则论文讲义,夜则樽酒谈笑,并席篝灯,连床对影,岁不辍也。余与若思俱成乙丑进士,发交登甲戌榜,只贵闻戊午浙江解元,仅南宫一试,下第遂殒命,伤哉!”可见,叶绍袁与袁伊及陈龙正兄弟堪称同声同气。参见叶绍袁:《天寥道人年谱别记》,吴兴嘉业堂民国二年刻本,第2页下。

② 叶绍袁:《天寥道人自撰年谱·续谱》,吴兴嘉业堂民国二年刻本,第9页上、下。

③ 王宝仁编:《奉常公年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66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384—385页。

④ 康熙《曹县志》卷13《人物志中·历代名贤》,康熙年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第58页上。

⑤ 康熙《曹县志》卷13《人物志中·历代名贤》,康熙年间刻本,第57页下—第58页上。

⑥ 光绪《曹县志》卷14《人物·历代名贤》,《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84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294页。

⑦ 光绪《曹县志》卷14《人物·历代名贤》,《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84册,第294页。

⑧ 光绪《曹县志》卷14《人物·历代名贤》,《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84册,第287、290页。

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662页。

⑩ 光绪《曹县志》卷14《人物·历代名贤》,《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84册,第294页。

好,为崇祯甲戌科同年,先授行人司行人,后擢监察御史,^①又与刘宗周友善,曾上疏荐举陈龙正、叶廷秀等人。此外,与新任曹县知县梁州杰^②的倡行、赞允也有一定关联,而梁氏为陈龙正旧日相识,崇祯十四年陈龙正曾致函梁氏,劝其仿行同善会,“以惠此一方民”。^③正缘于李桐月、梁州杰均与陈龙正有交集,武张联获悉江南地区同善会的发展情形,进而发起创设了曹县同善会。

此外,在山东青州府乐安县(今广饶县),邑人孙三锡于崇祯十年(1637)重刻了陈龙正的《同善会录》。而该会录是陈龙正将嘉善同善会章程及讲语等刊印成书,在京城时向各友朋、官绅广为赠阅。^④兵科给事中孙三杰遂将此会录寄给其弟,后又作《孙孝子悔庵重刻同善会序》,叙事之原委,阐发同善之义。其序文曰:“千古圣贤只是有善无恶,千古善事只是一道同风。善哉乎!钱启新先生同善会所由起,高景逸先生及陈几亭所为惓惓,发明力行不怠者与!夫人见利不轻,则其向善必不勇。……吾家季弟怀万夙具善根,心轻阿堵。……岁在丁丑,余率尔小草,家季奉慈帏甘旨。余不遑恤纬,特取几亭所刻《同善会录》为寄。家季亦不迂我于乘障登陴之余,亟命诸劄劄氏,谓:‘正可藉此发明效死勿去之义,以人和保地利也。’刻成寄余。”^⑤孙三杰在天启、崇祯朝以清廉恤民、直言敢谏著称,尤其在大明危亡之秋,他冒死上疏,连续五次弹劾首辅周延儒误国,可谓铁骨铮铮。^⑥其弟孙三锡则以孝义名闻闾阎,尽管《同善会录》刻成后是否创行同善会尚无史料证实,然他多行善举,无疑与此有关,即无同善会之名亦有其实。如县志载述,孙三锡“勇于施济,凡邑中义举,众力所能为者必先之,众力所不能成必后之,先后捐资以累万计,如设义田,建社仓,立乡塾,掩露胥,助人婚丧,重修学宫,不可殫述。而置学田以膳诸生,都数百顷,创修草桥长堤,延十余里为尤著。”^⑦由此,孙氏兄弟一时在邑中颇著声望。

明季同善会的流播,除世家大族倡行之外,一些宦宦游寓也有播迁之功。崇祯年间,湖广省亦设有同善会。崇祯元年(1628),无锡人蒋元敬由举人任岳州府平江县知县。^⑧下车伊始,他见“一切鰥寡孤独及流亡行乞之徒,死无所归,卒多暴露”,而平江自明以来未闻有漏泽园,若逢炎暑,更形腥秽,尤可悯恻,遂有仿行家乡前贤之善举,成立同善会,以掩骼埋胔。据蒋元敬《漏泽园记》载称:“予司此

① 光绪《曹县志》卷14《人物·历代名贤》,《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84册,第286页。

② 梁州杰,字皋虎,崇祯四年(1631)辛未科进士。原本姓李,为嘉善丁宾家奴之子,少聪敏,令伴读,得补诸生,由此与陈龙正相识。后与丁家交恶逃走,辗转至扬州,为山西盐商梁尚亿收为义子,再捐纳补诸生,后入襄陵民籍应举。进士及第后,先后为城固、长安令,崇祯十三年调任曹县。参见谈迁:《北游录》,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35—336页。又,光绪《曹县志》卷9《官职志·县令》载,梁州杰,“字皋廉,扬州人,辛未进士”(《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84册,第147页),皋廉,误。

③ 《与曹县令梁皋虎》,陈龙正:《几亭全书》卷46《文录·书牘六》,《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册,第474页。

④ 参见陈龙正:《几亭全书》卷45《文录·书牘五》、卷46《文录·书牘六》,《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册,第422—423、459、472、474页。

⑤ 孙三杰:《孙孝子悔庵重刻同善会序》,雍正《乐安县志》卷20《艺文》,国家图书馆藏,第60页下一第61页下。

⑥ 有关孙三杰略传,可参见雍正《乐安县志》卷12《人物志》,第15页上;民国《乐安县志》卷10《人物志上》,《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30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101页。

⑦ 民国《乐安县志》卷10《人物志上》,《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30册,第104页。另,雍正《乐安县志》卷12《人物志》略有异:“志在施济,慨学宫荒圯,出资修建,更捐腴产以膳弟子员,他如置义田以膳族,立社仓以备赈,创草桥长堤十余里。凡邑中公事义举,众力所能为者公必先之,众力所不能成公必后之,先后捐资以累万计。”(第18页下一19页上。)

⑧ 同治《平江县志》卷34《职官志·官师》、卷35《职官志·名宦》,《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9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7、66页。

土,不忍闻见已,创同善会,施棺殓藏,复遍访空门官地,捐俸置买民田,以为区处。”^①此善举还得到地方士绅的响应与赞襄,乡达李元阳率先捐地一丘,诸生童光楚亦捐出山地一丘,各有二百余弓,由此,平江县始设立漏泽园。从有限的史料来看,平江县同善会仅以施棺助葬为善举,似乎并未开展赈恤鰥寡孤独等活动。

夫马进等诸位先行者的研究曾揭示,由于高攀龙、陈龙正等人的推行,无锡、嘉善同善会成立后,在江南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久,周边一些府县州仿而效之,相继发起创设同善会,如苏州府昆山县和太仓州。而陈龙正尤为热心,他不仅上奏朝廷希冀借助国家力量加以推广,同时还刊印《同善会录》寄给亲朋好友,积极向他们宣介,倡建同善会。^②这样,明末同善会似有劝善运动之趋向,影响日益扩大,逐渐在全国南北诸省传衍、流播开来,并于山东、福建等省的一些州县播下善种,结出善果。本文的研究,不仅可以让人们了解明末同善会在传播与发展过程中鲜为人知的一面,弥补既有研究之阙失,而且能够还原山东曹县、乐安、福建长乐、湖广平江等地同善会与江南地区的往来联系,以及江南地域内部吴县、昆山、太仓、吴江各州县同善会之间的关联。同时,通过考察福建长乐同善会的运作情形和世家大族倡行同善会的概貌,进一步展现出同善会在明末社会鼎革之际何以迅速传衍与流播的若干图景,也映照出明清之际士人经世致用、匡时济民取向的一个侧影。

责任编辑:侯德彤

A Study of the Spread of Tongshan Association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Zeng Guilin

Philanthropy Research Institution and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Tongshan Association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ha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position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anthropy. Due to the advocacy of Gao Panlong and Chen Longzheng, Tongshan Association first grew in the southern reg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uring the reigns of Wanli and Chongzhen, local officials and gentry established the association in counties of Wu, Kunshan and Taicang in the Prefecture of Suzhou, and frequently did good deeds. Later, Xia Yunyi served as the magistrate of Changle County, and transferred Tongshan Association from the southern reg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to Fujian Province. He drafted *A Discussion on Tongshan Association* and hoped to "go hand and hand with Baojia". At the same time, some aristocratic families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provinces, such as the Hua Clan in Wuxi, the Ye Clan in Wujiang, the Wang Clan in Taicang in Jiangsu Province, and the Wu Clan in Cao County and the Sun Clan in Le'an in Shandong Province, all advocated Tongshan Association to support the poor and relieve hunger so as to influence people and form customs and maintain the peace of the local society. The spread of Tongshan Association in late Ming Dynasty can be described as "good deeds as good custom through the ages", which also reflects an aspect of the scholars' orientation of managing the society and helping the peopl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ey words: late Ming Dynasty; Tongshan Association; philanthropy; Xia Yunyi; aristocratic family

① 乾隆《平江县志》卷23《艺文》,《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8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67页。

② [日]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86—87页。

民国时期北平红十字会慈善事业述论

王娟

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近代中国红十字会的人道实践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历程相互映照、风雨同行。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北平红十字会揭开独立办会的序幕;抗战期间,尽管生存维艰,仍勉力救护、扶危济困,展现出人道情怀和民族气节;抗战胜利后,进入“复员时期”,工作重点转为从事“专为和平建设之社会服务”,日常注重社会服务意识的宣传,并广泛开展社会公益活动,以“达成伟大自助助人之使命”,使“社会国家自跻于康乐富强之境”。从区域史角度回溯民国时期北平红十字会历史,既看到富于地方特色的人道壮举,同时也可感受到,在近代险峻的历史氛围中,人道慈善事业与民族革命主题交相呼应,在红十字领域里散发出民族精神的光芒。

关键词:民国;北平红十字会;人道;民族精神

中图分类号: K2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3)01-0111-12

中国红十字会自1904年成立以来,秉承博爱宗旨,勉力救助伤病、恤贫济困、服务社会,留下绚烂的人道华章。近年来,在池子华、周秋光等学者的引领和推动下,中国红十字会史研究整体上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在红十字会通史和区域史研究、专题研究、人物研究、理论研究和现实服务以及资料整理诸多方面已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学界奉献了不俗的学术成果。纵观近代以来,红十字事业与社会发展休戚相关,如何更客观地审视近代中国的社会矛盾与革命主题,考量百年红十字事业的发展脉络及其与现代民族国家政治认同的关系,是中国红十字会史研究今后仍需进一步加强的基础工作之一^①。就北京红十字会史而言,学界已展开初步探讨^②,但尚需进行更加系统化、区域化的研究。本文通过回顾民国时期北平红十字会的救护实践和社会服务,探讨近代革命洪波中的红十字会在困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民国北京地区的诸十字、卍字会及其关系研究”(12CZS053)的阶段
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娟,女,河南洛阳人,历史学博士,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慈善救助
史等研究。

① 学界主要成果如下:周秋光、曾桂林的《慈善事业与近代中国的民族精神》(《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
年第3期);池子华、崔龙健的《抗战时期红十字会战事救护研究述评》(《民国档案》2014年第2期);周秋光、黄
召凤的《晚清地方公益事业的兴起与助推国家近代化转型探析》(《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郭进萍的《红十字运动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庄细
细的《海外学界关于中国慈善事业史研究综述》(《红十字运动研究》2018年卷,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8年);
周秋光、陈国连:《中国慈善史研究的学术检视与思考》(《安徽史学》2022年第2期)。

② 代表性成果可见:孙敬敏编纂:《北京市红十字会的65年(1928—1993)》(北京:天津出版社,1995年);杨红星:
《抗战胜利后北平红十字会的历史变迁》(《北京档案》2015年第7期)、《“复员”时期北平红十字会的医疗服务》(《兰
台世界》2015年第28期)等。

顿的生存环境下,推行人道实践的过程中彰显出来的民族精神,以期在推动红十字区域史研究的基础上,加深认识近代中国的跌宕激变与慈善领域的社会应对。

一、抗战前北平红十字会的设立与初步发展

北京与红十字事业的结缘始自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之初。1904年3月26日,驻美使臣梁诚上奏清廷“请联约各国仿设红十字会”,同时“以京师善堂为总会,复于行省商埠酌设分会。平时施医赠药,兼办军医学堂,战时防病疗伤,责令随营照料”^①。中国红十字会设办之初,总会设在北京,上海设立总办事处。红十字会正式在中国落地生根。

近代以来,北京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环境,在风雨如磐的年代里成为多难之地,军阀割据混战,天灾人祸频仍,晚清政府和民国政府无力解决社会民生,众多慈善组织慨然担负救助重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践行人道理念,一方面在北京统筹指导全国的红十字运动,同时兼顾办理北京地区的慈善救助救护事业。

按照国际红十字会的管理规定,红十字会根据需要可随时随地添设分会。抗战前夕,各地分会增至468个(另说512个)^②,红十字会成为民国时期中国最大规模、最具影响力的慈善组织之一。作为救护行动的基础依托和骨干力量,各地红十字分会开展各种救援救护活动,成为社会事业发展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1928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北京”改称“北平”,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迁往上海,总会与总办事处合二为一。总会结束在北平的业务,决定筹备组建北平红十字分会。10月29日,总会在北平干面胡同22号召开议事员会,宣布中国红十字会北平分会正式成立。大会公推颜惠庆、毕桂芳、江朝宗、汪大燮、何其巩5人为名誉会长,胡惟德为会长^③。总会于11月致函北平分会,称因“红十字会关系国际极为重要”,希望北平分会遵照总会章程之规定,“群力以利”,“以救灾恤兵为主旨,继续办理一切公共慈善事业”。自此,北平分会接续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托付,在时局艰难与社会动乱中救伤葬亡、扶危济困,掀开了独立开展人道实践活动的序幕。

(一) 战事救护

北平分会诞生于危难和动乱的年代,主要活动以战地救护为主。战争往往导致士兵伤残,手无寸铁的百姓亦罹难死伤,逃离战争烽火的难民比比皆是。1930年上半年新旧军阀混战,豫中战役的战事甚为激烈。6月,战地救济队队长华素乾报告称,河南开封一带惨状不忍目睹,“二三十里遍地积尸”,北平分会帮助掩埋战难死尸^④,并立即组织战地救护队,发动队员紧急购办药物及救护器材。后由平汉路局特拨专车一辆,7月10日上午从西车站奔赴陇海线。救护队长兼医务主任赵体乾率31名救护人员投入救护,抢救伤员达1000多人。救护队在郑州驻扎后,因受伤军民众多,在驻地部队

① 池子华、郝如一:《中国红十字历史编年(1904—2004)》,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页。

② 高鹏程:《近代红十字会与红卍字会比较研究》,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6页。

③ 池子华、郝如一:《中国红十字历史编年(1904—2004)》,第61页。

④ 《北平二十五日专电》,《申报》1930年6月26日,第四版。

要求下北平红十字会又设立临时医院,每日前来就医的伤者络绎不绝^①。在人道旗帜下,红十字会视救死扶伤为己任,及时开展战地救援,在残酷的战争阴霾中显露出人性的温情和光辉。

(二)慈善救助

北平红十字会自建立起,便不遗余力开展收容灾民、难民的工作,给他们带来生的希望。1928年6月,北平分会设收容所二十九处,共收难民十四万余人,半数为无家可归者^②。11月,分会调查北平待毙贫民约四万余,约占全市人口百分之四。乃设粥厂十八处,赈济万余待食之人^③。从1929年冬开始,北平红十字会建立粥厂、暖厂,日常收容50人左右。此外,每年施放棉衣、单衣。例如1930年5月,赈济单衣一千多套。每次赈济前,派员到各区调查,对极贫困户核实后发放救济物资。1933年以后,大批难民逃到北平。当时在报国寺、龙泉寺、石驸马大街、南新华街、万明路5个难民收容所共收容2200人。后又增设东北大学收容所、南半截胡同收容所两处,共有难民1000多人。^④

北平分会也对灾童进行收养及医治。1929年7月,《申报》刊载红十字会“征求收养灾童善策”^⑤,其中“临时灾孩收养问题二十四条”中专门彰奖北平红会的做法。根据总会要求,北平分会暂将甘绥察冀的灾孩收养于收容所进行施救教养。依据患有疾病灾孩的不同状况进行针对性救治,通常是先安置于北平地区的收容所,待灾孩身体痊愈后再安排接种牛痘疫苗、救治传染病等,最后将痊愈的灾孩护送至上海。例如,1929年末,北平分会先将在甘肃地区收容的灾童三百名运抵北平,后将连同之前由绥远运来的灾童三百名,由新铭轮运送到上海^⑥,帮助他们开启新的生命旅程。

在医疗救治方面,1926年4月,总会以“连年战事,需要救护机关”呈请在北京成立总会战时救护医院,即中国红十字会医院。1928年11月,北平分会接管并改组为北平市红十字医院^⑦。该院坐落于北平市养蜂夹道,设备齐全。医长为医学造诣较深的留法肺癆专家崔谷忱,院长为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医界名宿全绍清。当时医院有病床30张,主要收治肺结核病人。在社会各界支持下,到1935年病床增至50张,其中免费病床10张。1929年,医院东院全部改为肺病天然疗养院,全面门诊为12000人次。疗养院对生活困难的病人施诊施药;对长期住院疗养的病人酌情减免住院费;对于门诊看病者一律免费。据统计,从1929年10月到次年6月共施诊9312人次。此外,除疗养院施种牛痘以外,分会还在干面胡同会址特派专人常日施种^⑧。

北平分会也积极参与救灾。1929年6月,西北、华北旱灾严重,“其最甚者为陕、甘、晋、绥等省,终岁不雨,赤地千里”,灾民时状甚为凄惨。为赈济七省奇旱,红十字会出台“治标治本之办法”。“治标”举措之一就是在北平、开封、西安各设临时灾童留养院、灾女教养院6处,每处月支衣食5000元,

① 孙敬敏编纂:《北京市红十字会的65年(1928—1993)》,北京:文津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② 《北平红会收容难民》,《申报》1928年6月24日,第四版。

③ 《平津近闻》,《申报》1928年11月16日,第七版。

④ 孙敬敏编纂:《北京市红十字会的65年(1928—1993)》,第8、10页。

⑤ 《红会征求收养灾童善策》,《申报》1929年7月22日,第十四版。

⑥ 《绥甘灾童自平运沪》,《申报》1929年11月8日,第六版。

⑦ 《中国红十字总会设立北平办事处派舒敏杰为主任请予协助给市府的代电及卫生局金中孚等会同社会局调查本市红十字医院需要物资状况给局长的签呈》,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档号:J005-003-00914。

⑧ 孙敬敏编纂:《北京市红十字会的65年(1928—1993)》,第10—11页。

额定 1000 人^①。可知,北平红十字会自独立设会以来尽己之力,济度黎民,弥补政府救济不足,成为百姓的生命福音。

二、抗战时期北平红十字会的艰难生存与战地救护

抗战时期,烽火遍地。危急时刻,“何以维护民族,振救灾黎”,红十字会认为自身的工作“实为全体会员之试金石”^②。国难家仇面前,中国红十字会及各地分会恪尽职守,履行博爱恤兵的战地救护宗旨,救护功绩令人振奋,“前线一带,已布遍红十字会之旗帜”^③。北平红十字会在民族存亡绝续之秋,基于民族情怀慨然担当,做出了应有的历史贡献。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麇集难民,北平红十字会立即作出反应。9 月 28 日,分会致函日本驻辽宁司令官,称“本会职责所在,不能不为之拯救”,遂组织救护队员 25 名开赴辽宁各地。救护队所需的装备及资金,由北平红十字分会会议事员及社会各界人士慷慨捐助。10 月 3 日,救护队到达后在皇姑屯设立难民临时流通收容所^④。4 日,救护队队长张实携队员赶赴各粥厂调查难民情况,统计难民总计为四万多人,其中集聚在皇姑屯的难民约六千余人,欲归无计。10 月 10 日起,救护队谋划将难民分别移至皇姑屯收容所及北平收容所。

北平红十字会还帮助遣返灾民、难民和伤员。1931 年 11 月至 1934 年 5 月,转送上海、天津红十字会送来的绥远、陕西等地灾童、伤员数十人返回原籍。1933 年 10 月 7 日,北平分会按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函要求,对于愤慨投书北上从军的中国救济伤残疗养院职工多人,帮助他们办理由平至沪的军用免费乘车券。

1932 年,山海关沦陷,民族革命的烈焰怒烧长城内外。前线抗日伤兵和受伤群众甚多,北平各界纷纷组织救护队。3 月,北平红十字会女分会组织救护队 24 人南下,进行战地救护工作^⑤。1933 年 2 月,日军进犯热河,中国守军英勇反击,然而受伤将士得不到及时救治,兼之天气寒冷,伤员痛楚呻吟。华北救护委员会在北平正式成立,将救护队分为 12 组,赶赴各处救护伤员。自此,北平红十字分会在华北救护委员会统一安排下救伤瘞亡,不遗余力。3 月,第二十九军官兵与日军在长城喜峰口附近展开殊死拼杀,伤亡惨重,大批伤病员被运抵北平。北平各界自发组织数十个临时救护医院进行救护,其中北平红十字会设立 7 处救护医院。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帝国主义公然向北平西郊的卢沟桥中国驻军挑衅,炮击宛平城,挑起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守军奋勇抵抗,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在此紧急关头,救护委员会华北分会组织重伤手术组和救护组,北平分会与天津分会积极配合参与救护。7 月中旬,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委员会华北分会、北平红十字会及时组织救护队,分赴琉璃河、廊坊、黄村、榆垓及长辛店等地,对抗日军

① 池子华、郝如一:《中国红十字历史编年(1904—2004)》,第 61—62 页。

② 沈金涛:《岁暮告同胞书》,《中国红十字会月刊》1936 年第 18 期。

③ 《红会前方电告:需要救护药品》,《申报》1936 年 12 月 14 日,第十一版。

④ 池子华、郝如一:《中国红十字历史编年(1904—2004)》,第 65—66 页。

⑤ 《华北妇女救护队南下》,《申报》1932 年 3 月 16 日,第七版。

民和战区难民进行医疗救护,共救护受伤军民 500 余人。随着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华北烽火连天,大批难民云集京津。中国红十字会会同京津分会设置难民收容所,收容妇孺老弱。北平分会还与其他团体鼎力合作,联合救助。7 月底,中国红十字会决定加入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救护委员会,以协助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设计委员会办理救护事宜。该设计委员会将绥远抗战募捐款项所余部分充作平津难民救济费,汇寄 5000 元交由赈务委员会驻北平办事处查放,并“广事收容处于危难中之难民”^①。北平分会还派出医师、护士,到各难民收容所为难民治病,仅 1937 年 8 月 12 日到 9 月 2 日就治疗 1936 人次。9 月份,敌伪勒令北平红十字分会取消名义,停止组织活动^②。北平分会原有机构及场所被伪华北临时政府劫持,改为伪中国红十字会总会。1944 年 10 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强令该会停止活动,后改为伪华北救护委员会,隶属于伪华北医药卫生委员会^③。

尽管沦陷时期北平红十字会组织活动趋于停滞,但仍在艰难中求生存,继续从事战地救护工作,其救护业绩得到学界的充分肯定^④。抗战期间,红十字会明确指出,抗战“简直可以说是民族复兴的起点”,激励大家“到前方去”;抗战后期,红十字会喊出“天快亮了”的口号,激励广大会员发扬“冒险犯难”“牺牲服务”的红会精神,要“加倍努力,配合着抗战的步骤”^⑤,鼓励会员投身战地救护。抗战数载,风雨飘摇,然而红十字会同人“刻苦自励,一致合作”,在挽救民族危亡的时代主题下,中国红十字会以及北平分会的广大会员们“慷慨英发,蓬勃奋斗”,他们积极奔赴战场,医治伤员、救济难民,展现出人道博爱情怀和民族气节,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人道领域大放异彩,成为此时期红十字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

三、复员时期北平红十字会的组织恢复与社会服务

抗战胜利后,中国红十字会宣布进入“复员时期”。1946 年 12 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令发《复员期间管理红十字会办法》,规定复员时期的工作重点由抗战救护转为“专为和平建设之社会服务”,强调将建设分会、征集会员、筹募基金作为工作重点,以增强红十字会的实力,“复员伊始,与国共新”。据此,北平红十字会重新筹划恢复组织,同时“突破救护的藩篱”,开展广泛的社会服务。

(一) 会员征集与文化宣传

会员是红十字人道精神传播和实践的基本力量,征募会员是红十字会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根据《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管理条例施行细则》规定,红十字会分会需要每年征集会员一次。据此要求,北平红十字会在抗战前的 1934、1935、1937 年初先后有过三次大规模的会员征集活动^⑥。

抗战胜利后,北平分会注重调动社会力量,特别是借助一些行政要员和社会名流的隆誉和人脉

① 池子华、郝如一:《中国红十字历史编年(1904—2004)》,第 77—78 页。

② 孙敬敏编纂:《北京市红十字会的六十五年(1928—1993)》,第 10、14 页。

③ 杨红星:《抗战胜利后北平红十字会的历史变迁》,《北京档案》2015 年第 7 期。

④ 崔龙健、池子华:《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述评》,《民国档案》2015 年第 2 期。

⑤ 严独鹤:《到前方去》,《中国红十字会月刊》1937 年第 19 期;朱文新:《天快亮了》,《红会精神》,《会务通讯》1944 年第 29 期、1945 年第 31 期。

⑥ 孙敬敏编纂:《北京市红十字会的 65 年(1928—1993)》,第 11—12 页。

资源,广泛联络,推进会务。1945年12月11日,分会召开征求会员运动大会,做好动员准备工作^①。大会指出,红十字会的宗旨是“服务社会,博爱人群”,红十字会“有帮助人人的义务”,同时“人人有帮助红十字会的义务”^②,肯定会员享有一定的权力与义务:一方面红十字会系社会服务机关,凡入会者“须具牺牲服务之精神”;同时,为“增进会员福利起见”,红十字会设立的医院、诊疗所、图书室、交际室、救护训练班、演讲会、电影会等,会员均可参加享用^③,以此激励人们的参会热情和活动积极性。1946年8月26日,总会会长蒋梦麟和北平分会会长王正黼在总会礼堂召开茶会,招待北平市党、政、军、警、教育、新闻、商界等知名人士共50多人,由此拉开征求会员运动的序幕。

9月5日,北平红十字会成立征集会员委员会,并推举李宗仁(国民政府北平行辕主任)担任总队长,孙连仲(第十一战区司令)、熊斌(市长)、张伯谨(副市长)、胡适(北大校长)为副总队长。9月15日,北平分会致函北平市政府,称“对于青年、儿童、妇女、荣军、救济、医疗、救护、文化等项业务,皆拟设法积极推进”,然而“部门既广,事项尤繁,本会人力财力均属有限,势非广征会员通力合作不易完成”,因此,征求各界协力进行,恳请市长、副市长担任正副队长,各局局长分担队员,广为征募会员。此后,北平市政府要员及地政局、警察局的行政要员亦加入政府队^④。10月5日,征求会员大会开幕典礼举行,总队长李宗仁致开幕词。担任副总队长的胡适在北京大学积极宣传,函请北京大学同仁加入红十字会。此次他被邀请发言,并谈及与红十字会的渊源。政府各机构纷纷响应,积极招募会员^⑤。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历来有开办“红十字周”活动以征集会员、扩大宣传的传统,抗战时期曾多次举行“红十字周”活动^⑥。有学者考察认为,围绕抗战建国的使命,国人将红十字运动作为重要载体之一^⑦。“红十字周”打出的宣传标语,诸如“参加红会工作与参加前方工作同样重要”“民众为国致力最切要的目标,便是致力红十字会事业”“中国红十字会事业的发展,是中国人的荣誉”等^⑧,着重强调红十字会和抗战建国的关联,以此尝试建构民族主义的精神象征,培育民众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自1946年8月13日开始,总会决定恢复举办“红十字周”,使之成为各地分会更具规范化、制度化的“法定”活动项目。

1946年的“红十字周”期间,北平分会举办一系列舆论宣传活动。分会印发大量宣传资料,并编印“征友专刊”。专刊发刊词殷切之意跃然纸上,全文如下:“北平分会自‘七七’事变以还,会务被迫停顿,今次复员,重张旗鼓,抱人生服务之目的、博爱为怀之精神,以促进社会安全,谋求人类幸福。一切业务,变消极为积极,变慈善为社会性,变局部性为普遍性,以是关于青年、儿童、妇女、救济、荣军、医疗、救护、文化等事,莫不积极筹画次第推行。只以部门既多,事项尤繁,势必广征会员,群策群

①《红十字会征求会员运动大会函征募会员请转知各同仁自动参加》,档号:J181-014-00757。

②《红十字北平分会恢复会务征求会员的函、代电和社会局的批》,档号:J002-002-00181。

③《红十字会北平市分会征集红十字会会员及地政局、警察局入会名单等》,档号:J001-002-00381。

④《红十字会北平市分会征集红十字会会员及地政局、警察局入会名单等》,档号:J001-002-00381。

⑤ 孙敬敏编纂:《北京市红十字会的65年(1928—1993)》,第17页。

⑥ 吕志茹、池子华:《复员时期的红十字周》,《历史教学》(高校版)2008年第5期。

⑦ 郭进萍:《红十字运动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⑧ 池子华、傅亮等主编:《〈大公报〉上的红十字》,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79页。

力,分工合作,乃克济事。兹当第五届宣传周,本分会特举行征求会员运动大会,并发行是刊,以期唤起市民之注意,加强对于本会之认识。所望有志之士,加入本会,共同努力,以达成伟大自助助人之使命,则社会国家自跻于康乐强之境矣”^①。

北平红十字会非常注重面向会员灌输红十字人道思想,着力教育和培养年轻会员的社会服务意识。北平分会坚持认为,服务就是人生,一名合格的红十字会会员应当具备人道主义基本素质;要自觉秉承红十字会的理念,具备服务社会的坚定信念。综合其活动要目,“计有特刊、广播、集会、画展、征文、电影、音乐、慰劳、教师联谊、康乐活动、健康检查等,极能引起社会对于红十字会工作(之关注),更增一番认识与兴趣”。北平分会还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例如:开办图书游艺室,每月增添杂志等新书,并备有报纸及游艺品多种;设立伤兵玩具工厂;开办救护训练班等^②,以此鼓励和吸引民众亲身参与到红十字活动中,感受红十字的文化与精神。对于会员而言,以此增加沟通,主动传播红十字会人道文化理念和服务社会的精神观念,从而增加自豪感、认同感和服务意识。由此,北平分会的征求会员工作被总会认为是各分会中“最具有规模者”之一。

为扩大红十字事业的影响力,北平红十字会在学校里广泛地开展征文活动,宗旨在于“提倡青年对红十字会之认识及兴趣起见”,但凡北平市各大、中学校学生均可参加。征文活动分为两组,大学组的题目是:博爱;红十字会与世界安全。中学组的题目是:服务即人生;理想中的红十字会。活动开展以后,每组均征得50余篇征文。评比结果显示,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以及育英学校等各大、中学校学生纷纷投稿。为激发更多人参加征文活动,北平分会还规定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和会员优待;优秀文稿在总会《红十字月刊》上发表。分会还招待全体应征同学,当场由王正黼会长颁发奖金以资鼓励,在社会上产生积极影响。

北平红十字会的文化舆论宣传及征募会员活动产生了直接而有效的影响。截止到1946年11月底,共征集会员28703人,其中青年会员16021人,1947年底,会员总数已达41651人,“实开空前未有之记录”^③。经过努力,红十字人道理念深入人心,社会服务思想逐渐传播,会员数量不断增加,会员规模显著扩大。

(二) 社会服务活动

复员时期,红十字会面临“新机运”,因此规定“凡有利于社会安全、有利于民生者,均属红会工作范围”^④。复员之初,北平分会即被总会选定为红十字服务中心试验区,在很多服务领域开风气之先且成效显著。北平分会指出,“以往工作为慈善性质,仅具医药救济及伤兵救护等工作。自抗战胜利后,本会一切事业变消极为积极,慈善性为社会性,变局部性为普遍性。今后之工作,注重青年、儿童、妇女、荣军、医药、救济等事业,使人人能自助助人,则社会国家自济于康乐、富强之途矣”^⑤。北平分会还为此强调会员参与社会服务的信条:具丰富情感、抱牺牲志愿、本博爱襟怀、献科学身手;作精密准

① 孙敬敏编纂:《北京市红十字会的65年(1928—1993)》,第22页。

② 《红十字北平分会恢复会务征求会员的函、代电和社会局的批》,档号:J002-002-00181。

③ 孙敬敏编纂:《北京市红十字会的65年(1928—1993)》,第17、23、27页。

④ 曾大钧:《中国红十字会之新机运》,《红十字月刊》1946年第1期。

⑤ 《红十字会北平分会征募红十字会会员及地政局、警察局入会名单等》,档号:J001-002-00381。

备、求迅确效率、策社会安全、增人群幸福^①。

北平分会不仅举办救护训练,并对青年、儿童、妇女、荣军等项事业及康乐活动逐渐推展,相继成立了华文打字学校、民众识字班、儿童福利站、托儿所、图书阅览室、荣军玩具厂、缝纫班、职业介绍所、诊疗所、救护训练班等10类公益事业,并配以相应的服务设施^②,以培植实用人才为宗旨,力行社会服务之功能,在协助基层民众增长人道服务知识、扩大就业谋生手段以及救济贫困、发展公益等方面着力尤多,向着“成为现代化之社会服务团体”的目标迈出了重要步伐。下面重点介绍复员时期北平红十字会的若干项社会服务活动。

1946年3月,北平红十字医院向总会求援称,自七七事变以来,“物资腾贵,生活日高”,院中开支“人不敷出,困难万分”。但是,医院“在敌人铁蹄之下,既不拟向之乞求援手,亦不愿作无谓之呼啸”,更可恨的是,“日人屡拟参加间谍,破坏本院组织”。由于医院人员“坚持不合作主义”而坚持抵抗,院长曾被多次逮捕,惨遭非刑,但全院人员立志“坚持节操,砥砺风俗,以维护民族正气”。八年沦陷时期,红十字医院困苦万状,不仅日常经费匮乏,而且药物、医疗器械、卫生材料等均难充分购置。现在,“最为需要者为X光线机、人工太阳灯及电疗器械等”,然而每月所需普通药品、卫生材料等亟待补助;物品年久破坏不堪使用;加上病房多年失修而时有渗漏、开裂情况^③。红十字医院言辞恳切,最终获得总会的经费支持,并得到美国红十字会赠送的医药药品及医疗器材^④。4月,获得平津防痨协会捐赠巨型X光机一架。同年,建立起院务委员会,并制定院务委员会条例,红十字医院得以维持运转。

北平红十字医院门诊部计有内科、外科、眼耳鼻喉科、肺痨科等,住院患者以肺结核病人多为多。医院平时每日上午施诊,来院就诊者常在五六十人左右,夏季则超过百人。1948年6月至8月,门诊施诊15280人次。医院救济贫苦患者,并特别看重防痨工作与战时担任救伤事宜,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平民阶层的欢迎。

鉴于北平市民患砂眼者甚多(约占人口总数十分之四),分会和北平市卫生局于1947年5月成立砂眼防治运动委员会。委员会除宣传预防砂眼知识外,还设立义务检查站,聘请著名眼科专家毕华德、陈希礼等20余位名医开展义务检查及治疗工作。治疗砂眼所需药品和资金,多为美国红十字会捐赠;国际救济委员会也捐赠一批药品和一辆救护车。为便利市民诊查和治疗,北平分会还组织3个巡回诊查小组、1个中心小组,每天分赴各机关、团体或学校。两个多月检查了6580人,并对其中3050名砂眼患者进行免费治疗。为使此项社会服务事业能够常年开展,同年6月,北平分会将砂眼防治运动委员会改为中国红十字会北平分会砂眼防治所。该所成立后,每天上午门诊,下午深入

① 蒋梦麟手订:《红十字会服务信条》,《红十字月刊》1946年第9期。

② 《红十字北平分会恢复会务征求会员的函、代电和社会局的批》,档号:J002-002-00181。

③ 《中国红十字总会设立北平办事处派舒敏杰为主任请予协助给市府的代电及卫生局金中孚等会同社会局调查本市红十字医院需要物资状况给局长的签呈》,档号:J005-003-00914。

④ 《市立北平医院报送民国三十六年五、六月份领用美国红十字会医药器材月报表的呈及卫生局的指令》,档号:J005-003-00731。

工厂、学校等单位免费检查^①,治疗时,仅收取少量药费,群众对此赞誉有加。

1947年1月,北平红十字会与北平市社会局“为推进儿童福利事业,便利职业妇女适应社会需要”,“为救护本市清寒平民子女,减轻家庭负担,辅助家庭教育,发育优良身心起见”^②,特合作筹设北平市托儿所,所长由北平市社会局派遣方毓英担任。托儿所内设总务、收容、寄托三股分掌各事项。其中,收容股掌理收容弃儿及流浪儿童教养及福利事项,寄托股掌理寄托儿童教养及福利事宜等。托儿所房屋是利用北海桑园门的救济委员会原有房宇(约三十间左右)加以修建而成。托儿所的厨房、厕所以及用于清洁、盥洗、体检的用具、水电设备等较为齐全。除完善基本设施之外,托儿所内也置备了游戏器具、工作用具等用于教育和培养幼儿技能的设备。分会设定托儿所以一百名为限,分自费、半费、全面三种。全免费者占百分之三十,以孤苦儿童及清寒家庭之子女为限;半费占百分之三十,以子女众多及家庭负担困扰多者为限;自费占百分之四十,以职业父母无暇兼顾者为主,可自行申请入托。托儿所对于托儿的身体条件也有相应规定。诸多规定可谓周详备至。北平分会在复员时期专门开办托儿所,承担起教养孩童的责任,帮助他们培养劳动技能,发展健康身心,具有进步意义,做出了积极的历史贡献。

抗战胜利后,北平红十字会面对贫民、灾民继续开展赈济救助工作,安抚民众生计。1946年4月起始,调查并施放赈衣四次,共施舍育婴堂等十四个单位、个人贫者五十二人^③。12月,北平分会开办国子监暖厂及极乐庵粥厂,每天分别接受救济者平均为40多人和1900余人。至次年3月,贫民就食领粥者共190066人,一般贫苦市民由此可得温饱而度过寒冬。1947年7月,经市长批准,北平市社会局以北平红十字会办理冬赈粥厂、暖厂成绩优良而颁赠锦旗以资鼓励。1947年春,美国红十字会捐赠一批旧衣,重量约计两吨。为“散放以惠穷黎”,北平市政府指派平津铁路局、红十字会北平分会配合,将该批旧衣经由天津免费运抵北平^④。北平分会随即组成赈衣分配委员会,进行调查后分发给慈善团体、学校等52个单位以及赤贫个人124人。自1948年1月19日开始,北平分会在干面胡同22号会址向贫民发放玉米面窝头。此次所获捐款所余款项用于购买棉衣、鞋帽等物,发放给贫困民众度过冬荒。北平分会坚持秉承博爱众生的红十字精神,向受难群众施以援手,竭力开展各类救恤赈济活动,民众对此颂声载道。

(三) 救护及医疗防疫服务

复员时期北平红十字会的主要任务是开展社会服务,但仍在必要之时进行战地救护和诊疗、防疫服务。1947年2月15日,通县发生国共两军冲突,北平分会总干事吕芝山偕医护人员前往现场实施救护。共有受伤士兵7人、百姓9人,他们对伤员进行初步救护后送至潞河医院救治。1948年,国民党政府胁迫两万名东北学生来北平并进行严格控制,多数学生住在破庙和城墙洞内,由于伙食很

①《中国红十字会北平分会关于筹设沙眼防治所撤销与卫生局合办沙眼防治运动委员会的代电、函》,档号:J023-001-00193;J023-001-00202。

②《社会部关于社会局与红十字会北平分会合办托儿所请补助开办费的训令及设立托儿所办法、计划大纲》,档号:J002-006-00376。

③《红十字北平分会恢复会务征求会员的函、代电和社会局的批》。档号:J002-002-00181。

④《北平市政府关于平津铁路局、红十字北平分会关于美国红十字会“捐助”旧衣及免费由津运平的函》,档号:J001-002-00556。

差,学生患肠炎痢病者甚多。对此,北京大学医学院组成以学生为主的医疗队,去为这些东北学生看病。由于国民党当局控制严格,不能自行前往。北平红十字会得知情况后,支持学生们的正义行动,同意以红十字会救护队的名义为东北学生看病。队员们打着红十字旗帜、佩戴红十字臂章出现在东北学生面前,从而冲破了国民党的封锁,有效控制了传染病的蔓延^①。

此外,红十字会始终重视医疗防疫工作。抗战时期,“视推行医疗事业与健康”为“军事第一”“抗战第一”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今后改进民生、提高民权的根本条件”,以造就身心健康的国民,使民众“自觉融入抗战建国、战后强国的洪流”^②。复员后,红十字会认为广泛的防疫工作,不但直接给予人民健康的保障,“实与新中国的建设,乃有密切关系”^③。1947年6月,北平红十字会与北平市卫生局合办外城卫生所^④。

四、历史评价

(一)在国难当头时无愧人道慈善典范

伴随着近代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进程,慈善事业没有中辍停滞,反而在异常险峻的生存条件下吐故纳新、除弊兴利,勉力发挥博施济众、恤贫济困、消弭战乱、稳定社会秩序的强大功效^⑤,其作用举足轻重,贡献不容低估。回溯历史可见,民国时期北京(平)红十字会演绎的人道实践,打开了该地区红十字人道慈善事业的大门,也在“历史慈善地理”^⑥的近代版图中留下一幕幕光彩壮举。

近代以来,我国慈善事业因激烈变化的时局而发生重大转型。在国难当头、国运屈辱的历史时期,慈善组织担当时代赋予的重任,北京(平)红十字会即为典型缩影之一。自1928年正式独立设会以来,面对来自经费、会员、政府以及战争、天灾等方面的困难或障碍,在慈善领域里披荆前行,在夹缝中生存,务实开展大量赈济助贫施药等传统意义的慈善实践,而且也注重借鉴学习西方先进的慈善救助、救护模式。

同时,北平红十字分会与总会保持一致步伐,履行分会的各种义务并行使相关职能:从事社会服务工作,增进社会福利项目,赈济赈灾,服务大众,以求最大限度地消减或纾缓人民生活的匮乏与窘迫。在具体的人道活动以及社会服务活动中,北京红十字会依据本地特点以及分会自身能力,着重解决北京地区的实际问题,满足当地民众的具体需求,凸显自身的地域特色。北平红十字分会不仅开展地方性慈善救护活动,而且实现跨越区域的联手互动,促进了慈善资源的地方性流动。尽管受到时代限制,固然存在强差人意之处,但是成绩有目共睹,塑造出良好的慈善形象,无愧人道慈善典范,在北京社会发展的历史上留下不灭的印记。

① 孙敬敏编纂:《北京市红十字会的65年(1928—1993)》,第30页。

② 陈衡哲:《健康第一》,《救护通讯》第37期,1945年4月,第1页。

③ 胡兰生:《中国红十字会战后工作意见》,《会务通讯》第4期,1944年1月,第3—4页。

④ 《北平市卫生局呈送与中国红十字总会北平分会合办外城卫生所合同及市府的指令》,档号:J001-003-00328。

⑤ 周秋光主编:《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07页。

⑥ 郝红暖:《历史慈善地理研究刍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二)在革命洪流中承载民族情感

在近代百余年的民族革命征程中,慈善组织与之相互映照、风雨同行。红十字会也不例外。“我们先把中国红十字会的历史解开了瞧瞧,那里面,每一页的字里行间,都不是民族的血迹?都不是本会的汗斑?”^①通过探究两者的勾连与互动,可以感受到近现代中国社会在激烈转型时期民族精神对慈善救助事业的深刻影响。

近代中国急剧的社会变迁以及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给慈善事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促使传统慈善事业发生近代转型,并且具有极其丰富的时代蕴涵。近代中国民族矛盾尖锐,慈善事业折射出民族革命时期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居危思变的民族精神^②,以及中华儿女捍卫民族自尊、传承民族文化的决心、坚强不屈的抗争精神,在慈善领域里为抵御外侮、保持民族尊严做出了切实而独特的历史贡献。众多慈善组织承载着中华民族强烈而深沉的民族感情,在时局维艰的特殊历史氛围中,慈善活动映照出近代中国人民百折不挠、自强不息、抵御外侮、互救互助的民族精神。面对救亡图存的现实需求和时代号召,国人将发展慈善事业与解决民族危机联系在一起^③。例如,中国红十字会在抗战胜利后刊文指出,红十字宗旨在于“博爱人群、服务社会”,“朝着建国的大道上迈进”^④;控诉日本危害中国以及中国红十字会的罪行,着实“罄竹难书”、“何可胜数”^⑤;而且明确宣称,本会“须得到本国政府的承认”,所以“是绝对要国家、爱国家的”^⑥。

尽管广大慈善人员并未在前线出生入死、荷枪冲锋,但在另一个“战场”——慈善领域里日夜尽瘁、履险若夷。特别是红十字人士“高燃仇恨之火,不惜前赴后继”,“躬冒锋镝,舍己救人,其可歌可泣,实非笔墨所能状其万一”^⑦。他们在抗战洪流中,与难胞“同生死,共患难,亦步亦趋”,由于他们不懈地解救民众的生命,分担政府的救助职责,无疑从人道慈善的角度为争取民族独立、谋求民族解放做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他们的人道慈善行为,蕴含着别样的革命精神和爱国情怀,应该给予认可。特别是红十字事业以其独特的实践和价值,强化了国人民族心理的塑造,培育了国人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伴随着红十字会务活动的渐次开展,民众在社会参与、国民意识等方面不断觉醒,这些新气象进一步助力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⑧,其历史贡献自然不容弱化、不应遮蔽。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逐渐响彻云霄,中国红十字事业自诞生起就被赋予浓重的民族主义底色。红十字会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和民族革命过程中,为民族解放运动演绎出无数的动人篇章,我们由此可以感知和把握近现代中国波澜壮阔的时代洪波和民族主义的主流脉动,感触到慈善组织与社会变迁的同步律动。随着形势的发展,红十字会适时趋变,及时地调整发展方向,但始终高擎人道主义的旗帜,在民族革命的时代为近代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做出了切实而独特的历史贡献。

① 沈金涛:《中国红十字会对于新年的感想》,《中国红十字会月刊》1937年第19期。

② 周秋光主编:《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上,第92页。

③ 周秋光:《中华慈善的传承与转型发展》,《经济社会史评论》2016年第1期。

④ 陈蕙君:《红十字会的社会服务》,《红十字月刊》1946年第9期。

⑤ 汤鑫舟:《日本危害中国红十字会的罪行》,《红十字月刊》1946年第1期。

⑥ 胡兰生:《红十字会的性质与任务》,《红十字月刊》1946年第7期。

⑦ 汤鑫舟:《抗战中之中国红十字会护士》,《红十字月刊》1946年第8期。

⑧ 郭进萍:《红十字运动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不过,在“复员”期间,尽管北平红十字会积极开展社会服务,但这些活动大多属于公益性质,需要相应的经费支持。政府的相关政策和措施虽然多少减轻了经费压力,勉强维持会务的日常开展。但总体仍不足以应付各种开销,经费时常陷入窘境。从复员中后期的后续进程来看,经费出现难以为继、苦撑度日的状况;加上时局急剧变化,导致人事更迭、人心浮动,会员活动基本陷入停顿,最终造成复员转型的宏伟抱负无奈搁置。虽然红十字会在理论上是一个超越阶级、地域和党派的中立的人道主义组织,但又无法全然脱离复杂的社会现实,激烈的民族战争和国内战争,都会使其活动受到制约和影响^①。因此,北平红十字会在复员时期尽管抱定“服务社会,博爱人群”的宗旨,试图再度开创红十字人道事业的壮美华章,理想的蓝图最终落空。直至新中国宣告成立,北平红十字会才由此脱胎换骨,重获新生。1950年12月28日,中国红十字会北京市分会协商改组会议召开,会议明确了新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宗旨,决定协助北京市各级人民政府推进医药卫生及救济福利事业。自此,中国红十字事业踏上了建设“人民的红十字会”^②的崭新征程。

责任编辑:侯德彤

On the Charity of the Red Cross Society in Peiping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ng Juan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 humanitarian practice of the Red Cross Society of China in modern times accompanied the course of China's national democratic revolution.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the Red Cross Society of Beijing (Peiping) opened the prelude of independently establishing organization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despite the difficulties of survival, efforts were still made to rescue and help the needy, showing humane feelings and national integrity.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entering the "demobilization period", the focus of work shifted to "social service for peaceful construction", daily attention was paid to raise the public awareness of social service, and extensive social welfare activities were carried out to "achieve the great mission of help and self-help" so that "the society and the country could enter the state of happiness and prosperity". Looking back on the history of the Red Cross Society of Beijing (Peiping)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history, we can see the humanitarian feat rich in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also be felt that in the perilous historical atmosphere of modern times, the humanitarian charity and the theme of national revolution were intertwined,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national spirit in the field of the Red Cross.

Key words: Republic of China; Peiping's Red Cross Society; humanity; national spirit

① 蔡勤禹、王付欣、刘云飞著:《青岛红十字运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1页。

② 孙敬敏编纂:《北京市红十字会的65年(1928-1993)》,第35—37页。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券信用利差的非线性影响

——基于中国债券市场数据的研究

刘茵伟 张群姿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 基于2010年1月—2020年12月间在沪深交易所发生过交易的已到期和未到期的公司债和企业债,利用面板回归模型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将带来两种不同的效应:一是通过提高市场流动性和增强市场套利动机,可降低债券信用利差;二是通过增大企业信用风险和资产抛售机制,可推升债券信用利差。二者的共同作用使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呈现出一种正U型关系,但在国债、高信用评级债券样本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中,这种正U型的关系会被显著削弱。

关键词: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债券信用利差; 正U型

中图分类号: F8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3)01-0123-12

一、引言

目前,我国已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债券日益成为企业融资的重要金融工具。但近年来,受中美贸易战、金融监管政策趋严、新冠疫情冲击等因素影响,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增强。在此背景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债券信用利差的关系问题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但相关学者关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是正相关关系还是负相关关系问题仍然存在争议。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债券市场起步较晚,且刚性兑付现象较为严重。刚性兑付是指政府对陷入财务困境的企业实施救助,从而避免违约事件发生。^① 刚性兑付虽然在保护投资者利益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滋生了市场套利行为,扭曲了债券定价。在市场对大部分债券存在刚性兑付预期的背景下,由于信用债收益相对较高,一旦市场存在套利机会,投资者就会运用信用债进行套利交易,而套利交易导致我国信用债信用利差与经济周期走势同向的异象。但最近有学者却发现经济政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项目“金融风险测度与预警”(7222201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技企业创新与尾部风险:微观机制与预警体系”(7190311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中国家庭风险测度、成因及外溢性研究”(21&ZD08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茵伟,男,山东临沂人,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资产定价和公司金融研究;张群姿,女,经济学博士,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金融风险、资产定价和金融大数据分析研究。

^① 纪志宏、曹媛媛:《信用风险溢价还是市场流动性溢价:基于中国信用债定价的实证研究》,《金融研究》2017年第2期;王叙果、沈红波、钟霖佳:《政府隐性担保、债券违约与国企信用利差》,《财贸经济》2019年第12期。

策不确定与债券信用利差正相关,债券信用利差走势与经济周期走势相反。^①这一结论与外国学者基于境外债券市场得出的研究结果一致^②。国内研究结论存在差异的原因,可能与相关学者研究的样本区间因素有关。

由于现有基于中国债券市场数据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且研究结论既存在正相关的结果,也存在负相关的结果,因此本文推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券信用利差存在一种非线性的影响。因此,本文整理了2010年1月—2020年12月之间在沪深交易所发生过交易的已到期和未到期的公司债和企业债面板数据,通过在模型中引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平方项,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券信用利差的非线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存在显著的正U型关系,即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的不断提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券信用利差的作用由负转正。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软预算约束机制、安全资产转移机制以及市场化程度的影响下,相较于非国企债、低信用评级债券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在国企债、高信用评级债券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样本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正U型的关系会被显著削弱。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债券流动性之间存在显著的正U型关系,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债券价格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相关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基于一个更长的样本时间跨度从市场流动性和信用风险两个角度深入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相关领域的研究。第二,基于流动性和价格视角进一步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券信用利差影响的内在机理,深入证实市场套利行为现象,深化了相关领域的研究。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本文推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正U型关系的存在,可能与市场流动性和信用风险有关。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时,政府会通过降息、降准等宽松货币政策进行逆周期调节;此时货币市场利率下行,流动性较为充沛,存在套利空间,投资者会通过增持信用债以获取期限利差。同时,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较低时,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提升,企业违约风险有所增强,但违约风险总体可控,违约概率相对较低,即使有个别企业发生违约,政府救助难度相对较小,市场套利相对容易。此时,投资者套利动机显著增强,会扩大信用债持仓量,大量需求对债券信用利差降低的影响大于企业信用风险增加对债券信用利差提高的影响,使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券信用利差影响的净效应表现为负;而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达到一定水平后,比如出现严重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情况会有所不同。根据Choi等人提出的资产抛售理论,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强的时期,企

① 王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信用利差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上海金融》2020年第2期;杨媛杰、陈艺云、王傲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风险承担与公司债信用价差》,《金融经济学研究》2020年第6期。

② Ioannidis C., Kook K A.,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and Bond Risk Premia",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2021, 53(6): pp.1479-1522; Mehmet B., Ojonugwa U., Hasan G., et al., "Role of Global, Regional, and Advanced Market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on Bond Spreads in Emerging Markets", *Economic Modelling*, 2021,(0214):pp.105576.

业整体违约概率显著增大,政府救助难度显著增大,且大规模的违约事件会表现出较强的传染性,容易诱发系统性风险;此时市场套利难度增强,投资者预期收益显著降低,恐慌情绪加重,大量抛售债券,债券价格降低,从而推升了债券信用利差。^①有学者基于2008年金融危机事件,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结果发现:金融危机发生后,债券信用利差显著提高。^②因此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的背景下,企业违约风险提高对债券信用利差的推升的影响大于市场流动性宽松对债券信用利差降低的影响,使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券信用利差影响的净效应表现为正。为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H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呈现出一种正U型关系。

在不同产权性质和不同信用评级债券样本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可能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在我国,所有制属性一直是导致企业异质性的重要原因。国有企业往往享有政府信用背书,软预算约束机制的存在往往导致国有企业对经济政策的变化不太敏感;与之相反,非国有企业面临更激烈竞争,对经济环境变化更敏感。^③在我国,非国有企业长期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其债券融资成本显著高于国企债融资成本,存在着较大的套利空间。因此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水平的提高,非国企债往往会成为重点套利对象,但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超过一定程度,投资者预期非国企违约风险会显著增强,投资收益显著降低,会抛售非国企债,从而推高债券信用利差;而在隐性担保预期下,政府往往会对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施以援手,因此国企债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较小。同样,低信用评级债券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往往也存在较为广阔的套利空间,但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过高的情况下,安全资产转移机制会促使投资者抛售高风险债券;而高信用评级债券往往信用程度高,经营状况佳,盈利能力强,不确定性因素对其经营和发展影响较小。为此本文提出以下两个研究假设:

H2: 相较于非国企债,在国企债样本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债券信用利差的之间的正U型关系可能会被削弱。

H3: 相较于低评级债券,在高评级债券样本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正U型关系可能会被削弱。

在不同市场化程度地区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可能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政府对经济干预的程度较小,刚性兑付现象较少,企业的信用风险主要与自身经营状况有关,而且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法制环境较为完善,有利于遏制非法套利行为,从而增加了市场套利难度;同时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金融体系往往较为发达,能够有效抵御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有利于债券价格稳定。而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往往较强,刚性兑付现象较为严重,导致政府信用与企业自身信用难以区分,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时,往往存在着较多的套利机会。有学者研究发现,企业家的政治关联层级越高,影响力越大,企业越倾向进

① Choi J., Hoseinzade S., Shin S., Tehranian H., "Corporate Bond Mutual Funds and Asset Fire Sale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20(2): pp. 432-457.

② 周宏、徐兆铭、彭丽华等:《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债券信用风险的影响——基于2007—2009年月度面板数据》,《会计研究》2011年第12期。

③ 顾夏铭、陈勇民、潘士远:《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创新——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18年第2期。

入经济欠发达地区 and 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基于政治关联的政策套利型扩张行为明显;但如果并购方来自经济发达、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时,这种意愿则会有所降低。^①为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4: 相较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正 U 型关系可能会被削弱。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为何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呈现出一种正 U 型的关系? 其内在机理是什么? 投资者套利行为和需求价格理论可以对此进行解释。根据前文分析,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相对较低的时期,市场流动性机制发挥了主导作用,而在经济政策水平较高的时期,信用风险机制发挥了主导作用。不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下的市场套利行为会影响交易需求,同时需求的变动会影响债券流动性和交易价格。债券流动性是影响债券定价的重要因素^②,且在我国债券违约频发的背景下,流动性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显著增强。^③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的提升,投资者对债券的交易需求显著增加,大量的债券交易需求会显著提高债券流动性^④,同时投资者对债券的大量需求会提高债券交易价格;而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超过一定程度,债券会被大量抛售,债券需求会大幅减少,债券价格下跌,债券流动性会显著降低,进而降低债券信用利差。为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5: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债券流动性之间呈现出一种正 U 型关系,这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信用利差之间的正 U 型关系相对应。

H6: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债券价格之间呈现出一种倒 U 型关系,这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信用利差之间的正 U 型关系相对应。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收集

本文搜集了 2010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间在沪深交易所发生过交易的已到期和未到期的公司债和企业债数据。按照如下方式对初始样本进行筛选:剔除金融行业类债券;剔除剩余期限不足一个月的债券;剔除浮动利率债券,只保留固定利率债券;由于 AA- 以下的债券数量占总样本的比重较低,故本文剔除了 AA- 以下的样本,只研究 AAA、AA+、AA、AA- 四个评级的债券;剔除数据缺失较为严重的样本。在这个基础上,用债券月末的到期收益率数据与无风险国债到期收益率数据相匹配计算得到债券信用利差。为剔除极端异常值的影响,对最终用于回归的所有连续变量进行 1% 的双边缩尾处理。最终样本数据由沪深交易所市场 3311 只债券的 76583 个月度观测值数据构成。

① 蔡庆丰、田霖、郭俊峰:《民营企业家的影响力与企业的异地并购——基于中小板企业实际控制人政治关联层级的实证发现》,《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3期。

② 王永钦、陈映辉、杜巨澜:《软预算约束与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来自金融市场的证据》,《经济研究》2016年第11期;Schwert M., "Municipal bond Liquidity and Default Risk",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17,72(4): pp.1683-1721; Feldhütter P., "Stephen M S., The Myth of the Credit Spread Puzzle",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8,31(8): pp.2897-2942.

③ 张雪莹、刘茵伟:《资本市场开放、流动性与债券利差——基于陆港通的实证检验》,《国际金融研究》2021年第7期。

④ 本文使用 Amihud 衡量债券流动性,Amihud 值越大代表债券流动性越差。

本文所用到的债券日度行情数据,如到期收益率、收盘价、交易规模等数据,来自锐思(RESSET)数据库;债券各期限的国债到期收益率数据,来自东方财富(Choice)数据库;债券层面的控制变量、公司层面的控制变量,来自万得(Wind)数据库。

(二)模型设定

为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信用利差的非线性关系,本文构造如下计量模型:

$$Spread_{i,t} = \beta_0 + \beta_1 EPU_t + \beta_2 EPU_t^2 + Controls + Year_t + Industry_i + Pro_i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i*表示债券个体,*t*表示月份。Spread为债券信用利差,是被解释变量,它表示债券到期收益率与同期且相同剩余期限无风险国债到期收益率之差。EPU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²为其平方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由Baker等构建^①,本文将其取对数并做标准化处理(原值减去均值除以标准差)。Controls为控制变量,包括描述公司层面的变量,如资产报酬率Roa、资产负债率Lev、公司规模Asset、产权性质State、是否上市公司Listed;描述债券特征的变量,如债项评级Rating^②、票面利率Coupon、发行规模Scale、发行期限Term和剩余期限Maturity;描述宏观层面的变量,如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经济增长指标PMI和市场流动性的指标M2。最后,本文用Year、Industry和Pro分别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行业固定效应和省份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t}$ 为随机误差项。各变量的详细定义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

变量名	变量简称	变量描述
信用利差	Spread	信用利差 = 债券到期收益率 - 同期剩余期限相同的国债到期收益率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EPU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变量,取对数并做标准化处理
公司规模	Asset	公司总资产,单位亿元,取对数
总资产报酬率	Roa	(净利润 + 利息费用 + 所得税) / 平均资产总额 × 100%,单位为%
资产负债率	Lev	总负债 / 总资产,单位为%
产权性质	State	若债券为国有企业发行的,记State=1,反之,记State=0
是否上市公司	Listed	若债券为上市公司发行的,记Listed=1,反之,记Listed=0
债项评级	Rating	AA+及以上信用评级的债券定义为高评级债券,记Rating=1,否则,Rating=0
债券期限	Term	债券发行年限,单位为年
剩余期限	Maturity	距离债券到期的时间,单位为年
票面利率	Coupon	债券发行时票面利率,单位为%
发行规模	Scale	债券发行规模,单位为10亿元
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其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通货膨胀或紧缩的程度,单位为%
经济增长	PMI	能够反映经济的变化趋势,PMI指数50%为荣枯分水线,单位为%
市场流动性	M2	M2同比,反映宏观流动性水平,单位为%
年份虚拟变量	Year	当其中的某一年取值为1时,其他年份取值为0
行业虚拟变量	Ind	当其中的某一证监会行业取值为1时,其他行业取值为0
地区虚拟变量	Pro	当其中某一省份取值为1时,其他省份取值为0

① Baker等利用文本检索法对《南华早报》进行统计分析,估算出提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等关键词的文章比例,进而构建了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月度指数。详见Baker., Scott., Nicholas B., Steven J., "Measuring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6,131(4),pp.1593-1636.

② 参照有关学者的做法将债项评级在AA+及以上的债券定义为高评级债券,否则为低评级债券。详见彭叠峰、程晓园:《刚性兑付被打破是否影响公司债的发行定价?——基于“11超日债”违约事件的实证研究》,《管理评论》2018年第12期。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2 所示,债券信用利差的平均值为 2.390,最小值为 -1.555,说明有些债券样本的到期收益率低于无风险国债到期收益率,与相关研究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一致。^① 债券信用利差的最大值为 12.921,标准差为 1.931,说明样本中债券信用利差的分布不均衡,差异较大。经济不确定指数(取对数并做标准化处理)的平均值为 0,标准差为 0.978,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 -4.055 和 3.005。产权性质 State 的平均值约为 0.669,说明样本以国有企业发行债券为主体,占总样本的比重在半数以上;债项评级 Rating 的平均值为 0.583,说明高评级债券(AA+ 及以上信用评级债券)占比较多。其余变量的取值均在合理范围之内,此处不再赘述。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Spread	76583	2.390	1.931	-1.555	12.921
EPU	76583	0	0.978	-4.055	3.005
Roa	76583	2.701	2.761	-2.580	13.334
Lev	76583	59.279	14.979	22.447	88.343
Asset	76583	6.066	1.474	1.890	11.375
State	76583	0.669	0.471	0	1
Listed	76583	0.460	0.498	0	1
Rating	76583	0.583	0.493	0	1
Coupon	76583	5.784	1.382	2.830	9.900
Scale	76583	1.596	1.511	0.050	16
Term	76583	6.274	2.494	1.500	30
Maturity	76583	3.283	2.132	0.100	23.500
CPI	76583	102.22	1.004	99.500	106.500
PMI	76583	50.637	1.554	35.700	55.800
M2	76583	11.258	2.698	8	25.980

(二) 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在控制时间固定效应、行业固定效应和省份固定效应的条件下,列(1)中仅放入了核心解释变量 EPU 及其平方项 EPU2,可以看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系数为正,其平方项的系数也为正,两个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然后,分别在列(2) — (4) 逐步增加了公司层面的变量、债券层面的变量以及宏观层面的变量,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系数始终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其平方项的系数也至少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存在一种正 U 型的关系。具体来说,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水平较低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越大,债券信用利差越低;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达到一定的水平后,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的提高,债券信用利差会趋于上升,与研究假设 H1 一致。同时根据列(4) 回归结果发现, M2 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市场流动性会显著影响债券信用利差,更重要的是本文在控制市场流动性的条

^① 韩鹏飞、胡奕明:《政府隐性担保一定能降低债券的融资成本吗?——关于国有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债券的实证研究》,《金融研究》2015 年第 3 期。

件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信用利差之间的正 U 型关系依旧成立,说明债券信用利差不仅仅表现为市场流动性风险溢价,还表现为信用风险溢价,从而拓展了已有研究。

表 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信用利差之间的关系

变量名	(1) Spread	(2) Spread	(3) Spread	(4) Spread
EPU	0.135*** (15.54)	0.168*** (20.88)	0.061*** (7.31)	0.068*** (8.14)
EPU2	0.032*** (5.49)	0.031*** (5.86)	0.011** (2.23)	0.013** (2.52)
Roa		-0.081*** (-32.00)	-0.060*** (-25.27)	-0.066*** (-26.93)
Lev		0.016*** (30.49)	0.015*** (28.58)	0.015*** (28.24)
Asset		-0.394*** (-63.33)	-0.220*** (-28.84)	-0.218*** (-28.69)
State		-1.415*** (-78.18)	-1.096*** (-63.80)	-1.103*** (-64.21)
Listed		-0.386*** (-21.97)	-0.216*** (-12.43)	-0.207*** (-11.90)
Rating			-0.345*** (-21.84)	-0.344*** (-21.85)
Coupon			0.441*** (69.65)	0.440*** (69.70)
Scale			0.036*** (8.32)	0.036*** (8.22)
Term			-0.003 (-1.09)	-0.004 (-1.29)
Maturity			0.002 (0.52)	0.003 (0.95)
CPI				-0.049*** (-4.14)
PMI				0.009* (1.70)
M2				-0.096*** (-17.90)
Year/Ind/Pro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1.125*** (31.43)	4.574*** (80.18)	1.198*** (15.81)	7.759*** (5.95)
Observations	76583	76583	76583	76583
R-squared	0.135	0.278	0.350	0.352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 t 值,下表同。

(三)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这种 U 型关系的稳健性,通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和使用工具变量对模型重新进行估计。

首先,为避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变量测度误差问题,本文使用 Davis 等构建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①重新进行回归,为与前文提到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EPU 相区分,此处使用 DEPU 和 DEPU2 分别表示新替换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及其平方项(下同),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

① 从 1949 年 10 月开始,他们使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来量化与不确定性相关的概念。详见 Davis S J., Liu D Q., Sheng X G.,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in China Since 1949: The View from Mainland Newspapers", Working Paper, 2019.

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逐步引入其他解释变量的过程中,新替换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变量 DEPU 及其平方项 DEPU2 的系数值虽有小幅变化,但系数符号并没有改变,而且都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这种正 U 型关系是稳健的。

表 4 替换变量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信用利差之间的关系

变量名	(1) Spread	(2) Spread	(3) Spread	(4) Spread
DEPU	0.149*** (18.96)	0.157*** (21.47)	0.041*** (5.31)	0.053*** (6.93)
DEPU2	0.040*** (6.85)	0.043*** (7.98)	0.036*** (7.02)	0.033*** (6.45)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Ind/Pro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ervations	76583	76583	76583	76583
R-squared	0.137	0.278	0.350	0.352

其次,本文进一步使用工具变量法解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券信用利差影响的内生性问题。理论上讲,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属于宏观层面的指标,微观层面的债券信用利差不太可能会对宏观层面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产生影响,但为了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借鉴 Zhang 等的做法^①,选取美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作为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工具变量。这一做法的背后逻辑在于:一方面,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两国间的贸易活动较为频繁,因而美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中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产生影响,满足相关要求;另一方面,美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并不会直接影响中国的债券信用利差,满足外生性要求。^② 本文使用上文提及到的两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来进行工具变量回归,其中 Baker EPU 表示 Baker 等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而 Davis EPU 表示 Davis 等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下同),回归结果列示于表 5。可以发现,不论是采用哪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度量方式,回归结果与前文基本一致,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债券信用利差呈现出一种正 U 型关系。由此可见,在尽可能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之后,回归结果依旧稳健。

表 5 使用工具变量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信用利差之间的关系

变量名	(1) Baker EPU Spread	(2) Davis EPU Spread
EPU	0.180*** (3.48)	
EPU2	0.859*** (5.43)	
DEPU		0.173*** (2.89)
DEPU2		0.822*** (4.77)
Controls	控制	控制
Year/Ind/Pro	控制	控制
Observations	76583	76583
R-squared	0.083	0.085

① Zhang G., Han J., Pan Z., et al.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and Capital Structure Choice: Evidence from China", *Economic Systems*, 2015, 39(3): pp.439-457.

② 叶永卫、云锋、袁涛:《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与民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经济评论》2021年第5期。

(四) 异质性检验

1. 产权和评级的异质性检验

为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与不同信用评级债券样本中的异质性特征,本文在分别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引入产权性质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及其平方项的交互项以及债券信用评级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及其平方项的交互项。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其中列(1)(3)描述了产权性质异质性特征,列(2)(4)描述了信用评级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不论采用哪一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度量方式,产权性质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及其平方项的交互项、债券信用评级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及其平方项的交互项均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国企和高信用评级债券特征显著削弱了正向的U型关系,符合研究假设H2和H3。

表6 产权、评级异质性分析

变量名	Baker EPU		Davis EPU	
	(1) 产权 Spread	(2) 评级 Spread	(3) 产权 Spread	(4) 评级 Spread
EPU	0.370*** (24.20)	0.188*** (15.07)		
EPU2	0.067*** (6.33)	0.032*** (3.60)		
State × EPU	-0.483*** (-29.61)			
State × EPU2	-0.087*** (-7.41)			
Rating × EPU		-0.211*** (-15.00)		
Rating × EPU2		-0.044*** (-4.23)		
DEPU			0.307*** (21.52)	0.167*** (14.13)
DEPU2			0.071*** (6.16)	0.041*** (4.66)
State × DEPU			-0.394*** (-25.69)	
State × DEPU2			-0.061*** (-4.81)	
Rating × DEPU				-0.192*** (-14.44)
Rating × DEPU2				-0.022** (-2.06)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Ind/Pro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ervations	76583	76583	76583	76583
R-squared	0.364	0.355	0.362	0.355

2. 地区市场化水平异质性检验

为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在不同市场化程度地区中的异质性特征,本文设置了市场化程度虚拟变量,记为Market:将中位数及以上地区划分为高市场化程度组,记为

Market=1; 中位数以下地区划分为低市场化程度组, 记为 Market=0。^① 同时, 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引入市场化程度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及其平方项的交互项, 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研究发现, 不论采用哪一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度量方式, 市场化程度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及其平方项的交互项均显著为负, 相较于低市场化程度地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债券信用利差的正向的 U 型关系在高市场化地区会被显著削弱, 符合研究假设 H4。

表 7 地区市场化水平异质性分析

变量名	Baker EPU	Davis EPU
	(1) Spread	(2) Spread
EPU	0.173*** (10.58)	
EPU2	0.053*** (4.35)	
Market × EPU	-0.134*** (-7.71)	
Market × EPU2	-0.052*** (-3.90)	
DEPU		0.150*** (9.83)
DEPU2		0.052*** (4.28)
Market × DEPU		-0.122*** (-7.42)
Market × DEPU2		-0.025* (-1.91)
Controls	控制	控制
Year/Ind/Pro	控制	控制
Observations	76583	76583
R-squared	0.353	0.353

(五) 机制检验

本文基于债券流动性和价格视角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呈现出正 U 型关系的内在机理。按照大多数文献的作法, 本文使用 Amihud 指标度量债券流动性, 债券价格用收盘价表示。其中 Amihud 的具体计算方法如式(2)所示:

$$Amihud_{i,t} = \frac{\sum_{d=1}^D |R_{id}| / Vol_{id}}{N_{im}} = \frac{1}{N_{im}} \sum_{d=1}^D \left| \frac{P_{id} - P_{id-1}}{Q_{id}} \right| \quad (2)$$

P_{id} 为债券 i 在 d 日的收盘价格, P_{id-1} 为债券 i 在 $d-1$ 日的收盘价格, 如果 $d-1$ 日没有发生债券交易, 则选择距离最近的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 Q_{id} 为债券 i 在 d 日的成交金额(取对数)。 N_{im} 为债券 i 在 m 月度的交易天数。Amihud 指标越大, 单位成交量对价格的冲击越大, 债券流动性水平越低。

根据研究假设 H5 和 H6, 本文预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债券流动性 Amihud 存在正 U 型关系, 而与债券交易价格呈倒 U 型关系。为了检验推测的可靠性, 本文使用前文提及的两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变量, 分别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债券流动性 Amihud 的关系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债券交易价格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 表 8 报告了相应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不论采用哪一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变量,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及其平方项对债券流动性和价格的影响均显著。其中, 在以债券

^① 数据来源参考王小鲁等 2019 年编著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2018)》。

流动性 Amihud 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方程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及其平方项显著为正,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债券流动性呈现出一种正 U 型关系,即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的提升,债券流动性先增强后减弱;在以债券交易价格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方程当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系数显著为正,而其平方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债券交易价格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倒 U 型关系,即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的提升,债券价格先升后降,与推测的结果一致。研究结果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影响市场套利难度,进而通过套利和资产抛售机制影响债券价格和信用利差,从而证实了研究假设 H5 和 H6。

表 8 相关推测的回归结果

变量名	Baker EPU		Davis EPU	
	(1)	(2)	(3)	(4)
Amihud	0.069*** (12.78)	Price 0.114* (1.75)	Amihud	Price
EPU	0.035*** (10.22)	-0.131*** (-3.11)		
EPU2			0.031*** (6.06)	0.299*** (5.11)
DEPU			0.013*** (4.49)	-0.090** (-2.03)
DEPU2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Ind/Pro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ervations	76583	76583	76583	76583
R-squared	0.065	0.276	0.063	0.274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 2010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在沪深交易所发生过交易的已到期和未到期的公司债和企业债为研究对象,利用面板回归模型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存在一种正 U 型的关系。通过替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使用工具变量法后,本文发现这种正 U 型关系仍然稳健成立。本文分析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影响市场流动性和信用风险两种渠道来影响债券信用利差,当经济政策水平较低时,市场流动性机制发挥了主导作用,套利交易促使债券信用利差降低,而在经济政策水平较高时,信用风险机制发挥了主导作用,资产抛售促使债券信用利差提升,两者的共同作用导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呈现出倒 U 型关系。此外,在软预算约束、安全资产转移机制以及市场化程度的影响下,国企、高信用评级以及高市场化程度特征能够显著削弱这种正 U 型关系。最后,本文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债券流动性(Amihud)呈现正 U 型关系,而与债券交易价格呈倒 U 型关系,说明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升,债券交易需求显著增加,债券流动性显著上升,同时大量的需求会推升交易价格;而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超过一定程度,市场套利难度显著增大,债券被大量抛售,债券交易需求显著降低,债券流动性显著降低,债券价格降低,进而推升债券信用利差,从而证实了投资者套利交易的内在逻辑。流动性与价格两种机制的回归结果均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正 U 型关系相一致。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债券市场依然存在较为严重的刚性兑付现象,导致发行人自身信用与政府信用并没有清晰区分,难以反映发行人真实信用水平,从而扭曲了债券定价。随着2014年债券市场刚性兑付被初步打破,债券市场违约事件频频爆发,同时受中美贸易摩擦、金融监管、新冠疫情等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增强,市场套利难度有所增大,债券定价的市场化水平有了显著提升。因此,要进一步打破刚性兑付,深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加强金融监管,严厉打击非法套利行为,促进市场理性投资。

通过产权和信用评级的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民企债和低债项评级债券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更大,容易导致债券价格出现“暴涨暴跌”现象,不利于发行人稳定融资和持续经营。在当今天中美贸易摩擦升级、金融监管趋严、新冠疫情流行的背景下,不同产权性质与不同信用评级债券之间的“马太效应”加剧,融资成本差异呈扩大趋势,有损支持中小企业的政策效果。因此,下一步的重点工作是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同时,进一步有序打破国有企业隐性担保,进一步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增强对中小民营企业的支持。2020年以来,高评级国有企业频频爆雷,向市场传递了大力发展利率市场化的信号,对于改善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和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地区的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影响更大,应进一步提升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化水平,加强中西部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在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的背景下,流动性风险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显著增强,但由于我国债券市场起步较晚,二级市场交易机制难以充分发挥提高流动性和“市场稳定器”的作用,因此要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经验,大力发展和完善做市商制度,增强债券市场深度、厚度与宽度,从而提高债券市场流动性,维护金融稳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责任编辑:潘文竹

Nonlinear Effects of the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on Bond Credit Spreads: A Study Based on Chinese Bond Market Data

Liu Yinwei Zhang Qunzi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and bond credit spreads by using the panel regression model based on the mature and outstanding corporate bonds and enterprise bonds traded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exchanges from January 2010 to December 2020. It is found that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will bring two different effects: reducing bond spreads by improving market liquidity and enhancing market arbitrage motivation, and pushing bond credit spreads by increasing enterprise credit risk and using the asset selling mechanism. A combination of the two effects leads to a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and bond credit spreads, but in the area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debt, high credit rating bond samples and high marketization, this U-shaped relationship will be significantly weakened.

Key words: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credit spread; U-shape

新型集体化乡村旅游： 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张言庆 马波

青岛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中国旅游研究院乡村旅游研究基地，山东 青岛 266071

摘要：乡村旅游是新时期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在实现农业多功能性、促进农民增收、改善乡村治理方面作用显著；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容易出现社区参与不足、利益分配不均、土地供应紧缺、产品业态滞后等问题，亟待通过组织模式优化、制度创新等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文章从组织模式优化角度，提出了以新型集体化实现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命题，在归纳总结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内涵和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分析阐释了新型集体化乡村旅游发展的内在逻辑和现实困境，并从增加制度供给、增加财政投入、增强农民主体性、优化组织形态等方面提出了新型集体化乡村旅游发展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乡村旅游；新型集体化；发展模式；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F592.7；F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23)01-0135-11

一、引言

乡村旅游以其扎根乡村、融合农旅、联农带农等特性成为新时期有效解决“三农问题”、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①，在繁荣乡村产业、重建乡村组织、传承乡村文化、培育乡村人才、改善乡村生态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②。与此同时，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村民参与不足、利益分配不均、土地供应紧缺、产品业态滞后等问题频现，制约着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及其经济社会效应的溢出^③。基于上述问题，学术界从社区参与和增权、内生式发展、农民主体性、利益相关者理论、包容性发展、公共池塘资源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振兴中旅游经营组织转型升级研究”(18BJY194)和青岛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青岛市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研究”(QDSKL22011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言庆，男，山东临沂人，博士，青岛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副教授、中国旅游研究院乡村旅游研究基地专家，主要从事旅游产业经济、乡村旅游研究；马波，男，陕西绥德人，博士，青岛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旅游研究院乡村旅游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主要从事旅游制度、旅游文化、乡村旅游和旅游教育研究。

- ① 陆林、李天宇、任以胜等：《乡村旅游业态：内涵、类型与机理》，《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2年第1期。
② 黄震方、张圆刚、贾文通等：《中国乡村旅游研究历程与新时代发展趋向》，《自然资源学报》2021年第10期。
③ Wang L., Yotsumoto Y., "Conflict in tourism development in rural China", *Tourism Management*, 2019, 70(FEB.):pp.188-200.Cheng L., Xu J., "Benefit-sharing and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rural tourism: An asymmetric approach", *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2021, 21(5):pp.1-17.

论、多元治理理论等多学科理论出发,从乡村旅游经营主体和产权组织模式的角度进行了以个案式分析为主的研究,对实践中涌现的“遂昌公社模式”^①“朗德模式”^②“西江模式”^③“袁家村模式”^④“中郝峪模式”^⑤等做了深入的剖析与解读。从已有研究能够看出,以“社区主导+多元参与”为主要特点、以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主要载体的新型集体化发展模式逐渐成为备受关注和推崇的乡村旅游发展新范式。但目前,针对该种模式的探讨还主要停留在个案式的经验总结阶段,缺少对其合理性、可行性等内在逻辑的深入分析,对于现实中实施新型集体化乡村旅游发展模式面临的困难认识不足,针对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地如何选择合适的新型集体化发展路径也缺乏研究。本文在系统梳理现有文献基础上,旨在从资源基础和制度条件等角度分析新型集体化乡村旅游发展的内在逻辑,并探讨实施这一模式的现实困境和实践路径。

二、新型集体经济的内涵与特征

(一)新型集体经济的内涵

当前,学术界对新型集体经济的界定存在两种主流观点,第一种观点将改革开放后形成的集体经济称为新型集体经济,包括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乡镇企业经济、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的合作经济,以及21世纪初开始的以土地流转为基础的农村专业合作社经济和股份合作制经济。如朱有志和肖卫^⑥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界定为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在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下,成员在自愿、互利、民主、平等的原则下组织起来,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实行多元化的合作经营,分配制度上实行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所有制经济。

第二种观点则将新型集体经济限定在21世纪初出现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和股份合作经济。如宗成峰和李明^⑦认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指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进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以村集体为单位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陈全功^⑧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定义为以土地流转为中心,发展规模化种养或农旅结合类产业,生产收益按股分配的

① 周永广、江一帆、陈鼎文:《中国山村旅游开发模式探索——以浙江省遂昌县“公社模式”为例》,《农业经济问题》2011年第11期。

② 陈志永、吴亚平、费广玉:《基于核心力量导向差异的贵州乡村旅游开发模式比较与剖析——以贵州天龙屯堡、郎德苗寨和西江苗寨为例》,《中国农学通报》2011年第23期。张洪昌、舒伯阳:《乡村振兴中的旅游开发模式演进机制研究——以郎德苗寨为例》,《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③ 张洪昌、舒伯阳:《制度嵌入:民族传统村落旅游发展模式的演进逻辑》,《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④ 徐虹、王彩彩:《包容性发展视域下乡村旅游脱贫致富机制研究——陕西省袁家村的案例启示》,《经济问题探索》2019年第6期。黄鑫、邹统钎、储德平:《旅游乡村治理演变机理及模式研究——陕西袁家村1949—2019年纵向案例研究》,《人文地理》2020年第3期。

⑤ 王晨光:《集体化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影响与启示》,《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徐凤增、林亚楠、王晨光:《社会创业对乡村旅游利益分配模式的影响机理研究——以山东省中郝峪村为例》,《民俗研究》2019年第5期。徐凤增、袁威、徐月华:《乡村走向共同富裕过程中的治理机制及其作用——一项双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21年第12期。

⑥ 朱有志、肖卫:《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要深化“五个认识”》,《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年第2期。

⑦ 宗成峰、李明:《党建引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基本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理论视野》2020年第9期。

⑧ 陈全功:《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形成的动力主体与路径解析》,《改革与战略》2021年第3期。

合作经济和股份经济形式,是一种由代表村集体的经济组织进行有组织的、有序的生产或投资活动,为集体创造货币收入,并能够共享收益的经济形式。本文认同第二种观点,并将新型集体化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定义为乡村旅游社区通过清产核资和量化折股,以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借助内外部多元主体和多种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壮大新型集体经济、服务集体成员的发展模式。

(二)新型集体经济的基本特征

新型集体经济是相对于传统集体经济而言的,是在延续生产资料共有、劳动联合、合作经营、成果共享等集体经济原则基础上,通过承认个人资产、明晰个人产权、倡导股份合作,并实行进退自由、开放合作的现代经济组织形式。王宏波等^①认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新”体现三个方面:一是在经济体制背景上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二是在产权结构上实现了由单一到多元的转变,三是实现了个体经济与集体经济的协调发展。余丽娟^②认为,相比于传统集体经济,新型集体经济具有产权结构明晰化、生产经营市场化、分配制度股份化、进入退出自由化等特征。赵意焕^③从组织理念、组织形态、经营运作机制、利益分配机制等方面对比了传统集体经济与新型集体经济的差异。高鸣等^④从产权体系、组织形式、经济实力和治理结构总结了新型集体经济的特征,包括完成股份合作制改革,产权体系更加清晰;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实现了政经分离,得以实行集约化、专业化的独立运营;实施多元多样化发展模式,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组织治理结构更完善,兼具乡村治理效益。另外,徐凤增等^⑤认为,从制度逻辑理论视角来看,乡村社区在实施新型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前后的制度逻辑存在明显区别,在实施之前以国家逻辑和宗族逻辑为主,实施之后则呈现出国家逻辑、宗族逻辑、市场逻辑、公司逻辑等多元逻辑融合状态。综合上述观点,本文亦通过与传统集体经济相比,归纳出新型集体经济的主要特征,具体见表1。

表1 新型集体经济基本特征及其与传统集体经济比较

对比维度	新型集体经济	差异程度	传统集体经济
经济制度	集体所有制	无	集体所有制
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	很大	计划经济
经营制度	双层经营基础上适度统一经营	较大	统一经营或以分为主的双层经营
制度逻辑	国家逻辑、宗族逻辑、市场逻辑、公司逻辑等多元逻辑	较大	国家逻辑、宗族逻辑
产权结构	多元产权(集体产权、自然人或法人产权)	很大	单一产权
经营机制	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	很大	所有权与经营权或集中或分散
经营主体	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农户+外来企业	很大	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或农户
合作机制	劳动合作与资本联合的股份合作	很大	以劳动合作为主的农民合作
要素整合	整合内外部要素,甚至混合产权	较大	主要是内部要素
决策形式	成员代表股东进行民主决策	较大	村干部决策或农户独自决策
治理结构	政经分离,董事会+理事会+监事会等现代经营治理组织体系	很大	政经合一,多个班子一套人马
分配原则	按股分配与按劳分配相结合	很大	平均主义大锅饭或按劳分配
进退权利	入股自愿,可以按股等比例退出(转让或村集体回购)	很大	集体入股,入股后不得退出、不予返还

资料来源:作者参考相关文献整理而成。

- ① 王宏波、李天姿、金栋昌:《论新型集体经济在欠发达地区农村市场化中的作用》,《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 ② 余丽娟:《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内涵特征、实践路径、发展限度——基于天津、山东、湖北三地的实地调查》,《农村经济》2021年第6期。
- ③ 赵意焕:《合作经济、集体经济、新型集体经济:比较与优化》,《经济纵横》2021年第8期。
- ④ 高鸣、魏佳翔、宋洪远:《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发展的战略构想与政策优化》,《改革》2021年第9期。
- ⑤ 徐凤增、袁威、徐月华:《乡村走向共同富裕过程中的治理机制及其作用——一项双案例研究》,《管理世界》2021年第12期。

三、新型集体化乡村旅游发展的内在逻辑

乡村旅游活动的地域特性及其制度环境特征、所依托的资源及其社会经济属性、供给主体及其经营组织模式,以及乡村振兴背景下制度变迁趋势构成了新型集体化乡村旅游发展的内在逻辑。

(一) 乡村旅游地域特性及其制度环境特征

乡村旅游是发生在乡村地区,依托乡村自然环境、农业资源、乡风民俗、特产美食等资源,主要面向城市居民提供的一种旅游业态和产品,如一些现代民俗节日以博览会的方式,将传统的民间习俗改造成赚足人们眼球,吸引旅游者参与的地方文化展览会与土特产推介会^①。乡村旅游发展需要与乡村地区所特有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环境相适应。从正式制度视角来看,农村集体经济是一种嵌入乡村社会,以一定地域边界、身份认同和集体产权为基础,为全体村民所分享和共享的社会经济。近年来,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全面深化和农村集体经济多元化实践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基础。2016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基础上,逐步构建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全面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集体成员身份确认,加快推进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2017年10月实施的《民法通则》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特别法人资格,确立了其市场主体地位,保障了其在管理集体资产、开发集体资源、发展集体经济、服务集体成员等方面的功能作用。

从非正式制度角度看,乡村地区传统上是以血缘、地缘等情感纽带联结的乡土熟人社会和农业村落共同体,是以农户家庭为农业生产单元的半封闭性农业生产与交易系统^②。乡村旅游的发展,催生出农户、村集体、游客、外来企业、政府等内外部多元主体间的交易与合作,形成了一个乡村旅游市场共同体,使传统村落共同体的地理边界模糊且不断外扩、社会关系日益复杂且不断变动、商业利益纵横交织且日渐强势,改变甚至彻底颠覆了农户固有的生产方式、交往行为以及价值认同。在此背景下,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人情往来、家族宗族、伦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在维持乡村社会秩序和进行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有不断式微的趋势和被正式制度替代的可能。因此,乡村旅游社区需要在调适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基础上,发挥非正式制度在乡村地区的治理功能,通过不断的诱致性制度创新,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化大市场之间的有效衔接,完成从传统村落共同体向现代乡村旅游市场共同体的转变。在此背景下,以劳动合作与资本联合为特征,既能体现农民主体性,又能发挥集体合力,既能有效保障村集体权益,又能高效与外部主体相对接的新型集体化乡村旅游发展模式能够很好的服务于这一乡村社区转型需要。

(二) 乡村旅游资源的结构性黏连特征

乡村旅游开发不是单纯以平面化的土地资源为主,而是以多样化、立体化的生态资源为物质基础,如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河湖、青绿的田野等。这些资源具有结构性黏连特征,即在物质存在、功能

① 马光亭:《现代时间制度:理解非遗项目生产的一个角度——以青岛田横祭海节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0期。

② 郭占锋、李轶星、张森等:《村庄市场共同体的形成与农村社区治理转型——基于陕西袁家村的考察》,《中国农村观察》2021年第1期。

价值上相互依存,难以分割成单一资源或要素进行市场交易,即使强行分割但在进入市场交易时也会导致巨大的外部性或交易成本^①。生态环境资源作为乡村旅游的一种要素,要能为社会行动者创造出持久的收入流,一般需要对其投入大量持久的社会集体行动才能实现^②。同样,历史古镇、文化街区、民族村落等为乡村人文吸引物也存在资源要素的结构性黏连特征。吸引游客到访的不是单间独栋的房屋,而是在特定历史和文化背景下整体性的村落建筑群或镇街系统;游客感兴趣的并非单家独户的景致,而是浸润着特定风土人情和地域文脉的整体性村落景观。

乡村资源的结构性黏连特征叠加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决定了无论从自然特征、产权安排,还是经营管理层面,乡村旅游社区都应该是相对完整的一级资源开发单位,需要由拥有集体所有权的集体经济组织实施集中统一开发,并按照分配正义原则将所得收益在集体成员和相关参与者间分配。乡村旅游社区可以借助传统社会网络形成的社会资本以及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下的股份合作制,将村社成员集体所有但分散使用的“实物财产”转化为集中统一开发运营的“价值资产”,实现村落内多种资源的整体性、系统性开发和增值^③。

(三) 乡村旅游经营主体的新内生发展需要

目前,我国乡村旅游实际经营主体主要有农户、村集体经济组织(常由村委会代理)和企业,且呈现出随业态转型升级不断演化的趋势^④。在以传统村镇观光、农家乐等业态为主的乡村旅游初级阶段,农户或村委会是最主要的经营主体,这有利于促进乡村社区就业转型,增加村民和村集体直接经营收益,进而实现村社内生式发展。但由于农户往往缺乏发展乡村旅游的相关资本和经验,村集体经营管理理念落后且管理水平较低,会造成乡村旅游产品同质化严重,乡村旅游服务质量欠佳,乡村旅游整体效益较低,乡村旅游转型升级乏力。

在乡村旅游需求不断增长,市场潜力日渐显现的形势下,拥有资金、人才、信息、管理和技术等优势要素的社会资本逐渐参与到乡村旅游发展当中,特别是参与到乡村民宿、乡村精品酒店、露营地、田园综合体等乡村旅游新业态的开发中,形成企业主导型乡村旅游外源发展模式。此种模式下,市场运作能力强,资源优化配置效率高,乡村旅游市场规模、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往往会有较大提升。但由于资本的逐利本性,外来资本主导下的乡村旅游开发容易发生农民利益被边缘化导致社区冲突,乡村传统文化被“异化”或“涵化”,村组织被边缘化导致村庄公共性被瓦解。

新时期,我国乡村旅游发展需要超越内生与外生模式,构建能够充分发掘和最大化地方资源价值、有效利用外部资源的新内生发展模式。在乡村振兴战略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新一轮农村改革背景下,以股份合作制为代表的新型集体化模式契合了我国乡村旅游新内生发展需要。该模式以村集体和农民的资产入股分红为主要形式,以外来企业、村集体和村民为主要股东,以农村股份制企业或股份制合作社为基本形态^⑤。在该模式下,外来企业以现金、设备、技术、管理等入股,村集体以

① 温铁军、罗士轩、马黎:《资源特征、财政杠杆与新型集体经济重构》,《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② 赵德余、朱勤:《资源—资产转换逻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一种理论解释》,《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6期。

③ 温铁军、罗士轩、马黎:《资源特征、财政杠杆与新型集体经济重构》,《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④ 陆林、李天宇、任以胜等:《乡村旅游业态:内涵、类型与机理》,《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2年第1期。

⑤ 王德刚、孙平:《农民股份制新型集体经济模式研究——基于乡村旅游典型案例的剖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集体留用的耕地、林地、荒地、公共设施和场所等经营性资产入股,村民以承包地、住宅或宅基地、现金和其他物资等入股,多元参与和收益的股份合作设计能够有效整合乡村内外资源,发挥内外部优势,保障各方利益。近年来,包括陕西袁家村、浙江鲁家村、山东中郝峪等乡村旅游社区探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新型集体化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产生了很强的典型示范作用。

(四) 乡村振兴战略与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

为解决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三农”问题,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9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第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把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方向,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性,将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升到事关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政治高度。

乡村旅游发展能够有效促进资本、技术、管理、人才和信息等要素向乡村地区流动,促进乡村农文体多产融合,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和手段。在以乡村旅游为主导的乡村振兴实践中,需要把握好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充分利用好新时期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等方面的改革红利,深度挖掘农业农村多元价值,积极借助外部先进生产要素,构建“统分结合”的新型集体化乡村旅游发展模式。

新型集体化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一方面能够有效解决乡村旅游个体分散经营存在的资金匮乏、人才缺失、管理和技术落后、信息不畅等问题,实现资源整合、先进要素引入,加快乡村旅游业态转型升级,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另一方面能够借助集体经济的红利和福利解决那些完全或部分失能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同时,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壮大集体经济实力,进而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经济基础保障,稳定和提高乡村基层组织能力和地位,发挥乡村基层组织在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四、新型集体化乡村旅游发展的现实困境

(一) 存在思想认识误区,主观能动性不足

历史上“一大二公”传统集体经济对农村经济社会产生过严重的负面影响,至今很多人对计划性集体经济存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害怕新型集体化再次让农村经济回到过去生产“大呼隆”、分配“大锅饭”的状态,进而对新型集体化不理解、不参与、不配合。有些村干部认为,近年来经济下行压力大,加之新冠病毒疫情影响,乡村旅游面临较大市场风险,如果以集体名义搞乡村旅游开发会存在很大风险。一旦乡村旅游项目失败,既遭埋怨又丢选票,甚至还有背负经济债务和政治处分的危险。而且,现实中乡村社区干部要应付来自上级部门的各项繁重任务,缺乏实施新型集体化乡村旅游发展的时间和精力。

在笔者长期关注的山东省W村,十余年前就有近一半的村民建造起两层小楼经营乡村旅馆,全村年接待游客20多万人次,年旅游收入超过2000万元。但目前该村的乡村旅游属于典型的单家独户分散经营,管理水平较低、服务品质不高,总体经济效益较低,转型升级乏力,面临着周边不断涌现

的高档民宿和度假酒店的强力竞争。当问及该村相关负责人为何没能统筹全村资源,走新型集体化乡村旅游发展道路时,该负责人给出的原因包括肩负的村务繁杂无暇顾及、个体经营户不理解不配合、不愿也无法承担可能产生的经营亏损、担心出力不讨好等。

(二)资源禀赋缺乏和制度供给不足

在实践中要真正走新型集体化发展道路,需要具备一定的资源要素条件和相关的制度保障。但现实中,很多乡村旅游社区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本、人才和政策保障,难以开展或维持新型集体化乡村旅游发展。

首先,缺乏启动乡村旅游集体化经营的资源禀赋。任何资源集中的组织化过程都需要成本。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松散到紧密的过程是非线性的,组织化过程的开始需要一个相对较大的动力阈值^①。乡村旅游从单家独户分散经营到集中化统一经营的转变,需要让村民相信通过集体化经营能够比个体独立分散经营获得更大的收益,才能达到相应的阈值并启动集体化进程。影响村民对集体化经营信任感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村集体投入能力和风险保障能力。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去组织化”制度变迁导致大多数村集体可支配的资源和财力非常有限,难以承担启动集体化进程的货币资本和“信任资本”。据《中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年报(2019)》统计,2019年全国村集体经济组织没有经营收益或经营收益在5万元以下的“空壳村”比例为57.7%,即使是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这一比例也高达51.6%。山东省W村支部书记的担忧和疑虑印证了上述问题:“把各家各户建的农家乐集中起来搞经营虽然好,可是一旦经营失败,我们拿什么来承担损失。再说了,村里现在也没有多少能支配的资源(进行集中经营)”。

其次,缺乏善经营、懂管理、敢担当的乡村能人。乡村能人即乡村社会精英,他们比普通村民拥有更多的知识、经验、声望或关系资本^②,乡村社区任何一项集体行动都离不开能人的领导和带动。作为典型的集体行为,新型集体化乡村旅游发展要求构建一个以乡村能人为中心的权利地位体系,对相关组织活动进行指导和控制。而且,乡村旅游开发和经营以经济收益为目标,会直接影响到每个参与者的收益状况,能人所担负的作用和责任更为突出,对能人的要求也就更高。黄振华^③认为乡村能人要想有效带动集体经济发展,需要具备充足的资源禀赋、良好的市场意识、高超的管理协调能力和强烈的“道德感”。现实中,同时具备上述条件的乡村能人可遇而不可求。另外,目前大多数乡村社区在基础设施条件、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仍与城市存在较大差距,不利于乡村社区吸引外来能人。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空心化、老龄化导致的青壮年劳动力匮乏问题,也对新型集体化乡村旅游发展形成较大制约。

再次,缺乏充足的制度供给和政策支持保障。一方面,乡村旅游面临着基础设施落后、经营季节性强、市场整合度低、同质化竞争等问题和挑战;另一方面,乡村旅游发展不仅是一个产业发展问题,也与乡村地区的居民就业增收、人居环境改善、生态与文化保护、乡村治理、城乡融合发展等诸多国家战略所关注的重要领域密切相关。上述两方面特征使得我国中央和地方层面有大量的乡村旅游

① 温铁军、罗士轩、马黎:《资源特征、财政杠杆与新型集体经济重构》,《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② 罗家德、孙瑜、谢朝霞等:《自组织运作过程中的能人现象》,《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

③ 黄振华:《能人带动: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的重要条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发展政策供给,呈现出政策数量增长快,主体不断增多,政策工具不断丰富特点^①。但是在促进新型集体化乡村旅游方面的制度供给和政策支持还存在诸多短板,例如,虽然全国普遍成立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开始了登记赋码工作,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一直没有出台,关于集体经济组织的性质缺乏明确而权威的制度性规定,导致集体经济开展和治理步履维艰。另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虽然取得了“特别法人”资格并获颁了相应的登记证书,但尚未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在社会学意义的“合法性”机制上不成熟,在参与经济社会活动时还是会因为特殊的组织身份、功能定位而遇到诸多经营障碍。

(三)存在委托代理成本和激励不足问题

新型集体化乡村旅游发展的主体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其中包括承担主要经营风险但不掌握农村集体资产控制权的集体成员(普通村民)和掌握着农村集体资产实际控制权但并不是经营风险主要承担者的管理者(村干部)。现实中,集体成员和管理者两类主体的集体资产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均呈现不匹配的产权安排格局^②。具体而言,集体成员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配置呈现“大索取、小控制”的产权安排格局,即集体成员因共同占有集体资产而获得最终的“剩余利益”,但无法直接掌握农村集体实际的剩余控制权;而兼具农村集体资产委托方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双重角色的管理者则在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配置上呈现“小索取,大控制”的产权安排格局。这种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不匹配格局不仅会因为剩余控制权的虚置产生委托代理成本,导致集体成员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而且也会因剩余索取权不足无法有效激励管理者的积极性,弱化新型集体化乡村旅游发展的优势,阻碍农村集体经济的壮大。针对这一问题开展的乡村旅游调研中,因担心上述问题而不愿开展新型集体化发展的案例颇多,如山东省W村有很多村民担心新型集体化后村干部或外来企业把旅游收益占为己有,因而宁愿经营困难也要维持单家独户经营;村干部也担心“辛辛苦苦干一场却最终‘肥了别家的田,荒了自家的园’”,从而对新型集体化发展心存疑虑。

五、促进新型集体化乡村旅游发展的实践路径

(一)加大制度供给和财政投入

首先,加快《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立法工作,夯实新型集体化乡村旅游发展的“合法性”基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担负经济职能的村集体组织,是农村社区开展乡村旅游等产业振兴工作的主要载体,对新型集体化乡村旅游发展至关重要。目前,中央和地方层面非常重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工作。但作为这一领域根本大法的《农村经济组织法》目前仍然缺失,制约着现实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法性,影响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新型集体化乡村旅游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虽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早在2018年9月就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但直到2020年6月初才正式启动立法起草相关工作。未来,应进一步加快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工作,在法律层面优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

① 姚旻、赵爱梅、宁志中:《中国乡村旅游政策:基本特征、热点演变与“十四五”展望》,《中国农村经济》2021年第5期。

② 张浩、冯淑怡、曲福田:《“权释”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理论逻辑和案例证据》,《管理世界》2021年第2期。

其次,开展新型集体化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的典型示范与经验推介。组织社会学中的制度主义理论非常强调“合法性”机制对组织结构和组织行为的影响。该“合法性”不仅仅指法律制度的作用,也包含了文化制度、观念制度、社会期待等多元制度环境对组织行为的作用。而合法性机制是指那些诱使或迫使组织采取具有合法性的组织结构和行为的观念力量^①。合法性机制不仅约束组织的行为,还能帮助组织提高社会地位,得到社会承认,促进组织间的资源交换。因此,应加大对新型集体化乡村旅游发展成功案例的典型示范和经验推介力度,营造有利于发展的文化-认知良性机制。

最后,加大对新型集体化乡村旅游发展的示范引导。新时期,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不仅要加快产品与业态转型升级,加大乡村旅游人才培育与队伍建设,更要优化乡村旅游组织模式,探索从单家独户经营向集体统一经营的转变,提升乡村旅游资源集约利用程度、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提高乡村旅游经营管理水平和服务品质。鉴于国内多数乡村社区缺乏进行资源集中“组织化”经济杠杆的现实困境,建议中央相关部委和地方政府加大对新型集体化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的示范引领。通过积极的财政投入和政策扶持,帮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足够的可自由支配资源、资产和资金,建立集体化经营管理体系和增收机制。如将美丽乡村财政投入转化为村庄景区化项目资金,明确规定由乡村旅游社区的集体经济组织来承接,并负责景区化后的具体经营管理,同时将财政投入所形成的某些固定资产确权给集体经济组织。

(二) 增强农民主体意识,激发内生发展动力

乡村旅游是以农业为基础、农村为载体、农民为主体的旅游经济活动。新型集体化乡村旅游发展需要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发挥组织化农民的主观能动性以实现内源式发展。具体需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推进:

一是借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用经济手段激发农户积极性。以“三变改革”等为代表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加快农村要素市场化、加大财政金融助农杠杆的同时,能够有效支持和鼓励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或个人资产、资金、技术等入股到乡村旅游经营管理主体,作为股东参与经营与分红。实现农村市场化与农民组织化的有机结合,有效激发农民参与的积极性。乡村旅游作为劳动密集型经济活动,许多经营环节都需要众多劳动力参与。新型集体化乡村旅游能够切实实现资本联合和劳动合作,有效保障和增加农民充分获得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从而最大程度激发农户参与乡村旅游集体化经营的积极性。

二是重塑乡村文化魅力,用文化力量形塑农民主体意识。乡村衰败之源在于日渐式微的乡村文化无法将个体化、原子化、弥散化、异质化的农民群体凝聚成一个紧密的命运共同体^②。因此,要实施新型集体化乡村旅游发展必须改变村民的思维定式,引导其重新审视和发现乡村文化的独特价值与魅力,增强农民群体的文化自信。需要重塑乡村文化的公共精神和集体意识,增强农民群体的文化认同;要加快乡村文化设施、组织、载体建设,丰富乡村文化活动,切实提升农民群体的文化参与感和满意度。通过采取上述措施,有效形塑农民主体意识,增强农民对新型集体化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的认同感和参与度。

^① 周雪光、艾云:《多重逻辑下的制度变迁:一个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② 陈学兵:《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主体性的重构》,《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三是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用组织合力提升乡村社会主体性。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现代社会里,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只有通过建立和巩固自己的组织或社团,才更有可能实现权益保护。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恰恰在于农民的去组织化。分散的小农户既无法有效对接市场,也无法有效承接政府资源。为改变农民的“散众”状态,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完善能够切实发挥凝心聚力作用的社区组织(如农村基层党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旅游专业合作社、旅游协会等),以增加农民参与旅游发展的社会资本,以组织的力量同社会化大市场相对接,与外来利益主体形成较为平等的权力制衡,以实现乡村旅游社区有效增权。

(三)优化组织形态,构建融合开放的乡村旅游经营体系

新型集体化乡村旅游发展的主要组织载体是股份经济合作社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目前,以股份经济合作社为主要形式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性机制不健全,尚处于一种非标准化的不成熟状态,进入市场的交易成本畸高^①。另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有产权封闭和成员封闭特征,存在产业发展的市场化进入问题,使其较难开展乡村旅游等具有较大市场风险的经营业务。农民专业合作社则是一种入社自愿、退社自由,以农民为主,允许社会性投资,按照以惠顾返还为主、按股分配为辅进行盈余分配的经济互助性组织。在产业发展和市场化过程中,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人合特征和治理规范约束,使其面临规模扩张困难和道德失范风险,在现实中出现了大量“空壳社”、伪合作社等现象^②。此外,上述两类组织都是具有互助性质和非营利性质的农村经济组织,全都存在资金、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要素短缺问题,难以真正与大市场相对接并开展完全市场化的经营管理活动。因此,需要在发挥两类经济组织优势、规避各自劣势的基础上,充分借助和整合基层党组织、内外部企业和政府等多方资源,构建融合开放的乡村旅游经营体系。具体而言,可根据具体村庄的旅游经济发育水平和集体经济状况,选择以下类型的组织模式。

第一种类型是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新型集体化乡村旅游组织模式。即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基础上,组建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由领导股份合作社改革的党支部再领办以乡村旅游为主要业务的旅游专业合作社。由党支部成员注册成立旅游专业合作社,并由党支部成员兼任旅游专业合作社管理人员,其中理事长一般由党支部书记兼任。股份经济合作社代表村集体以集体土地(林地等)经营权、集体经营性资产、财政补助资金等入股旅游专业合作社。党支部动员村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闲置住宅或宅基地、资金等入股,并保障村民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旅游专业合作社在党支部带领下,吸纳内外部经营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开展乡村旅游统一经营。合作社管理人员、村集体、村民等对旅游专业合作社的可分配盈余实施保底分红或按股分红,村集体分得收益在留足集体发展所需资金后再在集体成员间分配。该类组织形态适合村集体经济相对比较薄弱,乡村旅游发育水平不高的村落。随着乡村旅游经营规模扩大和村集体经济实力增强,此种模式可能面临要素投入不足、经营管理乏力、激励不足或委托代理问题,进而阻碍当地乡村旅游进一步发展。

① 陈雪原、孙梦洁、周雨晴等:《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报告(2021)——党建引领新型集体经济治理现代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226页。

② 尹翠娟、任大鹏:《社区性与专业性:组织差异化背景下的合作社再合作——基于贵州遵义的案例研究》,《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二是“合作社+公司”的新型集体化乡村旅游组织模式。该类组织形态适合那些乡村旅游发育水平高,村集体经济实力强,需要突破户自为界、实现乡村产业链有机组合、优化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提升经营效率的乡村旅游社区。具体而言,该模式以全面推行清产核资和股权量化后组建的股份经济合作社为核心载体,经济合作社下面设立总公司,作为面向市场的经济主体,主要职能是组织统筹资源、制定发展战略和规划、转化经济合作社承接的财政资源、统筹投资方向,同时承担一定的历史遗留问题等社会性负担。在总公司下面设立包括乡村旅游公司在内的各类专业公司,开展乡村旅游、农业种植、农产品加工、农业社会化服务等专业生产活动,专业公司之间通过一二三产融合和产业价值链有机组合,实现经济活动最大限度的“在地化”。在专业公司的基础上,充分整合社会资源,打造纯市场化的乡村旅游类项目公司,按照市场规则配置资源、开展相关市场经营活动。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强调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乡村旅游是新时期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但发展中亦面临着社区参与不足、利益分配不均、土地供应紧缺、产品业态滞后等问题,亟待从理论和实践角度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响应发展问题、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式道路。新型集体化乡村旅游立足于农村集体所有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因应了乡村旅游资源的结构性粘连特征和乡村经营主体的新内生发展需要,响应了国家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是具有强大发展潜力和巨大推广价值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

责任编辑:董德英

New Collectivized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trinsic Logic, Actual Dilemma and Practical Approach

Zhang Yanqing Ma Bo

School of Tourism and Geographical Sciences, Qingdao University; Rural Tourism Research Base of China Tourism Academy, Qingdao 266071, China

Abstract: Rural tourism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It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realizing agricultural multi-functionality,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and improving rural governanc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participation of the community, uneven distribution of benefits, shortage of land supply and lagging product formats need urgent solution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rough organizational model optim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model optimiz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roposition of realiz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through new collectivization.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the connotation and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explains the internal logic and real dilemma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collectivized rural tourism, and puts forward the practical path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collectivized rural tourism from the aspects of increasing institutional supply, increasing financial input, enhancing farmers' subjectivity and optimizing organizational form.

Key words: rural tourism; new collectivization; development model; practical approach

乡村社会治理与文化生态修复

——以民间手工艺为例

朱利峰

北京联合大学 艺术学院,北京 100101

摘要:当下乡村振兴的治理体系除了自治、法治、德治三个基本维度,还需要通过文化生态修复的维度激活乡村发展的内生动能,因地制宜地为村落探索其特色发展路径。手工艺通过正确的步骤与方法介入乡村振兴,是修复文化生态、实现乡村综合治理的特色路径。基于优先修复乡村文化生态理念,践行乡村文化艺术创新“六步法”,以创新服务驱动乡村手工艺产业发展,以在地品牌打造修复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以手工教育体验修复乡村传统民俗文化根脉。激活乡村劳动者的自我造血能力和文化自觉意识,健全乡村文化和经济的自治体系。

关键词:文化生态;民间手工艺;乡村振兴;治理体系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23)01-0146-11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在“自治、法治、德治”这三个维度之外,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文化生态修复也是乡村社会综合治理体系构建的重要维度。中国的传统乡土社会是一个百工与百业平衡发展的社会结构,农民掌握着全社会最为全面的生产劳动技能,纺染织绣、编织扎制、雕刻塑造、剪纸刻绘、器具制作、食品烹制等丰富多彩的民间手工艺则是这百工百业中最为重要的技艺手段。民间手工艺以创新姿态介入当下乡村文化和经济的社会治理,是具有生态、环保属性的有效手段,在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这五大乡村振兴的着力点上,能够起到极为显著的贯通作用,对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总要求,具有四两拨千斤的独特优势。

一、乡村振兴与文化生态修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乡村经历过三次较大的振兴发展。第一次,是建国初期“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引发的乡村振兴,探索出了一条真正实现农民基本土地权益的道路^①;第二次,是1978年进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引发的乡村振兴,建立了以家庭经营为主体的基本经济体制和相应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北京民间手工艺在乡村旅游中的作用机制研究”(21YTB01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朱利峰,男,满族,河北承德人,法学博士,北京联合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创新研究。

^① 陈茂玲、巩前文:《农村土地制度探索与改革的百年历程》,《农村经营管理》2021年第7期。

的组织系统^①；第三次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发展乡镇企业引发的乡村振兴，奠定了城乡之间经济贸易互通的物质基础，加速了城乡产业融合^②。改革开放40多年来，联产承包责任制及乡村发展现代制造业，使农村劳动力得到释放，开启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腾飞^③。目前正在进入第四次乡村振兴的多元发展阶段，以往的乡村振兴都取得了巨大的阶段性成功，但盲目发展制造业也破坏了乡村自然生态环境。城乡融合的新趋势下，传统的百业农民向专职产业工人的身份转换，出现了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也加速了乡村人文传统的消亡。在农村，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但专职产业工人的流水线作业方式消弭了农民本来多元化的生存劳动技能，留守人群的转移意愿也普遍偏低^④。进入乡村建设新时代，乡村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形成乡村振兴动能的因素除经济外，还叠加了文化、生态、福祉和社会治理等多元要素^⑤。

如今的多元发展阶段，城乡融合、跨界融合、三产融合背景下，乡村将更多承担起人们精神家园的社会职能，更多地起到心灵栖息地的作用，从乡村主体而非城市主体视角出发的生态文明重建就显得尤为重要^⑥。温铁军指出：“生态文明是一种超越传统工业文明、以多样性为内涵的、人类自觉回归自然的文明形态”^⑦，这里的生态文明，不仅指乡村的自然生态环境，还包括传统村落最可宝贵的文化生态的传承延续。随着乡村旅游的持续升温，生态环境供给和独特的文化资源服务正成为中国乡村振兴供给侧改革的新趋势^⑧。二十一世纪以来，全国各地开始意识到传统村落所承载的乡土文化是可供利用的优质旅游资源，纷纷加入到乡村旅游开发的大潮之中。但由于我国乡村建设缺少相应的策略规范，管理水平良莠不齐，致使乡建规划过程中模仿成风。有些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盲目发展的直接后果，是所有乡村如出一辙的千村一面，民间传统习俗、传统手工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陷入传承危机，文化生态的多样性正在快速消失。

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执行，以及复兴传统文化提上日程，一定程度上对传统村落的文化起到保护作用，非遗传承和保护也成为当下的热点话题。但关于乡村传统文化的创新利用因为村落特色的千差万别，开发现状呈现出较为混乱的局面。文创开发首当其冲，许多管理者和乡村旅游经营者都寄希望于文创品牌和产品，动辄打造乡村IP。事实上，传统村落是一个完整的生态体，是自然生态环境和文化生态内容的有机融合。只关注自然环境开发的乡村建设缺少文化特色的支撑，发展后劲不足；只注重文创产品的销售推广，容易造成游客的审美疲劳。因此，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资源转化以及生态文明的重建，需要基于系统化的策略方法论和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策划执行手段，重点在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和文化生态内容修复的整体论基础上开展创新性活动。涉及村落的整体发展战略定位、自然生态保护涵养、文化生态修复与传承、自然景观和文化主题

① 赵树凯：《乡村治理的百年探索：理念与体系》，《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② 胡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历程研究》，《理论观察》2019年第8期。

③ 《习仲勋主政广东》编委会：《习仲勋主政广东》，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42页。

④ 齐嘉楠、刘鸿雁等：《农村留守劳动人口转移意愿研究》，《人口与发展》2021年第1期。

⑤ 张军：《深化改革，释放乡村振兴内生动能》，《东岳论丛》2018年第6期。

⑥ 李赫然：《乡村振兴中的生态文明智慧》，《人民论坛》2018年第26期。

⑦ 温铁军：《生态文明与文化创新》，《上海文化》2013年第6X期。

⑧ 张继晓：《北京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人民论坛》2018年第27期。

的挖掘呈献、产业发展定位、商业模式探索、村落环境景观提升、品牌策划营销、文创产品设计研发、产业运营管理等方方面面。手工劳动曾经是农耕时代传统乡村中的重要经济支柱,民间手工艺是农业社会基础最为深厚的生产生活方式,探索乡村文化生态修复的路径与策略,民间手工艺产业振兴可作为优先选择的切入点,并具有文化和经济治理功能的先天优势。

二、当代中国民间手工艺参与乡村社会治理

当前,以民间手工艺为特色参与乡村治理的群体主要包括乡镇企业、公益机构和高校师生等几类主体。从在地就业生产、培训人才手工技能、创新乡土特色产品三个方面促进乡村组织、文化与生态的治理。

(一)民间手工艺乡镇企业发展促进在地就业生产

民间手工艺的企业化发展具有其从就业、生产到销售这个较为完整的产业生态链条,是最具有在地性生命力的存在形态。因此发展乡镇企业是乡村产业振兴最直接的方式,能够有效促进在地就近就业和脱贫增收。

例如江苏镇湖为了保护当地传承两千多年的苏绣传统技艺文化生态,开发建设镇湖绣品街,为当地数千名从事刺绣行业的绣娘(绣郎)规划了专业的市场用房和集中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出台了入驻绣品街的多项优惠政策,鼓励刺绣私营业主购买或者租用店面,集中销售刺绣产品,获得了国家级的“苏绣产业集群”称号。其刺绣经济成为镇湖农民创业、就业、持续增收的重要载体。镇湖刺绣从以往的农民副业发展成支柱产业,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解决了镇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为提高就业率、增加农民收入作出了很大贡献。

再如宁夏银川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巴鸟麻编手工坊,多年来在麻编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巴鸟麻编品牌创始人张璟的持续帮扶下,带动因生态保护移民而来的贫困人口、空巢老人、残疾人和下岗退休女工进行麻编手工艺制作。宁夏的汉麻产量高,韧性强,手工坊在选材、染色方面都遵循生态原则,坚持精工制作各类大众能够消费的生活实用品。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巴鸟麻编先后建立了手工坊传承基地、手工创意工作室和移民扶贫就业工坊,带动了数百农民的群体就业和脱贫致富,成为宁夏手工艺扶贫的明星企业。

此外,北京怀柔区庙城镇的高两河彩绘厂以手绘彩瓷技艺带动周边村民参与就业,村民可以一边干农活一边到厂里画瓷器。产品远销东南亚等国家,给村民带来切实的就近就业机会。除了做画师,还可以当研学旅游的指导教师,指导中小学生的研学体验。达到同样效果的还有顺义区张镇的良好景泰蓝厂,以灵活生产时间吸引村民从事景泰蓝的掐丝、点蓝等手工艺制作,遇有研学团队也变身成指导教师,每年能够带动数十名村民人均增收5—8万元左右。

(二)公益机构教育培训提高在地人才手工技能

一些行业协会、学会、基金会等公益组织对乡村振兴的介入,在帮助解决乡村劳动人口就业问题的同时,举办各种技能人才培训和技能竞赛,为增进农民的持续就业能力和手工技艺的传承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例如北京工艺美术学会多年来依托北京市科协的科技扶贫项目,对京郊乡村开展精准扶贫和对口支援,每年为偏远山区和低收入村农民提供手工艺实用技能帮扶培训。组织非遗传承人、工艺美术大师和专家开展绢花、绒花、剪纸、草编、中国结、面塑、泥塑、兔爷、宫扇绘制、陶艺等手工艺技能授课,培训对象包括低收入村文化员和妇联主任、村办企业员工、非遗体验工坊员工以及幼儿园青年教师等,由浅入深地开展初级、中级、高级系列培训。在有意愿发展手工艺产业的乡村建设“乡土文化专家工作站”,提供系统的北京民间手工艺制作、乡土文创产品开发和市场推广等文化素质和技能培训,进一步提升当地农民持续发展的文化素养和致富技能。这些培训和工作站建设对郊区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提升与实用技能掌握起到了极大的帮助和促进作用,取得了较好的精准帮扶效果。

全国妇联的妇女发展基金会也是国内极为重要的公益机构之一。近年来,由妇女发展基金会推出的妈妈制造手工工坊、天才妈妈梦想工坊两个专项基金项目,陆续在全国各地建设了近百家非遗工坊。为保障项目的良好运作,提升各工坊带头人和骨干的综合素质,加强工坊间的交流沟通,定期举办手工艺女性培训活动。通过组织赋能计划,邀请同行业创始人、新媒体运营专家、平台负责人、非遗文创专家等方式开展培训,多维度提升带头人跨领域专业水平,为手工艺产品品质不高、市场化艰难的现状提供解决思路或创新解决方案。如今,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的如云南大理的扎染、德宏的撮花绣、贵州黔东南台江的苗绣和银饰、丹寨的蜡染、河北丰宁的布糊画、内蒙古呼伦贝尔的皮雕、赤峰翁牛特旗的耳枕、吉林辽源的农民画、海南白沙的黎锦等妈妈制造手工工坊、天才妈妈梦想工坊都已经成为当地女性就业扶贫的典范。

公益机构的培训因其中立属性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但同时,因为没有共同利益驱动的帮扶普遍带有临时性的特点,纯公益的培训指导在失去上一级项目与资金的支持之后,往往容易陷于停顿。因此,当前的公益培训除了财政项目的支持外,也开始广泛寻求实力雄厚的商业品牌加盟,以公益和商业品牌的联合实现双向赋能。

(三) 高校教师参与探索创新乡土特色产品

在乡村建设的热潮中,民间手工艺往往作为艺术乡建的急先锋得以呈现,高校教师的研究性团队成果较为突出。

如较早开展艺术乡建的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左靖老师,于2011年在皖南黟县的碧山村发起“碧山计划”,尝试将艺术引入乡村,挖掘碧山的乡村文化资源并融入现代艺术元素。该项目邀请到诸多艺术家、建筑师、设计师、作家等文化艺术领域的群体驻居乡间,共同参与保护乡土文化遗产,以公共艺术介入乡村的方式为乡村建设赋能,试图打造一个艺术乌托邦来避免乡村的城市化。其中左靖带领学生开展对黟县传统手工艺的调研并联合村中匠人发起的百工计划,对当地养蚕、榨油、艾叶饼、徽州木雕、织麻布、弹棉花、做火桶、打斗笠等民间手工艺资源挖掘与特色文创产品的开发形成重要影响。左靖编辑了乡土手工艺书籍《黟县百工》,并于2017年将碧山村老供销社改造为集出版、展览、零售、餐饮、住宿、驻村、手工艺体验等多项内容的综合文化空间“碧山工销社”。提出碧山工销社的“百工十条”理念,即“良品良工、百工习得、地域印记、日用之道、传统家园、当代美学、城乡联结、社区服务、环境友好、公平贸易”,努力探索立足于中国本乡本土的百工复兴之路,并逐渐完善出一整

套城乡互动的的方法和体系,努力构建一个互哺型的城乡共同体^①。

经过“碧山计划”的前沿探索之后,中国乡村大地上兴起了艺术乡建的风潮,更多的艺术家参与到乡村振兴的浪潮之中。但目前艺术乡建多是以艺术家为主体的“艺术下乡”行动,虽时常组织一些文化艺术活动,在特定的节庆活动中也偶有传统技艺传承人或工艺美术大师的技艺展演,但仅局限于艺术家、传承人和部分村民的参与,没有借助当地的民间手工艺资源形成成熟的旅游体验产品。艺术家们的单方面热情没有与当地村民建立起情感的共鸣,难以得到村民们的支持和理解。一些调研活动和理论思考的实践转化不足,未能带动当地民间手工艺形成产业并持续发展,也没有为村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村民渴望共同富裕的愿景并未由此改观。因此,新时代的乡村建设应结合乡村资源禀赋和旅游规划,因地制宜开发具有吸引力的旅游产品和体验内容,逐步修复乡村整体的文化生态,艺术才能在乡村更具生命力。

自2019年开始,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丛志强老师通过技能驱动的方式,在浙江宁海葛家村开展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实践研究。与以往的艺术下乡模式不同,丛志强带领学生团队通过深入调查揭示出乡村建设中普通农村家庭空间闲置、供给方式单调化、供给内容同质化、供给主体碎片化的突出问题,针对农村工匠文化的困境,探索其创新转化的策略路径。最终经过长期实践,确定低价微改、技能驱动、能力拓展的家庭资源共享设计路径,从家庭空间、家庭文化、家庭成员三个角度实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侧改革。在其所深度挖掘的家庭文化资源中,着力于充分调动农民信手拈来的缝纫、刺绣、木雕、草编、竹编、砌筑、美食加工等手工艺技能。首先鼓励村民利用所会技能自主改造,材料优先选用带有家庭记忆的老物件和废旧材料,进行老物改造和新物再造。同时通过技能驱动的体验活动设计,为游客开发了体现家庭文化特色的手工体验课程包、手作材料包、半成品物件和作品构件等,让游客建立起与乡村共享家庭的情感连接。最后,针对家庭成员的能力拓展,高校团队采取驻村陪跑的方式,培育并提升村民的自主创造力。如今,该探索的实践研究已经在全国多地乡村展开,培育了一百余位带头人,实现家庭平均增收二十余万元,为这些地方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②。

这种从系统性整体观出发的乡村建设,不仅仅停留在以创意设计赋能帮助乡村创立品牌,创新乡土特色产品的范畴,而是在就近就业、生产劳动、设计赋能之外还再现了当地的生活方式^③,为修复乡村的文化生态、激活村民内生动力做出了积极的尝试。真正做到了挖掘民间手工艺的珍贵价值,通过激活村民内生力、发展村庄吸引力的科学机制,强化民间手工艺在乡村中的重要作用,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三、以内生力和吸引力平衡发展修复乡村文化生态多样性

综合上述案例可知,当代乡村发展,内生力和吸引力是全面振兴的核心要素。应通过挖掘特色

① 顾涛:《工的黄金时代》,选自《百工》,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35页。

② 丛志强、黄波等:《乡村家庭资源共享设计研究——来自浙黔两省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实践》,《装饰》2022年第4期。

③ 左靖:《黔县百工》,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年,第425页。

内容、开拓在地品牌、激活内生动能、修复文化根脉,从多元视角重建乡村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全面修复乡村文化生态的多样性。

(一) 挖掘在地文化艺术资源促进文化自觉,增强文化内生力

乡村文化生态的脆弱性主要源于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的冲击。商业社会的工业化生产直接导致了传统乡村的生活方式改变,农民背井离乡外出务工,这种状况之下难以生成文化自觉。此外,传统乡村的手工生产耗工耗时且市场狭窄。特别是我们所谓的文创设计,经常是城市设计师对乡村文化元素采取拿来主义,通过符号、母题的设计重构,用工业化的方式生产制造,以廉价材料和低端产品充斥市场。虽然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播作用,却剥夺了手艺人劳动的权利和手工生产的微薄收益。如果乡村手艺人仅有的市场都难以保证,民间手工艺的传承就无从谈起。因此,修复乡村的文化生态,首先需要建立底线思维,保证农民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不论是经营者还是制造商,都应尽可能充分地挖掘在地的文化艺术资源,帮助守护乡村手艺人赖以谋生的基本生存底线。在地资源的挖掘转化,需要经营者和设计师驻村进行长期调查研究,在充分理解在地文化的基础上用创意设计提升乡村传统文化的时尚转化率,做出令当代人能够接受的特色产品。根据不同需求的群体,开发文创衍生品,突出在地的历史文化价值、民生经济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从文化自信、价值认同、新知识融入、活化传承几方面触发乡村自身造血功能,逐步引导村民的文化自觉意识,增强村民的文化内生力。

(二) 开拓在地文化品牌,提升文化吸引力

由于我国乡村旅游产业刚刚起步,各方主体的经营管理经验有限,对品牌建设缺乏深度认识。导致乡村特色旅游项目的文化渗透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很多乡村盲目跟风开发旅游资源,在经营中缺乏有效策划^①。特别在手工艺产业的项目开发、宣传推广与服务等方面均缺乏有效定位,吸引力成效不显。

反观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推行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大力打造品牌农业,将农产品的生产服务与当地特有的自然、历史、风土、文化和社会元素有机结合,强调农产品的地方特色,建立健全农业品牌规划,实行规模化与品质化生产^②。以农产品加工和乡村旅游为突破口,推行“一村一品”、“一村一艺”运动,作为连接城市和乡村的桥梁,广泛宣传传统民俗文化在国民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强调民间手工艺与工业文明并存互利的重要性,激发了日本现代手工艺的大幅度飞跃^③。例如日本茨城县笠间市从日本江户中期开窑烧制陶瓷,至今已有两百多年历史,“笠间烧”是这里唯一的产业。传统的生产方式均为手工制作,且多为个人制作的单件产品。1974年日本政府颁布《传统工艺品振兴法》之后,“笠间烧”产业得到快速发展,窑址数目大幅度提升,从1950年的12个跃升至2000年的330个。产品种类也日益丰富,除了生活实用器皿的制作,还扩展到陈设陶瓷、现代陶艺、壁饰、壁画等方面。现在,“笠间烧”已成为继爱知县的濑户烧、常滑烧,福井县的越前烧,兵库县的丹波立杭烧,冈山县的备前烧,滋贺县的信乐烧这日本六大古窑之后又一个制陶业代名词,成为集陶瓷产业生产、工匠日用陶

① 曹世燕:《我国农村特色旅游品牌建设的问题与对策》,《农业经济》2018年第3期。

② 贾磊、刘增金、张莉侠等:《日本农村振兴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农业现代化研究》2018年第3期。

③ 周静:《日本传统手工艺的保护和发展》,《艺术与设计(理论)》2011年第7期。

瓷制作、艺术家陶艺创作、业余爱好者学习体验的一个综合性陶瓷品牌^①。

台湾地区效仿日本经验,也在乡村手工艺振兴方面获得了高速发展。起源于19世纪初的台湾三义木雕,在日据时期苗栗县三义乡的村民将山林中废弃的樟木头捡回加以修饰制成浮雕工艺品,被日本人大量购买。后来木雕手艺人学习了日本雕刻技法与原有技法相融合,将浮雕转变为立体木雕。二战后,三义木雕在日本市场之外又开拓了美国市场,木雕商品主要销往美日两国。之后台湾手艺人聘请福州木雕技师传授雕刻技艺,再度提高了产业水平,生产规模也得到较大提升,当地居民约一半以上都以木雕业为生。1976年后随着全球经济危机到来,销量下降,出口转向内销,从业者将木雕产品推向艺术品范畴。1995年三义建立木雕博物馆,用以提高品牌知名度,提升技艺和创新题材,三义木雕的雕刻题材开始加入乡土特色内容。随着台湾旅游业的发展,为了扩大木雕艺术纪念品市场,当地从业者跟随时代潮流为进入市场竞争而做出改进,将传统技艺与现代艺术相融合,通过技能培训不断提高制作水平,以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使产品可以更好地融入旅游市场。台湾中正路上雕刻店林立,三义木雕成为台湾民间手工艺的著名品牌^②。

因此,中国的民间手工艺介入乡村振兴,修复民间文化生态,在地品牌的开拓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传统文化艺术资源的产业化管理,更需要树立良好的、鲜明的品牌形象。除了有利于品牌识别、优化旅游形象、提升服务水平,还能大幅提升乡村旅游的吸引力,调动在地从业主体促进品牌增值的积极性,保护村民与消费者的利益,利于品牌传播。

(三)使用乡土材料在地制造激活内生动能

乡土材料是民间手工艺制作的物质保证。我国各地物产资源各不相同,特定区域内的物产资源是传统工艺地域性特征形成的物质基础。民间手工艺品的制作原料大多采用天然材料,讲究就地取材,用传统的手工方式制作而成^③。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手工艺正是因为当地有合适的材料才产生的,如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竹纸制作技艺、祁门红茶制作技艺、宜兴紫砂制作技艺等。地理与气候等自然环境因素决定了各地有着迥异的社会风俗,由特殊的习俗催生的民间手工艺自然有着鲜明的地域性。许多手工艺对于地理与环境的要求非常的严格,如只有贵州赤水河地区的气候与水土环境中才能够酿造出茅台酒;佛山地区生产的香云纱,是用广东地区特有的中草药植物“薯莨”块茎汁液多次浸渍、晾晒后,使织物附着一层黄棕色的胶状物,再用佛山地区含有铁离子的灰黑色塘泥均匀涂敷于织物表面,反复多次晾晒、水洗后制成正面黑色、底面咖啡色的面料,被视为中国丝绸的上等佳品^④。再如广西环江县毛南族花竹帽,是采用当地盛产的金竹和墨竹篾子编织而成,其工艺精致、花纹美观、帽形大方、结实耐用。竹材生长周期短且耐用,作为乡土生态材料非常适宜产品开发。掌蔑和剖丝工序力气活偏多,主要由家庭的男性成员完成,编织工序需要更多的技巧和审美,则主要由家庭中的女性成员完成。家庭成员在制作技艺上的分工配合成为当地文化生态的表征,劳动过程也具有乡村旅游的观赏性和体验性特征。在从事生产劳动的过程中,民间手艺人通过生态

① 赵云川:《传统手工艺“活态”生存的可能性——日本“笠间烧”田野考察及启示》,《民艺》2019年第2期。

② 郭逸飞、钟蕾:《从台湾三义木雕看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保护》,《包装工程》2016年第20期。

③ 家伟编著:《中国手工艺文化》,北京:时事出版社,2019年版,第1页。

④ 王逸格:《以美与执着,撑起莨绸的天空》,《创意世界》2017年第6期。

材料、手工技能到旅游商品的价值转换,通过收益激发了从业的热情,从而产生劳动的积极性和内生动力。

就地取材是降低生产成本的最佳方式。乡村蕴藏着最为多样性的乡土材料,但许多生态材料和生产工具被工业化时代的塑料、钢铁和陶瓷替代,这也是乡村文化生态多样性缺失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乡村传统文化的振兴,必须要强调乡土材料的运用。田间地头的乡土材料随手可得,直接节省运输和购买成本,减少环境污染。关于乡土材料,手工艺从业者和设计师需要做的主要有两方面工作,一是在地特色材料量身定做创造性转化的产品,例如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院张继晓老师主持的“北京生态涵养区林杂木材料工艺品创意设计人才培养”项目,通过公益培训引导在地手艺人利用林杂木开展特色旅游产品的设计创新;二是在缺乏特色材料或项目的情况下,充分挖掘平凡的材料进行艺术再造,开发出具有特色的创新型材料,使废旧或无用的材料获得重生。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输血式的扶贫不具有持续性,争当贫困户的现象是对乡村文化生态的进一步破坏。因此,乡村文化旅游产品的设计和生产制造过程,应尽可能贯彻以乡土材料在地制造的原则,充分调动乡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使新型产业农民在生产劳动中获得收益和尊严,实现自我价值认同,激活乡村的自身造血能力和内生发展动力。唯有如此,乡村手艺人才能实现自己的文化传承和生态的修复。

(四)以手工艺体验修复乡村传统文化根脉

乡村手工艺是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农耕文化为本质,以农民为主体的融价值观、家族文化、生活环境、生活方式、民俗风情、民间艺术等物质和精神文明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①。通过打造看点,推介土特产,政府、社会和村落成功地将观看人潮转化为消费群体,获得巨大的社会效应与经济效益^②。

乡村传统文化建设的最主要表现是重视传统文化教育,亦是乡村自治体系中家风、乡风文明的理论基础。在实践中,许多以文化旅游为基础的乡村为游客和新村民提供的手工艺非遗体验服务,逐渐成为修复传统民俗文化的有效途径。这些体验服务以挖掘乡村传统文化特色的生活方式体验为导向,对村庄原住民、游客和新村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文明家风和良好行为规范作用显著,在新乡村建设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在挖掘传统特色内容的乡村建设实践中,“主题文化”挖掘和“手工非遗体验”能够在乡村的品牌建设、文旅体验、产品研发等方面发挥出强大的动能。

以民宿为例,民宿是乡村社区的共享空间载体。中国的民宿数量与日俱增,但同质化问题突出,能够良性运转的民宿屈指可数,归根究底是文化特色的缺失。针对这一现象,乡村的特色民宿建设通过主题文化的设计策划提升宜居环境的内在文化品质,能够在文化生态修复方面起到示范作用。民宿环境营造,要兼顾原生态文化的保护^③、民间非遗的教育传承、文创产品的创新再设计、乡村旅游的主题文化挖掘。即充分挖掘乡村在地文化的附加值,适度将具有地方特色的主题文化植入乡村景

① 朱启臻:《留住美丽乡村——乡村存在的价值》,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页。

② 马光亭:《现代时间制度:理解非遗项目生产的一个角度——以青岛田横祭海节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0期。

③ 龙泽江、曾羽:《原生态文化的保护与开发模式》,《民族论坛》2012年第4X期。

观和民宿的室内环境,并结合传统文化艺术资源的产业开发、产品生产和销售,使传统的博物馆展示教育功能,旅游纪念品的销售功能,与乡村民宿的居住体验功能有机融合。加入了特色文化主题的民宿空间,在适度运用主题元素营造环境艺术氛围的基础上,还能够将手作体验、教育培训、产品销售等环节自然融入,围绕民间手工艺非遗主题,经营非遗的文化创新。通过一系列文化主题为吸引标志,追求从环境体验、特色服务到产品销售等方面的整体创新,从产品、氛围到服务都围绕一个精心挑选的主题展开。由此,乡村民宿不再是一个就住论住、就吃论吃的地方,而是传统主题文化与时尚生活方式的结合,让人们在民宿的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地体验到乡村的传统民风民俗^①,从而通过民宿这一载体,将传统民俗文化的生态修复过程融入其中,也通过创新设计服务重新塑造乡村的生活方式与沉浸体验。

从整体发展策略的角度,基于乡村已有的旅游基础,挖掘村落传统文化特色,就乡村的建设发展和文化提升,包括整体战略定位、业态分析、品牌资产管理、文创产业开发、未来的发展维度等综合考量。对于旅游市场已经趋于饱和的乡村而言,为游客和村民制定一套创新型的文化提升战略,强化品牌意识,完善生活业态,配套文化体验,打造特色品牌,引导正向传播,是至关重要的。

激发乡村多元主体的文化自信和自觉,充分挖掘和整合乡村的文化艺术资源,合理重构乡村的集体记忆,能够有效推动产业兴旺、促进乡村文化振兴,重建乡村共同体的精神家园^②。民间手工艺文化元素挖掘以及系统生活方式的构建,使原有的乡村旅游实现消费品质的升级成为可能,既改善了乡村旅游的商业模式,又修复了村落的传统文化根脉。通过手工艺创新方法的介入以及整体策略的实施,具有理论上的可持续性和实践层面的可实现性。

四、手工艺产业创新发展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

民间手工艺的创新发展,是推动乡村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和经济自治的有效手段之一。具体的做法是通过手工艺产业振兴,助力乡村文化产业升级,实现对乡村的文化复兴和精准扶贫,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乡村手工艺资源能够通过乡村文化产业经营者、驻村设计师与手工合作社跨界联手组成的创新团队构建传承创新的通道,打通都市与乡村的文化发展脉络,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城乡融合。具体的实践步骤可以归纳为“乡村文化艺术创新六步法”^③。

第一步,创新团队首先要驻村进行田野走访和调查,通过学习地方知识和文化发现当地的文化特色和瓶颈问题。如民族特点、风俗习惯、生活状况、技艺水平、使用材料、市场渠道、营收情况、特色内容、审美能力、创新能力、从事手工活动对生活的影响等,记录手工作品、技法、色彩搭配方式、材料使用和主题内容。结合文献调查,通过历史文献、地方志、口述史、博物馆、文化馆、收藏家等资料的收集汇总,掌握全面的地方性知识和文化。

① 潘富:《生态文化旅游视角下的民宿旅游发展策略》,《时代经贸》2018年第18期。

② 鲁可荣、胡凤娇:《以竹为生:乡村传统手工艺的集体记忆建构及价值传承》,《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③ 陈雨婷:《非遗设计怎么做》,《创意世界》2017年第6期。

第二步,进而采取互动交流的方式,与手工艺传承人沟通传统与时尚的认识,加强彼此理解。并经常进行常规研讨,对日常发现的问题和对策及时讨论,新知识集体学习,重要内容及时做出总结。在阶段研究和探讨基础上,确定一系列手工产品的再设计主题和研发方向。

第三步,从业者与驻村设计师共同进行乡土品牌和产品的文化产业策划,结合地方特色深入挖掘可进行再设计的元素,提取传统文化艺术资源中值得借鉴的内容,如特色形态、图案、肌理、色彩搭配方式、专属构图、典型遗产、民族特色产品、工艺技巧、特色饮食、传统医药、历史故事、著名人物等等。将挖掘出的传统元素结合现代时尚元素,进行二次创作,改进(或恢复)乡土低成本材料、工艺,创新品类、造型和构图,帮助当地研发系列化产品。研发设计应不局限于原生元素的单一使用方式,而是运用开放性跨界思维,提升产品的丰富性、时尚感,尤其强调产品的实用性,并注重在地传承人群的可操作性。

第四步,创新品牌和产品经策划设计之后,还应整合优质教育资源和创客的创新设计力量,以集中教育的方式实施在地培训,指导在地从业人员理解传统与时尚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培训必要的创新技能。重点培养一批有创新能力的手工艺传承人和驻村设计师,有条件的要争取参加各级传承人群研修培训计划,解决在地创新问题。创新团队要通过驻村管理与服务的方式不间断地给予持续指导,以免原创缺失和品质下滑。

第五步,教育培训的同时,由管理者组织手艺人带动村民建立乡村手工艺合作社,进行样品的制作生产。深入挖掘地方性产业资源,将“科技与文化、传统与时尚、艺术与实用”^①相结合作为基本方针,以“在地制造”为基本原则,对适于市场推广的产品批量生产,通过文化旅游以及乡村电子商务的建设,为传承人群创造稳定的生产订单。还要帮助传承人或合作社打造品牌,及时进行工商注册和作品版权登记,进行专利申请,提前保护知识产权。

第六步,逐步将具有特色的手工艺产品投放市场,开设线上线下专营渠道和非遗工坊,打造乡村旅游手作体验中心,用综合手段实现营销推广。对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乡村文化和旅游能人、乡村工匠等评选优秀带头人,以乡贤力量带动民间手工艺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这一路径,乡村文化产业从业者和驻村设计师的创新策划设计能够为乡村手工艺的发展带来新的面貌和综合消费渠道,在地制造能够给乡村劳动者带来切实的福利,以手工艺产业发展带动在地手艺人自我造血,吸引外出务工农民返乡就业,促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成为更加多元化的新型产业化农民。彼此的融合能够促进乡村文化产业设计与制造品质的升级,也有效增加了销售实体的特色创新产品。

乡村传统文化艺术资源特别是民间手工艺资源,经过设计研发、生产组织、产品销售,通过当代创新性设计艺术的解构和重构,使乡村渐趋一致的文化生态模式重新焕发活力,并服务于当代的城市文化生活和农村经济发展,做到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修复传统村落的文化生态,重建乡村生态文明秩序。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进步对于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发展生态农业、绿色农业有

^① 宋慰祖:《“大洋全”与“小土巧”——谈工艺美术产品创新设计》,《流行色》2018年第5期。

着巨大的促进作用^①,同时也是乡村文化和经济实现自下而上、自我治理的强有力手段。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乡土社会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社会”^②,依靠着“差序格局”的基础结构维系着乡村的道德治理^③。对于新时期的乡村振兴战略而言,不论以哪个维度参与到乡村生态文明的建设中来,对于重建乡村传统文化的生态秩序,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手工艺产业创新和传统文化艺术资源挖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乡村振兴的路径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只要运用系统性的方法论和正确的实践步骤,平衡好创客与农民之间、文化与商业之间的关系,建立健全乡村的治理体系,乡村振兴是不难实现的。系统化的策略方法论使得乡村建设有章可循,不至于局部开发导致村落发展的营养不良;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操作步骤和措施使得每一个传统村落在开发过程中还能够保有其原本独具特色的自然生态环境和文化生态内容不致断裂,实现可持续发展。总之,中国乡村的创新发展或者产业开发,都应该遵循系统化和因地制宜的大原则,使乡村的综合治理回归到自觉、自信发展的轨道上来。

责任编辑:董德英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and Cultural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 Case Study of Folk Handicrafts

Zhu Lifeng

School of Art,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In addition to the three basic dimensions of autonomy, legal system and moral governance, the current governance system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lso needs to activate the endogenous kinetic energy of rural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dimension of cultural ecology restoration, and explore its characteristic development path for each village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Handicrafts play a rol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correct steps and methods, which is a characteristic path to restore cultural ecology and realize comprehensive rural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priority restoration of rural cultural ecology, the "six-step method" of rural cultural and artistic innovation is practiced,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handicraft industry is driven by innovative services,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ecology is established and restored by local brands, and the roots of rural traditional folk culture are restored by experience with making handicrafts. The self-strengthening ability should be activated and cultural awareness of rural workers should be raised so as to improve the rural culture and economic autonomy system.

Key words: cultural ecology; folk handicraft; rural revitalization; governance system

① 郝爱民:《城镇化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门槛效应》,《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②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1页。

③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4页。



史家亮,1973年生,山东莒南人,法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理事、山东省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秘书长、济南市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山东高校思政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入选“山东省理论人才百人工程”,荣获“山东学校思政课教师年度人物”“山东省优秀研究生导师”等荣誉称号。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党的建设研究,已出版《价值哲学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人民性研究》《中论与我国社会的和谐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专

论》3部专著,参与撰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性研究》《中国共产党道路创新史》等10余部著作;并在《人民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理论探索》《理论探讨》《东岳论丛》《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理论学刊》等报刊发表论文60多篇,其中多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摘编或转载。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价值哲学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人民性研究”(11BKS02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2项及其他省部级项目5项。



章罗生,1954年生,湖南韶山人,文学博士,湖南大学纪实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纪实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兼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纪实文学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中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老舍研究会常务理事,鲁迅文学奖评委等。已出版《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中国报告文学新论: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创新与发展》《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审美新变》《新时期报告文学概观》《老舍与中国新文学》等专著6部。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丛刊》《民族文学研究》《鲁迅研究月刊》《社会科学战线》及《人民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文艺报》等报刊发表论文200多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科学术文摘》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摘编转载。已独立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4项:“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审美新变及其理论意义”(06BZW054),“中国现当代纪实文学研究”(11BZW120),“新时期纪实文学四十年”(18FZW049),“中国现当代纪实文学(1898—2021)”(21FZWB019)。其成果多次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全国报告文学理论奖、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



《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度重点选题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为推进期刊高质量发展,结合期刊现有发展实际,现发布《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度重点选题,包括重点栏目、特色栏目和年度重点方向三个方面,欢迎海内外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学者惠赐佳作。

一、重点栏目

1.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 东方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

二、特色栏目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2. 国家建设与社会治理
3.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4. 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5. 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研究

三、年度重点方向

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重点关注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天人合一等主题。

2. 共同富裕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重点关注共同富裕理论与实践、新型城乡关系、多元化社会保障体系、乡村振兴、乡村社会治理等主题。

3.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中国式现代化特色研究

重点关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中国式现代化特色的理论构成、批评话语体系建设、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继承和创新、中西文学现代化比较、新媒介文学艺术现象考察等主题。

4. 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创新

重点关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普惠金融、绿色金融、数字金融、科技金融、消费金融、农村金融等主题。

5. 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与治理智慧

重点关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的社会治理经验与教训、慈善文化和社会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古典生态思想、民俗文化 with 历史遗产、社会发展与环境变迁等主题。

6.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

重点关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民族事务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等主题。